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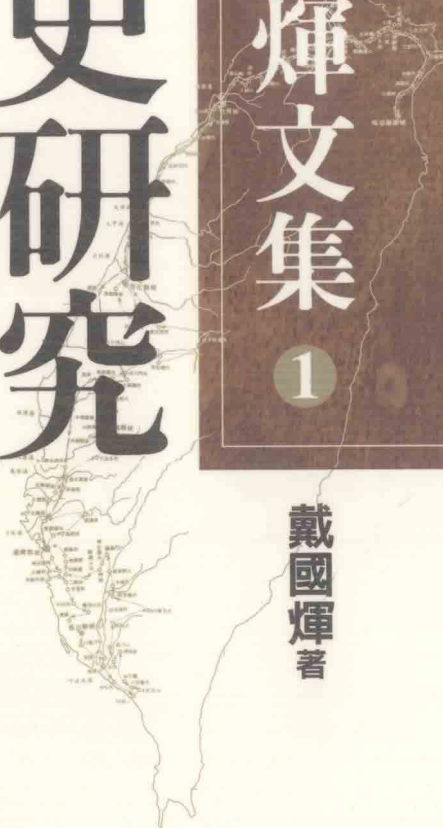
# 戴國輝文集

1

戴國輝著

# 台灣史研究

回顧與探索



戴國輝教授(一九三一年~二〇〇一年)終其一生,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至「李登輝時代」,大學畢業後即留學日本,旅居日本四十年,終老於台灣故鄉,遺志將骨灰灑在台灣海峽聯繫原鄉與故鄉。

從作為一個「殖民地的孩子」到「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由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到名滿東瀛的台灣史學者,戴國輝是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也是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他把他的研究和他的生命化為一體,他的生命決定了他的研究,他的研究重塑了他的生命。戴國輝的台灣史研究不同於一般學究,乃至於他的台灣史研究其實就是他生命的追求。所以,他不儘是台灣近現代史的學術研究者,他更是這一段台灣近現代史的代言人。

他曾經引述他二哥的話,說明他台灣史研究和生命的追求:

「我們都是被扭曲的=殖民地的孩子。如今,殖民地傷痕的本身成為我們不得不起步再次出發的原點,做為重新開關的新道路的基石,我們必須好好地活用這個悲痛的经验。我們一邊要痊癒殖民地的傷痕,一邊要超越它,必須將殖民地遺制的所有東西加以手段化、相對化,經過克服以變成我們自己能掌握的工具及東西。

對於圍繞著我們的殖民地傷痕糾葛的本質及核心事物;我們只有通過內省和對決,才有可能擴大做為自舊殖民地被統治者身份求新生的內在自由之嶄新境界。」

在旅日四十年間,由於「黑名單」,他長期不得返回自己的故鄉台灣,一個人孤寂的、苦心的、認真的、嚴肅的在日本,擺脫了島內權力的是非恩怨,以「隔離的智慧」,敏銳的眼光,以「內在自由之嶄新境界」,觀察著故鄉歷史的發展,記錄著歷史的發展,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愛妻林彩美女士。

戴國輝的視野遼闊,涉獵廣博,從史學、文學、經濟、政治到國際關係,著述內容從日據時期到李登輝;包括「二二八事件」、「台灣新文學」、「霧社事件」、「原住民研究」、「白色恐怖」。

戴國輝的中日文著述甚豐,在他逝世一周年後,七十冥誕之際,我們把他的中文著述匯編成《戴國輝文集》以紀念這位維護台灣人歷史尊嚴的「殖民地的孩子」和台灣歷史學家。並將這一份真正的有尊嚴的台灣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奉獻給戴國輝所熱愛的故鄉台灣。

——王曉波

戴  
國  
輝  
文  
集

**1** 台灣史研究  
——回顧與探索

---

戴國輝文集【1】

## 台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

---

作 者——戴國輝

總 策 畫——王曉波

主 編——林彩美

執行編輯——陳淑美·李佳穎·洪淑暖

封面設計——唐壽南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發 行 人——王榮文(遠流)·魏德文(南天)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電話◎(02)2365-1212 傳真◎(02)2365-7979

郵購劃撥帳號◎ 01894561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1 樓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購劃撥帳號◎ 0108053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四樓 505 室

電話◎ 2508-9048 傳真◎ 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2000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2002 年 4 月 1 日 初版一刷

**全套售價◎新台幣 6000 元** (套書不分售)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586-8 (套)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mailto:ylib@ylib.com)

◎南天書局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 [weitw@smcbook.com.tw](mailto:weitw@smcbook.com.tw)

# 代序

## —— 布扣唐裝的耕耘者

享譽日本的戴博士

兩年之前，當我初來東京的時候，時常去光顧神田神保町的書店街。在那裏，我第一次看到了四本戴國輝的日文著作：『境界人的獨白』，『日本人與亞洲』，『華僑』，『臺灣與台灣人』。但因我日文尚待進修，不得不暫擱在一邊。後來，偶然與一位日本新聞界的朋友聊天，談起這些書來，承他告訴我，戴的日文典雅優美，遣詞用字，特別講究，其造詣之深，連一般日本記者，亦常嘆為觀止。他還特別告訴我說：中國知識份子在日本學界和出版界享有盛名的，一共只有兩個半：陳舜臣享譽文學界，戴國輝享譽學術和評論界，另外半個就是商人兼寫金融評論文章的邱永漢。

這年秋天，世界性的客家人組織崇正會在日本東京開「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日本各報均有報導，而日銷七百多萬份的日本第一大報『朝日新聞』卻破例以全版登出一個座談會記錄（一九八〇年〇月二日），介紹並訪問了這次的大會以及其領袖人物，特別突出了戴國輝這個人物的言論。這件

事在日本的華僑界轟動一時，令人刮目相看。以日本新聞界的保守，以及其壁壘之森嚴，排外性之濃厚，卻居然肯花這麼大的篇幅去重視中華民族中的一個民系，也是日本華僑中的少數派的客家，這如果沒有戴氏在日本學術界、輿論界被肯定的影響力，則「朝日」等等大報必無此舉。

### 布扣唐裝，客家常菜

我第一次拜訪戴國輝博士，是去年（一九八一年）秋天的事。

那天，我單槍匹馬跑到他任教的立教大學，找到了訊問處，要求他們給我找一找戴教授的住址和電話號碼。辦事人員先仔細地看過我的「外國記者證」，然後，給我一些表格，填完，他就一邊交給我地址，電話號碼，一邊告訴我說：「如果你願意到他的東洋史研究室去看一看，有時可能在那裏碰到他。」我沒有找到他，只好用電話約好時間，安排在他下課以後，在學校碰面。

我記得是一個晚秋的上午，當我依約前往時，出現在我眼前的中年人，居然穿的是一套藍色的布扣唐裝。我簡直無法相信是置身在東京聞名的教會大學的校園中。這中年人寬肩膀，壯碩的身材，濃眉大眼，頭髮微白，黝黑的臉孔上，散發着一副中國農夫質樸厚重的氣質，只有那對炯炯有光的大眼睛，不斷透露出智慧的光芒。他沒有半句客套話，好像見到一個老朋友那樣自然地說：「這邊新開了一家客家餐館叫東江樓，菜做得不錯，我們到那邊去。」——我要先改一篇小文章，大概要花半個小時，等改完後我們再談天。我請你吃中飯，吃客家常菜。」

等工作完了，我們交換了名片，閑談之間，那餐館主人來問我們吃些什麼？我說什麼都吃，戴

氏一聽，連一句客套也沒有，便說：『那好，就來兩人份牛肉湯，來幾個大饅頭。我們吃饅頭吧！』這就是我被請吃到的「客家菜」，也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 不願學醫偏習農

戴國輝博士祖籍廣東梅縣，出生在臺灣中壢。他在日據時代考進州立新竹中學，日本戰敗後，他畢業於臺北建國中學高中部，卻因反對他的父親要他學醫，躲開了臺大的入學考試，跑到臺中農學院去讀農業經濟。他對這一個選擇，追憶着說：『其實學農也許對我是很偶然的，但是，分析起來，也有若干種因素，第一，我在高中時代曾經到過中部臺中、彰化一帶去旅行。中部以林獻堂爲主的抗日事蹟，以及那時臺中公園、中部秀麗的風光，給我留下了一個難忘的印象。第二，對中國這樣一個古老而又窮困的國家，必須要根本解決農業問題，而解決農業問題尤其重要的是農業政策，這使我決定學農經。第三、學醫是日本殖民地政策之下，臺灣知識份子的主要出路之一；但我痛恨以醫道來發財，我認爲這是十分醜陋的事。我的叔叔學醫，開業之後，財富增加了，但靈魂卻被金錢蛀蝕掉。有這殷鑑在先，我毅然決然違背了我父親的意願。』接着，他又說：『我這樣分析，聽起來未免過份冠冕堂皇，然而在我的高中時代，我就有着相當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漫色彩，希望自己追求學問，爲中國前途設想，應摒棄名利，過着田園生活，與世無爭。』

### 以蔗糖論文獲東大博士

一九五四年大學畢業後，服了一年兵役，面臨着出國繼續學業的問題。是留日呢？還是留美？戴氏本意是到美國去研究其大農制，及第一手的學問。但因他的二哥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強制徵去當兵，戰後復員，仍留在日本，很少寫信回家，家人很不放心，就派戴氏去日本看個究竟。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搭乘螺旋槳飛機，經過八個小時，飛到日本羽田機場，會到了他的二哥。他的二哥勸他留在日本念完碩士再赴美，但由於日本人在戴氏腦海中的印象過份醜惡，頗感猶豫。他二哥對他說：『你是學社會科學的，應該知道理論分析。你恨日本人，恨他們個人是沒道理的，他們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受害者，我們要冷靜來看待日本，須知毛病在於侵略，在於制度。有那種制度，才有了那醜惡的過去，一般和我們同樣受害的日本老百姓是無辜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戴氏考入東京大學。他是戰後第一位正式考進東大農經研究所的中國人。從此整整十年，在東大獲得碩士，博士兩個學位。他涉獵的不僅僅是他的本行，他自由自在，以東大的設備，鑽研範圍相當之廣泛。他一邊看，一邊寫，還要賺錢生活。他連任第一、第二屆東大中國同學會總幹事也就是會長，出版會刊『暖流』。他主張個人的政治活動應該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不贊成在同學會內搞政治。他自己是一直保持着獨立而又超然的立場，對於東大的校風與設備，他感到彌足珍貴，努力學習。

一九六六年戴氏以『中國甘蔗糖業之發展』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曾予以頗高的評價（李氏為中國科學史的世界最高權威），他自己認為書之好壞自有社會公論，著作者不應表示意見。但他是第一個將中國甘蔗糖業史作有系統的分析整理者。其中收集的古典資料極為豐富。他也是國人在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的第一人。



## 致力臺灣史的研究

畢業後，他東大的老師東畑精一博士主持亞洲經濟研究所，延攬戴氏任研究員，專門研究臺灣的經濟和農業等問題。他之接受此一職位，受到兩位臺灣農業界前輩的影響，其一是徐慶鐘博士，另一位是李登輝博士。遠在戴氏擔任東大同學會會長的時候，徐、李二氏來到日本，找了戴氏討論臺灣經濟等問題，特別要求戴氏多多留意有關於臺灣的研究。此外，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也促使他轉向臺灣問題的研究。那就是，一些人錯認爲日本殖民地政策把臺灣近代化了，所以才有今天的經濟繁榮。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在亞洲經濟研究所近十年之間，參與該所編著出版了兩部大書，一部是『臺灣經濟綜合研究』，另一部是『臺灣之農業』。他沒有公開出名，但實際主持人卻是戴博士。

這時，隨着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朝野開始注意到他們的近鄰，也就是亞洲，東南亞的市場，因此須要研究華僑社會。六九年日本官費派戴氏率領東南亞考察團赴東南亞，他路經離開了十四年之久的臺灣。農復會沈宗瀚先生，蔣彥士博士接待了他，派車派人陪他參觀了臺灣的農業，以及臺糖公司的綜合經營。次年年初回到日本，他開始主持華僑的研究，給研究所主編上、下兩冊『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另外一套中、日、英文的『華僑文獻目錄』。在這個崗位上，他研究華僑；但在另一方面他致力於臺灣史的研究，並廣泛收藏了有關臺灣的史料。就質與量來說，今天日本學界公認戴氏這方面的收藏之豐富，舉世第一。日本人統治臺灣這個問題的全貌和它應該佔一個什麼位置？這是他非常關心的事。這時他的工作也有了重大的改變。就是立教大學聘請他擔任正教授，於是他就開始全神貫

注，致力於臺灣歷史的研究。

### 感謝日人吃臺灣奶嗎？

戴氏斷言，日本人對臺灣之殖民統治絲毫不是爲了臺灣人的利益。因此，臺灣人沒有任何理由感激日本人的統治。就事實上說，臺灣在一八九五年日本侵佔之前又是什麼一種面貌呢？戴氏從臺灣史中找出了答案。他發表了「清末臺灣的一個考察」一文，他從清末的洋務運動，在臺灣設郵局、電報、開礦、製糖、製樟腦、鋪設鐵路……等等，一連串工商活動，證明臺灣在日本侵佔之前，已經有了建設條件，有了基礎。此文曾引起日本學界相當的重視。戴氏認爲，殖民統治普天之下沒有好制度，完全是壞制度：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一無是處。他舉例說：日本人爲了自己的利益養了一頭乳牛——就是臺灣，目的是要榨取牠的奶，這一頭牛長大了，日本人拚命吸牠的奶。但是，他們戰敗被趕回日本去了，他們無法把這頭母牛——美麗寶島——帶走。要注意，這母牛吃的却是臺灣土地上長出來的肥美的青草，是吃我們自己的草，牠以後能繼續長大，難道應該感謝日本以前吸牠的奶嗎？我們絕不能把日本人當做阿公阿婆來看待。歸根究底，臺灣本身先有條件，先有人材，又利用洋務運動引進了不少歐美先進設備，日本人利用這些基礎，展開了他們血腥的殖民統治，以統治者的姿態，壓榨了我們，傷害了我們。這是絕對的壞制度，我們痛恨都唯恐不及，有些鄉親卻去感謝日本人，民族的尊嚴何在！

## 主持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在一九六九年，有一批日本青年想要研究臺灣，找到戴氏，希望他能從中協助。戴氏最先婉拒，後來經不起他們一再堅持，終於在一九七〇年夏季，成立了一個純學術研究團體「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此會以戴氏為核心，會員三十多人有教授、醫師、經濟學者、學生等等，包含了日本人、美國人、澳大利亞人，當然也有中國人。此會成立業已十年，出版會刊三期（一九八四年冬已出到第五期），發表了有關臺灣近、現代史的論文與珍貴的機密資料，經常舉辦小型講演會，討論會。該會刊為一專門性高水準學術刊物，在歐美主要圖書館及國內均有收集。

戴氏這些年來，除了在立教大學專任教授外，在東大，一橋大，學習院大，鹿兒島大等校兼任。除了教書，他連續出版的專書已有十部。除了撰寫這些書，還給期刊、報紙寫文章，上電視，為財經界、政界、學術界發表專題演講。他交遊遍天下，在四大洲都有知交。他並熱心於東京的客家系華僑公益活動，同時又是三個孩子（兩男一女）的爸爸，可以說是標準忙碌的現代學人。但是，筆者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中年一代，也就是在戰爭中成長的那一代人，保持了舊時代優美的一面，樸實而堅強，敬業樂群，樂於助人，在學術上保持超然的立場，卻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在日本這樣排外，這麼名利爭逐的社會，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出了名的學者，要堅持原則，比登天還難。戴國煒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客家人，擇善固執，走一條艱難的道路。

## 揭露霧社事件真面目

一九八一年由戴國輝主持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共同執筆的一部最完整的『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出版了。此書從收集資料到與讀者見面，共歷十個寒暑，內容多為世人所未聞未見的資料，有些甚至是手抄本。全書達六百頁，共六十萬字，揭露了日本統治者猙獰殘酷的暴行。這不但給霧社事件還其真面目，同時表現了「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實力，也就是戴氏在史學上下的功夫。

這部鉅著問世後，日本出版界給予極高的評價，報章雜誌紛紛予以推介。其在學術界的貢獻，自有定評，筆者不必多費筆墨，唯一願在此一提的是，一九三〇年的霧社起義，日本政府以正規軍，現代化武器對付生活尚在半原始狀態中的山胞，其死傷之慘烈，為臺灣史上所僅見。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掩掩蓋蓋，不大願意提到，當年日軍對山胞竟用了慘絕人寰的毒氣，因而後來學者為了明哲保身，爲了在日本社會更吃香，投合日本人的口味，也對這敏感的霧社事件，盡量少去接觸。戴氏自當不揭露日本人這老底子爲聰明，何況，日本極右份子又高唱忠君愛國，戴氏就接到過恐嚇信與電話。但是，戴氏毅然接受出版社的邀請與「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諸同仁的要求，署上編者之名，其道德勇氣，實令人欽佩！

臺灣史的研究自然須要一批博學的史家來擔任，寫出夠水準的著作。更須要有骨氣與民族尊嚴的人，不討好日本人，不喪失自己民族的良知，才能寫出給我們後世子孫負責任的有骨氣的歷史。戴博

士正在這一條道路上，邁步前進。今後更多的著作，更高超的見解，和啓發人心的評論，是我們拭目以待的。

（陳中原，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於東京）

# 台灣史研究

# 目錄

代序：布扣唐裝的耕耘者——戴國煇博士

## 第一篇 自剖錄

● 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

● 晚清期台灣的社會經濟

——並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人治台史

● 爲「教科書問題」給東鄰日本的諍言

——一個台籍旅日歷史研究者的心聲

附錄一：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的往事

附錄二：隱痛的傷痕

附錄三：日據價值體系之批判

● 「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

——從自我體驗來自我剖析或解釋

一

一

二

二七

八九

九九

一〇一

一〇四

一一〇

## 第二篇 北美、扶桑對話錄

一四一

### ●「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

一四二

——與陳映真對談於愛荷華

### ●台灣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一八〇

——與李哲夫對談於華府

### ●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

二〇二

——陪內村剛介訪談楊逵於東京

### ●亦談海峽兩岸問題

二三八

——和李嘉、陳鼓應鼎談於扶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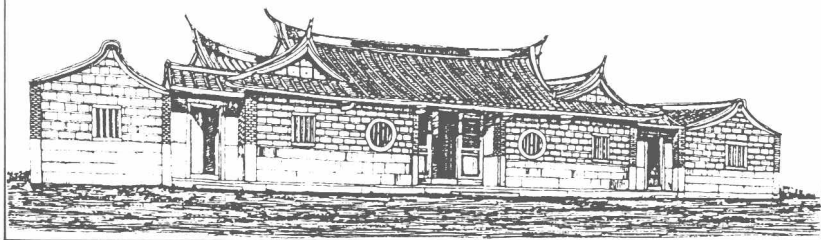
附錄：站穩在我們生活的大地上

二五六

### ●跋

二六二

第一篇  
自剖錄





# 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

主席，我所敬愛的各位鄉親。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次盛會，並能上台向諸位做點報告，感到非常榮幸。鄉弟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客家人，閩南話大概可以聽懂百分之九十。這個可能是得力於我太太，因為她是有四分之三的閩南系血統。在日本我遇到什麼人就講什麼話，只要對方的話我能講的，我是樂於那樣做的。

我並沒有只把閩南話、福佬話當做台灣話來形容過。鄉弟認為台灣話應該包括有高山各族的方言類，客家話以及閩南話也就是福佬話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有些「台獨」元老已把閩南話與台灣話畫成等號，甚至於把它定為他們所主張的「民主國」的國語來看待。這個對我們客家系台灣人來言，的確確「不是個味道」的。我認為那種看待是完全錯誤的。不過我倒很喜歡閩南話的一句話，也就是「騙呷（吃），騙呷（吃）」，我在日本已「騙呷」了日本朋友廿八年，授課、寫作、上電視、演講用的都是日本話。但今天不能用日本話，也不準備「騙呷」，只好老老實實向諸位交代並請教罷了。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很慚愧，過去我用中文發表的文章實在太少。主辦鄉親問我，有沒有什麼可供鄉親們閱讀參考的，在身邊只有一件中文一件英文的，我請主辦幹事幫我影印出來，這些原本仍是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找出來的。未到美國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鄉親來找我麻煩，要我獻醜的（笑），所以事先沒有準備，這一點要向諸位央請原諒的。

未講本題以前，我先對這兩份參考論文稍為做一點說明。

第一件是『台灣風物』雜誌所轉載的「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這個翻譯事先我沒有得到通知，等到譯完後譯者交給我一份譯稿的拷貝。但我一看很傷心，譯的不甚理想。一方面因時間匆促，另一方面無從改起，只好把它懸在一旁。沒有想到終於在第三十卷第四期被刊出來了。話得說回來，這一篇原論文是在一九七〇年發表的（成稿却在一九六七年），當年帶給日本學界一些衝擊，修正了不少日本人，甚至於台灣朋友對台灣歷史的某些看法。

### 批評日本刪改教科書

另外一件英文是「Advice for Japan as an Asian Neighbor」。這個該翻為「給亞洲的鄰居——日本——的諍言」的原文是去年（一九八二年）九月間發表的。當時日本恰好在開「篡改教科書」問題。文章是刊在『世界』（岩波書店發行）的一九八二年十月號（日本的月刊雜誌通常是提早一個月發行）。

我不敢自鳴得意，更沒有臉皮自我膨脹，但這篇文章確是得過好評的。或許是因為這個，芝大的

一些日本人（包括亞裔系的一群）學者把它翻成英文，小弟這一次來芝大訪問也是因為這篇論文受了注意，所以才被邀請過來的。他們翻得不錯，但有二、三個小地方我不甚滿意，據說他們將要印成書，斯時我當然會把它修改過來的。雖然這兩件都不是完整的論文，但只好暫時硬著頭皮請諸位過目參考就是了。

### 「我爲何研究台灣史」

現在，言歸正傳開始我的報告。今天我分三個大綱目來講。第一個是「我爲何研究台灣史」，第二個是「我（我們）的少少成果」，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在日本我們所組成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同仁而言的。第三個綱目是「來美以後的感觸」，我準備藉第三個綱目向諸位先進請教並一齊來思考一些問題，希望能暫時做出些結尾話。

剛才小弟已提過，我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他優點，當然也有不少缺點。有意識的客家人往往具有甚爲強烈的中原正統意識，有時偏激一點的客家老鄉會自稱這一種意識爲「客家精神」。老實講小弟本身多多少少也有這種傾向，帶有不知不覺被塑造出來的中原客家意識。從小家人就期待我，後來逼我唸醫，我始終反抗，認爲一個醫生，尤其是開業醫生在自己的小醫院裏，一天、一年，甚至於一生究竟能看多少病人，能救活多少人？而這些病人除了特殊的病例（特殊的病人往往私人的小醫生館是無能爲力的）以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營養不良，公共衛生未完備，教育水平過低而惹起的。既然中國人百分之八十是靠農吃飯，屬於農民地位的話，中國的基本問題當然是在農業問題上面。只要

能善於解決農業問題，解決窮困，克服我們的落後性的話，那就等於減少了一半以上的病人，所以我就選了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農學院）唸它的農業經濟系。匆匆忙忙地畢了業，受完了預訓班第三期的軍訓，我就出了國。這是一九五五年秋天的事。原來想的是留美，已申請到印地安那州立大學（昨天我頭一次跨了印地安那州界，有不少的感慨）的獎學金，準備來學美式大農經營，尤其是機械化稻作農業準備將來回國對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事業能奉獻出些能力。

### 考進東京大學的因緣

出國留學，我先到東京看我二哥，他長我十歲，非常疼我，我們已經十年沒見面了。他到日本留學以來，除了暑假回台省親一次外，因戰爭無法回家，光復後他一直沒有回台過。我二哥希望我留下來好好唸幾年書。但我却討厭日本，罵日本人，也不能原諒日本人。

我哥哥反而勸我說「我們得好好研究日本與日本人，你我都吃了日本人的苦頭甚多，我們當然可以討厭他們，當然亦可以大罵他們，但是那種情緒化的所作所爲，尤其是漫罵和恫嚇決不是真正的『戰鬥』更不屬於社會科學的。日本人在台灣，在大陸以及東南亞作了不少壞事，他們的確確胡作非爲作出違反人性的甚多錯誤。但我們知道那些日本人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體制下，也就是說在一種非正常的體制的框框之下做出來的。我們是否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其實日本的老百姓也跟我們一樣是受害者的呀！廣島、長崎的原子炸彈帶來的災禍是悲慘的，這些慘禍多半是由日本老百姓來承擔的呀！你該克服你的情緒化思考，同時你有與他們共謀光明的降臨之意願的話，你得原諒『過

去的敵人』，這兩點若是你自己做不好或者做不到的話，是沒有資格搞社會科學的。最好改行。

我被二哥說服了，很幸運的考上了東京大學，當時我對台灣史是有些關心，但並沒有太濃厚的興趣。所以我第一篇論文為「稻作農業與農業機械化」，第二篇為「中國農村社會的近代化與家族主義」是探討家族主義（familism）如何阻礙了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業的發展。不但不搞歷史，連研究對象都不屑放於區區小台灣。心理上一直嘀咕了有這種不甚成熟的「感覺」。現在想起來真有一點可笑。

### 慢慢走上「歷史」道路的小插曲

直到了準備寫第三篇，也就是博士論文時才慢慢走向歷史，同時把對象拉回海峽這邊的「寶島」來。這一段心路歷程是有個小插曲的。前年剛剛退休下來的徐慶鐘博士（前國府行政院副院長），他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邀請過我回台服務，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我們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請他來開座談會，因他是我們台灣人第一位拿到農學博士學位的好學之士，亦是我們龍潭鄉作為原籍的客裔人士，雖然他不會說客家話，我們都很尊敬他。他問我準備寫那一種題目的博士論文，我回答準備寫中國大陸的農業問題。他說，你為甚麼不研究台灣農業，我說台灣太小不夠味道，他笑一笑，「小是小，是我們鄉土呀！」，他說。

大概晚了半年左右，當時還在農復會當技正的李登輝兄（現在的台灣省主席，當年他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也來了東京大學訪問。我們東京大學農學院的中國同學們也請他來座談。散會後他邀請我到他住的旅舍，我們喝了茶、聊了天。他也問我，你準備以甚麼題目做博士論文，我同樣地回答他，雖

然對台灣有關心，但總認為台灣太小，不過癮等等的話。李學長勉勵我說，「真正研究台灣經濟史的人才太少，老戴請你多多考慮，用一點心研究台灣經濟史好不好？」

### 下功夫研究台灣史的原因

他們兩位學長的勉勵，當然只是後來促成我研究台灣及台灣史的一少部分的理由。真正喚起我對台灣史下功夫的原因，現在整理起來不外是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當年在東京的台獨運動主要人物有廖文毅、邱永漢、王育德等人。他們的主張當然不會是百分之百是錯的，並不至於百分之百沒有人去同情它的。但總而言之，他們的史觀，尤其是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看法以及評估，很多地方叫我不能同意。後來我發現「媚日」不限止於他們台獨人士，甚多台灣知識份子犯有同樣的毛病。這可不得了，我認為如此下去將自誤誤人，將給台灣以及中、日兩國國家間的未來關係都可能帶來災禍。

### 歌頌殖民主義的危險

第二，台獨的言論同時也可能給日本人帶來了禍水，台獨認為日本給台灣帶來了資本主義，促進了現代化云云的話，日本人一般聽起來很順耳，很可能就變成了甜言蜜語，這個可要害人不淺。為害的範圍很可能還要擴展到東南亞。

這個話怎麼說呢？一般來說，日本的一般老百姓是較為單純，心機也較為善良的。因為他們的社會不像別的國家那麼複雜，民族、語言、宗教並不甚為多元的。所以反而較易受騙，容易上煽動者的當。

一般日本人若是認為殖民地統治能做出好事，並且有「曾經受過統治的民族」出來見證時，日本老百姓向那裏去學歷史的教訓呢？很可能他們還會重踏他們的老路子也說不定。如此的話，當然亞洲全域難保和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也無法樹立。

我的憂慮從台灣出發一直到有關亞洲的和平。我認為，我們台籍人士假若沒有搞好台灣史的話，將會自誤誤人，同時也擔心台籍知識份子因不諳台灣史的真相目而被借為「殖民統治史的見證人」害己禍人，並且可能給亞洲帶來了不幸，所以我立志修台灣史。

### 中共大陸對台灣的認識淺

第三個因素是與大陸有關係的。在一九五五年前後，當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我很好奇收集並閱讀大陸出版有關台灣的書籍。中共從一九五〇年初期大喊它的「解放台灣」，特別在我們受訓期間（一九五四年秋至一九五五年夏），台灣海峽緊張過一個時期。不待說小弟也與其他有心人一樣對台灣海峽的情勢是懷有甚大的關心的。

當年我能收集到，能閱讀到的差不多，是小冊子之類，很難找出一部經過學術研究而推出來的文獻。它們除了論調差不多以外，有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發現，編著者連漢族系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與高山

諸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沒有搞清楚的實例。這個可叫我傷心並帶給我無限的失望。幹部級如此的話，我們數億大陸平民對台灣的認識一定不會太深，也不可能全面的。他們很可能隨口在空喊「解放台灣」而已，其實台灣究竟在南北或在東西，一般老百姓很可能不甚了解。中國太大，大陸的「政治掛帥」太猛，老百姓沒有太多的空閒來認識台灣的真面目。我發現這種情況值得憂慮，認為我得好好研究台灣而把成果呈獻給大陸同胞，最好能幫一幫他們開一開眼界才對。

下面我繼續講我的第二個綱目。我的野心是蠻大的，但工作進展却是遲慢，成果也微不足道。今天只好藉我（我們）微不足道的「成果」來道出我研究台灣史的心得。

## 研究台灣糖業史的目的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前後的事，我終於決定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暫定為台灣糖業史。我最大的目的是想搞通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真相。我們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是依糖、米兩項農產品為中心而展開的。尤其以糖業為最重要的榨取手段。

很多日本知識界的朋友，包括以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來看問題的一部分學者先生們，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把糖業搞起來，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所以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是成功的，是少有罪過的。

據我廿八年的日本生活「體驗」，一般而言日本人對侵略中國大陸是有他的罪惡感，同時亦具有他的贖罪感的。但他們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却少有罪惡感和贖罪感。原因何在，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現在我可以把我整理出來的未成熟的看法向各位披露。

第一、「健忘症」是人的通性，尤其是加害者往往不願記取有關因自己的加害而惹起的不愉快的一切史實。這種心理的作祟，加上光陰的無情流逝，亦加劇沖淡一些歷史的悲劇面貌。台灣被納入殖民地早於九·一八，更早於七·七，因而後生日本人易於忘記。隨日軍在清末期侵台的一輩也早就不在世了，這個也幫了他們的健忘。

第二，日本史書一直以「割讓」來敘述日本統治台灣的契機。清朝既然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個該是合法的，不能視為侵略。日本人如此主張。

### 「負」的歷史意識

第三，第一代台獨人士的言論，尤其是邱永漢、王育德兩氏的言論給日本人帶來「負」的歷史意識。他們以東京帝大的校友，以台灣人的精英 (elite) 姿態立論著書來肯定日本帝國主義給台灣農業帶來了資本主義，給台灣現代化奠了基，給台灣農業帶來了現代化水利設施——好比嘉南大圳等等。這些言論概以日文發表，它不但變成了「媚藥」還幫助了日本人，把他們原來已經很稀薄的殖民地統治罪惡感沖淡了不少。

我沒有意思苛求日本老百姓，一般來說，文化水平在平均線上的一般老百姓，不管他是屬於何種民族、何種人種，我想人人都不願第三者來指摘自己的先人概為敗類，父祖的一切事業都被第三者否定，一筆勾消的。

儘管人的常情是如此，但我還是力主歷史問題是要交代清楚，要說清楚才對我們未來開創共同的新歷史有所幫助的。因此我點出，第一，我們中國人（包括台省籍民）並不是第三者，就近代日本、中國關係史來言，我們是不折不扣的第二者或是當事人，我們有權揭開歷史的真面目。如此做不但對我們有利，對日本也具有幫助的效能的。

第二，看待與評估殖民地統治史，被殖民，被支配的歷史，我們須要全面地，從殖民地支配的動機開始分析，一直到統治的具體過程和結果來做整體的調查、研究才稱得上社會科學的。

### 評估殖民地統治的功過

第三，只從殖民地統治遺留下來的「成果」來評估殖民地「母國」的功過是不充分的。就台灣而言，日本人把糖廠留下來並不是他們自願的。日本戰敗了，被逼捲了舖蓋滾回日本，萬不得已留下糖廠這才是真相。去年暑期在日本九州開幕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曾經引起一項不大不小的爭議。有一位留美回去的日本人教授，他在會場爲了敷衍討好日本文部省，主張日本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行爲不能統統算入罪狀裏頭去，好似日本軍也訓練一批土著人才，他們目前活躍於東南亞諸國是個好例子。鄉弟義不容辭地站了出來，很冷靜地反駁了他的言論。

我說，我們都知道日本名古屋戰後所建的地下街，都市計劃是非常漂亮且成功的。因爲名古屋被美軍B二九炸平而後有所新建。我問當時在場的諸位，名古屋市民該不該感謝美國空軍，需不需要請美軍再來轟炸一次。還有日本醫學界有關「原子炸彈病」的醫療技術水平是冠於世界的，我不相信日

本人將來會爲了再提高「氫彈受爆炸」的醫療技術水平而央求蘇聯學美國炸廣島和長崎一樣的來轟炸東京，造出病人來貢獻日本醫學界作研究。

我本人，是在台灣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的。家叔唸了後藤新平所創立的台北醫學校（後昇爲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爲開業醫生並賺了大錢，在個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許該感謝後藤新平也說不定，但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言，絕沒有感謝後藤的道理。因爲後藤在台灣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爲了台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來辦的。他的真正目的在於，爲日本資本家準備健康的投資地，爲資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勞動力等，却非靠台灣人醫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台不久就開辦醫學校培養台灣人的醫學人才。模仿英、法諸國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樣。諸位若不相信我的話，請你們想像一下，「瘴癘之地」有何資本家肯前來投資，若殖民地的基層勞動力統統是病弱不堪者，要從何種人的勞動來榨取剩餘價值呢……我們有良知的台灣人不至於感謝日本人的統治，更不會再度邀請日本人來當統治民族，重新光臨台灣的……。在場的日本朋友吃了一驚，與會的外國學人們給我鼓了不少的掌。會後他們還特地跑來誇獎鄉弟的道德勇氣。

話有點說遠了，其實並沒有離譜。我能得出如上的邏輯，主要得於我寫成了「中國甘蔗糖業史」的心得而形成的。

### 馬關條約裏日本要佔台的經濟原因

當我進行台灣糖業史的研究過程時，我整理出來，日本當年的政權為何在「馬關條約」向李鴻章極力地主張侵占台灣、澎湖的真正經濟原因。日本明治政府，當年爲了蹈襲諸先進西歐帝國主義奪取殖民地，確立它對外擴張勢力的軍事基地外，日本當權派是另存有它的經濟理由的。日本資本主義在明治維新以後漸漸脫穎而出，它爲了搞起資本主義工業化，需要一大批外匯來向西歐購進新式工廠設備。

但它的國內市場因資本主義經濟的釀成，慢慢地亦形成新的有關「吃的」消費構造來，因而年得從外國輸進一大批食糖，花費它廿五%的外幣支出，它的主要輸入市場之一是我們台灣。

諸位千萬別吃驚，大概我不會記錯，我們台灣的糖商在日本橫濱開它的分行是遠在一八七三年（清朝同治十二年），是明治六年間的事。這個糖商即爲陳中和一家，它的後裔就是光復後在高雄縣市作他們的地盤而活躍的陳啓川昆仲。

台灣當年已是「寶島」呀，我們千萬不能被當權者、統治階級、體制派文人官員給台灣及台灣居民所套的「瘴癘之地」、「化外之地」、「三年小反五年大亂」或「好亂、好鬥成性」一些「框架」語迷亂了自己的心靈。

日本人老早調查清楚台灣的社會經濟，他們在侵台以前和治台早期很少提到台灣是不毛之地。其實日本人自明末清初已從鄭成功一家治台、開拓台灣、振興台灣糖業得到不少利益。鄭家三代人能依靠「彈丸之地」來抵抗還沒有腐敗，正在興旺的大清帝國，它的主要財源主要靠的是輸出紅糖的。當年的紅糖除了輸到日本外還輸到波斯（現在的伊朗）。國府中央剛遷台不久的局面有點相似於鄭家治台的歷史局面。

我們清朝期的台灣糖業已具有相當規模的基礎的。日本人絕不是憑空在荒地把台灣糖業搞起來的。奪取台灣的頭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的盤子尚是脆弱而淺薄的。狡猾的日本商人以及當權的財政官員，他們並沒有忘記了台島的股商和洋行買辦等人的資金。日本當局動用了台島富庶人家的資金參入了他們的糖業資本，一方面運作了台島土著豪商士紳的資金搞他們主導的工業化，另一方面驅策了我們台籍的勤勞階級盡其所能榨取了他們用血汗產出的剩餘價值。

在我的台灣糖業史研究過程中，我不單單發見了以上我所報告的史實，我還發覺到台灣糖業有它本身的前史，有它的「根」。因而我開始追索到海峽對岸的福建，爲了弄清楚福建糖業，我繼續探索古籍，然後我遇到「本草書」之類書以及「糖霜譜」等的貴重古文獻。「糖霜譜」還告訴了我，四川的糖業早在十二世紀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不管是在製糖技術或在社會經濟的水平。

我的博士論文終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印成書，書名爲「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這是我生平第一本書，它幫了我不少忙。我雖學農，但我能在日本的立教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謀了一個教席，百分之六十分是靠它的。它不但是世界第一本有關中國甘蔗糖業史的書，並且它敘述了七世紀到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個側面。我引用了不少內外古籍因而得到學界的肯定。

###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下面我繼續要談的是我的小論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這篇文章雖然公刊於一九七〇年，收錄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東京勁草

書房)，但成稿却是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

仁井田陞博士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是中國法制史的權威。一九五六年我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科碩士、博士班聽過他的課。他在東京大學的受業學生和他後期同學們（他們多在日本國、公、私立大學占有重要的教席），大概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爲了紀念他的退休（東京大學是六〇歲退休，因爲東京大學是國立他們叫退休爲「退官」）而籌備公刊「紀念論文集」三大冊。但退休不久的他很不幸地得病於英倫（他退休後受聘於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送回東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開刀，藥石無效謝了世。因而書名才改爲追悼論文集。

很幸運地公刊了我生平第一本書後，得到了好評，籌備仁井田陞博士紀念論文集的委員先生們知道我是仁井田先生的受業門生，故邀我寫一篇論文紀念他的「東京大學退官（休）」、並祝賀他的「還曆」，六十大壽。

鄉弟說了這麼長的「多餘的話」爲的是對歷史要說個明白，所以如此嘮嘮叨叨的。請各位多包涵。能夠在「仁井田陞博士紀念論文集」發表論文，當然是光榮同時也是難得碰上的良機。這裏所謂「良機」含有公私雙重的意思。有關「私」的部分我不必「點睛」，但有關「公」的重要意義我非得詮譯一番不可。

先前我已經稍爲提過仁井田先生是位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世界性權威。紀念他的論文集很可能也可乘他的權威受學界注意並將收藏於各權威圖書館，如此的話當然附帶地也可給我們帶來好機會。我們可以藉這個良機來向日本以及世界來揭開，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一部份真相。

我開始擬稿準備詮譯，爲何日本帝國在台灣能夠「留下」較有規模的「殖民地遺產」。我開始整

理日本治台前期，也就是清末期的社會經濟概況。

一般日本人大多數都不知道，我們台灣早在日本侵台以前就有了鐵路，煤礦的開採，與對岸福建之間已敷設有海底電線等等。

日本學界，知識界向來不甚注意台灣。他們認為台灣只不過是大中國大陸的一個「小盲腸」而已，可有可無，無關重要。加上他們所普遍尊重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文物大可在大陸尋找，不必在「國內殖民地（明清時期的台、澎兩島可當中原大陸王朝的國內殖民地。邊陲之地來看待）」的台灣來撈。人人都了解，國內「殖民地」是不會存有或者是很少存有古色古香的文物和文化的。

日本人打敗了帝俄，乘機向「滿洲」侵透，隨著日帝擴張它在大陸的勢力圈後，他們逐漸消失對台灣的好奇和興趣。日本人已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不沉航空母艦，對他們來說，台灣篤定地是屬於他們控制的，不可能變更其既定「存在」的。如此一類的念頭普遍存在於日本人的思考裏頭。這種思考當然不會促進他們的學界去研究台灣史，尤其去研究日本治台以前台灣的的確確有過的「前史」的。

我寫「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來詮釋這個「前史」。讓人人能知道，日本人帶進台灣的資本主義，一些現代化的設施等等並不是從空中飛下來的，憑空創造出來的。我用了甚多的資料，包括日本人在未治台前所發表的有關台灣的報告文章之類，來證明台灣並不是人云自云的「不毛之地」。的確確治台十年以後的日本人，居心不良，為保持既得的利益，為了自誇其成就，為了向第三者討回其花在治台的「血汗」功勞，而盡其所能醜化台灣為「化外之地」、「瘴癘之地」、「三年小亂五年大亂」的難治之地的一些假像。

## 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爲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的政府，爲何日本人在朝鮮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爲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爲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台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嘗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台以前已在台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作合情合理的解釋，爲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台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心靈的台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

但這個「炸彈」好像效果不甚大，在這個時候還有位高伊哥先生寫出「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生根」第八期）一文，我發覺到我們台籍知識份子病入膏肓與問題的嚴重。俟後我們再給高文來一下論評。

繼「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我連續發表了「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有關『台灣舊慣調查』的札記」、「戰後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清末期台灣農業的實貌」等等，以及參加了「台灣經濟與日本資本的進出」等座談會，繼續我對日本和台灣關係史的詮釋。現在時間已不多，有關我個人的研究心得報告暫時就此結束。

##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諸位大概已經過了目吧！我在櫃台上展覽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一集到第四集的全套和鄉弟編著的「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另外一本是我的第一位學生若林正文君的『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這三部刊物可以說是我們在日本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同仁的小小成就。可惜的是統統以日文書寫，不能供給鄉親們作爲參考。

有關我們研究會的緣起，我已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的末頁「補白」上道出一些。我們的研究會創始於一九七〇年初夏，本來沒有正式會名，到目前爲止我們沒有會長，只有輪流義務承擔的「事務局」以及年報的編輯委員會。

我們的會一貫保持公開，我們沒有會章，但我們有共同的默契三項。

第一，我們同仁不能作假，不作虛，不作「排場」。

第二，我們主張不受「正統」和既存的「框架」的束縛，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我們同仁願能驅使富有彈性的思考。

第三，我們反對任何人給研究會帶進「政治」。

同仁們，曾經要我寫創刊辭，但我力主排除形式主義，反對「排場」而改用「補白」塞了責。我們沒有接受過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的資金援助，每一個月開一次「月例研究會」，除了每年八月休一次暑假外，差不多沒有間斷過。事務局每個月還出通訊頒佈給會員，有一些台籍同仁出了一次席，交了通訊郵資以後不會出席，當然不作報告和不參加討論。但他們却可藉我們的通訊所載的「學界情報」來向台灣或者我們同仁少有機會見到的中文刊物發揮他的「文才」。最近我們察覺到其中的奧妙。我們不反對有關學界情報的廣泛傳播，但我們覺得那些「不參與」的台籍同仁，如此下去是很

不易樹立他們自己在學術上的風格的，因而惋惜和憂慮。我們得老老實實作學術研究才有前途，抄襲和騙個學位的作風，我們應該儘快把它丟進垃圾桶裏才對。抄襲日人著作，改譯、改編日人著作等並不是作真正學術工作人士應該採用的正途。別在企圖瞞住台灣人後生，以爲他們不諳日語，不通日文資料而來嚇唬。我們可以預料到，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後生會站出來，大大地給「你」來個當頭一棒的痛擊。

對不起，話亦離了一點譜了。我們再回頭談正題。我們的研究會，有種種行業的研究家，有醫生、有小學教員、有商人、有文學家、有搞物理的、有出版社的編輯，但大部份是在研究所、大專、高等學校服務的老師與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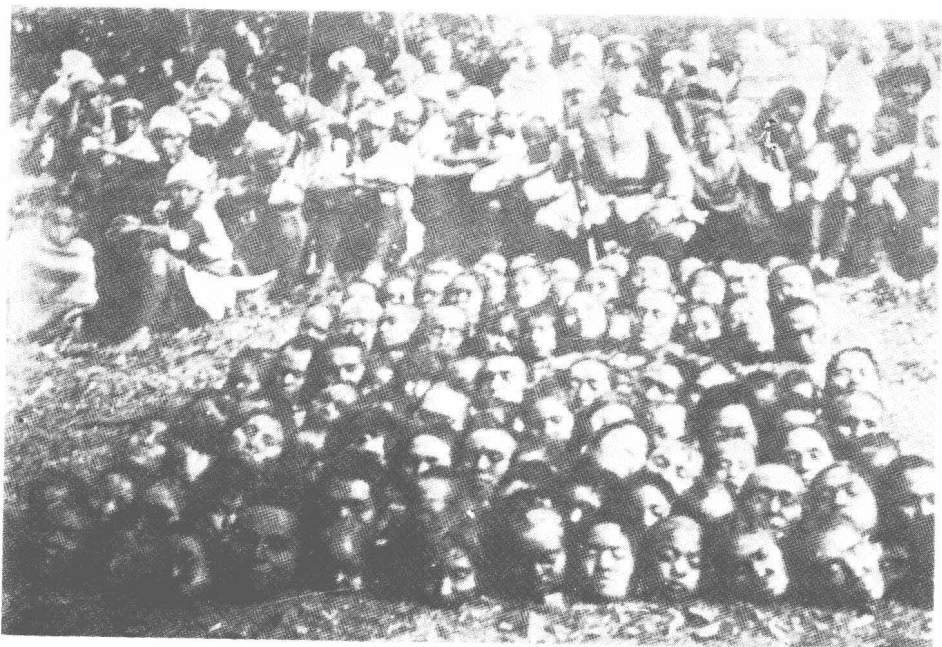
### 「霧社事件」的研究

因爲同仁行業的多元，我們常常選出同仁能保持持久關心的共同研究題目。第一個是霧社事件，第二個是後藤新平。第一個題目我們花了十年，收集了不少日方的機密資料，包括一些不曾公佈過的殘酷照片。我們等一再用幻燈機把它放大並加以說明。

這一部『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很是大部頭，加上照片，資料的排版花了甚多精力和成本因而定價很貴。是日圓一萬三千圓，折美金等於五十多塊。出版社早期認爲難銷，只印了一千部，沒有想到銷得很好，據東京來信說，最近能出第二版（補記，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已出第三版）。

出了這一本書，我雖然曾經受到日本右翼、國粹激進派的恐嚇，但我還得提一提，日本人裏頭畢

下：由日本當局為報復，鬼計搞出第二次霧社事件，把  
起義高山族的遺族謀殺，其悲慘的人頭達到101。





霧社抗日起義前些時候的達茲其斯·諾敏(左)  
達茲其斯·納偉(右)，達茲其斯·諾敏夫人(歐敏·納偉)(右)，達茲其斯·納偉夫人(歐敏·達打奧)(左)。

竟仍有他們的良知的。不然的話，這一本書不可能售完了第一版。他們看了這一本書當然會很難過，不過我相信，我們這本專著對日本人是一部「苦書」。藉「良藥苦口」來比喻的話，屬於他們的「苦書」當能成爲日本朋友的「良藥」，也就是正面的歷史教訓才對。

鄉弟亦希望這一本書將來能譯出來，同樣地變成我們自己的歷史教訓，我們同胞間的「苦書」。

我在此還得特別表明，我沒有意思揭發日本朋友的瘡疤，我始終是保持「可恕不可忘」的態度來對待中、日兩民族間在近代史所扮演的一切「悲劇」。鄉弟認爲揭發瘡疤一類的行徑是屬於低層次的。那一種作法不但不易說服對方，同時亦不易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精神糧食」。

但很可嘆的是，我們同胞間很多人把批判與漫罵混在一起，始終沒有能夠把學術上的互相論評，互磋互勉，接受批判以提高研究水平的一種學風樹立起來。這一點，我們同仁和鄉親們以後還得加緊努力。

第二個共同研究題目的後藤新平研究，我們同仁雖然已陸續有過他們個別論文的發表，但我們還沒有編成爲一本書。這個得

等我明春（一九八四年）返日後再重新籌劃。

我們同仁除了對共同研究題目下功夫外，個個同仁，各有各的研究題目。其中已印成書的算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刊行）為第一冊。若林君為了寫這一本書訪台多次，目前他是東京大學的「助手」（等於美國的 assistant professor），我來美後，不久他到大陸廈門大學去作半年的有關台灣學術研究。

明年以後，我們的同仁將陸續公刊他們的有關台灣文、史類的著作。敢請諸位拭目以待。

### 來美後的感觸——後藤新平風波

時間已不早了，我們繼續來談我的第三個綱目，也就是「來美以後的感觸」。

最先，我們可以藉高伊哥先生所著「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為引子。

高文我已詳讀了，這一篇論文據內容來言，沒有甚麼突破亦沒有甚麼新鮮的資料被引，我猜高君可能連後藤的女婿鶴見祐輔所主編的「後藤新平傳」都沒有詳讀過。

高文一出，台灣內部的黨外雜誌顯然吹起一陣一陣的「狂風」與「反狂風」。據我看問題有兩個：一個是高文的 *subtle*（副標題）標了「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引起了爭議。「現代化」在高文並不等於中性詞彙，顯然這個詞彙是有正面被附的價值的。下面還來了奠基者，這個就不是個味道了。不但有失民族的尊嚴，同時亦有失被殖民統治大眾的立場。因而引起眾人的批評。

第二個問題該是「被殖民心態」病人膏肓，並不只是屬於高君一人，很多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

識份子，因在台灣戰後史遭遇到太多的挫折及傷痕，必然地生起了憎恨以及不滿現狀，反對體制的強烈願望。但這些一直停滯於情緒化的層次，不易被提高到理性的層次來處理。這種心態的繼續反映了我們台灣內部社會的落伍，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我們聽說坐過將近十年的政治牢的人士也犯有同樣錯誤，沒有來得及克服與揚棄那種「被殖民心態」，我們感有無限的悲哀和說不盡的內疚。

高文叫我痛心，但是來美以後的所見所聞並不全是叫我失望的。不少的年輕朋友，搞台灣史的不管他們的省籍和國籍，甚至於不分人種，不分民族來找我談，與我交換意見。他們不單單正在克服老一代台籍台灣史家的「框架」途徑中奮鬥外，他們的熱情很感人，有一批年輕朋友排除了「美元」的誘引力，繼續爲了他們的理想而在掙扎，叫我感動不已。

### 高山青年覺醒叫我興奮

最近我在『暖流』第十二期看到「高山青年的覺醒」的短文報導，這個報導也是叫我興奮的一件事情。鄉弟雖然還未能看到他們的刊物『高山青』，但我總覺得這種刊物的出現，不管它的背景如何，我認爲是一個突破。

我很早就提出，我們客家人和福佬人雙手並不是頂乾淨的，尤其是參與開拓台灣的客家父祖輩扮演過侵占山地的先鋒隊。因而我始終保有一種「原罪」感。

我在『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的序文裏早有提過，我們非高山籍人士不能夠代替高山籍朋友（我把他們稱謂 Native Taiwanese，或先住台灣人）來敘述他們的真正歷史。我們只能夠暫時

扮演代為收集和整理資料的角色，甚至於我表明了我們同仁因為同是屬於迫害、欺凌高山籍人士的後裔，所以必然俱有不少的局限性。希望最近的將來能看到高山籍青年學人來承接我們少少的禮物！『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然後完成他們自己的歷史書。

我的預料好像就要呈現於我們眼前了，這個怎麼不叫我興奮！

當我們的書上市不久，我們同仁設法給高永清先生（很不幸，他去年謝了世。他是霧社事件倖免於殺禍的一位少年，他後來成了醫生，當了霧社鄰近高山部族的領導人之一）帶去這本書。我與高先生從未謀面，但我有很多的同仁和朋友去訪問過他。他寫了一封非常長而且感人的謝信給我，是用日文寫的。適當的時期我會公佈出來請大家作為參考。

### 「龍的傳人」進入大陸事件

高伊哥的一文鬧了「狂風」，但侯德建的進入（我並不很喜歡輕易地把「回歸」一詞套上）大陸，好像也給我們帶來了一陣不少的風風雨雨。

我認為「龍的傳人」的歌詞寫得不錯。但我始終不能了解一些黨外人士最近的言論。他們喜歡提出一千八百萬的全體台灣人云云的話。我認為他們的提法雖然比起「台獨」第一代等人士常把省籍矛盾無限擴大成「民族」矛盾那一類的言論有些進步，但我覺得一千八百萬人云云的提法既沒有「內容」，亦是含糊不清的。至於有強逼一些大陸籍人士，或大陸籍人士的後裔認同台灣人為至上課題，這「一種」強姦」民意的作法是少有效果的。它亦不應該是我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至上人士來肯定的行爲。

最近黨外論壇內部，有意無意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台灣意識」或有意地強調「台灣人意識」的成長和成熟。

我認爲他們有一點焦急，有意迴避客觀現實，輕視歷史過程，而一心一意，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的「理念」、主觀願望道出來。這個有一點像東條英機提倡大和魂，高揚日本精神的作法。

中共在大躍進時期所搞的一套也足爲我們借鑑的。他們的領導層當年想調動「主觀的能動性」來作他們一廂情願的大躍進行徑。結果吃了虧的不外是九億八千萬的老百姓。沒有具體的基礎和條件，只靠空喊口號以及自欺欺人的「土法鍊鋼」是鍊不出真鋼的。

「龍的傳人」爲何能在台灣校園歌曲中保持它的長期地位，還不值得高唱「台灣人意識」成長論者探討的嗎？一千八百萬「台灣人」應該包含有多元的存在，我們只要不是裝糊塗，缺乏社會科學的學養的話，我們是不作這一種提法的。不過我還是同情那些正在玩「政治魔術」的黨外民意代表，不得不作出那一種呼籲的處境。但是，這一種同情是屬於「情絲」一類的，不是一種社會科學的洞察。

我們先前提到的高伊哥先生的論文，很可能是借題發揮的。或許高君爲了呼應「台灣人意識」的成熟論，他不得不肯定後藤新平爲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他和他的同路人有必要肯定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台灣過程裏頭，不管它的動機如何，不管它的過程是如何的毒辣、殘酷，不管它只是被迫「遺留」下來它的「奶牛、寶島台灣」，不管這一隻「奶牛、寶島台灣」是我們台灣自己島民付出了莫大血汗才養成的，高君和他的同路人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政治掛帥」非來歪曲歷史不可。這個是值得我們痛心惋惜的。



## 台灣史的定位

最後我得提出有關台灣史的定位問題。我們台籍人士，尤其是受過日本教育的，易受日本的價值觀念體系的影響。

我們因為生長於台、澎兩島，先天地有被染上「島氣」的可能。加上日本人的島氣，我們很可能負荷雙重「島氣」的包袱。我們四十歲以上，直接或間接地受過日本教育影響的朋友們，常常透過「日文」、透過「日式思考」來看問題，來看世界，這一點是需要我們一再反省、自我檢討的。

很多同鄉不滿現狀，常常自閉守關地不願把自己的、台灣的「位置」擺在世界地圖，亞洲地圖，全中國的地圖來瞄一瞄，來思考思考我們自己所站有的地位（當然包括歷史地位）。人總是懶惰的，包括鄉弟是如此。但我們得抖擻振作一番，好好把我們台灣史的定位搞好才對。

台灣史當然需要從內部來探討，包括高山各族的歷史，漢族和高山各族間的鬭爭，爭生存的歷史，漢族間的械鬭的歷史等等。但我們爲了明察「台灣何去何從」的課題，我們還得從全中國史，從亞洲史，從世界史的連關上面作好台灣史的定位來考察問題，才不至於陷入自己的小「框框」，溺死於「小浴池」裏頭。我們不願意面臨緊急關頭時空喊「救命呀！來人呀！」一類的哭調話。

我希望我們鄉親們，不管他的省籍，只要對台灣海峽的安靜，台灣和大陸雙方老百姓們的福利和人權的進步有關懷的，我們一齊來互勉互勵，多謝各位，謝謝！

（根據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於美國中西部夏令營的演講錄音整理修正成稿）

# 晚清期台灣的社會經濟

——并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人治台史

台灣黨外雜誌界，近幾個月來，有過「中國結」和「台灣結」的論爭。論爭本身，多為吞吞吐吐，而且建設性不甚大。我想起戴國輝博士在七〇年代初期發表的日文論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刊於『仁井田陸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東京，勁草書房，一九七〇年），它曾經給日本學術界以及留日學生界帶來過不小的衝擊。我認為論文雖然是成文於一九六七年，但它具有的創見，在當前台灣仍有深遠的意義。戴氏論文雖然已有陳慈玉博士的譯文（譯載於『台灣風物』第十三卷第四期），但對照原文，譯得不盡理想。而且『台灣風物』知者不多，戴先生這些研究成果在中國人社會裡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譯者曾向戴博士（他正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寫信談及。戴先生亦有意重譯，並填加若干新材料。筆者乃不揣冒昧，請命重譯，並得戴先生的校閱增補敬請諸賢者指教。

一九八三年十月吉日，林真理誌

## 前言

日本人有一句俗話，稱十年爲「一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就是日本戰敗投降，已有二十年（譯者按；本文成稿於一九六七年）了。換句話說，台灣脫離了殖民地統治桎梏亦已等於二十二年。套一句日本俗語恰好是「二昔」多出二年來。

姑且我們可以不述及，因殖民統治而惹起的支配民族（日本人）與被支配民族（包括高山諸族和漢族的台澎諸島住民）間的心理糾葛能否藉光蔭的流逝而被沖淡以及被忘懷。但爲了建立及發展今後中日兩民族間的友好關係，筆者認爲雙方的有關學者必須積極承擔起，加強研究中日甲午戰爭本身的真象以及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所展開的中日兩國關係之責任。

日本學界對有關中國的研究一向頗爲盛行，但照理應該被包括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且爲其重大一環的台日關係，尤其是有關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却是意外地少有學者從事（註1）。如衆所知，日本統治台灣是根據一八九五年，清朝·日本明治政府所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台灣作爲開始。終止於，戰敗了的日本帝國接受波茨坦宣言，末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市中山堂簽訂降書（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時。其期間約爲五十年六個月。

近幾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爲世人所稱道，由是有一些日本人尤其是舊台灣總督府有關官員和他們的眷屬們所自誇的「日人治台殖民統治是成功的」、「台灣是藉了日本的力量才開發出來的」、「台灣是由日本才被近代化的」等等議論已大大地越出「往事只能回味」的領域而慢慢地且普遍地

開始被肯定接受。

著者在本稿裡無暇對上述議論是否確實作出全面性的探討，但我願意且大致地承認，台灣經濟在日據時代是有過它殖民地經濟類型的發展的。不過這一種經濟發展是需要加上括弧號來表示別於其他一般經濟發展類型才對。日帝統治下的台灣經濟發展畢竟不是爲了被支配民族的利益而所計且所爲的。追根究底，該時期的台灣經濟是陷於日本資本主義全體系的逼求之下，以強有力的日本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政策先把台灣經濟從中國經濟圈（其實，當年的主要範圍多限於東南沿海諸省的經濟圈，因國民經濟尚未成熟故也）割開，轉而使其淪爲日本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庸（台澎諸島——一直沒有受過作爲日本列島主要構成份子的平等待遇。殖民地就是殖民地，不可能被提升爲主人翁之一員的）。台灣經濟確實有過它殖民地類型的一種發展，但這種發展不過是當了附庸而帶來的副產品而已。

我們還得指出，本來不過是「副產品」的殖民地，台灣經濟發展也不是日本人心甘情願地留下給台灣島民的。是因日本戰敗，日本人被逼迫無法帶回日本去，不得不將「副產品」留下來。上舉一味歌頌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人們似乎故意忽視這個極其簡單且嚴肅的史實。在戰前戰中，沒有言論自由的日本作出如上一類歌頌殖民體制功績的言論，我們尚可原諒。但在第三世界新興勢力已抬頭，連先進帝國主義者的後裔們都普遍地能接受「不管任何形式的殖民體制，一概應該被否定」這一種想法的今天，居然還有日本朋友對殖民地經濟發展作出無條件的歌頌，真叫有心者痛心，且深感遺憾。

再者，上述一類歌頌論者往往亦片面地只從殖民統治者的政策措施，單線地來觀察這該加括弧號的經濟發展。換句話說，他們習慣於只從身爲統治者地位的日本當局及日本人的單方面來探討所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所在。結果這些論者，無法對同樣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支配的台灣和朝鮮——雖

然兩者成爲殖民地的開始期有其先後，統治期間有五十年與三十六年之別——，爲何在統治過程（包括殖民統治體制下，主體、客體相互間的因應形態和作用）及統治後果上呈現極其不同的現象，作出合情合理且具有說服力的分析與詮釋。

總而言之，世界史上的任何殖民體制是包括有主體、客體雙方面的既綜合又是整體的體制。因而若是忽視客體方面的歷史條件及政治、社會、經濟發展之階段，尤其是忽略或輕視被殖民統治前夕，客體方面所具的條件及所達到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話，當然不可能深入且全面地掌握殖民地統治史的全貌。

上舉歌頌論者亦真正忽略了這個理所當然的邏輯。在日本的有關日人治台史研究的重大欠缺亦正在於此。

由於一直輕視並且未有效地着手過晚清時期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往往會對「台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爲了抗日的大義，由台民與清朝在台開明官吏等相謀組成的抗日體制）的成立感到驚奇，而那激烈的抵抗、防衛日本侵台軍的台民軍事行動力亦成爲他們不可思議的存在。

他們陷於「死角」，無可避免地他們是看不透亦不願親自下功夫去摸透，台灣島民爲了防衛「台灣民主國」而付出偉大犧牲在前，在竹越與三郎稱讚不已的「兒玉·後藤政治」的毒辣政治（包括違反「武士道」（？）的引誘騙殺）下，上萬的台民又壯烈成仁在後，爲何仍然不放棄抗日行動？甚至到了一九三〇年，霧社山胞還冒了全村被虐殺之險而勇敢地敲起震憾全世界的「台灣霧社起義」的戰鼓。這一連串的抗日史實當然可視爲一脈相承的。上舉論者大致來言，他們是不會亦不願以同一個歷史脈絡來掌握並洞察貫穿抗日事件時台民所具反抗殖民主義的時代精神。

據史料，在防衛「台灣民主國」戰爭中，台方的犧牲，僅戰死的兵士就達七千人（註2），至於民間的犧牲者則因為沒有確實統計，無法確知。但數字絕不會少於數千人的。激烈的抗日運動當然也給日方帶來不少傷亡和困擾，因而在日本國內，台灣放棄論或出售論曾倡行一時。

另外據後藤新平之女婿鶴見祐輔的記載（註3），在「兒玉，後藤政治」的前期——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的五年間，所逮捕的「土匪」（日方蔑稱土匪者，佔在台方來言當然是抗日義民）有八〇三〇人，所殺戮者達三四七三人。更有甚者，單單在一九〇二年的大鎮壓（林少貓事件），逮捕後被處死的就有五三九人，被誘殺的多達四〇三四人。至於霧社起義山胞的悲壯情懷以及日後所受的夢魘般反人性的滔天報復罪行是衆所週知的（譯者按；請參考戴國煇編著『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東京，社會思想社第二版）。

筆者一九五五年秋天出國來日本留學，從事研究工作，一直呆在日本學界圈子內。我觀察到日本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們的大多數雖然主張「一個中國」的立場，但至今仍然不把台灣擺在他們研究的視野裡頭。而僅有少數研究台灣的學者亦欠缺將台灣和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歷史上的動態，脈膊結合起來思考，來掌握問題，或由全中國的動態中以及從其有機的關係中去發掘問題，認識研究對象，從而開拓他們台灣研究領域的眼界。同時也少看到日本朋友真正抓住圍繞台灣的時代精神來掌握「台灣問題」。

由於上述研究態度的積弊，使他們所抱有的台灣史的形象依舊模糊不清，對於所謂「台灣問題」亦不會有過堅持立場，充滿自信的言論。

起草本文的目的，正是試圖彌補上述缺陷，讓晚清時期台灣的洋務運動登上學術解剖台，介紹、

闡明其運動的背景和實況，藉以評估晚清台灣的總貌。

## 一 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

### 1. 台灣開發小史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日本人雖然統治了台灣五十年，但台灣史的一般面貌日本人却很少熟知。尤其是有關晚清時期的台灣，也就是說被「割讓」前夕的台灣，若為有意地掩蔽其實相，情有可原。但至今仍然流佈在一般日本知識界的却是被歪曲的且有利於殖民統治體制和殖民統治民族的史觀。因而我覺得問題相當地嚴重。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知我們一個普遍的史實。支配部族·種族或民族，通常為了方便於他們的統治以及樹立他們的統治秩序和體系，他們是習慣地且不擇手段地，培養支配民族對被支配民族的優越感。並且有意地且有組織地讓他們的社會瀰滿着，他們支配者俱有先天的優越屬性。讓他們的一般老百姓停留於感性的認識階段，而「盲目」地迷信他們的文化、社會、民族等等優越於且有別於被支配民族的文化、社會、民族性。統治當局當然盡其所能，運用了這種優越感和心態來進行對殖民地原住民的壓迫及榨取。

台灣當然亦不例外。初期的，特別是頭十年過後不久的在台北日本統治當局，開始沿襲並有意增幅清朝體制統治台灣時留下來的「批蔑視台灣和台民的用語。好似「化外之地」、「瘴癘之地」、「三

年小反，五年大亂」、「好亂成性」等等輕蔑用語，有意地造成台灣是未開化之荒地，野蠻之地，其居民不外是隨便殺人頭顱的生蕃和好亂成性，不守秩序，亂來械鬪，桀傲不馴的土人。支那人等等「台灣形象」（註4）。筆者將另尋機會，起稿批判統治者史觀，故對統治者史觀的批判暫時擱筆在此。為批評並糾正這種錯誤的「台灣形象」，茲特別略述台灣早期歷史。

由現存史料觀之，台灣被編進中國勢力圈，開始與漢文化接觸，大致是在西元三世紀以後的事。最早期的接觸，當然我們可以易於想像，它當是斷斷續續的。直至倭寇興起活動於南海，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早期西歐列強窺伺台灣的十七世紀初葉，大陸向台移墾的移民潮也慢慢地開始旺盛。

明代台灣的開發始於十七世紀一〇年代，當時鄭芝龍一派人所領導的反政府武裝交易集團，為避免明朝統治者的干預，開拓台灣本島西南部的北港一帶作為基地，從而揭開了開發台灣的序幕。

其後，荷蘭人於一六二四年占據了以台南為中心的南部台灣。然直至一六六一年，逐漸把它的勢力擴展至全島西部平野並作了它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荷蘭東印度公司，不但以台灣為貿易的轉運站，而且從對岸大陸的華南（閩粵為中心）招募許多漢人到南部台灣一帶開墾。荷蘭人利用了漢人開拓勞工，透過米、糖、鹿皮、鹿茸等中心商品，攫取重商主義階段殖民統治的利潤（註5）。

另一方面，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已於菲律賓呂宋島確立它的勢力的西班牙人企圖與荷蘭對峙，於一六二六年占領了荷蘭勢力尚未侵透到達的西北部台灣。西班牙人以鷄籠（基隆）、淡水等地作它的貿易轉運與傳教事業。西班牙人少有從事農業發展，直至一六四二年因受荷人攻擊逼迫退至馬尼拉而結束其為期十六年的西北部台灣的統治。其後荷人繼承了西人對西北部台灣的統治，但西北部的社會經濟的變化進展不如西南部台灣來得大。



迨至一六六一年，抗清失敗逃至金門的鄭成功軍終於驅逐荷蘭人，而在台灣開始樹立反清復明基地。從此開始，台灣名實相符地變成由漢族直接控制政權並從事廣泛的開拓事業，經營台灣。

鄭氏統治，開拓台灣歷經三代，共二十二年。尤其在第二代的鄭經治台期間，尚能維持「反清復明」精神的高潮，不甘接受滿清異族統治的明朝遺老知識份子大舉移住台灣，興學設校，導入大陸先進有關製鹽、造糖、水利以及栽培稻米等的技術，大大地振興各種行業力促台灣經濟的開展。尤其台灣農業展現出台灣史上未曾有過的繁榮與進步。值得我人特別注意的是對外貿易的進展。鄭氏當局爲了確保其政權的經濟基礎，它充分地動用了兵船（由大陸開進台灣來的），爲了突破滿清當局的經濟封鎖，採取了積極政策擴展其與日本及透過東南亞等地直接與西歐列強樹立貿易關係，因而貿易經濟頗爲興盛。另外我們得指出，流入了爲數不少的明軍殘部，鄭氏把他們轉爲屯田兵，向高山諸族的占有地侵透，開了不少水田，使農業開發的範圍不再僅限於台南附近平野一帶，大規模地向北擴張至竹塹（新竹），南至鳳山（註6）。

隨著上述的開發，短短二十年間，漢族人口由荷蘭統治末期的五萬左右（註7）增加爲二倍多的十二萬人（註8）。

及至一六八〇年代，清朝康熙帝的政績所帶來的直接及間接的影響和衝擊越過台灣海峽，以及清朝歷年對台所作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封鎖政策逐漸奏效，搖撼了鄭氏治台的根基。

同時在台灣內部，因鄭經去世（一六八一年）所引起有關繼承人的權力鬭爭，綱紀廢弛，政治紊亂日增月盛，呈現日暮途窮的一般社會形勢，遂爲清朝所乘，一六八三年，水師提督施琅征台，鄭克塽被逼開了軍門向清投降。

清朝治台約爲二〇〇年（一六八三至一八九五年），在此二世紀長的開發過程，在本稿無法詳細介紹。茲僅列舉三大指標便於概觀之所據。

(1)：漢族人口由十二萬人增爲二五五萬人（一八九三年）（註9）。

(2)：耕地由一萬八千甲（一六八四年）（註10）激增爲七五萬甲（註11）。

(3)：行政區劃及設施方面：當初台灣只是隸屬於對岸福建省的一府三縣。因開拓的進展和有關國防和治安的考慮，遂於一八八五年，清朝在台設省，分台灣爲三府、一直隸州、六廳和十一縣（註12）。

以往，許多論者陷於清朝體制所遺下的「框架」盲目地過度強調清朝治台期的所謂「三年小反、五年大亂」和「分類械鬥」因而相對地忽視或輕視了以開拓農民作爲中心的農業開發的成果。農業開發附帶地促進生產供出口的農產品，主要有糖、茶、樟腦以及米。從而貿易商人活躍起來。貿易商的特化慢慢地形成發展了「郊」——商業資本。上舉論者必然地亦低估了「郊」的形成發展，以及它在台灣社會經濟結構上的重大意義（註13）。

我們當然知道，清朝派在台灣的大多數官吏們仍然陷在「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劣根官僚傳統中，離於自拔的境界。來自於大陸他鄉的地方官，他們當然不會認爲台灣是自己「長留埋骨之地」，他們時常與地主惡霸們勾結，胡作非爲，榨取民膏民血以充實他日衣錦還鄉的老本，「三年小反五年大亂」不正是老百姓對上述貪官惡霸們反抗的一種語言上的反映嗎？至於「化外之地」之稱，不過是反映了清朝中樞難於統治台灣，具有「鞭長莫及」之感。這個「化外之地」的成語，不外是表示當年的台灣，正處於「開拓地的最前線，frontier」，到處尚留有處女原始林地帶及所謂「蕃害」而

令漢族人人恐懼，山胞勢力所據的「勢力圈」蕃界」之存在。「蕃界」毋寧是為「開拓先驅者」（往往是反體制者），突破既存秩序的「造反者」的廣大「避風港」，暫時退避養神之地。

我們不要忽視，這個「開拓地的最前線」——邊境所具有的條件，正提供開拓農民抵抗體制的多種方便。開拓農民常常利用了上述的絕好條件，前仆後繼地揭竿起義，演出多次的農民起義。開拓農民有時會向地主與清朝官吏的連合體揭竿起義，有時亦會連合開拓地主直接向清朝體制擊鼓挑戰。

不以社會經濟史學的觀點和方法來整理、掌握並分析農民運動（註14），反而陷惑於「三年小反、五年大亂」一類的統治者史觀的一般常識論者，當然不易看透歷史的真相。這一類庸俗的論者其實也無法對後來的土地調查事業（一九〇四年所完成，由台灣總督府所強制施行的土地調查）為何能發現隱田（未登在官廳土地簿冊的田地）多達四十萬甲的事實（註15），作出合情合理的說明。要注意四十萬甲地，其實佔有當年實際耕地面積的二分之一強。

因此，被清朝統治者視為「化外之地」的台灣，對大部份移台漢族系開拓地主和農民來說，毋寧可說是幸運的。處於清朝政治權力最為軟弱的「化外之地」——台灣，漢族系移、殖民們利用清朝綱紀之紊亂，不斷地展開抗戰、抗租運動中，反而能夠累積了一些他們自己的勞動成果。充滿了「開拓者精神」（*frontier spirit*）的開拓農民，一為直接生產者的「現耕佃戶」，二為「小租戶」（直接向清朝政府申請開墾的自耕農戶），一步一步地由點向面擴展開墾各地沃土造成後日的水田。當然這一種擴展「邊境」的行動另一面引起「蕃害」——高山諸族，抗漢族侵透的武力行動。所謂拓殖者給先住台灣人——高山諸族帶來不少損害亦是史實的一面，這一點我們是不該忽視與忘記的。

另一面，鑽清朝體制的漏洞，商人們尤其是貿易商人獲益非淺，他們逐漸地形成「郊」的一大勢

力不外是一個最好的見證。

如上，我們才可指出，清朝治台期，尤其是晚清期間，台灣的小農經營有其特殊的發展，因而在台灣農村才能見到小租權的樹立以及「寄生性地土制」的展開。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亦促進了台灣商業資本一定程度的累積，並出現了「郊」及買辦商業資本家等的一群人。

## 2. 晚清期的台灣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進一步地加強了它們對世界「落後」地域（套一句今天的詞彙則為「第三世界」）的瓜分，進行殖民主義式的野蠻、侵略、擴張主義行徑。

### 帝國主義開始垂涎台灣

中國已變成它們下手的目標，台灣當然地亦被捲入漩渦之中。僅僅列舉其較為顯目的行徑，就有如下不少事件的相繼發生。

1. 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之際，英軍爲了牽制清軍，出兵派艦在台灣近海游弋。
2. 一八五四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M.C. Perry）派軍艦至鷓籠（今基隆），測量港口並調查煤礦。事後根據調查報告，積極建議華盛頓當局佔領雞籠，以確保有關美國船艦的補給（煤

、食品、用水等等）基地。

3.：一八五八年，根據天津條約清朝被逼開放台灣府（當時，包括台南和安平）與淡水為通商口岸。

4.：一八六〇年，普魯士船向南部台灣山胞部落砲擊。

5.：一八六三年，清朝被逼增開打狗（高雄）、鷄籠（基隆）為通商口岸。

6.：一八六七年，美國軍艦砲擊並進攻南部台灣山胞部落。

7.：一八六九年，駐台英國人商行因買賣樟腦同清朝官吏發生衝突（一般稱為「樟腦紛爭」），英艦無理砲擊安平，要挾謀取貿易上的優勢。

8.：一八七四年，日本明治政府發動所謂「牡丹社（現屏東縣境）討伐出兵事件」，向清朝示威並藉而要挾清朝承認其吞併琉球為合法。

9.：一八七九年，日本明治政府完成吞併琉球王國的國內行政手續，適用所謂「廢藩置縣制」於琉球，創制沖繩縣，終於把琉球列島強制完全編入日本勢力圈內。

10.：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之際法國艦隊侵襲並封鎖雞籠、淡水及澎湖島等港口，藉以牽制清軍。

。（註 16）

從「亂自内生」到「亂自外至」的台灣

上述一連串的外來威脅事件，逼迫清廷有關當局不得不加深其對「邊陲之地」台灣的認識。也就是說，清朝被迫檢討，地當東南七省門戶要衝重地台灣，其在國防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性。並迫使清朝修正其傳統治台基本方針——向由「亂自內生，鮮有外至」的認識而策定成的「以防台而治台」方針，且爲了適應「亂自外至」的新情勢而不得不轉趨且採取「以防外患而治台」的新方針。

新方針在政策實踐中，最具體且最集中的表現，乃是在台建省（自福建省獨立，另成一省），和派任具有開明幹練之稱的劉銘傳爲台灣巡撫，並委劉在台力行洋務運動。

未闡明在台洋務運動的實貌以前，我們似乎有必要略述當年的台灣產業經濟概況。

當年，台灣產業的中心在於農業，自不待言。台灣農民以七五萬甲的耕地面積作爲基礎（一九四一年的全耕地面積約爲八九萬甲（註17），值得我們憶起藉資參照），大大地發展他們的稻作以及蔗作和植茶等等的商品作物農業。

### 鴉片戰爭前的台灣稻作

稻作的豐盛，誠如巡視台灣御史黃叔瓚載云：「三縣（一六八四—一七二二年期間的台灣行政區劃只有台灣（現台南一帶）、鳳山（現高雄一帶）、諸羅（現嘉義一帶）三縣，其他地區尚未成縣）皆稱沃壤……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註18），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台灣（請留意，只限於南部西海沿岸平野部的三縣），已有相當多量的餘米可接濟對岸大陸。（國內間交易我們名爲移出入，國際間交易我們稱其爲輸出入，以

便區分)。

其後，開山闢土更加進展，除正規的移出及「走私」之外，乾隆以迄嘉慶年間，每年移出被稱爲「台運」的軍用米（包括軍眷用米）約爲十萬石。到了道光年間，復受官府命令增額至十四萬石向天津移出（註19）。

### 鴉片戰爭後亦影響台灣經濟

可是，鴉片戰爭後，因大陸港口受逼開放於洋商故，洋商從越南及暹羅等地輸進大量「洋米」擾亂了「台米」在大陸的市場秩序。「台米」因競爭而跌價，遭受嚴重打擊，遂使台灣農村呈現「豐作但滯銷」的不景市況。

類似景況，可透過當年身任台灣府學教諭席的劉家謀所述：「台地糖米之地，近濟東南，遠資西北……唛喇（英國）販呂宋諸夷米入於中國，台米亦多賤售。商爲虧本而歇業，農爲虧本而賣田，民愈無耶賴矣（註20）。」而窺知其一斑。

鴉片戰爭對台影響所及，不止於搶奪了「台米」在大陸的市場，另外還讓「不速之客」鴉片擁進來台。鴉片的大量進口，必然地導致台灣經濟在貿易收支平衡上失調，逐漸造成台灣經濟的混亂。

自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四年，就任台灣兵備道的徐宗幹即曾嘆謂「銀日少，穀日多。銀何以日少？洋煙愈甚也。穀何以日多？洋米愈賤也。……米穀不流通，日積月累，望豐年乎？歉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賤如故也。蓋內地食洋米而不食台米也。不食台米，則台米無去處，而無內渡之米船。無內

渡之米船，即無外來之貨船。往年春夏，外來洋元數十萬（註21）。」，我們後人當可藉以上徐言，為當年台灣經濟困境作一個見證。

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的經濟體制逐漸走上解體及崩潰之路，是眾人皆知的史實。台灣的稻作經營當然難免受其波及。然而，對稻作經濟的「外來災禍」却因台灣的特殊條件，它可受之無愧地，轉變為新的「刺激因素」逐漸發揮它的獨特功能。

台灣諸島與對岸大陸，因間介有台灣海峽之故，本來就具有妨礙大陸與台灣諸島經濟結為一個整體，使其經濟動態成為高效率的有機體的先天「負因」。特別在中國國民經濟尚未成熟，交通工具未現代化的道光年間前的清朝期為然。

通商口岸的開放，一方面給台灣稻作經濟帶來不利，但另一方面，却給台灣的茶業和樟腦打通了進軍世界市場的新道路。茶葉和樟腦的外銷多利，遂吸引家境瀕臨破產的華南農民和一些已定居於台灣的漢族系移民直奔台灣中，北部墾殖幹活。大大地展開關「處女林」製造樟腦，開墾丘陵地種植茶樹以振興茶葉，發揮他們的「開拓者精神」，導致日後「台灣烏龍茶」和「台灣樟腦」名震歐美的盛況。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開拓者精神」却惹起並記錄了台灣史的另一面。則，漢族系人物慣稱為「蕃害」或「出草」，令有心人內疚且不堪回首的一些歷史「負面」。高山諸族——這一個時期，其中心為泰雅族——的對漢族的「出草」或「蕃害」一類行為，該定位為抗漢人的義舉才夠公正。我們漢族再也不該一味地墨守成規，夜郎自大地總括數其反漢人行為野蠻暴虐。這一點，真值得我們漢人們常為自己警惕和自我反省的。

其結果，台灣中、北部茶葉與樟腦的生產大有發展，不但使一八六五—六九年間的貿易（包括輸



出入口和移出入口)赤字逐漸減少，並且自一八七二年以後直至「割台」當年均能維持出超局面(註22)。

話題歸回稻米生產的檢討上來，我們當前並無足夠資料可資推斷劉銘傳時代的稻米產量。不過若據「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總督府爲了調查台灣風俗習慣而所組織的調查研究機構)報告所云：「米產量雖不知其詳，惟當時除正供十九萬餘日石(日本量穀單位，值一八〇公升)上繳官庫外，移進大陸的平糶米、軍糧及軍眷米等亦約與正供數量相當。此外，從打狗、鹿港、尤其是淡水等港口以「商品米」輸(該爲移)出之數量亦不少，足見其產米量決不少於今日。」(註23)。

由此我們亦可推斷其產量已達到甚爲高額，幾乎不需存疑。至於文中所謂「今日」當指明治三十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一九〇四年)(註24)，故縱使以產量最低的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因抗日侵台戰事，兵荒馬亂，百姓難於安居樂業必然地影響產量低落，斯年尚未回復正常。)立爲推斷基準年，斯年稻穀產量亦已達約爲四百三十萬日石(註25)的可觀數目。一般而言每人一年平均所需的糙米量爲一日石，若將稻穀以七七%的碾米比率換成糙米來計算的話，上述產量可折爲三百三十萬日石的糙米量。這個數目，不但可供二百五十五萬人口充分消費外，顯然尚且保有充裕的輸、移出量於後。

### 蔗糖是日本垂涎台灣的經濟理由

台灣的第二種主要農作物、甘蔗在國際與國內商場受到重視，可說較稻米還要早。自十七世紀三

十年代起，台產蔗糖即不斷地向日本及波斯（今伊朗）等國輸往銷售。十八世紀初葉，造糖生產方式已漸趨手工工廠制（*manufacture*）而開展（註26）。

到了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也就是雍正年間，自對岸大陸來台的商船日漸頻繁，加上「郊」（在台灣商人、商業資本所形成的同業公會 *Guild*）的成立，更促進了蔗糖向大陸的移出，同時促成大陸同台灣往還的商船陸續不斷（註27）。

就劉銘傳到任台灣巡撫的前五年的統計來研討並推斷蔗糖的年平均產量，我們可得五年間（一八八〇—一八八四年）的年平均為八千三百萬斤（註28）。若再加上在台消費推計量的話，其總產量大約相當於一億日斤（一日斤等於六〇〇公克）。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日本全國所輸入的各種蔗糖量為二億四千萬日斤，為它日本得支付一千二百萬圓的外匯（當年日本叫它為「正貨」，可與同值黃金兌現的貨幣）（註29）。由此觀之，當時日本廟堂所以垂涎台灣經濟理由亦甚為明顯（註30）。

### 茶葉繁榮了北部台灣

我們下面得談一談，台灣的第三位農產物的茶葉生產。茶樹，其實很早就有漢人栽植於台灣北部。據十八世紀二十年代的記載，在水沙連（現在的淡水附近）一帶茶樹繁茂，每年通事與各「蕃」（指高山諸族的各部落）協議，入山培製（註31）。再至嘉慶年間，有名為柯朝者引進福建產茶名地武夷的茶樹苗，栽植於鯨魚坑（石碇堡）一帶，因土質、氣候合適，栽培得法，非常成功。至道光年間

(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年)，已發展到有力向大陸移出的成就(註32)。其後，根據天津條約淡水亦被遍開放為通商口岸，來到北西部台灣的，不管其為國人商家或外國商人，當然不會放過向北部台灣的重要特產——茶葉和樟腦打主意謀大利的機會。因樟腦及茶葉生產更進一步的被重視，促進了漢族系開拓農民除了向北西部台灣的「邊境」地區繼續「進軍」外，還伸向北東部一帶，一向為高山諸族所佔據的「處女林」，揮其刀斧闢山開墾。他們一方面製造樟腦，另一方面栽植茶樹並且種植稻米以期樹立自給自足的開墾型農家經濟。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英商約翰杜德(John Dodd)在考察樟腦產地實況時，發見北部落台灣適於栽植茶樹，乃自福建安溪引進茶樹苗，以預貸資金予開墾農戶之方式，鼓勵農民種植，以備謀外銷茶葉的大利於日後。杜德除了在農耕栽植過程假藉預貸來控制原料外，他亦在艋舺街(今萬華)開設茶葉精製工廠，由已掌握焙製、精製茶葉工程並對外銷美國，開拓新市場下了不少功夫。結果他獲得了大利，「台灣產茶」因而揚名於世界，並樹立了「台茶」在國際市場的地位(註33)。

茶葉盛況及其利潤之大，可由光緒初年身任台灣道的夏獻綸，致其上司福建巡撫之報告中略窺其一端。夏文述道：「淡水之種茶也，始於同治初年，嗣洋商有到該處販賣出洋者，茶價驟高，農民趨之，競植以為利，所以海隅片土，市樓買船日聚月增。……傳聞種茶萬株，工本百金，三年以後，一歲所採，便足抵之，其利甚厚。台北千巖萬壑，居民寥寥，誰非曠壤？或招民佃種，或傭工種墾，行古官焙之法，取息裕餉，其利當倍於屯田。(註34)」。

我們仍然可以依據劉銘傳到任台灣巡撫以前五年的統計，來算出茶葉年平均的輸、移出量為一千一百六十萬磅。當年一洋擔(一三三磅)約值流通於淡水交易市場之銀元三六元，故其總輸、移出額

將相當於三百二十萬銀元。此外，包種茶的輸出量在一八八六年，約可計為七十七萬磅，其後不斷增加，到了一八九四年也就是「割台」之前一年，其量則大增為二百三十萬磅（註35）。由這些數字，我們不難推出，晚清期的台灣茶葉亦頗為興盛。

### 台灣是世界最大的樟腦產地

除上述的農產品之外，我們得對林產加工品中之一的樟腦，加上特別的留意。

在化學合成「樟腦」未被發明製造以前，台灣乃是眾人皆知的世界最大的樟腦產地。由於羊毛紡織工業的興起引發「防蟲藥劑」的大量需要，樟腦除了另有醫藥用途外，還可成爲當年正在興起的賽璐路（celluloid）工業之原料，故歐美的市場需要與年俱增。台灣未正式向外國開有通商口岸之前，英商早已透過走私方式輸進鴉片，換取蔗糖和樟腦貪圖暴利。台灣島，有了對外開放通商口岸之後，北部台灣尤其是淡水，很快地變爲外商雲集，積極從事樟腦貿易之中心港口。不過，樟腦交易的利潤特高，常常惹起有關樟腦交易之糾紛。樟腦交易糾紛，不但在民與民之間、民間與官方之間、官方與外商也不例外地且不斷地發生。日後，爲抵抗「割台」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之要員，林朝棟道員就是依靠樟腦發跡的典型人物之一。

由於，高山諸族常常發動抵抗漢族入山軍事行動，山地的「治安」不但難於保持，「安寧」的生產秩序亦不易持續因而樟腦的產量變動頗大，輸、移出量當然亦是變化無常。

一八八〇年輸、移出量有一百六十萬磅，約值十五萬銀元。到了一八九四年則增爲約六百八十萬

磅，約值二百二十萬日圓。我們可據日方統計得知同一年（一八九四年）的日本樟腦的輸出量只有台灣的一半以下之二百八十萬磅，僅僅幫了日本當局賺取一百萬日幣而已。

因樟樹在世界上的分佈已相當有限，故樟腦產地必然地形成局限於華南、台灣及日本（註36）三地域的山地。但華南，日本的山地開發已快達到極限，反而把仍然存有原始樟林的小島台灣突出為世界樟腦的名產地。台灣樟腦遂遠揚名於世界且誘引了不少外商來台謀利。

樟腦產量不定且有限，加以其用途日廣（不僅可造高效能的防蟲藥劑和用途極廣的賽璐珞外，樟腦的用途後來擴大到製造無煙火藥及煙火不可或缺的材料），故若能控制樟腦生產於台灣，獲利當然甚大。尤其是中北部深山還蘊藏着尚未被「開發」且甚為豐富的森林資源，當然包括有樟樹的「處女林」，有何理由不叫樟腦出產國家的日本人，熟知世界樟腦行情的日本商人不垂涎萬丈？

### 洋務運動前台灣資本累積已甚可觀

試觀，日本在甲午戰爭前一年，也就是一八九三年的年間總出口金額，僅僅只有九千萬圓。反而觀我們台灣同一年的總出口金額則已有九百四十五萬海關兩，若以當年的海關兩與日圓的換算率（一兩比一·五四圓）來折算，區區台灣小島則已有一千四百萬日圓（註37）的可觀出口金額。

上述台灣的外匯賺取潛力，就「晚到」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累積尚且不充分的日本帝國的國家立場來看，已揚名於世界，賺取外匯的能力並不壞的台灣茶葉與台灣樟腦業，當然和台灣糖業一樣地，將對日本人具有莫大的魅力，是不待言的。

此外，早受英美等國家注意的鷄籠煤礦等，有關礦產方面的情況如何，留待下節敘述。

以上諸節，我們不惜贅述台灣開發的略史及台灣尚未真正施行洋務運動前夕的產業和經濟概況。由上可知，晚清期台灣絕非體制與體制派文人、官員所云的「化外之地」，亦非人云亦云的「未開之地」。誠如明治二四年（一八九一年）作過實地台灣社會調查的日本駐福州領事所云「由東洋政略上觀之，該島（指台灣）的將來乃是今後我國（指日本）人最值得注意者。我此次前往該島各地考察物產資源及其他事物，其富庶實在令人驚訝，……誠可稱天賦寶藏之地」（註38）。

### 洋務運動前台灣經濟成長迅速的原因

台灣，的的確確是寶島。清朝政績乏善可陳，並不因而促使來台一般民衆，減低其爲求生存，維持最低生活而從事開拓事業之興趣和努力。

我們不能忘記，來台開墾闖天下的大多數漢人，可以說都是在大陸出身地破了產，不得不冒險過海的流亡農民與其後裔。他們的家世和來台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們父祖輩在對岸鄉土的社會基礎，却變爲支撐着他們「開拓者精神」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

衆人皆知，台灣是先居有「先住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的海島。但他們高山諸族的社會生產力與「民智」，相對地且大大地落後於漢族系移台住民的。因而，當他們遭遇到移民集團的入侵進迫關棘造田時，心雖有不甘，但被迫只好節節退却，避至山地深谷求其生存。

來台漢族移民集團，逐漸相聚爲村莊，形成新移民村莊社會。新移民社會，一般來言，它甚

少具有封建傳統束縛的。它的社會秩序，往往是依靠着產自於住民內部的核心勢力來維持並鞏固之。

台灣，遙遠屹立於中國東南海面上的「小孤島」，儘管北京皇帝雖鞭長但亦莫及。尤當腐敗不堪，綱紀紊亂的晚清期，政府控制台灣民間之力量更見低弱，駐台官員既明哲保身又伺機中飽私囊，難有多餘的心與力，來管制開拓農民為中心之台灣移民村莊社會。

筆者認為，台灣的例子毋寧可說是與「傳統社會」是相反的。我不便苟同庸俗的常識論，人云亦云的「台灣觀」。當然亦不便接受似「化外之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等等俗語為形容台灣的「負面」詞的一種慣用法。

「化外之地」，「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語，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正是「話中有話」。它不正是在告訴我們，移民社會仍然有其「邊境」，移民社會的執政權力不夠嚴密有其鬆弛地帶，秩序尚未鞏固等等社會現實嗎？

上述社會現實，與其說將成為阻礙或限制來台漢族系農民的開拓活動，不如說反而對一般開拓農民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讓移民們有機會充分發揮其潛能，在台灣開其勞動的花、結其血汗之果，開創出寶島台灣的花果來。

再者，在新開墾的沃壤及良好的氣候條件下，豐富的特產在國際市場上，佔有其優越地位，促使開拓農民的精力更集中於開拓事業上，結果耕地面積大增。參與「邊境」台灣的開拓，比較在對岸大陸從事耕作，陷於佃農的惡劣情況要來得有利，亦富於挑戰。故來台人口激增到上述二百五十五萬之多。尤其人口在社會層次上的激增（非自然層次上的增加），概集中於劉銘傳推行新政前後，是很值得我們留意研討的（註39）。

## 清末台灣推行洋務運動的條件與原因

在貿易方面，亦與振興開拓有關連的產業同樣有利。儘管英國等外國商人極盡其榨取之能事，當年仍然產生了陳福謙（著名糖商、陳中和的先人）、林維源（林本源家）、黃南球、李春生、沈鴻傑等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商人（註40）。

其中之一位，沈鴻傑爲了改良製糖方法，從德國引進新式機器在新營（台南縣境）設廠，在當時似乎是一件頗令人驚訝之快事（註41）。

台灣，正由於上述相當有規模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有逐漸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資本家之存在。才能從內部支撐洋務運動——劉銘傳的「新政」的開展。

腐敗紊亂，病入膏肓的晚清期間，清朝爲何會企圖導入洋務運動於「邊陲之地，台灣」呢？理由甚爲簡單，日漸逼迫的外來軍事威脅，叫清朝生起危機感。因而，清朝洋務派爲了擴充並確保東南七省的防務與安全，只好斷然地在台灣推行洋務運動。

至於實施洋務運動是需要財源的。台灣如果是真正的「化外之地」，或只不過是「生蕃之荒島」的話，毫無疑問，清朝實權派是不會亦不可能在台謀其洋務運動之開展的。台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在台灣社會經濟層面所實施的新政——「清賦」、敷設電信網、修築鐵路以及「撫蕃」等等——，其主要目的當然是在於開創財源，以補回已經投下之資金。另外亦意圖振興台灣經濟，使「乳牛」台灣更富庶，以便多謀田賦稅捐等等收入，好充當防務「原資」。取於台灣，用於台灣，本來就是劉銘傳



一向的原始願望。

## 二 洋務運動在台灣の實況

### 1. 台灣的特殊性與初期在台洋務運動

所謂洋務運動者，一般係指第二次鴉片戰爭，即英法聯軍之役終了以迄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一八六〇—一八九四年）的三十五年間，由清朝官方自上而發動的一種自救運動。

運動的主要策劃者，爲當年已開始具有買辦傾向的當權派大官僚們。他們日後因而形成「洋務派」。

### 洋務運動的內容與目的

他們認爲，並不須改變其體制結構，更無需洗心革面改造其精神「深層結構」，僅僅借披西方資本主義的外衣即可挽回頹勢，且亦可試圖維護他們的封建支配體制。

洋務運動當初的主要目的有二：1. 欲藉運動的「成果」，來壓制國內的反體制運動。特別是因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解體而惹起且不斷高漲的農民運動。2. 以毒制毒，欲藉「洋爲中用」來加強防務，

以防備與對抗日益逼迫的外來軍事威脅。斯時，西方殖民主義先鋒隊的進軍喇叭及槍聲，已在國界各地高鳴響徹。

很顯然，洋務運動一開始就涵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因此，我們亦可把洋務運動視爲，以軍事目的爲中心的一種「近代化」運動，或者「西化」運動。

儘管洋務運動具有濃厚的軍事性格，但因洋務運動所開創的軍需工業以及所加強的防務諸措施，必然地將會帶動「民需」部門產業的開展。

因限於篇幅，拙文將自限主題，只就非軍事側面來作探討，希有所見諒。

我們必須先確認，洋務運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本質是不曾因地——大陸沿海地域與台灣島嶼——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的。

### 洋務運動在台灣的特殊性

但只要依據「比較分析」視角來展觀，我們亦不難尋出台灣所獨具的特殊性格和條件。

第一，我們可以發現，洋務運動在台的實施時期，較大陸的運動要晚許多。它創始於大陸洋務運動的第二期，也就是「官督商弁」時期。有關在台開展日期諸問題，我們俟後還會詳述。

第二，就地理政治學（Geopolitics）的觀點而言，本爲南海孤島的台灣，難免受輕視是不待言的。可悲的是，斯時的當權集團，仍然保持其「夜郎自大」的「中原正統」價值本位觀，不但未能早覺出「西方的衝擊」所帶來者爲何種內容與何種情勢。他們依然故我的把台灣當著邊陲「化外

」之地來看待。

除了上述傳統心態的作祟以外，同時期的台灣，很顯然又不是屬於當年洋務主流派，特別是北洋派的勢力範圍。台灣因而不受重視是有其道理的。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第三，我們有必要提出，同期間台灣社會經濟的特殊狀況：1. 台灣經濟已具有如前所述的規模，其商品經濟的成熟度亦達到相當高的地步。2. 台灣經濟就其進出口來言，包括移出入和輸出入的「貿易平衡」上業已形成順差。樟腦及茶葉等的台灣新特產，在國際市場的聲價已逐漸被肯定和接受。故若單就台灣一島經濟的立場來言，台灣經濟本身已足以抗衡「洋貨」和鴉片的進口。台灣很充裕地已形成貿易的出超。「島嶼經濟」的優越性日新月異地在醞釀。3. 台灣農村的階級關係有異於對岸大陸諸省。我們雖然無法尋出有關數據來詮釋和印證。但衆所週知，漢族人士在台的拓墾歷史並不甚久。尤其是中北部和東部（花蓮與台東）的新開墾地域的階級關係顯然地有異於大陸農村，是不必贅言的。

### 當時台灣的社會經濟矛盾有異於對岸大陸

當年的先住台灣人 (NATIVE TAIWANESE)，除了平埔族已達到農耕生產初期階段而外，其他的高山諸族，一般來言還停留在打獵、捕魚、最高者亦不過是過著「燒圍式」極爲原始的農耕方式的階段。

雖然，嘉南平野以南較早被漢族蠶食，開拓爲美田沃野外，中部以北的台灣却因泰雅族的人數衆多且抗侵力量可觀，漢族的入侵蠶食只得牛步漸進，其範圍一直到清朝中期尚停滯於山麓以西較爲平

坦的沿海平野地帶。

故而，在這一地帶的耕殖農戶的的確確流了血汗，以頭顱換來他們的「開墾地」，且確立其自耕農或「小租戶」的地盤。

晚清期，因大陸農村經濟的破產，新推出一大批破產農戶向台灣「未墾殖」的原始樟樹、檜樹林地帶進軍。一步一步的迫使泰雅族人向後山深谷退守，新來漢族開拓人士則伐樟木、蒸樟腦，開水田播種水稻，園圃地栽植甘蔗以求生存。

類似的推展，晚清期的中北部台灣以及東部的一小部分平野地帶亦可發現自耕農或「小租戶」的出現，及小農經營的開展。結果促進了「國內殖民地」台灣」的「民富」的累積。

從此可以判定，類如上例的台灣中北部、東部農村的階級關係與正在面臨鴉片、洋貨的大入侵加速解體的大陸沿海一帶農村的階級關係，在本質上是有其差異的。先進南部台灣的平野地帶，因拓墾歷史早且久，因而佃農、「小租戶」、「大租戶」的關係相當地「成熟」，當然我們需要另文別論。但這一期，中北部、東部的新開墾農村在社會經濟上的主要矛盾卻並不呈現於階級矛盾上，仍然顯現於種族矛盾——高山諸族與漢族——上面，自不待而言。台灣洋務運動有關民需部門的茶葉、樟腦，包括帶有部分軍事色彩的硫磺、煤炭主要生產於這個地帶。因而我們特別點出中北部、東部的有關社會經濟概況。4. 一般而言，晚清期台灣經濟主流已非以自然經濟、自給自足一體制為主要基礎。幾乎所有的農產物皆以輸出國外或移出島外為目標而生產者（當然高山諸族的經濟生活另當別論）。5. 已有「郊」行商人資本家或從買辦地位巧妙地逃出，並樹立自家地盤的商人、商業資本家在台灣出現。逐漸擴充其勢力及活動範圍。這些新興的商人、商業資本家大多數不僅與中央權力機構無直接關係，

他們中的一些先進人士，甚至於遊弋於清廷和外國諸勢力之夾縫中，尋「孔眼」而出入歐洲、日本、東南亞、對岸大陸等市場。他們從而通達國際情勢（註42）。但他們始終仍然保持著「店」在台，「家」居於閩的雙棲生活方式。

由以上的檢討，在海洋務運動的創始，與其視為由清廷官方單方面，自上往台灣「強制」下注而實施，勿寧說在海洋務運動，的的確確具有它本身，以其本位的經濟發展階段與基礎，而加以國際情勢在台海周圍已見有風聲鶴唳之勢，日趨緊張為契機，而自大陸誘引進來者較為中肯。

### 台灣洋務運動的開始

在海洋務運動，肇端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註43）。當時，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在有關於台灣防務奏摺中，為加強在台防務的一環，他建議清廷架設陸上及海底電纜。以便台灣府與台灣南部（與洋船糾紛頻起之地）之間，以及台灣島與對岸福建之間的訊息迅速傳達，架設電纜工程，後來成為在海洋務運動的一件大事。

一八七四年，因「牡丹社事件」（為明治政府第一次侵台軍事行動）而被委派「辦理台灣海防事務」的沈葆楨，當他處理上述事件的善後之後，進一步建議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加強台灣的治理，除此以外沈亦為了鞏固台灣防務起見，積極地嘗試刷新台灣的行政、促進東部的拓墾、勞眾動資獎勵開山闢路，並整編駐台軍隊以及築建臨海砲台等等的措施。

洋務運動要務之一的槍砲及輪船之試造，曾國藩、李鴻章及左宗棠等洋務派頭頭，大致已在大陸

有過試辦。沈葆楨很可能欲繼其後，自台向大陸的洋務運動來個呼應，他對台灣煤礦的開採以及原料鐵礦的試採表示過濃厚的興趣。

由葆楨明言「開煤、鍊鐵有第資民力者，有宜參用洋機者，就近察勘，可以擇地而興利。」可窺伺其一斑。沈進而亦婉轉地指摘「南洋派」一味偏重洋務於東南諸省，而忽視一向與東南諸省有著「唇亡齒寒」般密切關係的台灣為不當（註44）。

### 煤礦的開採

事實上，沈在其任內，即特別致力於美英兩國早已留意，正在伺機入侵鷄籠煤礦的開採。

首先，葆楨於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所上奏的「台煤減稅摺」（註45）中表明，應除去稅制上對台煤的限制，俾使台煤最低限度能與日本產煤相互競爭為要緊。蓋，當時的通商稅則因受西方列強之強制，洋煤進口稅僅為每噸五分，但土煤的搬入關稅却反高為每噸銀六錢七分二厘。因而洋務運動中所增設的船政局和軍需工廠所需煤炭，幾乎全部仰賴洋煤。土煤（台煤不過是其一例而已）的開採被逼居於甚為不利的地位（註46）。

同年五月，沈雖被擢昇為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但由於前述的上奏被採，他一面推辭就任新官（後來乃趕赴任），一面聘請英國人士翟薩（David Tyzack）來台探查煤礦，根據其調查報告草擬並呈「台北議購開煤機器摺」，建議有關當局購買新式開鑿機器和聘用外籍工程師（註46），以便開展盛舉。

翌年，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當局聘來了外籍工程師，新式機器亦陸續運到，乃正式進行開採鷄籠八斗煤礦。其開採督辦則經福建巡撫丁日昌的推薦，復得李鴻章和沈葆楨的贊同，委派精通船政的廣東題奏道葉文燾到任。

再者，丁日昌巡撫亦為洋務派大官之一，故他不但督勵開採礦源，並親至台灣視察與督促下屬調查硫磺、石油等（註48）。尤值我們注意者，他經過調查後，在台嘗試開採，大陸未曾試掘過的石油資源（註49），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一個創舉。

是年，八斗煤礦裝置了日產數百噸的機器，挖鑿直徑十二·五呎的豎坑二百九十五呎，而在坑底二百七十呎深處掘到厚三呎的煤炭層，算是開端有成的好徵兆。它頭一年的日產量僅止於三十~四十噸。但第二年（一八七七年）不但重新裝置了供通風用的基拔式風扇（*gubal fan*），亦復新掘直徑八·六呎的豎坑深達八十八呎，日產量大幅增加，遂達二百噸的高產。據外籍工程師紀錄，該礦的煤質甚佳，至於同坑的儲炭量亦可達二十萬噸（註50）。

### 架設台灣的第一條通訊電纜

丁日昌，他在巡撫任內，不僅實際上開採了煤礦，他並恢復了因沈葆楨的離任而中斷一時的電纜敷設工程。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丁把電線自福建搬運入台，委命游擊沈國先指揮福建船政電報學堂學生蘇汝灼等，自八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不到兩個月的短時間內，架設完成了安平——台南、台南——

—鳳山（至鳳山旗後）間的兩條幹線，一共九十五華里。

值得日後國人感興趣者不外是，丁有意識地不假借外籍人士的相助，而純以國人自己的能力來完成該項工程（註51）。這一點，除了應得贊賞外，似乎已顯示出，大陸洋務運動中，國人應獲得的經驗與外來科技已有不少。其部份成果乃可應用於台灣，搞出一些成績來。

日昌亦沒有忘記台灣傳統的名礦產硫磺可作為火藥原料的重要性。他企圖統產統銷硫磺於大陸各省。光緒三年，特命葉文燦在產地立「碑界」布告禁止民間私製外，亦復廉價收購已成的私製品。他試算，藉收購統銷可獲得一千一百兩利潤，準備轉此利潤為資金並策劃建設新式工廠。

丁在福建巡撫（當然兼管台灣）任內（光緒二年至六年），除了力圖在台開展新式產業；例如開採煤炭、石油等等外，他曾對台灣的茶葉和樟腦業亦作了初步的調查（註52）。

岑毓英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接了丁日昌的棒，就任福建巡撫，直至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岑幾乎在洋務運動上未曾留下可被注目的成績來。倒是他的部下台灣道劉璈，有意發揮他精練的政經才幹。

### 煤礦開採好景不長

令人扼腕的是，唯一稱得上振興產業成功例子的煤炭開採，好景却不長，在劉璈到任（光緒七年）時已陷入於經營不振。

其原因概在於，相沿成習良久的官吏之腐敗、貪污以及無能。有關掌管官吏，不但虛報收支，還



「私銷」中飽私囊。偷懶且無能的官吏們，當然無法策劃運銷體系和拓展新市場。出了坑道的煤炭只好堆成爲煤山，存貨的增加必然地導致滯銷之累增。因而形成經營不振的惡循環，問題累積重重便難於克服。

單就存貨的實況觀之，正如劉璈奏云：「煤井全年所出之煤，不下百萬石之多，除船政局搭銷少許，各輪船銷亦無多，現積四十餘萬石，尙在待銷。」（註53）劉文明示給我們，當年，年產量的三分之一已堆成煤山，無法銷出。

劉又云：「刻下日本、英、美各國之炭，銷於上海、香港各口者數十倍於台灣。查上年上海一口，銷英煤一萬八千噸，日本炭四萬四千噸，台灣煤四千噸（註54）。」足見台煤在對岸大陸市場居於極爲不利的地位。對於因台煤的銷售不佳和存貨累增所造成的損失，劉璈亦嘆云：「台北礦……該礦只開一處，每年已見煤百數十萬石，能值銀二十餘萬元，局用不過數萬兩，徒以存煤不銷，籌銷而未得其道……是本有大利，而轉爲大害（註55）」。

劉將台煤滯銷之原因，歸咎於「地」（認鷄籠位於僻遠之地，往來商船過少）和「商」（有信譽的大商行不願經銷台煤）。他雖受歷史的限制因而認識有其局限性，但劉的認識時務頗爲不足且不夠精細明確却是事實。

本來，大陸洋務運動所創設且較近於台島的有江南製造局、馬江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等。其實這些新廠局與有關船隻所需燃料的煤炭量，超過台煤的總產量綽綽有餘。只要煤價適宜，「地」不至於成爲問題才對。

阻礙台煤銷售的主要原因，決非在於劉璈所指的「地」與「商」。

## 台煤銷不出去的原因

我們認爲，第一，當年的洋務運動缺乏全國通盤性的策劃與領導。北洋派和南洋派各搶其山頭。第二：台灣既因地理的位置而不屬於洋務派主流的北洋派勢力圈之內，但它又無法醞釀催生「南洋派」勢力圈的氣候。很不幸地，台煤陷入了「北洋派」勢力圈和未成熟的「南洋派」勢力範圍的夾縫困局中，難於尋出「生機」以培養剛問世不久的「初生之犢」台煤產業，是不難想像的（註56）。我們的「初生之犢」却怕虎，這隻虎，名謂西方帝國主義。這隻虎，動用種種「魔爪」準備把中國資本主義的「幼苗」捏死在搖籃。「魔爪」的一種就是控制關稅。束縛了中國人的自主權利。

我們該知道，阻礙台煤有利地銷售大陸的最主要的因素確是關稅規定。誠如「請減出口煤稅摺」中所云「洋煤每噸稅銀五分，土煤每擔稅銀四分，合之一噸實有六錢七分二厘，若加復進口半稅，已合每噸銀一兩有奇，盈絀懸殊至二十倍之多（註57）」。本是土煤需要負擔關稅已失常理，不僅如此，它還得負擔洋煤者的二十倍，洋煤因而能夠保持其絕對優越的地位，理由連稚兒亦可明察的，有何值得我們去添描蛇足。

我們相信，劉璈者並非不知其實因。很可能他已體認到關稅規定者所牽涉的國際關係非淺，區區小官有何可言及，因而迴避免談亦說不定。

劉璈推出了「節糜費」、「禁失耗」、「足器用」、「廣銷用」等四大方針，力圖三年內和緩其經營的危機，但效果却不顯，距克服難題亦甚遠（註58）。

我們很可以肯定，劉焄對改善台煤運銷及經營不振的「善意」和努力。但我們亦不得不指摘，劉的確未能明察問題的本質，他所提出的上揭四大改善方針，充其量也不過是枝葉末節的小「功夫」而已。我們又可以假定，劉為一位能力甚強的清官，但他的屬僚却很難保證，都免疫於晚清時期的官場各種陋習。他可能因而得不到合作，不易發揮他為改善而下的多種努力。我們又知道，道台所掌的權力本來就極其有限，加上劉焄亦未能與東南各省洋務運動的首腦們建立起友善且富於協調的人際關係，當然這些又間接地削弱了劉焄的權限和能力。迫使他難於收到預期的改善效果。

### 建議創設軍火工業

迨至光緒九年（一八八四年），劉道台為了圖備情勢緊急之需，他又建議創設「修配鎗廠火藥局」。以圖製造台、澎兩地所需彈藥及鎗廠。新設工廠在藍圖上當然又包括有修配鎗廠的項目。

但因所需資金龐大且找不出適當的人才來督辦，退而求其次，於同年臘月二日改奏創設「火藥廠」（註59）。

### 台灣洋務運動也倡議「民需」產業

在台初期洋務運動，正接近尾聲時，自島外飛進來，有關「民需」產業部門的洋務倡議，倒叫我們非留意探討不可。那就是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八五年二月七日），洋務大員之一的

左宗棠與閩浙總督楊昌濬聯名提出「試辦台糖遺利以濬餉源摺」，建議派遣製糖技術人員前赴美國，購買新式製糖機器及招聘外籍工程師，以求改革製糖，特別期待能藉機引進精製蔗糖方式。左等準備等待中法戰爭結束後在台實施（註60）。

這個有關製糖方面的洋務倡議與前述台灣商業資本家沈鴻傑的嘗試，是有其不謀而合的「時代胎動」在。

誠如前述，沈某從德國引進製糖機器，在新營嘗試改良製糖方法（遺憾的是，我們無法確認其確實時期，但自文脈觀之，與左等倡議大約為同一個時期）。沈的嘗試與左之倡議，我們都不該忽視它給中國近代甘蔗糖業史帶來的重大意義。

### 台灣的洋務運動比大陸者晚十五年

探討迄今，我們可以得知，台灣的洋務運動比起大陸者，大約要晚十五年左右。它的原因不外是，台灣位於南海邊疆之地，清廷有關人員亦遲遲未能洞察，圍繞著台、澎兩島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緊急新情勢及重要性。

惟，沈葆楨、劉璈等在台推行初期洋務運動的官員們，由於有較長的時間來觀察並作實地視察調查，故似乎對台灣經濟的潛在力量有所掌握和認識。

儘管如此，但他們一旦有需遊說清廷中樞當權派，以便推動洋務運動的實際工作時，他們通常亦只好藉「台灣為東南七省的門戶，因而地位特別重要」云云為口實（註61）。或者是，站在支持南北

洋務運動爲重點來強調。誠如「萬一台灣爲彼（指外來勢力）所襲，地大物博，取多應用，凡我欲爲不得者，彼皆爲所得爲，南北洋務將無安枕之日，是誤台即誤國矣，由辦之不早辦也（註62）」云云，只把台灣放於次要或是附屬地位來主張並說明情況。

至於專心致力並忙於確立北洋勢力圈的李鴻章，當面臨「牡丹社事件」的緊急驚慌失措狀態時，特命派遣洋務派的幹員黎兆棠爲「福建署理台灣道」以協助沈葆楨。但日軍自台撤出，一俟「牡丹社事件」塵埃落定時，旋即召回黎某另就「津海關道員」（北洋洋務的要職）（註63）。這一招，無疑是印證北洋派頭頭李鴻章，不但有意輕視台灣洋務，基本上對台灣洋務並不具有任何長遠計劃。李等北洋洋務派人士，乃可以輕視台灣的存亡，但絕不能讓他們北洋派的「生命線」——北洋，和京畿受到任何威脅。

### 台灣洋務運動的財源

再者，對如何確保洋務的財源時，駐台官方則有如下主張。「且固台防必練兵，欲練兵先濬餉，籌餉款於內地，利有時竭，不如開餉源於台灣，利可無窮（註64）」，或亦云「不特山前已闢地方，可期整理，即山後山中似關未關各區，墾務、礦務、材木、水利等項皆利源所賴。開辦得法，則農、工、番、漁皆足寓兵，亦皆可籌餉（註65）」。說的眞堂皇，邏輯亦不能說不夠分明。問題却在當年的官場是否有人才，有組織，有能力，有魄力，把上述見識與方針附諸實施是爲關鍵。事與願違，晚清的無能官僚，上書是一套，實做又是一套。他們既沒有耐心亦缺乏信心去求開「源」的治本作法。

他們的實施僅止於治標却是事實。所求者不外是姑息捷徑的方式以索取他們所要的財源。

在台清廷官吏，第一著就是向台灣鄉紳伸手籌捐，第二著便立碑禁止民間利用土法製硫磺，並廉價收購私製硫磺成品以求開源。

當局另亦藉官辦洋務爲口實，多方阻礙民間自力在傳統產業求發展的各種企圖，好比自力依土法開採煤礦等等事業（註66）。

值得我們留意的另一件要事是，當時似乎並沒有實施，直接對農民增加課捐的政策。這一舉可能是面對外來侵略的緊急，於不得不優先考慮防農民反抗，以先求島內治安而所作的施策所致（註67）

### 初期洋務運動的兩種特色

在台的初期洋務運動，如上所述，其具有兩種特色。一爲：由官僚主導和獨占。二則：洋務的推進帶來了抑制民間土法傳統產業的進展。不過洋務實施於煤礦或石油礦的採探時，附帶地引進了西方近代科技，我們不該忘記這些新科技都是先於大陸諸省洋務的第一招。這一點確實具有其歷史意義值得我們後人肯定。事實上，引進來的採煤新技術，後來成爲開採大陸開平煤礦的先進楷模（註68）。

復次，洋務運動在台的初期嘗試雖帶有軍事色彩，但多亦具「民需」側面。換句話說，它甚容易轉換爲民生產業或同時成爲「社會資本」活用的一些先行投資。這一個比起純軍事工業的創設對日後民生經濟的開展，含有不少潛藏的促進因素。

電話線的架設，先是軍事利用，日後當然可轉爲產業經濟資訊的傳達網來活用是個「社會資本」

的典型例子。煤炭、石油的開採，當年的主要供給對象當然是有關軍事部門。衆所周知，煤炭、石油概為近代工業的重要動力源。至於所引進的有關開採的新技術，只要承接有人，當然亦可以轉移變為「民需」部門以及其他民生有關產業部門來活用。

這一段時間，在台洋務運動雖未能見到「官督商辦」方式的推行，但有關近代製糖技術的引進，必然地將給民間商人、商業資本家——特別是經營茶葉、樟腦、蔗糖外銷的商人、商行——帶來正面的「刺激」(incentive)。

這一種「刺激」往往亦可轉變為「觸媒」，再給台灣經濟鼓起一種新的風氣與「生機」。

## 2. 洋務運動的正式展開——劉銘傳的新政

劉銘傳係安徽合肥人，他經歷過曾國藩的團練，一八六二年被李鴻章擢升為淮軍的「管帶」。他在清廷「扼殺」太平天國的戰事中屢建軍功。由上列經歷，我們可窺知，劉確屬洋務派主流的骨幹人物。

銘傳與台灣事務發生關係則在中法戰爭期，他被遣派為「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開始。即於一八八四年春天，當法國海軍軍艦為了配合該國對印支半島發動軍事行動之需要，開始窺伺台灣時，清廷軍機大臣透過北洋大臣李鴻章，拔擢下野正在養病的前直隸總督劉銘傳為「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

劉接受任命時，當然會向李鴻章請示商討。他在其赴台就任前夕（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曾至天津拜訪李，接受不少指示以及鴻章所推薦的幹部和各種新式武器（註69）。

直至光緒一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六月四日，辭卸台灣巡撫一職，劉銘傳在台灣任職，約滿七年。最初兩年，劉專心致力於防衛法軍侵襲台灣以及處理有關台灣防務的善後，他推行所謂新政却在其後的五年任內。

一般而言，新政所指者為：「辦防」、「練兵」、「清賦」、「撫蕃」等四大要務。本稿因限於篇幅，筆者只就「清賦」及「振興基礎事業與生產事業」等項目，擇要探討和介紹。

如前所述，晚清期台灣並非所謂「化外之地」。事實上是，被腐敗昏庸的清廷有關人員所忽視，反而受東來的諸列強勢力所垂涎的「寶島」。雖然，當年尚存在着所謂的出草或「蕃害」（其具體內容，却是因漢族移台人士不斷向高山諸族既佔土地侵透而惹起的武力抵抗行爲），以及亞熱帶、熱帶地區當年難於逃免的「瘴癘」。惟無論如何，那些以瘧疾（Malaria）為中心的「瘴癘」並非台灣獨特所具有的屬性，而是當年的世界史階段，亞熱帶和熱帶所住人類必有的共同遭遇。

雖然，台灣面臨外國侵略競爭的挑戰來得較晚，此時期最為垂涎台灣者却是日本和法國。這兩國，皆不是清朝期洋務運動所依靠的主要國家，尤其日本係，正欲趕搭「資本主義巴士車」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個，它還只是，剛出生不久的資本主義之犢而已。

不過，侵略的鋒芒所向直逼台澎近海後慢慢又引發新的民族危機。洋務派為確保東南諸省（斯時稱謂南洋）的安全及洋務運動的「成果」，乃被逼在台灣亦嘗試了「新政」。

新政後來雖然遭到了挫折，但它仍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它特別顯現在，始於一八九八年（頭三年日本當局奔命於對付台灣民主國的抗日軍事行動，經濟政策無從做起）的日據下經濟層面的「接木」運作上。當日本有關當局力圖把台灣經濟編入其日本經濟圈時，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本土社會經濟



基礎上找出來的接木用的「台木」，很「幸運」的並不是派不上用場的「竹桿」，反而確確實實是眞木頭的「台木」。

這個「台木」終於發揮了它的功能，給日據下的台灣經濟，能開展出「殖民地形態的經濟成長」提供了前提條件。

劉銘傳當然沒有意料到，他在台灣所嘗試的新政，將給日本殖民當局，提供了「台木」，方便它在台灣「移花接木」開展了「台灣式殖民地形態的經濟成長」且獲得了「成果」。

研討劉在台的新政，我們首先得從台灣建省及行政組織的重整和擴充來開始。

### ① 台灣的建省及行政組織的重整及擴充

自從牡丹社事件的善後處理過程中，沈葆楨建議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來，台灣的建省即不斷地在清朝官廷醞釀。中法戰爭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升高了台灣近海的緊張情勢，這個當然影響了清朝對台灣的關注。另外已有駐台經驗的洋務派人士們，例如沈葆楨、黎兆棠、劉璈等人根據在台的直接見聞反映回大陸等等，似亦促進了統治階層形成在台建省的「共識」。

中法戰爭之際，法軍侵犯台灣北部乃是台灣建省的直接契機。爲了應付危急有加的台灣情勢，除了促進台灣建省之建議外，有關台灣防務善後處理之積極意見也紛紛出現，接踵而來（註70）。

其中，促使清廷決定台灣建省最有力的意見，乃是洋務派的大將左宗棠的「遵旨籌議海防事宜」奏摺，以及與之相呼應的軍機大臣醇親王奕譞同北洋大臣李鴻章等重臣聯銜覆奏中所表示的：「臣等

查台灣為南洋樞要，延袤千餘里，民物繁富，通商以後，今昔情形迥然不同，宜有大員駐紮控制」建議。

清廷接到上述奏摺之後，於九月初五日（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頒佈德宗之諭旨，略謂：「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予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籌海防善後事宜摺內奏稱：『台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等語。台灣為南洋門戶，關繫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着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常川駐紮，（中略）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詳細籌議，奏明辦理。」（註71），台灣建省之議遂有最後的決定。

在有關建省的奏摺中，引起吾人留意者乃是左宗棠對台灣經濟的認識，既相當地具體且有深度。左謂「台灣雖係島嶼，綿互亦一千餘里。舊制設官之地，祇海濱三分之一，每年物產關稅，較之廣西、貴州等省，有盈無絀。尚撫蕃之政，果能切實推行，自然之利，不為因循廢棄，居然海外一大都會也。（中略）至該地產米甚富，內地本屬相需，若協濟餉項，各省尚通有無，亦萬無不為籌解之理……。」（註72）。

台灣建省雖已由清廷做下最後決定，但台灣島內的行政組織一直未具其規模，雖一度由沈葆楨略加整編但距整合尚有一段距離。考其原因：第一為清廷長期輕視台灣，因而不曾真下過工夫整編行政組織。第二則由大陸過海移民日衆，移民民社會經濟的進展過速，昏庸的官僚們無法跟進。第三，有些地區因漢族移殖民群與先住台灣人群（高山有關諸族）的抗爭狀態時時在流動不定中，不易定界亦是其因也。

因而，劉銘傳的到任第一舉，則對行政組織作如下表所列的整編。

台灣府 (知府)	台北府 (知府)
台灣縣 (知縣) 彰化縣 (知縣) 雲林縣 (知縣) 苗栗縣 (知縣) 埔里社廳 (通判)	淡水縣 (知縣) 新竹縣 (知縣) 宜蘭縣 (知縣) 基隆廳 (同知) 南雅廳 (通判)
台南府 (知府)	台東直隸州 (知州)
安平縣 (知縣) 鳳山縣 (知縣) 嘉義縣 (知縣) 恒春縣 (知縣) 澎湖廳 (通判)	卑南廳 花蓮港廳

衆人皆知，日本殖民當局治台初期的行政工作亦是憑藉上述行政區劃而有所推行的。

## ② 清賦事業

劉銘傳的新政畢竟是就洋務運動的一環而實施的。因而，當然是定防務爲最重要。他一方面推行「辦防」、「練兵」同時亦進行行政組織的整頓。「辦防」、「練兵」必需確保並籌措財源，乃實施清賦事業，進而又振興生產事業及創設與之相關的社會基礎事業。其中與財政具有最直接關係者，乃

出處：周憲文著『清代台灣經濟史』（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灣研究叢刊，第45種）5、6頁。但台東直隸州則根據伊能嘉矩編『台灣巡撫、劉銘傳』（日文本）17頁作成。不過花蓮港、卑南兩廳則在企劃中，因遭「割台」沒有來得及實施。

是確保賦稅的最中心項目「田賦」也就是「土地稅」。

誠如銘傳在「量田清賦申明賞罰摺」中申明「期於三、五年後，以台地自有之財，供台地經常之用，庶可自成一省，永保巖疆（中略）今田賦稅，率土輸將，乃司農歲入之常經，列代保邦之大法，舍而不計，徒乞鄰疆，雖舌敝唇焦，緩急終不可恃」（註73），清賦之目的顯然是「在求財政在台的獨立，以能就台地取財源以養台灣防務為最終目標」。

實施清賦之前，劉所預估的台灣財政的收支却可藉下列記述來掌握其概況。「查台灣田產，甲於東南，一年兩熟。淡水一縣，每年額徵錢糧銀僅七百八十餘兩，官莊穀纜九千餘石。宜蘭一縣，錢穀無徵。其餘各縣，糧稅亦寡。通計全台鹽、茶、百貨稅釐，歲入銀一百零數萬兩。將來整頓各項稅釐，剔除中飽，歲可百二十萬。核以台澎三十五營之餉，歲需百二十萬，乃適相資。惟輪船經費，一切雜支，並須添設製造局，歲需銀約百五十萬，所虧實多，若能將各縣賦稅一律清查，以台灣之入供台灣之需，尚可有盈無絀」（註74）由上可知，歲入約為一百零數萬兩，整頓稅收和剔除中飽之後，歲入可望增為一二〇萬兩，正相當於台灣、澎湖的駐軍三十五營之費用。然而因船艦及製造局等之增設費用約另需一五〇萬兩，故僅靠上述收入顯然是不足的。劉銘傳認為若能將各縣賦稅一律「清查」，則不但能充分供應，而且還有盈餘。

事實上，當時的台灣被處於「化外之地」，所以清廷對台灣的支配常感「鞭長莫及」，必然地徵稅管道經常阻塞或不能發揮其功能，更有甚者，行政體系的僵化及貪污官吏的「中飽」與無能，益使稅收惡化。本來，像台灣般的新開拓地，開墾的情況常因時地而異，何況在長達二〇〇年的清朝的統治下，有關土地所有權的各種情況當然變化迅速，然而在此期間迄未實施全面清查過。其結果田賦負

擔輕重不一，難免發生無土地農民（佃戶）之田賦負擔的不平等及大小租戶跋扈等情形。正如劉氏嘆云：「臣渡台以來，細訪問賦稅，較之內地，未見減輕，不勝驚愕久之。察所由來，皆係紳民包攬。」（註75）但另一方面，據劉氏所云：「究之正供糧課，毫無續報升科。如台北、淡水，田園三百餘里，僅徵糧一萬三千餘石，私升隱匿，不可勝窮。」（註76）亦可印證清朝綱紀的紊亂反而提供了有力小租戶之抬頭及民富形成的政治經濟條件。光緒十二年秋正式開始的清賦事業，至光緒十五年末大致完成。結果田賦總額多達六七萬四四六八兩，較過去的十八萬三三六六兩增加四九萬一五〇二兩，增加將近三倍（註77）。

我們所以說是大致完成，是據於其間頗多曲折，並且為推動清賦事業而設置的清賦局實際上直至劉氏離職後的光緒十八年五月才被解散（註78）。

民衆（尤其是南部的）對「清賦」為中心的劉銘傳新政的反應，曾留下頗有趣的資料，茲略述如下：

日本駐福州領事的「台灣視察記」中曾云：「目前（指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台南人心頗抱不平，……不滿清廷官吏之措施，動輒抱着一舉謀反之心，的確為不能掩飾之事實。近來民情之所以如此，全由政府之苛稅所致。劉銘傳駐台以來，一味致力於輸入西洋文明事物，不察同胞心情之向背，斷然施行土地改良（制），因此需額甚殷，其結果乃不得不由地租（田賦）雜稅分擔，……原來台灣的地租（田賦）一向依照戶部之規定徵收，從前歸福建省管轄時，稅額甚少，幾乎有名無實。但自從獨立為一省，即徵課意外之重稅，且各地普設厘金局，因此其稅法亦甚為苛酷。」（註79）。

該領事所透露的台南附近政情不安，蓋(1)由於漢人對台南附近開拓甚早，新政當局對大租戶在開

墾上扮演的角色異於北部（概言之，北部的大租戶只是不勞而獲地收取因轉讓開墾權而得的「大租」，而南部的大租戶（其先人）多為實際從事墾墾者）之情況認識不足，而企圖一律清查所致。(2)清賦所帶來的財政收入之投資主要集中於北部（如修築鐵路等），南部對劉氏的新政並不熟悉。(3)台南附近為舊墾地，故傳統社會勢力頗強，而且是與劉銘傳不和而下野的前台灣道劉澂之地盤（註80）。(4)以往之稅課有名無實，清賦事業對過去透過勾結地方官吏而逃稅的地主們無情打擊，使他們無法或少能施展故技等等皆累積成爲反對新政的原因。除上述曲折之外，清賦事業又有以下之缺點：「至於其施設之目的固然在於整頓地制之紊亂，要言之，由於急於增收田賦，故與租稅無關之地則置之不理；根本不加丈量，丈量方法亦不無疏漏杜撰之嫌。」（註81）。「當局不得其人，弊害叢生，尤其時丈量方法不完備，加以急功近利，調查流於粗陋，對業主之查定欠缺精密，誤給丈單，發生糾紛時，受害者亦無法伸其冤。丈量標準，因地區而不同，田園等級失其相等，魚鱗冊與實際亦往往不符。」（註82）。甚至到後來與日據台灣總督府所進行的土地調查工作一比，更顯示清賦事業的不徹底與杜撰的意義。」（註83）却值得我們留意。爲清賦事業的一環的保甲編制和人口調查（註84）所具有的意義，意外地常被忽視，當日本資本主義佔據台灣後，即充分利用了這包括人口調查和保甲編制的新政清賦事業、出乎當事人之意外，新政的這些事業和下述的基礎事業之振興，後來均轉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治台的方便，給扮演「台木」的角色奠定了基礎。

### (3) 基礎事業與生產事業之振興

如前所述，當時的台灣經濟已頗具規模。劉銘傳所計劃透過資本主義方式的開發以促成富國強兵，藉以對抗列強覬覦台、澎的事業，概如矢內原博士所指出的，有「修築基隆、新竹間的鐵路、購買輪船並航行於沿岸、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柴棍（西貢）、菲律賓等地、郵政制度、樟腦專賣、「理蕃事業」等（註85）。新政的內容實際上不只這些，更廣泛地進行築港、修建道路、擴充電信設施、改革貨幣制度、改良教育設施（如創設西學堂等將歐洲文明引進台灣）、設立官醫局（即聘請西醫韓先，譯註：Armauer Gerhard Henrik，一八四一—一九一九，挪威醫生，一八七九年發現癩菌，著有「癩菌之病理學」、「癩病研究」等書。）將西洋醫學引進台灣、架設電燈、獎勵植茶及養蠶、引進棉花及呂宋種煙草，並爲了在大料崁溪上游（則今日石門水庫水源地）開鑿灌溉溝渠（爲後來的桃園大圳的原型）而招聘外籍工程師測量等措施。（註86）

限於篇幅，以上各項措施不能詳細。茲另加略述此一期間民間資本之大略動向。

原來台灣的「殷戶」大多是來自福建，其「家在彼而店在此」。（註87）這些商人大多鑽政治官場之間隙，利用同鄉關係往來於東南亞地區。劉銘傳即利用上述關係，希望振興貿易，派員到南洋各地考察商務（註88），進而對南洋的「閩商」（福建出身的商人）積極展開民間商務合作的勸誘工作。（註89）

另一方面，設立商務局，向民間籌募股金，購買了一艘值十八萬兩的快速輪船（時速十五、六浬

（駕時號和斯美號（註90）。「最初航行於上海、香港等地，其後遠至新加坡、柴棍、呂宋等地。」（註91）。上述民股的來源雖然不詳，但南洋閩商的反應確來的相當積極。尤其是為修築鐵路而發行一〇〇萬兩的鐵路股票，民間積極地應募認股（後來因工程進展不順及當局處理不當，引起民間的反感，不再響應追加部份的投資，故自福建導入一〇四萬兩來填補，而收回官辦（註92））。對於製糖業亦採相當積極之措施，例如一八九〇年在淡水利用西式機器精製白糖（註93），在台南地區則引進鐵製甘蔗壓榨機等（註94）先進嘗試。對於經營不振的基隆煤礦，民間資本亦投資六萬兩試行官商合辦（註95）。尤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八八年民營煤礦產量超過官營，年產達二萬三〇〇〇噸以上（官營為一七〇〇噸）（註96）。同時，民間資本亦嘗試開設採用西式機器的「煤磚」製造廠（註97）。以上可見劉銘傳的新政所波及和牽動當時民間資本動向之概況。以施政積極名聞歐洲的劉銘傳（註98），亦不免因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醇親王奕譞之去世，又因不同派系關係而與布政使邵友濂（劉氏的繼任者）不和，以及部下不得其人等施政上的僵局，而藉口離職養病，終於一八九一年六月離台下野。繼任的邵友濂和劉氏的政見相異，亦曾有過對立和抗爭，邵氏根本無意擴大劉氏事業自不必論，毋寧是着意於中止或廢棄劉氏之事業以洩私怨為急（註99）。

## 結 論

台灣前、後兩期的洋務運動中，軍備投資費用甚鉅（僅在後期，其總額即達二一〇萬七五〇〇餘兩（註100），其中即使扣除修築鐵路的一〇〇萬兩，仍約一一〇萬兩）。此一情況與中國大陸頗相似



，充其量只不過是成爲歐美舊式武器的良好市場罷了，在清末腐敗體制下，就連智將劉銘傳的作爲亦無法奏功係理所當然的。

與日本明治政府的歷史性格相去甚遠的洋務派，在台灣政治上至少留有下列的長處。除了討伐少數民族——所謂理蕃事業的軍事面之外，頗有異於中國大陸的情況。洋務本身較少被利用在台灣壓制漢族系移殖民內部反體制勢力。再者，具有助長社會資本的投資及間接地不摧毀民族資本幼芽之一面。將資本主義式發展的新風氣引進台灣，此乃其貢獻。正因爲當台灣經濟內部傾向於資本主義生產及其生產力亦相應發展時引進上述新風氣，才能在清、日兩政府簽訂「割讓」條約後，對建立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台灣民主國」——以抵抗日本的入侵，乃有台灣本土性的社會基礎在。當土豪士紳、「家在彼而店在此」的股戶及腐敗政權清朝官吏等臨陣逃走或避難，以及腐敗的正規軍潰退後，漢族移殖民集團自組織義勇軍，所以能對日軍展開激烈的游擊性抵抗，全賴具有小農經營發展的小租戶及現耕佃戶的勢力，值得我們的留意。雖尙未成熟，但在台灣的水田地區已可見到「寄生性地主制」的發展，此一現象與同時代的朝鮮不同——「在朝鮮，具有近代意義的土地所有權並不明顯，土地爲國家或共同體所有，介其間，存在着豪族及官僚等的私有」（註101）。因有如此般的社會基礎及「寄生性地主制」的發展，才能在日後阻擋了日本人地主在台灣水田地帶生根落實。

台灣不會有類似朝鮮的「東洋殖株株式會社」般的日系地主公司的成立。台灣的既成社會勢力亦沒有讓日本人地主藉總督府權力，採取露骨的沒收及吞併方式來發展其在台灣的水田地主制度，好似在朝鮮農村地帶所開展一類的日本人地主制度。其具體的阻力乃是來自於持續二十年的台民間武力抵抗，固不待言（當時抗日運動，以沒收土地所有權較爲不明確的林野及爲了擴大糖廠的甘蔗栽培地而強

制收買土地所引起的農民及小地主之抵抗爲主體)。土豪士紳可說經土地調查而確保其所有權，並被編入日本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結構中。還有，那些大、中地主所擁有的資金亦被巧妙地導入製糖資本體系中。最著名的例子乃是由後藤新平之說服林維源(後來創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林本源家的中心人物，台灣最大的資本家，亦爲地主)回台(註102)和將林家資金攜回台灣(爲了避「割讓」之難而儲存上海海上銀行的林家存款據說多達二、三〇〇萬圓之鉅(註103)。然而當時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的資本却不過是一〇〇萬圓)以及陳中和家的創設新興製糖株式會社(註104)。正因爲如此，故大、中地主階層對武裝抗日運動始終站在傍觀者的立場(註105)。一九一〇年代以降，在徹底的武力彈壓之下，方便於沒收的土地均已被沒收，隨著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與俱同來的絕對性要求，台灣的甘蔗栽培逐漸發展，與之有連鎖關係的稻作亦逐漸提昇發展。大、中地主階層更在台灣總督府權力的庇護下，對佃戶剝削高額地租而確保了「殖民經濟」體制下的「殘渣」餘祿。

當台灣的日本資本主義體制形成時(大約在一九一〇年以降)，上述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發展亦遭受拘束。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年)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台灣府令」禁止台灣人單獨設立公司即爲典型之例(註106)。不僅在經濟方面，在政治、社會(包括教育)方面差別待遇亦日趨顯著。大、中地主階層的子弟(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者)對之敏感地反應，遂展開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雖然如此，林獻堂一派所領導的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抗日運動，不過是在溫和的議會設置運動的範圍內求其進展。中日戰爭爆發後，總督府的壓制變本加厲，林獻堂等所領導的溫和抗日議會設置文化運動遂後退爲「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單純地方自治運動，最後甚至有一部份人還加入了或被捲入了皇民化運動。

即使在一九二〇年代國際性無產階級運動昂揚時期，上述的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亦未像朝鮮人一般激進地轉向共產主義運動。這並非如山邊健太郎所謂由於林獻堂一派不像朝鮮民族主義者終於出了紕漏（註107），而是因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物質社會基礎大且廣於朝鮮，以致不易出現「亂子」，促使階級、階層分離，析出廣泛的無產階級才是史實。此即矢內原所指出：「台灣異於朝鮮，台灣人並未全部成爲生產者，由於不論土地集中狀況或企業方面，台灣人的大、中地主和資本家之勢力亦較強，故其民族運動不備有完全無產階級運動化的社會經濟條件。」（註108）。上述狀況若不對清末台灣社會經濟——劉銘傳的清賦事業以下的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及寄生性地主制的展開，以及商品經濟在台灣農村具有相當程度之滲透——發展階段作下科學的評估及正確的認識，則是無法理解且解釋的。

即使在世界史的發展上，正由於當時台灣的社會經濟已存在殖民主義者所不能完全扼殺的深厚的地主階層和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生機，因此其後日本資本主義在經濟面的接木運作遂得實現。雖在重新分配國民所得等上面有了明顯的民族及階級的差別待遇，惟「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的具體化亦已藉而出現於台灣。

若無上述之認識，則無法全面瞭解「日本之台灣統治史」，同時，若僅站在統治者史觀，則科學的台灣史之構想亦即無法建立。

以上，非常粗略地觀察了晚清期台灣經濟之概況。近年在日本有關台灣之研究——尤其是現狀分析研究——並未充分整理分析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問題，而有過於輕率地強調日本過去對台灣的殖民地體制確是支持台灣日後經濟發展的台柱，甚至認其爲支撐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來看待。

所有受過殖民統治的地域或國家，在某些意義上，均具傳正負兩面的殖民地遺產，姑且不論負面遺產，即使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正面遺產，其存在或形成過程並非與殖民統治前之歷史無關。何況從殖民統治解放後，守着那些遺產，並將其活用轉為本身發展經濟的手段者，畢竟是被統治者才是現實。保持「遺產」者若是凡庸的一群人，又從何談起解放後的「本位性」經濟成長呢。

吾人的確應在歷史脈搏的分析上，把握殖民統治前歷史的發展階段並加於科學的定位，在其現況分析上，把握住守着「遺產」並將其手段化的主體（則曾經被統治的人民群體）的性格，進而擴大視野至負面「遺產」的整理與定位。如此對殖民地遺產的全面評估才將有效。

就此意義而言，今後對晚清期台灣的研究，必須包括土地制度及地主制等個別問題在內的細密研究才夠涵蓋。

我們若意圖分析晚清期以來台灣本位性的發展（不僅是經濟方面，包含文化等全層面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下列各項留意並加分析才能全面奏效。好似如何因日本的統治，台灣社會的本位性發展終於被扭曲、變貌，而不得不曲折地發展。台灣民衆又如何地因應興起抵抗日本統治，包括「台灣民主國」之成立與其防衛戰爭，以及最初二十年的武裝抗日運動。而由於台胞之因應各種方式的抵抗，日本帝國又如何地制定、修正、變更或推行其政策。對於這些問題，唯有不把抗日游擊義士單純地視為「土匪」作亂，力克偏見及成見，運作科學方法全面地加以探討，始能有所成就，將自不待言。

在本稿，筆者多少提出了未成熟的一些問題，若能拋磚引玉且能被讀者諸賢接受、認為稍具「突破」，則不勝欣喜。

註  
腳

1. 部份台灣人以「台灣獨立」為前題而從事的「研究」之外，少有其他研究。值得注意的著作，僅有向山寬夫的「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為著者向九州大學提出的學位論文，尚未刊行。筆者所能得閱者為向山氏初期作品「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史——在日本統治下——」。『歷史評論』通卷二六、二七號），以及尾崎秀樹的「決戰下的台灣文學」、「台灣文學札記」、「殖民地的傷痕」（均收載於尾崎秀樹著『近代文學之傷痕』）。

2. 竹越與三郎著『台灣統治志』，一五三頁。另據莊嘉農『憤怒的台灣』，二九頁，為數十萬人，數字略嫌過大，但把竹越所言的七千人，加上民間人被處死者等犧牲者，則為數甚眾。

3.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台灣統治篇（上），一五九—一六〇頁。又，鶴見直稱我們抗日義民為土匪，而無抗日游擊隊的一種看法。就一般而言，在台灣並非完全沒有真正的土匪，而當時的統治者，拘於他們的立場將抗日游擊隊和土匪混歸為一類是非常當然的。遺憾可惜的是這種支配者史觀，被扭曲的看法直至戰後的今日猶存。甚至連九十三高齡（譯註：此文成立於一九六七年）而仍以向前看的態度闡釋中國革命的「中國人民革命史論」（發行人三島海雲，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發行，非賣品）之作者矢野仁一博士，也把當時的抗日游擊隊視為匪賊。他所描述的誘殺事件如下：「兒玉總督在對全島之匪賊所發出的佈告『到x月x日為止，要呈報洗面革心，更改匪賊行徑，歸為順民，這是給予你們的最後機會』中，督促他們『絕毋忘此期』。於是在嘉義之北的斗六設置廣大的歸順場所，在該地聚集出『面歸順的全島匪徒，以武裝警察包圍而一齊加以射殺』（矢野上

揭所著一六一—一七頁)。錯誤的歷史認識是如何的不斷地毒害善良的學者博士，並叫人們不斷的歪曲且錯看台灣史的真相。至於一般讀者，將來仍會如此下去嗎？心寒者恐不只筆者一人吧！

4. 日本當局在「牡丹社事件」(有關牡丹社事件請參考，藤井志津枝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原型——剖析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四年台灣事件』，一九八三年四月，台北：三民書局)發生前夕，派遣樺山資紀(後來的首任台灣總督，當時為少校)到中國大陸和台灣調查近二年(一八七三年二月自東京出發，翌年一二月返回長崎，值得注意的是隨員之一人為後來的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參照樺山愛輔，『父、樺山資紀』，一九五四年七月油印本所記錄的「台灣日記」或參謀本部所編輯的『台灣誌』，一八九五年一月編，同年七月一三日發行，該書採錄某領事在一八九一年調查台灣的記錄√等早期調查記錄中，並未見有對台灣的蔑視記述。由此可知後來的日本殖民主義者的台灣觀往往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權益而加以潤色有時且任意捏造的。

5. 詳閱拙著『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亞洲經濟調查研究叢書第一二九集，亞洲經濟研究所出版)第四章。

6. 參照前引拙著一五二—一九九頁。

7. 陳紹馨纂修『台灣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一九六四年六月，台北)一一一頁。陳紹馨指出「漢人在五萬以下」，略嫌曖昧，故在此根據其文脈改為約五萬。

8. 同陳紹馨上引著一一七頁。

9. 伊能嘉矩著『台灣文化志』(一九二八年版本)中卷，二四一頁。

10. 陳紹馨前引著，一三七頁。

11. 井出季和太著『台灣治績志』三七一頁，略謂一九〇四年時，所完成的土地調查之田畝面積為七十七萬七千八百五十甲。自「割讓」至調查完成為期九年，但治安不佳，雖有新墾地之增加，但為數甚少，故本文作七五萬

甲看待。

12. 請參照周憲文著『清代台灣經濟史』（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灣研究叢刊第四五種）三、六頁。
13. 例如細川嘉六在其著『植民史』一〇四頁或中村孝志在其論文「台灣史概要（近代）」（季刊「民族學研究」，第一八卷第一、二號，台灣研究特集）一概如此。
14. 據筆者所知，真正以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來論述台灣農民運動的論文只有宋明哲「從台灣社會經濟史的觀點看分類械鬥的意義」（載於『唯物論研究』第二八號，一九三五年二月）。但宋氏論文的資料大批為二手資料，其運用分類械鬥的分析方法亦不甚恰當，尚有檢討之餘地，容後另文研討。
15. 同上註7。
16. 參照吉國藤吉譯，『台灣島史』，一四七、一五〇頁。
17. 台灣總督府農商務局編『台灣農業年報』，（一九四三年版）四頁。
18. 黃叔瓚撰『台灣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種）之「物產」，五一頁。
19. 參閱前引『清代台灣經濟史』，（同註12）三六頁。
20. 劉家謀撰、吳守禮校『校注海音詩全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七頁。成書於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其詩作於一八五一年，故大致可以說是描述四〇年代末年之事吧！
21. 徐宗幹撰『斯未信齋文編』（台灣文獻叢刊第八七種），「請籌議積儲」六六、六七頁。
22. 參照東嘉生著『台灣經濟史研究』三五、三五二頁之表。
23.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一二頁。
24. 根據上引書（同上註23）之敘言（一、二頁）：本調查是根據明治三四年（一九〇一年）十月廿五日之勅命而

公佈該調查會規則，於明治三七年（一九〇四年）四月中止調查，故以此推測。

25. 『台灣總督府第五統計書』四一〇頁。

26. 參照，前引『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同上註5），一六三～一六六頁。

27. 前引『台灣經濟史研究』（同上註22），三〇四～三〇五頁。

28. 根據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57 之表 SUGAR EXPORT STATISTICS。本文所引數字將其英磅換算爲日斤。

29. 糖業協會編，『近代日本糖業史』，上卷七一頁所載第四表。

30. 事實上，明治二四年（一八九一）二月，日本當局曾經派遣駐福州領事到台灣調查台灣糖業。根據該領事之記述，當時日本每年輸入台糖三、四〇萬擔，價值海關銀多達六、七〇萬兩。參照參謀本部編『台灣誌』（同上註4），一一〇～一一八頁、一八八～一八九頁。

31. 前引『台灣使榷錄』（同註18），六二頁。

32. 連橫撰『台灣通史』（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第四冊六五四頁。

33. 『台灣文化志』（同上註9）中卷，六四八頁。

34.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編『洋務運動』第七冊，七一～七二頁。

35. 參照 J. W. DAVIDSON, OP. CIT., PP. 三九五～三九六之表。又，根據前述明治二四年二月到台灣調查的福州領事之報告，則謂當年「茶況甚爲昌盛……聽說台灣一年間之茶葉輸出量勝於我（日本）全國之輸出量」，前引「台灣誌」，（同上註4）五三頁。

36. J. W. DAVIDSON, *ibid.*, P. 443。



37. 輸出額根據前引『台灣經濟史研究』（同上註22），三五三頁之表。再者，本統計不包含從台南（安平在內）之輸出。又，向中國大陸之移出是否包括在內亦不清楚。換算率的一日圓五四日錢則得自『日清戰爭實記』，第三六編「北部台灣之貿易」。

38. 前引『台灣誌』（同上註4），一九九～二〇〇頁。

39. 上引書（同上註4），一四〇頁。

40. 參照前引『台灣通史』（同註32）（第六冊），列傳各項目。

41. 參照上引書『台灣通史』第四冊（同註32），一〇一二頁。

42. 參照前引『台灣通史』第六冊，列傳各項目。

43.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編『洋務運動』第六冊，三二五頁，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第二冊，二五六頁。再者，劉指為同治一〇年，唯據『洋務運動』之文脈可判定為一二年，有待考證。

44. 參照沈葆楨：『福建台灣奏摺（台灣文獻刊第二九種）』，「請移駐巡撫摺」條，一～五頁。

45. 參照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六七頁。

46. 前引『福建台灣奏摺』一三～一四頁。

47. 同上，五九～六〇頁。

48. 參照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七二～七四頁。

49. 參照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台灣石油礦的試探」條，五九三～五九七頁。

50. 參照 J. W. DAVIDSON, *OP. CIT.*, P. 481。

51. 參照前引『洋務運動』第六冊，三三四頁，同『台灣通史』第三冊，五三四頁，同『台灣文化志』中卷，八〇〇～八〇一頁。

52. 參照『洋務運動』第七冊，七〇～七五頁「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閩浙總督文煜等奏」，「光緒二年二月一日福建巡撫丁日昌片」，「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撫丁日昌片」等。

53. 劉墩著『巡台退思錄』（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二種）第一冊，「致上海招商局唐觀察煤務由」條，三三頁。

54. 同上「詳論煤務屯銷利害由」條，三六頁。

55. 同上同條，三五頁。

56.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六五四頁所收錄的「益聞錄，光緒八年十月十五日」條，略謂：「津友來函，言近日開平煤密因中國人欲速見功，開至三十丈即行停止，故日僅出煤五百墩，不敷中國各輪船機器製造局中之用，是以當事諸君擬再添開一礦，相助爲理云」，可知在洋務運動展開過程中，煤雖不足，但台灣不屬於北洋主流派的勢力範圍內，故其市場受限制。再者，上引書下冊，六五五頁所收錄的關冊一八八四年分（下篇，頁一六～一八，天津）云：「日本煤『入口』大減，原因由於開平煤礦產量漸增……」，可見逐漸給予日本煤打擊是由於在李鴻章主持下的招商局使用開平煤爲輪船用煤，因此開平煤礦能發展且景氣進佳也。

57. 參照『洋務運動』七卷一四〇頁，「請減出口煤稅片」。

58. 參照前引『巡台退思錄』第一冊「致上海招商局唐觀察煤務由」條，三二頁和「籌銷論」三九頁。劉自光緒八年二月（舊曆）至光緒九年四月之間，爲改善煤礦經營，提出多達二三件之文書。

59. 參照同上引書第二冊「稟請設立修配鎗礮藥局由」條，一〇〇～一〇二頁和「稟籌商先設火藥廠次再擴充情形由」條，一〇二～一〇四頁。

60. 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五七九～五〇八頁「試弁台糖遺利以濬餉源摺」（光緒一〇年二月二三日，會閩浙總督楊昌濬已革巡撫張兆棟銜）。

61. 前引『福建台灣奏摺』、「請移駐巡撫摺」條四頁有云：「況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爲門戶，其關係非輕……」。

62. 前引『巡台退思錄』第三冊，「稟陳台防利害由」條，二五六頁。

63. 參照李鴻章著『李文忠公選集』（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三一種所收）第一冊，「保黎兆棠補津關道摺」條（九三～九四頁）。

64. 前引『洋務運動』第七冊，「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閩浙總督文煜等奏」條，七二頁。

65. 前引『巡台退思錄』第三冊，「稟陳台防利害由」條，二五六頁。

66. 根據上引書第一冊，「籌銷論」（三九頁）所指出，民煤之移出將妨害官煤之銷售一事，可以類推。

67. 參照同上引書「稟復函飭調移山後勇營加招土勇並勸捐城工兼另勸林紳捐助防務由」條，二二四～二二八頁。

68. 參照，前引『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六二七～六二八頁，「直隸總督李鴻章批」條云：「著照所請，先在磁州台灣試辦，派員妥爲經理等因……徒以磁州煤鐵屢次委員往查，運道艱遠……因而中止。台灣開煤已照洋法辦，直境函應仿照試行……」可以推知。

69. 參照林熊祥主編『文獻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劉銘傳特輯，胥端甫編「劉銘傳年譜」。

70. 同上（註69）『文獻季刊』李騰獄著「建省始末」一八頁。

71. 『清德宗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三種）第二冊，二〇七頁。

72. 雖查閱『左文襄公奏稿』六十四卷（光緒十六年庚寅仲春月開雕，日本、東洋文庫藏本），却不見「遵旨籌議

海防事宜」條，故暫借前引『文獻專刊』，「建省始末」一文一八頁的記載。

73. 『劉壯肅公奏議』（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第三冊，「量田賦申明賞罰摺」，三〇三～三〇四頁。

74. 同上，第一冊，「條陳台澎善後事宜摺」條，一四八～一四九頁。

75. 同註七三。

76. 同上。

77. 參照同上三二三頁所載之「台灣清賦全功告成彙請獎敘員紳摺」。

78. 參照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清賦一班』，二八一頁。

79. 前引『台灣誌』一七七～一七八頁。

80. 參照王國璠「劉銘傳」（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印行，『台北文獻』第一〇～一二期合刊），「劉璈之獄」條，二七一～二八一頁。

81. 前引『清賦一班』九頁。

82. 伊能嘉矩編，『台灣巡撫·劉銘傳』（日文本）七七頁。

83. 矢內原忠雄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日文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四版本）二〇頁。

84. 參照，前引『清賦一班』四四～五八頁。

85. 前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二〇頁。

86. 詳閱前引『台灣巡撫·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第一～三冊及『台灣誌』等。

87. 徐宗幹，『斯末信齋文編』（台灣文獻叢刊第八七種），「論郊行商賈」條，八六頁。徐爲道光末年的「分巡台灣兵備道」。

88. 參照前引『台灣文化誌』下卷五〇頁。
89. 參照前引『劉壯肅公奏議』第三冊，「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條，二六八頁。
90. 參照同上書，「變售舊輪船以資新購摺」條，二五五頁。
91. 前引『台灣巡撫·劉銘傳』，三四～三五頁。
92. 同上，三一～三二頁。
93. 參照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一〇一五頁所收「關冊，一八九〇年分，（中文本，頁八三），淡水條」。
94. 參照同上，「關冊，一八九一年分（中文版，頁八六），台南條」。
95. 參照前引『劉壯肅公奏議』第三冊，「官辦基隆煤礦片」條，三五二頁。
96. 參照前引『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五九九頁所收「關冊，一八八八年分下篇，（中文版，頁二九二），淡水條」。
97. 參照同上，一〇一六頁所收「關冊，一八八九年分（中文版，頁七八），淡水條」和「關冊，一八九〇年分（中文版，頁八三），淡水條」。
98. 參照前引『台灣巡撫·劉銘傳』一二八頁。
99. 參照同上，一一八頁。
100. 參照同上，二四頁。
101. 山邊健太郎著「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日本歷史』現代2（岩波書店版日文本）二四三頁。
102. 參照竹越與三郎著『讀書樓隨筆』九五～九九頁所收之「和林維源的商談」（日文本）。

103. 參閱前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六三頁的註(7)。
104. 參照同上二九二頁
105. 參照台灣新生報社編，『台灣年鑑』，民國三六年（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十八章抗日運動，頁四。
106. 參照同上，一二八～一二九頁，一三四頁的註(8)和註(9)。
107. 參照前引山邊論文，二四六頁。
108. 參照前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二五〇～二五一頁。

○ ○ ○

再者，台灣文獻叢刊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又，年月日若無特別標明，則皆依據榮孟源編『中國近代史曆表』而換算為陽曆。

## 追 記

一九六七年夏本文脫稿之後，筆者為補充本文之論旨而發表之論文有下列三篇，若能同時請參閱，則感激不盡：

- ①「日本人的台灣研究——以台灣舊慣調查為中心的探討」（日文，收錄於『季刊東南』第4集，一九六八年八月號）。
- ②對談「台灣經濟與日本資本的進出」（日文，載於『經濟評論』，一九六九年八月號）。

③「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在日本——台灣條——」（日文，載刊於『亞洲經濟』第一〇〇號記念特刊，一九六九年六、七月合併號。此特刊號，後以『開發途上國之研究在日本——亞洲經濟』一〇〇號記念特刊——之書名，由亞洲經濟研究所重新以單行本出版（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因作過更正重新排版故，敬請參閱後者爲宜）。

# 爲「教科書問題」給東鄰日本的諍言

## ——一個台籍旅日歷史研究者的心聲

當日本篡改教科書，掩飾其侵略戰爭的罪惡時，引起全世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軍蹂躪過的亞洲人的震怒。中國、朝鮮、菲律賓……等等國家，紛紛向日本政府提出義正辭嚴的抗議，引起了包括日本人在內，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士的關切。議論衆多，正反左右，紛然雜陳。

本文係戴國輝博士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十月號，日本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被認爲教科書問題論爭中，最有份量、最有代表性的言論。已被芝加哥大學譯成英文。今特譯成中文，以饗讀者。

一九八三、六、一六 陳中原於東京



如果鄰居有令你愉快的，你可搬家了事，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就不能夠如此方便完事。那麼，怎麼在更高的層次與境界上，相互切磋，共謀生存、共同生活在今天乃至明天，恐怕就值得我們來認真思考一番的吧。

教科書問題的確存在著所謂日本內政問題的一面。戰爭結束以來，文部省、執政的自民黨與日教組（日本教職員組合，為日本的革新派工會組織之一）互相之間存在著對立，結果才會導致現在所謂「教科書」問題。我這個觀點——儘管我知道這是有些過份善意的觀點——不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這個問題的側面，第一，我不太清楚，第二，這類屬於內政問題的側面，作為一個僑居外國人，或許是不應該公開發表評論的。

然而我相信，對於這種不能搬家了事的鄰居的立場而言，他們的鄰居日本，今後將要以何種形式來策定它立國之道？或者用什麼方式來教育他們的年輕一代？以後要與日本年輕一代互為鄰居而生活下去的我們，是有關心上述問題的權利的。

現在的問題是，曾經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朝鮮以及亞洲的鄰居們，他們極為關注日本人如何描繪他們自己的形象，怎樣評估日本「近代」的歷史。同時，他們也開始擔心起來，他們的鄰居日本人，好像因經濟發展的成就，帶來了得意忘形的、不願作反省、自我檢討，吸取因戰爭惹起的歷史教訓的社會氣氛正在漫衍於扶桑列島。因此，問題不僅僅是在於教科書的記載方式或以重寫、政治解決（不管任何方式）等等方法，這問題就可以解決，敷衍了事一類的單純事情。「教科書」問題的背後所隱藏的「本質」問題，確實是嚴重而值得我們鄰居們時時刻刻留意探討的重大問題。

再進一步說，亞洲鄰居們的擔心，並不在於日本一部份保守派的觀點。而是，日本大多數的人們

，他們對於戰前殖民地統治和在亞洲發動戰爭的反省、和對自己本身也就是日本「近代」的評估，以及在世界史上的定位，還沒搞好。據我粗淺的看法，我認爲日本朋友們對自己的「近代」史的負面尚未成功地作好交代。

實際上，我個人的經歷，作爲一個研究者的經歷，和這個問題也有很深的關係。所以，我想敘述一下我自己的事。

我在九一八事變發生這一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日本的殖民地臺灣。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戰爭結束了。一九五五年在家兄的協助下，留學日本，在日本住了二十七年。來到原來的殖民地統治者的母國日本，我的心情當然是難以形容的。（也可以說是有一種憎惡和怨恨感。）

本來準備在日本呆了一、二年，我就想到美國去的。却在家兄的堅持說服下，才繼續留在日本，在東京大學讀書。但那時候使我吃驚的是，在大學裏碰到的教授和同學們，與我幼、少年時代在臺灣碰到的日本人（主要是一批中下層的殖民地官僚）簡直是兩種不同的人類。東大的這些人把我當人看待，理智，具有自由的思維。在學問上，在東大我也得到了不少東西。

但是，更使我吃驚的是，這些人却全然不認爲臺灣的殖民統治是一件大壞事。甚至那些認爲自己的同胞日本人在朝鮮是幹過大壞事的人們，他們的「常識」也認爲在臺灣，他們日本人並沒有幹壞事。正因爲這些人的理性層次的認識水平甚高，人也善良，才更使我驚異。

古今中外，殖民地體制絕對沒有給被殖民者的家園帶來好處的可能。即使殖民地統治者中，存在著個人的善意，這善意也常常不是被抹煞得無影無踪，就是其發揮也或多或少地受到阻碍或壓迫而被編進殖民體制，充當加害者的角色或被架構於一種點綴的小配角。這難道不就是千篇一律的殖民體制

史嗎？

對我個人來說，我小時候也曾經經歷過幾次不愉快的事。此外，兩個哥哥，長兄被徵用到南洋當農業技術指導員，二兄在日本當了學生兵（日本人叫學徒出陣，就是日本的預訓班），在各種形式之下，都被動員到侵略戰爭中去，被逼著當「配角」或炮灰預備人員。（幸運的是，他們後來都復員了。）甚至，我一個當醫生的叔叔因為拒絕「國防獻金」（國防指的是防衛日本，一種國防強迫捐款），而被日本當局懷恨在心，日本特務不管他年事已高，把他徵去當軍醫，結果戰死了。所謂殖民地台灣，僅僅在我個人的經歷上也曾經留下了這麼一類不小的傷痕。

修完了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後（已在日本呆上十年左右），我開始在亞洲經濟研究所工作，那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斯時正碰上戰後日本資本主義重新進入亞洲各國的市場。在這個企圖的背後，我發現日本有關當局及人員有一種設想，就是認為臺灣經濟發展的模式可以應用到亞洲去。我又愕然了。

這也就是說，那些有關人員正在籌劃，在設定日本曾經在臺灣的殖民地經營是不錯的前提下，進一步把它作為一個開發「未開發國家」的新開發理論的模型，而把「台灣模型」應用到亞洲各國去。

我的研究和依據研究所作的我的發言就是源出於這種驚惧與畏懼。我察覺到「這可不行」。作為不能搬家敷衍了事的鄰居之一的留日中國人歷史科學研究工作，又作為曾經在臺灣體驗過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實際情況，揭發它的真實面貌藉而擺正它在日本近代史，在亞洲近代史的位置。

我想，假如我不如此作的話，我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我的父祖輩、對不起同胞、對不起亞洲各國的百姓、更會對不起愛護我家人以及支持我們一家五口人平安地能在日本生活的一些友善的日本朋友

們。我意識到我個人在日本社會的「特殊」地位，我認為我得作出些成績來好對歷史有所交代。

臺灣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中佔有不尋常的地位。爲什麼呢？因爲臺灣對日本的「近代」可以說它被逼著扮演了「基點」的一個角色。近代日本的黎明期，除了琉球列島以外，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第一個對象就是臺灣。它最先行使武力的對象也是臺灣，最先體驗近代日本的殖民地經營的也是臺灣。從殖民地統治臺灣發了跡的日本向外侵略的這一條線上，以後繼而來的是朝鮮，中國大陸，有「九·一八」，「七·七」，南京大屠殺等等。若是把日本帝國主義奪取臺灣、剝削臺灣、迫害臺灣島民等等的的方法和方式搞得模糊不清、是非不分、甚至於認爲在臺灣，日本當局以及有關殖民統治的官員們一概沒有幹過壞事的意識瀰漫下去，這個將可能惹起更可怕的後果。不但後果可慮，日本近代史也不可能寫得很好的。歷史的真面貌一定具有正面與負面的史實的。連殖民統治過臺灣的負面史實都不敢面對，從而談起歷史科學的研究，從何博取亞洲鄰居們的信賴感。我相信有良知的日本朋友們能贊成我這一種提法。

有關「沖繩問題」，我認爲認識的病根是同源的。目前沖繩問題牽涉到「教科書問題」的部份主要被指摘出來的祇是有關日本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如何屠殺沖繩諸島民，爲何教科書，不讓或不把它的真相描繪出而祇是模糊云云的議論裏頭在打轉？其實，若要追究日本軍屠殺沖繩諸島民的悲劇根源，恐怕非溯及明治維新的「琉球處分」（明治政府吞併琉球王國編進其爲日本帝國的一個沖繩縣。）不可。明治政府不但吞併了琉球，名義上雖列琉球爲其國家的一個縣份，但日本的官民一直到最近，仍然歧視沖繩以及其縣民，日本本土與沖繩的差別顯然是人人皆知的事實。日本若不具有上述差別以及歧視琉球住民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何能在面臨大敵美國軍隊的困境裏頭作出傷天害理，殘殺「

自己同胞」的歹事。

我認爲，自從日本列島形成「近代日本」以來，日本國內一貫地包攝有「日本內部的亞洲問題」在內。也就是說以大和民族作主流的一般日本人始終懷有蔑視亞洲，看輕亞洲人的心態與實際行動。日本國內的「亞洲、亞洲人的問題」包括有北海道的「愛奴」，「琉球人」，「被差別部落民」，朝鮮人以及留日中國人和華裔人民被歧視對待的問題。

我們假若不能真正掌握住包括「沖繩問題」在內的所謂「日本內部的亞洲問題」的話，據我看，有心人是無法作好對日本「近代」的評估以及有關其歷史定位的作業。

我認爲「教科書問題」並不是一個孤立而存在的問題。

日本的「近代」的歷史脈絡與目前所發生的「教科書問題」是脈脈相承，有密切關係的一個重大環節問題。擺在我們與有心且有良知的日本朋友們面前的緊急探討課題該是如何掌握日本的「近代」，如何給日本「近代」決定其正鵠的定位，以方便日本朋友們與亞洲的鄰居們能藉它來作爲共同的歷史教訓。再而使其變成我們求生存，求光明的精神糧食，才是真正問題的所在。

## 2

其次，再看一下這次所惹起的問題，不得不使我認爲，對於歷史的看法，日本人和中國人因各具悠久歷史、文化的背景顯現出有相當不同的地方。日本人通常以流動（flow）形式來思考問題，似乎具有強烈的未來取向，這並不是說這麼就不好。從經濟的組織發展，住宅的方式或者每年從官

僚機構發表的各種白皮書來看，這種未來取向的表現都歷歷在目。相反，中國人是看過去、依歷史取向，並習慣於以經驗的積聚（stock）來考慮事物。

對流動的思想表達來說，所謂歷史，與其說教訓，還不如說是故事，說書。正因為是未來取向，才想盡量擺脫歷史的包袱。即使對手是抵抗的，一旦「致於死地」以後，就一切「付諸東流」，還是想要建立新的關係。一種窘迫的事情過去以後，還要拘泥以前的對抗或是紛爭，或者對其重新提出異議，對於一般日本人來說，那是一種「沒有男子氣概」、懦弱短小者的行動方式，一般日本人是屑於這一種行動方式的。

對中國人而言，歷史是一種經驗的積聚，是絕對不該且不能忘記的。須要貯藏、加以保存記錄、整理下來作成爲「歷史教訓」的。但是在中國人的思考方式裏頭，「不忘記，不該忘記」與寬恕是兩個層次不同的問題和概念。它們兩者之間是不存在有矛盾的。雖然「不忘記」、「不該忘記」，但是爲了相互求生存於明天也就是爲了光明的未來，相互寬恕過去的紛爭和對抗，藉著這個跳板來建立新的關係，這才是有展望的作法。不過寬恕不等於忘記過去的一切，更不等於把所有的史實都付諸東流，一筆勾銷。

日本朋友似乎把寬恕和「忘却」當成同一層次的問題，日本人認爲既然你能寬恕的話，你應該把所有的「過去」也來個付諸東流，讓它流失於大海裏去才夠意思，才夠格爲大男子漢。這一種「善意的期待與誤解容易引發國際間的誤解和隔閡」。

當前的教科書問題好像就有這一種因「審美意識」上的文化隔閡和歷史觀的差距而帶來的困擾。日本朋友們很難察覺到自己正在對「寬恕」和「忘却」作出些「美麗的誤解」，我們中國人對近代中

日關係史上因日本方面所惹起的悲劇史實，我們是採取「可恕不可忘」的態度來對待的，我希望日本朋友能夠懂得這一點。

此外，對「對外援助」或「經濟援助」，這一種行爲的看法，日本和亞洲諸國間也存有其差距。在日本，「援助」一辭本來就具有施惠的含意，不管它的具體內容爲何，援助常帶給日本人有某一種的「滿足感」，它還懷着慈悲爲懷的心，由上向下施予恩惠的一種意識在。但是站在中國人，亞洲人的立場來看，他們却不認爲「經濟援助」是施捨，他們只認它爲互惠的交易。他們力主，「經濟援助」若不是互惠的交易，單單祇是日本方面的施捨的話，「經濟援助」根本不可能保持其持續性的。在此我特別得提一提中國的俗語，「朋友只能救急，絕不能救貧」這一句話作爲我們鄰居間互勉互勵的格言。有關「經濟援助」的含意，在日本和亞洲諸國間的確確存在有甚大的差距，這一點我也希望日本朋友們能多留下一些注意。

日本朋友可能認爲，中國以及亞洲的鄰居們，正在向日本求取「援助」或者舉着「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的旗子來向日本學習，既然是如此的話，鄰居們應該以「拜師」的「門生」、「求助」的「弱者」來侍候日本人才對。何來的立場，敢作出抗議教科書描述的舉動來。

日本朋友或許不易或不能理解爲何亞洲的鄰居們會「翻臉」，胆敢以對等的、充滿着民族尊嚴的態度向日本當局提出篡改教科書的抗議行動這一招。

有些短見的日本政論家不明事理地提出，「中國和韓國存心不良，他們爲了爭取更多的『援助』而藉機抗議，有『敲竹槓』的嫌疑」一類的論調，甚至於主張大可不理騷然鬧事的貧窮鄰居的意氣話。掌握政權者有何企圖我不敢揣摩，但一般老百姓向日本和日本人提出抗議的心態，我相信是誠懇的

。是值得日本朋友聆聽作爲參考的。

### 3

我在日本已住了二十七年之久，爲了進一步了解日本，不斷在下苦功。我想雖不能說自己是屬於親日派，但至少可以自負是一個「知日」的人。作爲「知日派」的一份子，在觀察當前的教科書問題時，特別是日本對於中國和韓國的批評所表現出來的反應、對待的態度和闡明的作法，心中不由得苦悶難言。

日本由於戰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以後，又重新站立起來，促進了經濟發展，成爲一個「經濟大國」，我從內心深處感到欽佩。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我們這位富有的鄰居祇是一個極端的「拜物」、「拜金」主義者，專喜歡發財，且喜作「暴發戶」一類的行徑的話，那就不能禁止周圍的人引爲痛苦了。如果是「經濟大國」，就應該具有與此相對稱的「精神境界」，就應該考慮到與鄰居們共同擔負求生存於未來的重擔。如有這種想法，不是更好一些嗎？

就像個人有「人格」一樣，民族該有「族格」，國家也該有「國格」，雖然這祇是我自己隨便創作的語句，如果日本在對待其鄰居時，不重視亦不準備培養與經濟的強大相稱的「族格」、「國格」的話，那麼，我真得擔心，不久的將來，日本難免成爲世界的孤兒，將受一切鄰居們的排斥了。

在日本社會裏，一般老百姓普遍膺著一種處世格言，那就是「好好了解鄰居的心情，以善意量度別人的心情，然後才決定自己的行動」的一類話。然而，像這次教科書記述的篡改，踐踏了亞洲鄰



居們的心靈，而毫不知反省、自責。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亞洲諸國向日本學習的具體心態和當前的情況，決不同於日本在明治、大正年間向歐美學習時的心態和情況。這明明是曾經飽受侵略的一方，向曾經發動侵略的一方，覬顏、委曲、不得已向日本、日本人去學習的。鄰居們的抗議，日本人難道不應該注意到這種抗議背後所存在的昔日的傷痕，而設法細心去彌補的嗎？

如果說現在日本人在教科書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姿態和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Ezra F. Vogel）所著「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1）在日本成爲暢銷書的現象，有蛛絲馬跡的相互關係，甚至說，購買此書的四十萬人（大多數是屬於中智以上階級）的心態與支持篡改教科書的一般社會氣氛有一脈相通的關係，會太離譜嗎？這樣說，不會是過於牽強附會吧！（譯註：可惜，在日本轟動一時的這本暢銷書，在美國却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甚至有人以爲這是沽名釣譽的投機之作，傅教授趁此也狠狠在日本撈了一筆。）。

作爲一個祈願亞洲和平、世界和平的一個區區學人，我期待著日本在廣闊的世界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扮演她光彩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之上，我不想祇就事論事完了打住，而衷心地希望日本培育自己的「族格」，從而形成能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並受尊敬的獨特的「精神境界」。如此地朝著積極、正確且具有光明前途的方向去發展。

最後，作爲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人員，作爲一個在大學講授歷史的平凡學人，就有關如何作好史實的敘述，我想藉這個機會附上幾句。雖然這些話剛才所談的問題有些層次的差異，但上述的課題一定得由史學家當作人類共同的、普遍的問題來探討才能更加深入。

時至今日，歷史的描述總是由當代掌有政權的集團以及它的代理人們來承擔敘述的作業。因而掌權集團與它的代理人們往往爲了維護自己集團的既得權益而把史實有時抹殺或作些歪曲。此一事實，古今中外，無論資本主義體制或是社會主義體制可以說是相差不會很多。例如，史達林體制下和以後的蘇聯，中國大陸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四人幫掌權下和垮臺後的歷史敘述，有何不同，他們的有關史書將會成爲怎樣的一種面貌呢？史學家應該怎樣對待這些情況和問題呢？我個人也滿懷興趣和關心的。

我認爲整理歷史，敘述歷史最大的目的該放在爲人類全體留下共同的知識遺產，爲建築人類共有的燦爛未來而貢獻出歷史教訓等等層次上面。

如果，這種看法可以被接受的話，我們亞洲的鄰居們包括日本的有心人士，應該好好地、誠懇地來接受由於「教科書問題」所引發出的如何作好近代日本與亞洲諸國關係史的敘述的課題，並一齊朝著更深遠且更根本的問題下手，這樣才能完成歷史本身交下給我們共同使命。

## 附錄 1

### 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的往事

七七事變以後，臺灣平靜的田園生活，很快就受到了騷擾。日軍侵入華南，臺灣的青壯年，很多被拉去入伍。「南支派遣軍」司令安藤利吉（最末一任臺灣總督，戰後畏罪自殺），認爲臺灣人既講閩南話，客家話，又通

漢文，就將他們派到閩粵地區去。那些搬運軍用物資的苦力，叫作軍伕；那些幹翻譯、調查、慰勞、連絡的，叫作軍屬。

大約民國三十一年之際，我們村子也被拉去一人當軍伕。記得他大概幹了一年多吧！這位在公學校（專給臺灣人上的小學）畢業以後，一直就在我們鄉下種田的老實人，有一天穿了一套日本卡其軍裝，沒有配帶任何階級徽章，拿了一個八等瑞寶勳章，退伍下來。（這是日本勳章之中，最低的一等，在侵略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大量發給幫助他們打這不義之戰的人。）

我的父親爲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晚飯。當天安排的客人，不是至親，就是好友，沒有外人，鄭重其事，目的是想聽聽這個故國劫後歸來的客人，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父親頻頻催促我說：『明天早上要上學呢，早點睡吧！』可是，我這個小學五年級的小鬼，充滿著好奇心，實在不願意，拖延了好久，才勉強強爬上床，在那裏躺著，假裝睡着了。

大人們並不知我這小鬼有詐，等我上了床，頃刻之間，就迫不及待地，爭先恐後向這軍伕提出一大堆的問題，諸如：我們的故鄉廣東現在的情形怎麼樣？廣東鄉下，像我們說的這種客家話，還可以通用嗎？日本兵在那裏有沒有幹出壞事等等。當時臺灣與大陸的往來被極度限制着，海天遠隔，音信難通，我父親那一輩人對自己故土廣東的關懷，和那思鄉的飢渴，好像一下子就要得到滿足一樣。良久，軍伕壓低了聲音，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種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她捅死！

現在每每回想起來，猶令我臉紅的事：當時，在蚊帳裏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

這事發生得太突然，以致大人們全給嚇得面無人色，手足無措。紛紛到我跟前，誠惶誠恐地訓誡我，今天這番話一旦洩漏出去，他們全都會坐牢，那軍伙可能給警察大人逮去，也可能被宰掉。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當我爬起來大聲說出上面那兩句話之前，還聽到父親說道：『這場戰爭的勝敗已定，日本兵敢於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暴行，斷無戰勝中國之理。我們回歸唐山懷抱的日子，也就不遠了啊！』

## 附錄②

### 隱痛的傷痕

『你這個混蛋東西，是從那裏滾進來的臭清國奴，哼！明年再也不讓這一類東西進校門！』

這野蠻，惡毒的吼聲，曾經深深地傷害了我幼小的心田，震撼了我的生命。如今，隨著歲月的流逝，整整有三十年了。這一片往日的傷痕，依然清晰地遺留在我心靈深處，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隱隱作痛，啃咬着我的記憶，歷久彌新。這傷痕宛如無形的文字，寫出殖民統治下的辛酸和亡國的血淚。

那時，我小學（公學校）剛剛畢業，歷經相當的辛苦，才踏進了那一所著名的州立中學。入學後第二個禮拜

，在國語（日本語）課堂上，日本老師高野要我朗讀課文。當我站起來讀時，那惡毒的吼罵就震碎了我的心靈。

「清國奴」三字是日本人當年對我們臺灣人最起碼的罵法，充滿了藐視和惡毒的侮辱。當時，我們漢族系台灣人唸的叫公學校，而日本人唸的叫小學校。一直到了日本投降前夕，才改公學校為乙種國民學校，原來的小學校改成甲種國民學校。但是，教科書卻故意叫我們唸低於日本人小學一年級的書。入學考試當然依照日本人小學課本考，刻意安排這個，不就等於當局在作弊嗎？根本是無理和野蠻的不公平。然而，這日本老師居然還有臉罵我清國奴，還加上一句明年不再讓我畢業那所公學校的學生進校門，以示他的無上威權。

我所畢業的公學校，位於偏僻的農村，全校才只有六個班級。我是自創校以來，破天荒第一個考進當時州裏唯一官立中學的人。自然被認為是很大的光榮。記得當那喜訊傳到我們村子時，全村給我這個小傢伙來了一個大宴會，其轟動可想而知。但是，如今入學才兩個禮拜，這個日本老師的一聲辱罵，卻永遠留下了心中的傷痕。

我們漢族系臺灣人唸日本語，一般都搞不清濁音和ウ行和ダ行的分別。我呢！濁音沒什麼問題，但是ウ行和ダ行，即使今天當了大學教授，還是唸不好，寫錯也是常有的事。

追根究底，這和我的家教很有一點淵源關係。我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不能說窮得日本語也唸不起。但是，我的祖父，乃至我的父親，向來視日本語為「賊」的玩藝兒。本着「漢賊不兩立」的春秋大義，終其一生，既不學，也不用，以「嚴夷夏之防」。因此之故，我上小學時，連個最起碼的發音也一竅不通。我就是那樣一個華夏的小傢伙。

我們中學的那一位高野老師，聽說是沒有學歷而經過檢定考試取得教員資格的，只因如此，他就耿耿於懷，自慚形穢，居然患有嚴重的自卑感。他除了鞭子、鐵拳和不絕於耳的吼罵聲之外，對於教育的內容和愛，這一切，都了無所知，後來日本人戰敗投降了，這下子我們同學對他的怨恨爆發了。有一天，把高野的房子包圍起來，

要找他算舊帳。這個過去以辱罵，鞭子和拳頭對待我們這批本島人（台籍）中學生的傢伙，終於坐在地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嚎起來。我實在不想再見到這個「東洋鬼」的臉，我並沒有應邀去參加這次行動，我倒對這個日本人充滿了憐憫之情。

和這樣卑鄙人士成強烈對比的老師也有，那就是我們的漢文老師谷口先生和物理老師惠美先生；這兩位先生不但沒有以「清國奴」三字來罵過我們，相反地，谷口先生曾用柔道把欺負我們的日本學生摔倒在地，打抱不平。可憐天下好人就是那麼短命，當我來日留學時，曾想探訪這兩位老師，閑話離情，不料他們都已作古，令我無限感慨。可嘆的是今天用經濟大國做靠山，在我們的家鄉台灣又出現當年那暴戾之徒與高野相類似的人物，在那裏得意忘形，表演日本武士式的醜態。

歲月悠悠，戰後已三十多年了，任憑時光逝去，並未帶給日本人太多反省。馬齒徒增，我居然對於當年無法容忍的殖民地官僚與教員們的作風慢慢能夠了解了；他們不也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嗎？對於這些人，除憐憫之情，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由於那些惡毒的辱罵所造成的傷痕，常常警惕着我，避免傷害學生的「心」，並且，鞭策着我，堅持一貫主張，去反殖民主義與反種族歧視。這樣說來，我個人的傷痕卻也不想積極地把它醫好，寧可讓傷痕留在，好做警鐘時時用它。

# 附錄 3

## 日據價值體系之批判

### 訪戴國輝教授談林少貓事件

戴國輝的書庫

王曉波

此次，我受柏克萊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邀請赴美訪問研究，路過東京，下機專程拜訪久仰的戴國輝教授和「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日本學者們。

六月十九日，我來到了東京。二十日，見到了戴教授。五十開外的戴教授，熱情、健談、博學，現任立教大學教授，他的著作『華僑』、『台灣與台灣人』等享譽日本學界，由於他的著作改變了不少戰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印象，他那優美的日文，充滿民族自尊自信的雄辯語言，也糾正了由邱永漢、王育德、史明、廖文毅、辜寬敏等人帶給日本人對台的偏見。二十二日，也見到了「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日本朋友們。我們由台灣史的研

究和「中國結」、「台灣結」的爭論談起，也談到了最近在台灣發生的林少貓事件。

戴教授身為漢族系台灣人，旅日二十八年堅持不改國籍，拿的還是中華民國護照，又是研究台灣史的學者，

因此，我也很自然地要求戴教授站在台灣人和治台灣史的立場對林少貓事件發表一點看法。

於是，二十三日，戴教授帶我到他千葉縣的房子，那也就是他的藏書所在和寫作的地方。在他鋼筋水泥建造的書庫中看到了我在許多圖書館所沒有看到過的那麼豐富且齊全的台灣史料的收藏，那也是他留日二十八年來心血之碩果。在書架上，他取下了『台灣憲兵隊史』、『警察沿革誌』、『台灣治績志』、『台灣匪誌』、『台灣匪亂小史』、『陳中和傳』、『台灣法令輯覽』等書。於是戴教授探本溯源地說話了。

## 匪徒或義民

首先，他提起了「匪徒刑罰令」，該令是根據一八九六年第六十三號法律（即「六三法」），由總督府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五日所發佈的惡法（律令）之一，「不問其目的為何，凡藉暴行或脅迫以達目的而作結合眾人者即爲匪徒罪」。其目的並不在於針對一般的搶劫或強盜，而是針對抗日義勇軍的。不僅僅抗日義勇軍遭這項刑罰令處死，同盟會會員羅福星也是遭該項刑罰令處死的，難道羅福星也是「匪徒」嗎？後來，在由台灣士紳發起的「六三法撤廢運動」中，「匪徒刑罰令」也是主要的對象之一。台灣士紳大地主的財產是需要「法律」保護的，如果「匪徒刑罰令」是真正懲罰土匪的，他們爲什麼要求撤廢？

關於林少貓抗日的事蹟，現在台灣已經有很多人談了，戴教授只強調二點：

一、從當時日本方面的資料可以知道，日本人是把林少貓視爲第一號敵人的。林少貓之所以能游擊那麼久，沒有人民的掩護行嗎？他是在「人民的大海」裡受到掩護的，所以，才能神出鬼沒的從事對日本軍警的游擊。人民爲什麼要掩護他？並且甘冒身家性命的危險，當然是他得到了人民一定的支持擁護才有可能的。



二、林少貓襲擊日本軍警的部隊不僅有漢族台胞，而且還有高山族台胞。可見當時山胞和漢族抗日的立場一致，並且，也表示了林少貓不但受到漢族台胞的擁護，也是受到山胞的支援，這更證明了林少貓是抗日義勇軍中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傑出領袖。

站在日本統治者的立場，林少貓誠然是反異族統治體制的「土匪」，但站在中華民族和被支配民族的立場，林少貓當是不折不扣的義民才是。我們今天怎可根據當年日本統治體制立場和他們的官方宣傳，把林少貓也視為「土匪」呢？這是價值觀念的混淆和民族立場的倒錯。

### 陳中和違背民族立場

至於陳中和，戴教授說，劉永福還鎮守在台南的時候，陳中和就在高雄迎接日軍，協助日軍的後勤補給，為侵台日軍建立地方秩序，後來又擔任聯合保甲局長，協助日軍殲滅林少貓等人義軍，對日本殖民統治歌功頌德，這些都是事實，無法抹煞的。當時的高雄市尹（長），也是陳中和去世時的葬儀委員長（治喪委員會主任）的今井昌治，和高雄州知事（縣長）太田吾一，在他們為陳中和作的悼詞中也提到了。

澎湖廳民會代表陳光燦和高雄鼓善社代表陳江力也在悼詞中說：「帝國領臺，皇軍剿匪，民心恐懼，逃竄一空，公明大義為國家盡忠良，為地方保安寧，曉示皇軍紀律，秋毫無犯，使民衆安居樂業，其造福於地方，又足為吾人感念而追悼者四也。林（少貓）匪跋扈，人民苦痛，公以恩德兼施，協助官憲功誘歸誠，上得以報國家之私，下得以盡地方之責，迄寵受皇恩賜敕功勳五等，榮耀門閭，齒德俱尊。」

戴教授說，陳中和協助日軍，得到許多特權發了財後，曾經為沽名釣譽，把得來的不義之財捐出一些來從事

慈善事業，這也是事實，同樣是不容抹煞的。但是，他協助日軍侵台是違反民族大義的，是任何稍有民族立場的台灣人所不能苟同的，也不便接受的。所以，楊金虎先生雖然也寫了悼詞，但絕口不提陳中和協助日軍之事，而只提他的生意成功和沾名鉤譽的慈善事業。戴教授翻出楊金虎以漢文作的悼詞如下：

『嗚呼！先生久擅令名，陶朱並駕，管子之聲，持籌握算，頗善經營，急公好義，恤孤救貧，公平義取，古道待人，果斷靈敏，料事如神，歷任公職，惠澤斯民，蘭桂逞秀，頭角崢嶸，擁資巨富，一世功成，君志雖展，貧缺滋榮，蔗境方甘，忽爾騎鯨，泉路有知，賑恤當行，嗚呼痛哉！天何蒼蒼無情，返魂無術，愧我活生，白楊啼鳥，永弔孤塋，生芻一束，聊表微忱，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戴教授表示，陳中和爲了他個人及和他類似的一些人的糖商，地主及地方豪紳的利益，去協助日軍，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却不能接受以此種違背民族大義並捨棄大多數老百姓的社會公道而只爲己爭取私利的行爲爲是的價值觀念。

## 繼承與負債

接著戴教授談到歷史是非和歷史人物評價的問題。

首先，他認爲，歷史的是非是千秋萬世的公道，是不可以政權體制的短暫利益來評斷是非的。否則，歷史就失去教育的意義和參考的價值。古今中外史家是非常看重這一點的，爲了保衛歷史的公正和真實情願犧牲生命，董孤之筆是中國史家最高的典範，也有『一字之褒貴如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的垂訓。由於歷史的公正和真實，經長期的累積才能提煉出一個民族基本的道德規範。陳中和爲一己一時的現實利益，而沒有爲人民和爲自己

的千秋萬世的名聲而奮鬥，甚至以傷害民族大義和人民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一己一時的利益，他可以是一時的日本殖民政權體制的功勞者，但不能成爲台灣歷史上的正面人物。

其次，如何對待漢奸後人的問題，這又是層次不同的一個問題，戴教授說，人無權選擇父母，當然也就沒有承擔其先人行的直接責任。不過，他又提到民法上的繼承權的問題，遺產繼承必須全面繼承其正負兩面的，也就是說，繼承了先人的物質遺產，也就必須承擔先人的負債，民法上規定不能只繼承遺產而不繼承負債的。否則，我們如何對待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的問題，那些日本戰犯和侵略罪行都是上一代的事，與這代日本人「負債」的道義。他們既然繼承了上一代人的日本，除非他們放棄日本國籍，當然也就必須有承擔上一代日本人「負債」的道義。以我們而言，上代日本人的侵華罪行，對現在的日本，是「可恕而不可忘」。我們決不是復仇主義者，但也不能成爲歷史的健忘症者。

戴教授還指出，他立教大學一位同事粟屋憲太郎教授，其父親是職業軍人，在侵略戰爭中戰死，他是孤兒出身。去年（一九八三）到華盛頓，在美國政府的公文檔案中找出日軍當年以毒氣殺害中國人的日本軍方所編的資料，經過整理，今年六月中旬在日本發表了，日本『朝日新聞』還在頭版以特別醒目的版面報導出來。戴教授認爲，任何人種和民族對於揭發自己先人罪行的事，總是難免感覺痛苦的，但是，這種勇於揭發先人過錯的史學家的良心，才是重整戰後日本道德倫理之途。掩飾日本先人過去的罪惡，只會使得日本人的道德更加墮落而已。

## 重建歷史的價值體系

戴教授呼籲台灣의 同胞，不能因爲某人是漢奸的後人就予以制裁，那是野蠻的血統論，我們必須反對。但是，

漢奸的後人，如果他們在物質上繼承了其先人的財產，在道義上，也不能不繼承其「負債」。這些漢奸後人應該把這些問題分得清楚，也要對歷史負責，回饋社會，為其先人向烈士遺族贖罪，像粟屋教授一樣勇於揭發其先人的罪行，才能得到社會的寬恕和尊敬。我們的原則還是『可恕而不可忘』，否則，歷史又如何能激勵後人，教育子孫呢？

要在台灣建立台灣史，戴教授說，台灣社會應主持公道，以確立歷史的是非，漢奸後人也應向前看，不要一味掩蓋自己的家世，那不但不會得到同情和寬恕，反而會激起公憤的，他們應當懷抱着道德感和民族倫理來面對史實，協助大家建立正確的台灣歷史的是非。

戴教授最後說到，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秩序應有移轉，價值體系應當重編，也就是，從異族統治的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轉變成自主的秩序和價值體系。

但是，這種移轉重編的工作，在光復後不久，被「二二八事件」干擾了一次。一九四九年，國府中央政府遷台，為了鞏固政權，匆忙的建立反攻要塞的秩序，因此，連批判和糾正原來日據下被異族支配所扭曲的秩序和價值體系的工作都沒有來得及做，便遷就並做了妥協。為了穩固政權就拉攏了高層台籍豪紳、大地主們，連他們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哲學的價值體系都沒有想法建立起來。後來，又都忙去搞經濟，忙着賺錢，這項工作也就被金錢第一主義給沖走流逝到現在。

國府在光復後沒有重新建立自主的、以民族正氣、社會公道為支柱的秩序和價值體系，史學界也沒人去做法這項批判和糾正日據下台灣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的工作，以致林少貓這麼清楚的問題，大家竟爭論不休。所以，戴教授最後呼籲，台灣史學界必須將台灣史整理出一套屬於中華民族自主性的價值體系出來，這是台灣史學界，包括他本人不可逃避的責任。

# 「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

## ——從自我體驗來自我剖析或解釋

中心與邊陲的對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城市與鄉村、中原與邊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地區等等，都是這種對立的例證。有關這種對立的研究已逐漸盛行。例如二十多年前興起的庸屬理論（或依賴理論）便是根據中心——邊陲的對立與差別來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問題。

台灣地處中國邊陲，加上曾受日本統治，以及目前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具有濃厚的邊陲性。台灣居民因而具有遠較其他地區為強烈的地方意識，亦即「台灣意識」。但另一方面，台灣居民除了少數高山諸族原住民外，均移自中國大陸。移民每有綿延不斷的原鄉意識。來台的移民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原意識。這種中原意識在受到日本等外來侵略，形成漢族意識或「中國意識」。「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並存於台灣，反映了台灣社會組織及歷史過程的複雜性。

原鄉意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海外華人或留學生。東南亞華人的原鄉意識曾導至當地政府的排華行動。台灣來美留學生的原鄉意識也在支援台灣民主運動及提倡台灣運動中發揮重大作用。

戴國輝先生這個講稿係根據他在紐約哥大一次公開演講整理而成。作者以親身的體驗來分析這個重要而不易理清的題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省察「台灣意識」「中國意識」論戰，特此推薦給讀者。

我先交代一下今天這個题目的由來。第一是前年，一九八二年的暑假我用日文寫了一篇論文，收在「漢民族與中國社會」裏。（舉起這本書）這書是一系列從寬前的世界探討各民族與國家間問題的叢書之第一冊，是我的老朋友橋本萬太郎教授編的，他是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語言學教授。這裏頭我寫的一長篇論文就是今天的題目。在裏頭我提了幾個問題，最主要是對漢民族的意識，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及中華意識做一個未成熟的整理和交代。這是我一直在日本探討的主要題目之一。其結果變成我這篇論文。其次，在愛荷華我沒料到會碰上陳映真。結果在「台灣與世界」第八、九期（分別在一九八四年二、三月出版）發表了上下兩篇的「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希望在座的鄉親與同學們趁我在紐約的這段期間，能給鄉弟多多批評和指教。我們可以好好地討論一番。

### 從邊緣到中心的史觀

爲什麼要從「自我的體驗」談起呢？照理說這種寫法是吃力不討好的。以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之立場來講的話，是最笨的一種作法。爲什麼要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想法和過去的體驗交代清楚呢？把這些記錄下來，將來或許要吃虧。可能我是個大傻瓜所以才這樣做。我始終這樣想：「原則上搞社會科學的就是應該擺開情緒的部份，把所研究的對象對象化、客觀化，保持一定的距離，然後才加以探討。但把所有的感性部份丟掉，並沒有把它昇華，提高層次來結合科學研究的話，亦太過於枯燥。不一定能道出其所以然來」。因此我在東京這二十八年，經過種種的挫折，各色各樣的衝擊，發現到就是應該從自己生活的現實，或是生活歷史的現實，或是我既有的社會生活的現實做出發點來思考、

來整理自己的問題。意思就是說千萬不能藉爲「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來自欺欺人。對自己也應該有所交代。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中國知識份子經過很多很多的挫折，吃了許多許多的苦頭。但是不管在大陸、在台灣，或者是現在在美國，一些搞政治，參與政治的朋友們一直都不大公開地談這些問題，至少在我的狹窄的經驗來言是如此。這個問題就是人人罵的美國在成熟期資本主義下開花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我却認爲「個人主義」有正、反兩面。我們應該追求其正面意義。我希望對自己比較忠厚一些，善待自己一些。這樣對做學問、研究、待人、處事都要好一點。不然的話，就像很多知識份子被人家牽着鼻子走，始終走不出自己的道路來。不仿美國，就學日本，老是依賴別人，老是高攀(或許該說低攀)。對一些權勢低頭，出賣自己，甚至出賣朋友。簡直是胡鬧，也相當不應該。總之，我這個題目是要對自己有所交代而談的。另外，從我個人生活來說，也是給我在日本生的孩子們留個記錄，讓他們能超越我，從他們的父親所經歷過、所苦惱過的行程和思路得到一點小小的教訓。對這個問題要交待的第三點則得從我半路出家談起。剛剛主席又誇獎我學問相當廣泛，這並不事實。只能說我興趣很廣，肚子裏都是「油」(大家笑)，並不是學問。我這個半路出家也有它的必然性。過去我學農，學農業經濟，寫這方面的論文，然後寫農村社會學有關的題目，博士論文寫的是農業史，我做農村社會學這方面的題目的時候，相當積極地利用文學題材(小說)加以整理、考證並精煉後做研究的「基材」。後來我寫糖業史也得利用我們老祖宗留下來比較多的文字材料，因爲，諸位都知道，甘蔗糖業這方面根本不可能在考古方面留下研究材料來。所以我就找出當年都市生活的一些文學語文等記錄來，用社會科學、社會經濟史的方法整理出我的第一本書。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我對所謂正統就形成一種看法。就是說，中國知識份子背負了相當重的歷史包袱，總是從歷

史，也就是從過去的觀點來看問題，其實老百姓對正史都沒有太多的興趣。比如廿四史中的三國史，我相信除了唸歷史的人之外，很少有人去看它。但是三國演義看的人却很多，不管它的歷史事實性如何。後來我就想到搞正統歷史的人很多，我何不從邊緣來圍攻呢？套一句大陸的術語就是「從農村包圍都市」，「革命」求勝的方式既然可以用，當然做學問也可以一試吧。那麼「邊緣」對我究竟是什麼呢？搞台灣史啊、搞華僑史啊、搞農業史啊，甚至在農業史裏我搞的是蔗糖史（並不是社會經濟史裏的主流。而是一個邊緣的東西），就是一些嘗試吧了。如此就慢慢形成了鄉弟的一種「史觀」。我在搞台灣史的時候亦是從另外一個「邊緣」的高山諸族着手，我覺得高山族的歷史境遇太慘，沒有人替他們講話，因而我就代他們整理一些資料出來。當然，我沒有資格替他們寫歷史，但是起碼給自己一個交代。歷史上，我們客家人給高山諸族添了許多麻煩，或是傷害了他們，或是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富。就這樣，終於編出了『台灣霧社烽起事件的研究與資料』。這樣講，諸位就可以發現到我總是在「邊緣」徘徊，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核心，中心地帶去。

我現在以爲我的歷史觀體系在慢慢地成形。這是我第一次很冒昧地公開講出來。我的筆記本裏是畫了許多圓圈、箭號等等，在一步步地搞。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完成較有系統的一套東西來。另外一句題外話就是：我覺得很多人過去搞歷史的沒有用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等方法，我希望能夠把這些方法導入歷史研究方法裏來。或能稱爲歷史心理學的一種範疇新境界。

### 知識份子該對自己的思考與行爲負責



在進入正題之前，最後一個想請教諸位的就是「自我同定」(identity)的譯詞問題。我不曉得台灣島內或大陸上寫文章的人不用這個翻譯詞彙。常用的譯詞「認同」還算不錯，但是比較適於動詞的場合，也就是英文的 *identify*。但是把 *identity* 翻成「認同」，很有些時候會引起誤解，不很適當。所以我才想用「自我同定」。這個「自我同定」的「自我」當然跟「個人主義」有關係，這個非常值得我們留意與強調。就是說對自己的 *identity crisis* (認同危機)如何解決，以及如何豎立自己的自我同定。也就是說，當為知識份子，該對自己的思考與行為負上責任來。時時刻刻都應該好好對待自己，老老實實面對自己，進一步要能對得起朋友、鄉土與民族。還得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才好。就是我不成熟的一個看法，也就是為什麼我要赤裸裸地把我的看法說出來的主要因素，這在日本學界也是很少見的。

當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日本朋友來信說，引起了種種爭論和嘉評。我今天的一個如意算盤就是希望諸位能夠給我一些意見，我回去以後可以藉諸位的智慧來應付日本朋友方面的「挑戰」。

### 「黃帝子孫論」的質疑

現在言歸正傳。第一個要談的就是「黃帝子孫論」。我特別是要談我自動到小學這一段期間，黃帝子孫論在我家的情形。家祖父、家父當年常常一而再日而月地要強調我們是黃帝的子孫！這當然是針對着當年日本統治者——一個外來的壓力，一個權威，且是侵略民族相對抗而強調的。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那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件。等到「七七」的時候，我在唸小學。那時日本在台灣推行皇

民化運動，要逼着我們改姓名，獎勵年輕人參與日本軍的侵略行爲。在這種情況之下，家父很怕我這個公兒將來會被同化成日本人。那時我的哥哥們，有的在東京、有的被動員徵備到南洋，只剩下公兒在身邊。天天給日本老師灌輸「日本國體論」——萬世一系的天皇，偉大的大和民族和大和魂。家父當然希望能夠把這個公兒拉回中國人這邊來。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們家過舊曆年第一天，所謂開正，要拜天公、祭祖、貼春聯……等等。拜天公的時間還得看當年的干支來決定。我相信家祖父和家父等老一輩是透過這些祭祖、拜天公，而再地強調我們係黃帝的子孫等來教育我們這一輩，叫我們不能且不要變成日本人。

但是我向來不是「乖乖聽」，常常要發些疑問。那時我在東京的哥哥希望我上中學時到日本去上學，因爲在台灣受到日本人歧視，很厲害，到日本起碼還有那反動且保守的明治憲法的保障。千萬不能忘記，當年的殖民地台灣，連那老日本憲法都沒有被施行，當然無所謂憲法的保障。他常常寄書來，有次寄來一本松村武雄編的『朝鮮、台灣、支那神話與傳說』（我寫這篇文章時又看了一次，坦白說，編得不錯）。書上說黃帝是神話，是不存在的。我就向家父發問：「不存在的黃帝怎麼會是我们祖宗呢？」爸爸說：「你怎麼這麼嚙嚙聽爸爸的就對了，爲什麼要發問呢？」我反駁說，爸爸您不是常教我們，別讀死書，要多發問的嗎？這個是書上講的。他說「可能是日本人有偏見，書上抄來抄去，要侮辱我們漢民族，侮辱我們黃帝的子孫，所以說黃帝不存在」。後來我向我哥哥求救，他就把司馬遷的史記寄來了。那時我才小學五、六年級，當然很難看懂囉！但是總也看得出來其端倪。五帝本記第一講黃帝，司馬遷也只是當它是傳說，並沒說是實在的人物。只管說黃帝可能有些不妥，所以再找他的先一輩的炎帝也就是所謂神農氏來再加一層「武裝」變成所謂「炎黃子孫」或「炎黃裔胄」的

成語來，流傳到現在。最近十年來，我一直在想如何用近代人文科學來對這些神話、傳說之類作下分析。是否可沿用社會心理學或精神分析來解釋？日本也有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等。全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神話與傳說。我們爲什麼不能找出通用的方法，新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解釋它。不管怎樣，對或不對，我爸爸、我祖父他們始終是以爲黃帝是我們的遠祖，漢族的遠祖。深信我們是他的子孫，這個社會觀念我們絕不能忽略它，更應該加以科學的探討才夠時代意義的。

### 「黃帝子孫論」的政治應用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到了東京。本來對於三民主義，除了應付留學考試和預訓班受訓以外，都不大願意看與唸的。到了日本以後，反而想好好研究一下孫文、辛亥革命等。這樣就接觸到章炳麟、王船山、「黃書」，也看過「黃帝魂」、「革命文牘類篇」等等。王船山可以說是主張漢族中心國家並以華夷思想力主排外保種（漢）的開創人。黃帝的「存在」，我看了那些書以後，我斷定它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存在，精神所繫的一種存在。我猜我祖父和爸爸可能沒有看過這些書，一九七二年回台省親時，我還到老家去查了一下，的確沒有這類書的存藏。那麼他們爲什麼會與王船山等人一樣地主張我們一定是黃帝的子孫呢？會不會是口碑傳下來的呢？他們當年的知識水平來言，當然分不出何爲神話，何爲傳說。他們更有可能沒有把神話和傳說分開來的欲求。當然，他們也不會想到更不需要去分。只有我們這些囉嗦的知識份子才要搞這個區分了，定義了，分析了等等的事情。（笑）。史記中的黃帝已不是神，而變爲半神半人的「存在」。司馬遷把神話中的黃帝描繪成帶有濃厚的「人」的味道來

，但他只認為黃帝是傳說中的人物，並沒有確認他是事實的存在。我的解釋是：當年我們（算是說自認為的原初漢人或漢族吧）在中原以黃土平原和黃河來當做我們偉大的母親，向無能為力來馴服的大河黃河來討生活，還得向可畏的自然環境挑戰。斯時的漢人們為謀取鬥爭的勝利，還得假託「神通力」等，至於有關炎黃等的故事，却反映當年與大自然博鬥的一種社會心理的反映。原初漢族人當年需要「超能力」來支持自己的社會行爲，由這種社會心理的反應逐漸造出一種黃帝子孫的說法。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黃書」、「黃帝魂」、「革命文牘類篇」等就再給倒清與漢革命攤出思想性的準備。它們說的黃族就是漢族，過去的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慢慢却變成促進排滿、保種（漢）革命、團結、統一的象徵。後來孫文一統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當然，排「滿」就給沖淡了，逐漸提升為五族共和，五族却不排除滿族了。這種轉變以一個「中國人」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也是一個很大且很有趣的課題。不共戴天的仇族一經過革命却變為共和的族伴。這一種邏輯的轉換，如何來做合情合理的解釋，又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更有意思的是，這幾年大陸對台灣的統戰口號，一貫地呼籲「我們是黃帝子孫」云云，台灣國府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在大談其「炎黃子孫」。他們還一方面說：最好你們「台獨」不要搞什麼台灣民族啦，我們同是炎黃子孫云云。我仍然不做「乖乖聽」，就去查兩邊出的辭海。台灣中華書局發行的『辭海』（一九五九年四月台四版）的「黃帝」項等於抄襲「史記」根本沒有近代人文科學一類的任何解釋。至於「炎黃」項却加有「今我國人常自稱為炎黃裔胄」。大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一九七九年版）的「黃帝」項則先明說「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後再引「史記」等記事來闡述。另「炎黃」項亦先明示有「傳說中的中國上古帝王炎帝與黃帝」。

台灣國府講「炎黃子孫」不奇怪，因為他們不要馬列，不講唯物史觀嘛。但是大陸中共就該不同的囉。大陸作統戰時又爲什麼也來個「炎黃子孫」呢？這不是怪怪的嗎？怪怪是怪怪，但它打這個口號是有一定功能才會繼續在打的。這就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囉！被當爲統戰對象人們的心態究竟爲何？難道不值得我們去關心、留意的嗎？我們當然可以批他：中國共產黨啊！不要變成老修囉！你們的唯物史觀要好好保持囉！你們自己編的辭典明說是傳說，怎麼可以用來作統戰的口號人物呢？批儘可以批，但實際上這種政治口號有它存在的合情、合理性，有它發生效果的社會心理基礎。或許被統戰的人們，無意識的具有接受這種口號的心理基礎，（不被統的當然是例外），不然大陸當局老提這個幹嘛？這次我來美國一年，就發現很多過去搞台獨的鄉親們到北京去了。大概他們動搖了，他們是否對「台灣民族論」失去了信心，回過頭來，承認他們爲炎黃子孫的一份子？我並沒有譏笑、中傷人家的意思。而只是以爲這種心態值得我們去分析就是了。反而又可以說，自廖文毅以來叫了三十幾年：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我們已自成爲「台灣民族」，對中國人，中華民族不但有別，還另具有「民族仇恨」，講了大半天，好像是「空喊」。

在此我順便給諸位，介紹一些小插曲（episode）。一九五〇年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頭，大概因爲鄉弟是客家系，加上在同學會愛說話又能用日文寫一點小文章的本省人的緣故，有些鄉親來遊說我，要小弟去看他們的廖（文毅）大總統。但我看完了廖著『台灣民主主義』後，我認爲濫褻一套，那一套行不通，不值得我浪費時間去訪問他。過些時候有一位同學來邀我去看邱永漢，那一位同學說，邱是在堂堂皇皇的日文大雜誌『中央公論』、『文藝春秋』等寫文章，不至於是濫褻一襲吧！我說邱的日文很美可佩，但他的邏輯我不能贊同。另外我問那位同學，邱會不會是「小政客」

來唬人的，搞台獨怎麼取「永漢」這個筆名呢？他恍然大悟，嘿！戴學長，我不曾想過這個問題。（邱的本名為炳楠）。這一次來美國，去年暑假前在灣區有位「新相識」，來了個電話，邀我參加世台會，另外問我想不想與陳唐山見一見面。當時我對美國僑界一無所知，當然不知道陳氏為何許人。經過新相識說明以後，我向她發問，唐山是不是本名？，本名還可原諒，若是筆名的話，會不會再來個「邱永漢」呢？，她忙着在電話那一邊說，唐山大概是本名：。唐山先生將來何去何從，我個人無法預料亦無多大興趣。但邱永漢財神師爺（日本商人對他的稱呼），他已自認「炎黃子孫」回台賺他的錢，前幾年搖身再一變，又成爲日本公民去了。愛罵人的在日華僑們裡，甚至於有人打起問號「邱會不會再從日本公民，升級變爲日本皇民」「可嘆可嘆！」。這個是後話。

### 「台灣光復致敬團」的遙祭黃帝陵

另外一件值得我們在此一提的，則大概光復快爲一週年的時候吧，由林獻堂先生、姜振驥（爲客家系人士，於抵抗「割台」戰爭中勇敢犧牲的姜紹祖烈士的獨子）先生、葉榮鐘先生等士紳們組了「台灣光復致敬團」回了大陸作上了「光復致敬」的儀式。

「台灣光復致敬團」，由邱念台（代表團顧問）先生和林獻堂（本被推爲團長，但受長官公署當局之反對作罷，該團終於不設團長職）先生率領晉謁了蔣介石國府主席，宋子文行政院長，王雲五內政部長，白崇禧國防部長等送上「國族干城」的錦旗與蔣外，另託蔣轉贈五千萬元給陣亡將士家屬爲慰勞金等的現實「政治秀」外，他們還飛到西安，再由專車轉赴陝西耀縣，遙祭了黃（帝）陵。這一

種政治上的「現實」和「宗教」合一之回歸祖國「儀式」，值得不值得我們今人，用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方法來分析與解釋一番呢？鄉弟認為是大大值得去做的。

目前手頭上（因在旅途上）資料不夠，將來有機會把今天的一些話印成書時，我會補上代表團名單和祭黃陵文的。但在此我可以先提一下，代表團裏雖有福佬系，客家系的人數安排但獨缺高山諸族代表，至於「祭黃陵文」則由葉榮鐘先生起草，經過獻堂和念台兩先生審閱定稿的。

我希望最近的將來，能找上機會，另草一文來介紹「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來龍去脈，今天就不再多言了。

### 尋根，族譜與中原意識

諸位知道，前不久『根』這部著作和電視劇在東亞亦風行一時，在日本，台灣也煽起尋根熱。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界又是一樣。反正生活水平提高到了某一種程度，一般人都會想起家譜，族譜之類的。我們戴家也新搞了一個。還有遠祖的相片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戴家的族譜豈能有個黃帝「玉照」〔衆笑〕。真有意思呀！。那時我們家的總管大哥還在世，我就寫信問他，族譜裏那張「玉照」怎麼弄來的。怎麼用「今人」古裝照相來唬自己。根本不知模特兒爲何許人，還要我們戴家後裔來祭拜，不是胡鬧嗎？他老人家含糊其詞，但却讓編譜的「業餘文人」賺了一大筆。這亦可說幫台灣創出「就業機會」相助並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景氣」（哈！）。

我們家的店號是「晉和」，晉當然是指山西省的太原。這也有段故事。我爸爸那時教育我們是黃

帝的子孫，當然要談到中原。但我始終不是「乖乖聽」，就問他：「中原在什麼地方？」我爸爸說是在河南附近。可是我一查，我們的店號是晉和，是山西的太原囉，河南到那裏去了呢？會不會以前的河南包括太原，或是後來分離了呢？我爸爸素來討厭日本話，這時却用日本話罵我真是「唔路塞」（指嚙嚙，討厭的人）（衆笑）我就說：「你不是說要我們好好發問，學習才能進步嗎？怎麼又罵我『唔路塞』呢？」我們的祖宗靈牌和祖墳的墓碑上都寫的是「譙國」。我就問我爸爸在那裏，是不是在中原呢？他說不知道。好，我就去查。給我查出來了，原來是河南省上丘縣，當然得託福，大陸的地殼以及地名並無起過大變化。我就說：「我們的祖宗靈牌和墓碑上的兩個字與我們的店號距離相當遠。那時船也不甚大亦不可能很好，當然沒有飛機囉，怎麼會差得那麼遠？」我爸爸大概沒法回答我，就說：「我們偉大的正統祖先，在周朝時被封於譙州，就是中原逐鹿那段時間，我們戴家被封了，由『州』變成『國』，就是『譙國』。這一下，你就得服氣了吧？」我說：「還是不大服氣。我們家那麼偉大的話，爲什麼跑到台灣來冒險？首先要過『烏水溝』也就是現名爲台灣海峽的險，那時候好危險！到了台灣還要跟高山諸族打仗，常有可能被斬頭的這是很危險的。」他一方面翻我們家的老族譜，（不是剛才說的有照片的族譜，另外有一本老族譜）並指着族譜說我們的祖先多光彩，好多的秀才、舉人。我說：「沒有吧？那有那麼多秀才、舉人呢？如果我們戴家都是秀才、舉人的話，我們應該像林本源一樣囉？奇怪！我們家的秀才、舉人都不靈光？」（衆笑）我爸爸又罵我「唔路塞」。差一點要挨揍。

### 因「雜種」挨了耳光



最絕的是，有一天我的外祖母到我家來，那時她七十幾歲，她很漂亮，鼻樑高高地，客家山歌唱得好得很。我突然問我爸爸：「外祖母會不會平埔番？」我馬上挨了一個耳光。我爸爸說：「你這個混帳！我們家怎麼會有『雜種』？」我說：「哥哥寄給我的書——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門第爾（Men Del）的有關「遺傳法則」之書——說雜種是好的。爲什麼你要罵我、打我？」我爸爸說：「你混帳！什麼『雜種』好！我們戴家怎麼會有雜種？」我說：「雜種不壞嘛！從進化論、遺傳學來講，越雜越有希望啊！」（衆笑）當年，我想法不外是承認家父的中原正統說，再加上與平埔族混血不是可以培育更上一層樓的『雜種』嗎！但長輩却不能接受。中國話的「雜種」是罵人的話，其實就是有一點混血又不至於傷大雅才對（哈！）。但我爸爸絕不讓如此的說法。當時他會有那種激烈反應是很有意思耐人尋味的！他雖然唸過漢書，我相信不會看過太多的書，但他身體中充滿了「黃帝子孫」觀與「中原正統意識」，心理上始終認爲是大陸中原那邊南下且過海來的正統客家人。關於混血，我相信客家人和邊疆民族混血，該是常見的，你看李光耀，如果把他請到東京，日本人一定說他是朝鮮人。李的面貌很像「平均」的朝鮮人的面貌啊！朱德據說又是客家人，大塊頭，可能比較接近北方人的所謂漢族。葉劍英在相片和電視上看與邱念台故老先生一樣，較爲斯文些。我自己嘛！我相信有一點高山諸族的血統吧。（衆笑）現在胖了許多，以前黑漆漆亦是很 smart，大家叫我“black”。（衆笑）踢足球時，大家認爲我是很兇猛的。有關我們家，自囿於「黃帝子孫論」和「中原正統」意識的故事，就此暫時結束。

## 客家人與閩南人

現在我講第二個題目，就是「中原、客家人」。我想，我如何地慢慢認同自己為客家，當然是先碰上非客家後，才會逐漸地做下自我認識，認識到我自己是客家人。我生在中壢，我們家的小醫院在中壢街上，店也在街上，平常碰到的都講客家話。有一天回去鄉下的家，忽然碰到有人講我聽不懂的話，後來家母告我他們是福佬，是閩南人。我們通常叫做「福佬仔」。我們彼此間的生活很少有過衝突，住在我們鄉下家的隔壁是我們家的佃農。他們是閩南底客家人，原本是閩南人，後來遷來客家村莊住，又種我們的地吧，他們平常在家裏講福佬話，但在外面則講客家話，慢慢地年輕的一代，二代就客家化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是福佬底或閩南底客家人。然等到我上中學以後，就再發現我們的周圍日本人變多數了，鄉下只看到小學校長與警察大人及他們的眷族是日本人，但在中學的同學，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剩下四分之一才是當年稱謂本島人的台灣人，偶而可尋出一、二位山地人（全校裏）。這就是當年的新竹州立中學的情況。當年的日本人學生很霸道，常常欺侮我們，我們本島人之間逐漸發現我們同受日本人的欺凌。但是我們互相之間介有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好像氣質亦不大一樣。客家人一般較多出身於農村，商人比較少，像我們家既是醫生，又是地主，再兼營布店和碾米廠是很少有的。而當年我同班的其他客家人不是小學老師的兒子，就是中小地主當年被分類為「貧地業」家的兒子，或是醫生的兒子，生意人的子弟甚少。但福佬人同學，他們的出身較「雜」，因他們住新竹市、桃園街（當年新竹市是一大州城，客家城鎮的中壢還沒有現在的繁華，福佬人的城鎮好比桃園、竹南都要比中壢、苗栗街要繁榮，起碼在我幼年時期是如此），他們問還有「大」商人的子弟，習慣於商場及商人討價還價一般的生活，顯然地他們的表現較為「敏捷」，較為「狡猾」，較為「油條」。我們覺得閩南系同學很靈，很會對付日本人。我們甚至認為閩南人狡猾，不老實，不忠厚。

而我們客家人直綑綑的，說打架就打架；閩南人則說我們「阿呆」（笨蛋）。另一方面，我們也覺得閩南人不易團結，客家人則比較團結。爲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客家人大多數是鄉下出來的，對於都市的商業社會沒有什麼認識與體驗。閩南人則見的場面多與廣，較爲「世故」或成熟，很會適應。由於這個區別，客家人和閩南人同樣受日本人欺凌，但我們之間却難於構起「被迫害者」間的共識與連帶團結。原因不外是以下幾種。第一，母語有別。第二，氣質有異。第三，彼此間的信賴感亦不易建立。第四，日本人的挑撥離間政策促進我們本島人之間的分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年的山地青年同學在我們新竹中學者，始終受到日本人的「特別」庇護，他們講日本話比我們靈，他們不會說福佬話，客家話，他們的母語我們不懂，當然不可能站在一起，我們之間建立關係尙要等到光復後。

### 客家是什麼？

由於這個閩南人與客家人的不同，後來我就問家父，「客家是什麼？」他說，「客家就是講客家話的人，是從中原來的。」還說我們客家是正統的漢族。再問他正統是什麼，他就答不出來了，反正他確信是中原正統出身，跟閩南人不一樣。甚至我們父母都有一種偏見，認爲閩南人髒，不愛洗澡。「衆笑」其實，我祖母，我媽媽梳頭髮的髮型、穿的客家衣服、唱的山歌都有客家的特殊風格，當年的福佬鄉親很可能在背後罵我們客家人「土包子」呢！「笑」

到了光復後，我的視野慢慢擴大了。幫我擴大視野的第一個人就是我家大哥。他從南洋復員回來

，告訴我們南洋華僑裡，有很多和我們講同樣客家話的。甚至於有同我們家母，祖母梳同樣髮型頭的，穿「大婆衫」的婦女們。他還進一步在台北給我們家添購了一本羅香林原著「客家研究導論」的日譯本。

我們那以前，只知道中壢靠海邊的客家人講「海陸」，我們家母就講「海陸」客家話。但我們家常用的却是「四縣」。另外有位嬸母來自於台中的東勢角，她們家講的是另外一種饒平客家話，已自台大退休現為淡江大學教授張漢裕先生就是講饒平客家話的。這些命名統統來自於對岸大陸故鄉的地名。

我詳讀了羅著以後我發現客家在大陸上的分佈都在「邊陲之地」，不毛的「邊疆」之地。也就是說多散居於 *marginal land*。後來我再發現台灣的客家分佈亦是一樣，在「山腳」地帶，在福佬系所佔據的平野部份與山地諸族退據的高山地帶之間。南洋亦有類似的歷史情形。

這般分佈的來龍去脈，我們今天不加以討論，我只在此地提一提，我們客家人士的潛意識裡面有雙重、三重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在，却是事實。

### 邊疆意識

在大陸已居於邊疆，遷台後再來個邊疆。再加上在台灣의 客家人數只佔有漢族系台灣人的十三%的少數，被歧視是理所當然的。日據時代被日本人歧視，在漢族中還得受福佬系人們的疏離、歧視。這些情況足夠形成客家鄉親們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

來會的鄉親們，千萬別誤會我在「訴客家人的苦」在唱客家人的哭調。鄉弟不過是在試圖發現問題所在而已。我一直認為自囿於低層次的「被迫害意識」者是難於獲得「勝利者之碩果」的。我們為了解決問題，需要發現問題的所在，然更需要加以分析，以便解開我們問題的癥結，可以藉而克服我們的問題。更想把自己的看法昇華且提高我們彼此間的精神境界。何況，福佬系鄉親們既然亦有人主張，福佬通於「河洛」。以此作據尋他們自己的根於中原的。我們就可知「中原正統」意識和「邊疆異端」觀是具有其普遍性的。問題不只局限於客家鄉親們。其實古老一點的國家，不管它是東方或西方，多多少少都有中原和邊疆或正統和異端之對抗或「間距」的狀況。就連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加拿大都有類似的問題。中國或許是因為太古老，國土廣大，問題較為巨大與深刻些。

值得我們注意的却是美國。一般來言，邊疆觀或意識往往是曲折錯綜亦複雜的，通常帶有濃厚的「卑屈」和反面的潛意識在。但美國却少有此種性格。

一般白人系美國人的邊疆觀不單沒有負面的價值，反而把它提升並與 frontier spirit 連結在一起，它還具有正面的，開創新境界的理想，拓荒冒險的崇高精神的含義。我們還可以在其文學裏面，找出強有力地反映開拓者精神的作品類。我現在請教諸位，能否在我們的福佬系台籍作家的陳映真或者在客家系台籍作家的鍾肇政等人的作品裏找出類似 frontier spirit 的「進取性格」和「傲骨」來。

近幾年來，張俊宏提出「草地人」，楊達提出「草根性」，雖然難免帶有些美國文化中的 grass-roots 的味道，但也值得我們去留意它。

話說說回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看法中的邊疆觀通常却是與「土包子」、「鄉下佬」、「落後

性」、「流放」、和「放逐」一類負面價值連結在一起的。

對不起，請諸位再一次回到我們戴家的事例來。我們家祖父、家父輩，他們繼承了遷台來的父祖們的血液、風俗習慣以及不甚很高的文化水平。他們以開拓者且最低層農民的「身份」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確實是清朝期中國的邊疆之地。他們忙於討生活，他們得向自然界博鬥，得時時刻刻提防先住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的「出草」而力圖擴展他們以及他們雇主的開拓前線。他們還得與福佬人（有時是泉州人，有時却是漳州人）械鬥搶地盤，確保水源。因此我們父祖輩很不易獲得安寧的生活。當我們家好不容易成長為小地主的時候，却來了個兇暴的異族侵略者——日本人——。

他們雖然不曾作過心理剖析或精神分析，但他們的確確是需要找出能使他們精神安定下來的「依靠」。套最新的詞彙就是群體的「自我同定」（group identity）。他們還需要在觀念上找出他們團結的核心。「正統」性的「象徵」。這個不就是，黃帝、中原正統等的觀念嗎？。這一類觀念的相對觀念却是「邊疆異端」觀。諸位大可批判我，說我戴某人既然在講社會科學，怎麼好把父祖輩的感情都引出來灌進研究對象裏去，不但如此還用上你父祖輩不曾想到過的新詞彙來解釋問題。我只好回敬說，這些不過是鄉弟的一個小小的新嘗試而已。請多多指教就是了。

我們在日本的客家老鄉們，多年前組織了客家同鄉會，另外又組織了姐妹團體崇正協同組合（等於國內的合作社）。一九八〇年的十月上旬，我們還主辦了一次世界客屬懇親會。

在這次大會上，我觀察了來自各地的客家鄉親。他們的國籍各色各樣，有些鄉親連客家話都已經不會說了。一俟日本的各大報登載了我們開大會的顯著消息後，居然有些未見過面的鄉親來電話，說是幾代前是客家人，但現在已入日本籍，客家話，中國話一概不會說，能否加入大會，參加大會。

他們的熱情真感人。我發現他們所懷有的中原正統意識相當強烈且相當地普遍。

會後我也聽到背後有人罵我，批評我。說是戴某，思想並不保守，爲啥子還開歷史的倒車，搞什麼「泛客家主義」一類的話。

### 「自我同定」不是等於「泛客家主義」

藉這一次的良機，我想表明一下。我並不是泛客家主義者更不是唯客家主義者。我到處表明我是台灣出生的客家人，不管對任何國人或地方人，當然包括在排外閉鎖的日本人社會也有所主張。鄉弟沒有瞞過人更沒有瞞過自己。我主張客家人並不意圖與非客家人鬧情緒甚至於搞分歧以及促進分裂。原本的意思在，如何豎立我個人的「自我同定」和客家群體的自我同定。我認爲連自己的「出身」都不敢主張它的「固有的尊嚴」時還談些什麼？。知識份子的一切社會行爲的「基點」在於此。就假設我媽媽是位包小脚的窮家出身，我仍然不會掩蓋與逃避我出生的「秘密」的。我當然不會猶豫，去主張與我媽媽臍帶連繫上的「自我同定」。因爲這個是「命運」的，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亦沒有什麼可逃避的。成人時，我們爲了自己的生活與生存當然可以嘗試「非命運」的「自我同定」的選擇。我們可以不让子女再包小脚，我們可以爲爭上游，向日常生活博鬥，甚至於我們還可以選擇我們願意歸屬的國籍或公民權。此外，只要對方答應，我們又可以選擇新娘子或新郎。但千萬不能忘記，任何個人無法更不可能有機會和權利去事先選擇自己的親生父母親的。

我不懂，爲何有些人，向來不敢表明自己的「出生」爲何許人，一旦因有「小便宜」（好似飛機

票啊，幾十塊美金啊）可賺，他會突而來的道出，我父親原本是……，然一到對他表明自己出身有不利時，又再來一變……，嘿那些沒有什麼可計較了可涉及的啦……，少數者的語言，文化將會被磨滅……會被同化埋沒的囉……可以不談……奉持有奶是娘哲學的，爲了一時的生活方便亦可「認賊作父」的人們，有何臉皮來主張「革命」，來整理「本位」文化。

「明天」的台灣以及全世界，客家人應該與高山諸族，與福佬人，與大陸各省人與日本人以及與美國人等共同致力謀取和平共存，光明的日子才是我的理想。我真不懂，爲什麼還有人會懼怕我們主張客家人意識，要謾罵我們開客家世界大會之盛舉。他們盡其所能在掩蓋他們自己的投機心理的不安，倒反而要來謾罵我們的正當作爲爲客家佬的「自卑心理在作祟」，真是無恥！

## 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事實」

下面，我們談一下，有關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事實」有關的問題。我們先前已分析過，客家人在流浪求生存的路程裏頭，他們急切需求精神上的「寄託」，中原終於變成他們的價值中心同時亦成爲一種歷史的「真實」。中原在何方，有無其「事實」已不成他們探討的所在。

老百姓們，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裏頭，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欲望和精力花在分別闡明歷史的「真實」與「事實」的。他們亦不善於分層次來做它的分析。

各位都知道，以客家系農民爲核心展開的太平天國運動過程裏頭，洪秀全自認爲是基督的弟弟，他那有可能是基督的弟弟。事實上洪秀全爲基督的弟弟，雖然不會是歷史上的「事實」，但後來逐漸



在運動過程中醞釀成歷史的「真實」隨而捲入並動員了不少信徒，參與運動。不可否認，洪秀全的「信念」終於轉換變成他自己的歷史的「真實」且擴大牽住了當年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低層農民群眾。但我們又不可不承認，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事實」間的「差異度」過巨，最後還是要穿幫的。太平天國終於又見沒落和崩潰是個最好的事例。那一種歷史的「真實」畢竟是非科學的且又是虛構的，破綻只是時間問題的必然歸趨。

類似的例子，可以找希特勒與東條英機來闡釋。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為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一說，東條的「大和民族優秀論」以及「大和魂論」，「萬世一系的天皇國體神聖說」等等，當年雖能給一般德國人、日本人尤其是懼共反共的中產階級以上人士灌上迷湯，醞釀一時的「愛國」的假熱潮但最後還得穿幫，挨上原子彈等的悲劇。

前「近代」時期的農民運動尚可利用「迷信」來推行。但二十世紀以後的改革反體制運動則再也沒有可能利用「迷信」，非科學的邏輯來獲得勝利碩果的餘地了。這一點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不然我們的悲劇將會很不客氣的降臨到我們頭上來。

最近我發現，圍繞着我們台籍僑界甚至於島內「黨外」界正在醞釀有「接受『台灣民族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種怪氣氛，並唱「台灣民族優秀論」的高調。我得敬告諸位，這一種氣氛和順耳的高調或許能得勢於一時但搞不好，處理不妥很可能會變成「台灣式法西斯主義」的「鬼胎」。如此的話，它將引起的災禍將是無窮。

冲昏了頭的人們、鄉親們，當前一聽我如上的話，他們當然會大罵我，罵我「胡路塞」，還好他們尚未掌權，若掌了權的話，他們非把我關進監獄裏不可。

我們鄉親的大多數人是屬於聰明人，爲了明哲保身，對於這些問題都不願碰。只有我這個「胡路塞人」又是「傻瓜」的人才會提這些問題。總之，希特勒認爲他們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夜郎自大地大誇他們的國，大談他們的大和民族優秀論與大和魂無敵論。史實已告訴我們，他們有過甚多的老百姓喝了「迷湯」後被捲入漩渦裏頭。他們誤信了它，惹起不甚小的災禍，害人傷己還殺了不少人，賠了甚多的命。

我們客家父老包括我們家父，認爲我們是中原南下來的正統漢族，又是最純正的。因爲他們不會掌過權，亦沒有利用它來搞過政治，說一說，信一信且無傷大雅亦不至於惹過禍來，尚可說有其可愛之處。

大陸上的客家人如何想法我不甚清楚。但東南亞的客家人，很多都抱有很類似我們家祖父、家父一樣的思路與情懷，真叫人驚奇。這一點也是促使我來嘗試探討上述一些問題的原始動機。不管那些思路，心態正確與否，還是值得我們去整理與分析的。

我介紹了半天客家鄉親的心態，恐怕諸位非客家人的朋友們不易懂，現在我可以向諸位介紹一部英文書是韓素英寫的，*The Crippled Tree*，是她的自傳體小說。

韓素英介紹她的家史，述及他們家是從廣東省的客家莊遷移到四川去的。他們父叔輩都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但他們還抱持有客家意識和其尊嚴。她介紹了他們家的葬禮的形式，「洗骨」，「檢骨」，裝於金斗甕。在「走反」時還得揹着金斗甕逃難，這些可以說與我們家的作法完全一樣，真叫人驚奇。「一聽衆插話高聲說：閩南人也有同樣的作法和講法，叫做「金斗甕仔揹腳聽」。韓並沒有高唱客家沙文主義，她只是在闡述她的家史與她生長之過程而已。

## 華僑與華人

現在，我講第三個題目的「華僑」。鄉弟一貫地在日本學界主張，我們應該把華僑和華人在政治與法律上的範疇界定清楚，千萬別再馬虎混淆不清，叫別人生疑招起殺身之禍。

好比我們夫婦，住在日本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但仍然保持中國國籍拿的是台灣國府護照。因日本的國籍法是以「血統本位主義」為依據，所以我們的三個兒子雖出生於日本，未曾回過台灣或大陸。他們拿的亦是台灣國府護照，因而我們全家可以稱為華僑。

我們有些親戚，不管在日本或在美國已入當地國籍者，我把他們界定為日籍華人或美籍華人。鄉弟不但希望他們能自己好好在政治、法律的範疇上搞好定位外，我還勸告他們千萬不要參預台灣以及大陸有關的直接政治。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中國或台灣國府的公民故也。但他們可以仿效「出嫁的女兒」或「被招婿的男兒」關懷本家的家務事的方式，保持一定的距離來關懷故鄉的政治。這個當然既可以又應該被容納才是合情合理的。但千萬不能亦不要超越自己的「定位」來直接參預海峽兩岸有關的政治。

實際上，說出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却不甚容易。除了本身需要有充分的覺悟與堅守居住國的法律外，還得有關方面的諒解及多方面的協助才能達到理想的境界。

過去，不管是台灣國府，大陸中共的當局都犯有「墨守成規」，「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總認為中國人的後裔一概為中國國民或中國人。不管他是否已改了籍，入了現居住國的國籍。

往往有關當局，有意或許無意地把中國人的涵義搞成含糊混淆不清。

美、日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第一，因為華僑、華人人口不大，第二，其政治、經濟社會的基礎穩固並不很懼怕華僑、華人力量。

但華僑、華人人口衆多，且剛從殖民地主義體制脫離不久，議會民主政治剛剛起步，國民經濟尚未成形，社會上百孔千瘡且百端待舉的東南亞諸多新興國家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樣。

雖然東南亞的華僑，大多數已逐漸加入當地國籍變成當地籍的人。但他們在目前還經常被逼面臨各種危機與厄運。

引發危機和厄運的主要來由可分為兩大方面：第一，為當地土著民衆、輿論界、知識界以及政府官員所抱有的普遍反華情緒和反華政策。今天因為時間不充裕鄉弟不便多分析與介紹。在此我只限於第二來由，也就是華僑、華人本身以及他們先人之故國有關當局所惹起的側面來加以分析與介紹。

甚至外國有識之士，總認為華僑、華人不願隨俗，更不易被同化。日本學界甚至認為華裔人士一般比起日裔人士，對「故國」之歸屬感特別濃重且強烈。

我個人倒是認為，中國人出外真能隨遇而安，在末節瑣事上亦的確能入鄉問俗。但在基本的生活規律上或在「文化」的核心部門，一般來說，華僑、華人都固執其中華人性（CHINESENESS），並有把它連綿地續傳下去的欲望傾向在。

尤其在第三世界圈子生活的華僑、華人界為甚。

衆人皆知，我們中國人普遍地懷有中華意識、中華思想。在背後曾經主要支持它的却是華夷思想。華夷思想在作祟時，華僑、華人容易在主觀上自惹疏離感。幫助這一種疏離感的「不間斷性」（

Continuity)，還有，他們謀生活，求生存客觀環境與客觀條件。

當地人民和社會，政治不接納他們甚至於歧視或疏離他們時，他們更願意，更容易或被逼得不得不更堅持並延綿他們的中華人性，甚至是華夷思想。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正在動盪，華僑華人的居住國與他們父祖的故國都起了莫大的變化。人們對國籍、公民權的看法，有關於它的選擇（包括放棄原國籍或公民權以及取得新居住國的國籍或公民權）和態度都在變化中。

圍繞人們的生活價值體系，價值觀念亦逐漸走向多元化。華夷思想，在主觀、客觀上都變為不易不易維持的保守思想。

土著語文的興起，華人教育的後退，英文教育的取代叫僑界的有心人士深感恐慌應付不易。

### 「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

華僑、華人有關居住國政府逐漸開放其入籍門戶，台灣、大陸的政情並沒有讓僑界人士放手走上「落葉歸根」之路，反而有促進其走上「落地生根」道路之趨勢。

本來，「落葉歸根」的生活哲學應該是附屬於華僑的。華僑本為出外打工，只圖借宿僑居，並無準備長留國外或定居的。有朝一日，他們總是準備衣錦還鄉的。但「落地生根」的生活哲學却是屬於華人的。他們已入當地籍，爲了謀生活與求生存，他們亦準備作下長留甚至於定居的打算。一般而言，華人的回鄉省親，掃墓祭祖不過是一時性的。

最近二十年來，僑界正面對著轉型、震撼、挑戰的時代而在徬徨。他們又正面臨着自「落葉歸根」(華僑)轉換為「落地生根」(華人)，求生存的既曲折又艱難的道路。他們往往會掉進認同危機的困境而忙圖掙扎，但却不易整理出其思路或合情合理的自我解釋。

在此，我很願意把我多年來在日本探討下所成的未成熟的想法披露出來。

首先，我認為華夷思想與中華人性雖有重疊的地方，但其內涵，我們應該把它們界定清楚。華夷思想表面上具有排外並藐視異族的含義在。我認為該把它藏進歷史博物館的檔案箱底裏去。但中華人性却不一樣。

中華人性應該歸類於 *ethnicity* 的範疇來認識的。*ethnicity* 可以當做種族或民族的集團特質來解釋。由共認有供奉的祖先之多種家族，氏族或部族構成了 *ethnic group*。*ethnic group* 常常彼此間保持有共同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等的文化諸特徵，這一些文化諸特徵，我們便叫它為 *ethnicity*。有關「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 *ethnicity*，我把它擴大又叫做中華人性 (*CHINESENESS*)。有些朋友很可能叫它做「中國人性」來使用。

我們，下面繼續把 *identity* 與 *CHINESENESS* 連起來探討，圍繞着我們華人自我同定的困境問題。

起先，我得主張。自我同定可有多元的。大分類起來，第一類為政治、法律的自我同定。第二類為文化、社會有關的自我同定。

我認為為政治、法律是人工的，華僑改籍然而入了居住國的國籍，這個只不過是加上了法律上的手續而已，國籍者，也只是個人與國家的合同關係，最多也不過是個人和國家之間在政治、法律上的一

種結合關係而已。就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三博士的例子來闡釋，他們已取得了美國國籍，他們已成為美籍華人。他們在政治上當然得向美國國旗表示忠誠，當他們行使他們的美國公民有關權利和義務時，所必須依據的法律當然是美國的法律。但我們不會見到他們有改己姓名，有放棄中華人性而所行動。意思就是說，他們雖然在政治、法律上選擇了對美國的自我同定，但他們仍然可在社會、文化上保持對他「故國」有關的自我同定。這兩者之間並不發生對立以及衝突才是人的常情。

我認為華人們，能保持並繼續發揚光大他們的中華人性也就是豎立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於其出身的 ethnic group（種族和民族）並不妨礙他們在美國求落地生根之行爲。楊、李、丁諾貝爾獎三博士的類似例子，同樣亦可在美籍日裔人士群中，好似夏威夷的有吉州長，前共和黨上議院早川代議士等人的生涯上找出見證。

這些在美國可行的事例，在日本以及東南亞却是不易行得通。當地的政府、社會逼着華僑改了中國姓名以後始准入籍。另又盡其所能，在法律上，社會規範上加上多種的限制和規則，逼使華人慢慢磨損我們的 ethnicity。甚至於想盡辦法，來抵制華人繼續發揚光大他們所持有的中華人性，並順利培育出「有根的下一代」的正當社會行爲。

### 愛鄉者的悲劇

實際上戰前的日本，借題發揮慘殺了朝鮮人。東南亞亦一樣，排華事件窮出不盡。歐美白人世界，歧視猶太人的事例不勝枚舉。

尤其最近幾年，印尼、馬來西亞、印支半島特別是越南，反華事件常假藉，華人對當地社會、文化、宗教不願認同，更對當地政府、國家不會有過自衷的忠誠。當地政客一而再地利用種族主義來做他們的反華勾當。

故國，心有餘力不足，加上已改籍不方便發言或許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真是無能為力。華人社團更是一盤散沙，並沒有能夠尋出合情合理的對付方法。更沒有弄出一套理論來向居住國有關部門試作溝通和公共宣傳。

據我多年來的觀察，華僑、華人所懷有的鄉情是濃厚的。「美不美鄉中酒，親不親同鄉人」便是一對反映上述心情的句子。

華僑、華人的愛鄉，回饋鄉土的念頭，却往往被誤解為「愛國」的行為。「愛國」的慣用語語上的國字，一般來言，所指的含義上多為局限於鄉土而言才是事實。除了特殊的少數例子以外，它根本與認同於某個政權或政黨是有一段距離的。尤其是以華人身份來高喊「愛國」的話，當然容易引起居住國有關當局和人員的注意與反感。累積起來搞不好將引發殺身之禍的。

悲劇往往出在誤解與種族歧視主義的反華情緒與政策上。不但當地有關當局和人員如此，故國人士甚至於華人本身往往亦沒有搞清楚，政治、法律的自我同定和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是有別的。我且相信不但有別，更需要分別善待兩者才能真正認識問題的根源，尋出解決問題的要訣。

有關文化上的自我同定，常常要涉及到個人的信仰以及「靈魂」，精神層次等問題。至於有關社會上的自我同定，亦常常帶有血緣、祖傳、生理語言（body language）等等，換句話來說，是屬於「命運」上的，無法選擇甚至於無法改變的一種自我同定。



所以說，政治、法律上的有關自我同定，雖然有選擇和更改的餘地，但它的更改並不能又不該牽動同一個人的有關文化、社會的自我同定才合情理的。在人的本性與日常生活的常情裏來言，有關文化、社會的自我同定是不易亦不能隨機應變地更改才是真實。雖然它有可能逐漸被沖淡，但這個該另當別論。

在前幾年，我終於提出了 *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 的概念。暫且可翻為「既矛盾亦動態的自我同定」。我認為一般華人以及在外面的其他僑裔人士，好似日、韓、猶太裔人士，不管他們有無意識，他們總會懷有上述的多重且錯綜的自我同定。同一個體內，抱持有一見好似矛盾，却並不絕對矛盾相對抗的雙重或多重的自我同定，並沒有什麼不公正，不正常的。入籍以後，一個人老是花心計掩蓋自己的「根」或民族特質時，他將只能掉進 *one of them* 沉沒於大海裏頭去。他又只能變為扮演不痛不癢且不甚光彩的小人物角色吧了。如此的話，不但對那個人本身，或對接受他變為新公民的國家社會都不會有太多的益處。不敢或不能接受自己出身的事實，又不敢或不能對己出身的尊嚴有所主張，甚至於不敢或不能面對現實，依據自己已有的 *ethnicity* 來發揚光大自己的才能者，要在堂皇可見天日的「事業」裏獲得成功與勝利的碩果是絕無僅有，這個才是世界上的史實。

### 背井離鄉者求生存之道——結語

時間已剩下不多了，我們來個暫時的結尾話。中國人的分支以及其後裔的華僑、華人，一般來言，他們亦懷有與我們先前談及的中原意識和邊疆觀極為相似的心態。尤其是，受過中文教育，出外第

一代或年齡屬於老壯年那一代人爲甚。

他們或許是他們本人，出國外謀生活、求生存的鬪爭場合裏難免遭遇到疏離、歧視以及包括生命危險的多種困境。他們常會感有寄人籬下，討生活的孤獨感，心中往往很是徬徨。失落感，不安全感不斷地襲擊他們。我們在海外飄泊多年，保衛着自己的後代而討生活時，常常又會感覺到我們本身是否將變成無「根」的浮萍一種存在。類似缺乏一份「有所屬」，「有所靠」，「有所託」的生活困境體驗，自然而然地讓人們感受到人生的懸空與迷惘。

現在在北美僑界呈現的，同鄉會、教會有關活動之活潑的一部份社會心理基礎又可藉此來解釋。人們爲上述失落感所驅使，人人都有需求去追尋一些當前且暫時的「保護傘」或某一種心理上的補償。大陸爲原先出發赴外地者，往往上述心態反映在華夷思想，中華意識以及強烈的歸屬感（歸屬於鄉土爲其中心內實）上面。

台籍的華僑、華人，因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加上光復後在台灣的挫折與遭遇，他們的心態，雖然老年一代人與老「華僑」（包括華人）們具有相同重疊的部份。但因爲台籍僑界大多分佈於北美、日本（南美者據說有甚大差別，因鄉弟未曾親睹，不便多言）等的所謂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華夷思想已相當淡薄甚至於可以說少見其痕跡。

當前，我們在北美可以看到的「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的培養推廣「運動」以及「台灣話」的普及教育運動，除了有他們的政治意圖外，我們又可藉先前的心態剖析來認識其深層裏的社會心理基礎。他們的領導層很可能正在嘗試著「脫胎換骨」之作業。「故鄉·台灣」的處境驅使他們去追尋新的「取代」象徵和他們台美族獨特的一些且暫時的「寄託」或補償。

台籍的中產階級以上人士，往往因其生活歷史背景的關係，有甚多鄉親自囿於「現代主義」（歐美白人與日本人透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價值體系與觀念），轉而看賤台灣國府，大陸中共以及「大陸人」之不正常心態。另外因其出身階級及其宗教信仰又再進一步驅使他們患上拒共，即拒中共的心理，這些作祟以後再形成他們抗拒「大陸人」的心態甚至於提升擴大為反華的情緒。

這一點，我們值得留意。我這個客家系台灣人，甚至於還覺有無限的悲哀和道不盡的內疚。

我總認為有關政治、法律上的自我同定的選擇是一時的。我們千萬別搞錯，有關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是具有「命運」性且具有半悠久性的特質。



院長于院于南京在團敬致台灣

我們雖然可以變換我們的信仰象徵或價值的心類似黃帝與中原。但我們自己的 ethnicity 是該為擇善保持並且該加功夫發揚其光大，才不致於徬徨和失落的。我們正面臨着，如何在外國教育出「有根的下一代」的重要課題，我們有何多餘的精力去「剪斷」自己的根，去找徬徨之苦呢？。我願與我親愛的鄉親們，同學們，不管來自於何方，我都願意透過切磋琢磨，相勉互勵的方式來一道追尋我們共同的且最合理的情。更合乎發揚人性的求生存之光明方途。謝謝！諸位！〔眾鼓掌〕。

（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第二篇 北美、扶桑對話錄



「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  
——與陳映真對談於愛荷華

前言：

台灣出身的小說家陳映真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之邀，於八月底來美短期訪問。

這是陳映真首度獲准出國旅行，很引起各方人士的關心。

一九六七年，陳映真第一次應邀，正在準備來美參加國際寫作計畫之前，被逮捕而坐了七年的「思想」牢獄。陳映真一直是台灣最受期待的一位文學家，他的小說不斷地寫出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活上的人們、他們的愛惡與掙扎。深刻地探討在「台灣」這個特定的環境中，沉悶的政治以及資本主義高度物質化的經濟生活對人們的心靈、對文化的重大影響。他的重要作品有小說集「將軍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貨車」、「雲」，以及文學評論集「知識人的偏執」等。

陳映真也是當今台灣文學界最受爭論的人物。一九七六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不久前台灣黨外雜誌「生根」、「前進」等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戰中，他都是浪頭上的人物。近年來，海外「台灣民族」論者也以他為「大中國沙文主義」的象徵人物來看待。

旅居日本二十八年的日本立教大學史學系教授戴國輝，係一九六六年獲得日本東京大學農學博士（農業經濟）學位。多年來他先後在亞洲經濟研究所、立教、東京、一橋、學習院等大學研究和教授歷史與社會學。

自一九七〇年來，戴氏在東京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這個學術團體的研究成果廣受美、日各地學術界的看重。戴國輝的重要著作有『中國蔗糖史』、『台灣與台灣人』、『華僑』、『台灣霧社烽起事件研究與資料』等。

今年三月間，戴國輝應聘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任訪問學者一年。九月下旬，正在美國各地旅行的戴國輝教授應聶華苓女士之邀來到愛荷華大學訪問。聶華苓女士是現任國際寫作計畫的主持人，她與戴國輝多年來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已故名記者、作家司馬桑敦（王光逵）和日本著名現代詩人田村隆一，這次雖是他兩初次見面卻一見如故，實神交已久。

九月二十九日陳映真、戴國輝與本人同在詩人呂嘉行家中作客。呂嘉行、譚嘉夫婦近年來接待了蔣勳、吳晟、宋澤萊、楊逵……等許多台灣來的訪問作家。在主人夫婦的盛情招待、酒菜具佳的热絡氣氛之下，初次見面的陳映真與戴國輝有一段精彩的對談，話題是陳映真出國前在台灣發生的那一場「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爭。本文即根據當晚的對談整理而成。

## 恐共是「台灣結」的根源

戴：我是今春到了美國以後，才有機會讀到較多的黨外雜誌。日本的學界向來對台灣不很重視，來往也少。

日本雖然有六萬多的「中國人」（包括已歸化日籍者），地理上也與台灣接近，但是台灣的「信息」却往往是透過美國、香港才傳到日本的。因而，我在日本時通常只能看到部份受贈閱的黨外雜誌。來美後發現柏克萊和史丹佛兩所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有很多台灣的黨外雜誌，（似乎是有意識的收藏），因此我才看到有關這次論爭前後幾篇文章。然則，我雖很努力想了解，初步印象却是看不下去。爲什麼呢？似乎大家都不敢明講，吞吞吐吐地都有禁忌。於是我乃對這個問題做了一番思考，有一些看法——表面上，大家在談論的「台灣結」、「中國結」或「台灣人意識」、「中國人意識」，並不是什麼學術性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目前主張「台灣結」這部份人有一種恐懼感，恐懼的是共產黨何時要過海來？一夜之間換換旗幟的事會不會發生。更恐懼國共會不會和談？在和談之中會不會被「犧牲」。而去年林正杰父親在大陸被關了廿多年後回台的事，確實在黨外人士中間引起很大的猜忌。首先是中共爲什麼放這個人？其次國民黨爲什麼又接受呢？這都因爲他是林正杰的爸爸！葫蘆裏頭到底賣的什麼膏藥？簡直太叫人不安了。因此，這暗流中蘊藏的乃是反共、恐共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下自然就忙著努力維持現狀。做爲以台籍中產階級爲核心的改革體制的大眾媒介的黨外雜誌，帶著二、二八的歷史傷痕，對大陸有抗拒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尤其是四人幫垮台，文

革的失敗都暴露出來後，對中國大陸的期望感更是茫然有失了。這當然是世界性的問題，無論對共產主義或中國共產黨有無好感，過去大家都認為大陸好像在進行一場很大的實驗，內容雖不清楚，却普遍有一種期待感。但是後來蓋子打開來，文革的真像似乎很慘。期待感變成了失望，剩下一條路就是主張維持台灣現狀了。因為國民黨的言論抑制，人權問題雖然可以批判，但推翻國府體制的話，在島內「台獨」是不方便明講的，再者，台籍中產階級在高度經濟成長以及中共統戰攻勢逼迫之下與國民黨也慢慢地形成利益一致。因此就以要求一千八百萬的台灣人（或含糊的說台灣居民）的自決來對抗中共的統一。說得通俗一點，這種心情就像是一個由鄉下到都市去求發展的普通老百姓，發跡以後過著有汽車洋房的摩登生活，就不屑與鄉下故里的窮親戚認同來往了，更何況窮親戚還具有共產主義的武裝。

因而，我認為這次「中國結」與「台灣結」論爭的背後暗流，乃是在國際政治關係的動盪不安中，一部份人企圖以強調承認台灣現狀並維持現狀來對抗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

### 分裂國家的困擾

陳：我想提出兩點，來補充戴教授精闢的分析。第一，為什麼在其他那麼多的分裂國家中，沒有一個分裂國家的任何一方要求根本地棄絕自己民族的根源的？我問過來參加寫作班的南韓詩人許世旭，「南韓為什麼不主張自己建立一個共和國？」為什麼所有看到的文獻，無論是教會、學生或反對黨，都主張祖國統一？他說，南韓「獨立」對韓國人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祖國的自由化、民主化





戴國輝，一九八三，愛荷華。

與統一，是每一個韓國人民的悲願，南韓的反對派有他們自主的全韓國的觀點，總是同時批評南、北韓的不民主與不自由。並且呼籲在自由與民主的基礎上，統一祖國。據他解釋，這是有歷史原因的，韓國有中、蘇、日三個強國壓境，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祖國是民族生存相關的事情，而南韓統一意願的力量主要是來自前仆後繼的學生運動。因此，我曾經這麼想，假設共產黨和國民黨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地區仍為國民黨統治，那麼台灣的民主資產階級大概就不會有「獨立」的理念，而會與大陸的自由主義民主派資產階級結合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嘗試按照中國資產階級的形象去改造和建設中國。若是以長江為界，中國資產階級會有統一中國的信心和希望，也的確還有可能吧。但是國府到了台灣之後，這種可能性成為泡影。大陸的資產階級力量完全被摧毀，而在六〇年代中興起的台灣的資產階級自量絕無信心去依照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中國，因此只好把範圍縮小只管台灣，從而有台灣獨立的理念出現吧。

戴：關於分裂國家的問題，我認為大陸與台灣的分裂，與

南、北韓或東、西德的分裂比較，形式邏輯上雖相似，在國際權力政治中却有所不同。第一，是分裂的歷史原因不同。東、西德和南、北韓的分裂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大陸和台灣的分裂則是國、共內戰尚未完全解決遺留下來的局面。

第二，是大陸和台灣被殖民地化的過程是很不一樣的，大陸始終是半殖民地，任何一個帝國主義都無力完全併吞她，台灣却是以台灣海峽劃線被整個割裂的。前前後後，直接或間接，台灣受到日本影響已有八十年，這八十年的體驗，使得台灣的資產階級與大陸的資產階級已具有一定程度的隔閡，隔閡原是可以透過時間來彌補的。但是因為戰後的國際關係以及國共內戰而喪失了構成「共識」的時機。演變的結果是國民黨來統治台灣，大陸的資產階級則分散在香港、台灣以及北美各地。

第三，是台灣資產階級與大陸到台灣的資產階級，雖然在六〇年代後期以來逐漸有交流合資通婚，但是因為台灣與大陸根本上力量的不成比例，無論人口或地理面積比例的懸殊非常大，不像東、西德或南、北韓雙方力量旗鼓相當，頂多是四、六的比例而已。這種情況下，在台灣的資產階級，無論蔣經國再怎麼鼓勵給他們打強心針，恐怕都很難樹立起信心，都很難叫他們不往外國跑。

因此你剛才那個假設——如果長江以南給中國那個尚未充分成長的資產階級留下發展的餘地，台灣的土著資產階級和大陸的土著資產階級也許會結合成立政黨，而嘗試其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發展——可能是太樂觀了一點。主要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不夠成熟，世界史的胎動沒有來得及提供時間，讓他們找出「生機」。

陳：戴教授說的一點都不錯。我剛才說的完全是一種假設，是把歷史固定在以長江為界，也固定了這卅年。我為什麼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在台灣生活中有太多的實例說明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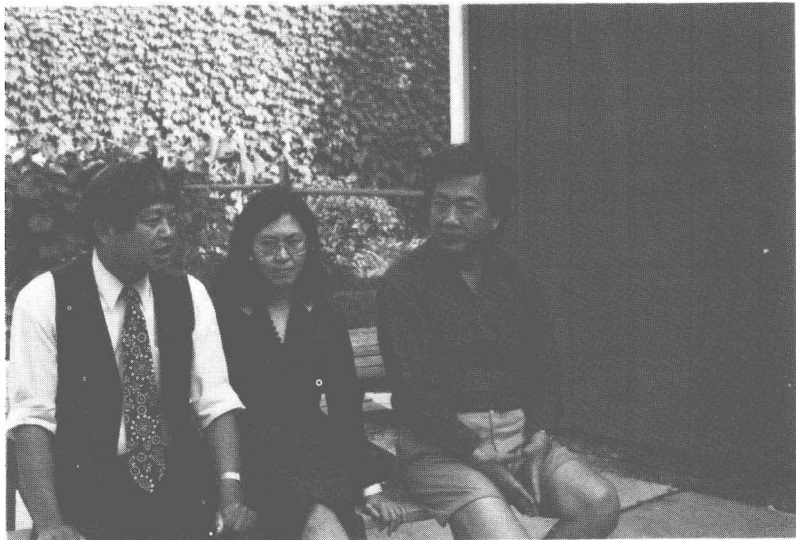
是什麼「民族」的問題。

以「自由中國」運動為例，在整個「自由中國」運動中，台灣籍與大陸籍的自由思想份子，民主派聯合得非常之好，甚至推了雷震為領導人，他們舉辦的全省巡迴演講、座談會，所受到的歡迎、雷震受到的尊敬，都是極為熱烈感人的。後來雷震被捕入獄，像以前的五虎將楊金虎等人也還常到牢裏去看他。這就說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在共同的社會階級利益之下，台灣人和大陸人是絕對可以合作無問題的。再舉例說，賀兆雄的工會中，外省工人和本省工人是團結的。在 ROTARY CLUB 中，外省的 JOHN CHEN 與本省的 FRANK CHANG 也是團結的。

戴：但是國民黨政府是絕不會容許政治層上有這種情況產生的，所以雷震要坐牢。後來，余登發的案子也頗類似。

### 時不我與的焦慮感

陳：方才戴教授說，台獨運動，是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我是同意的。在台灣，有些黨外也這麼提。時序進



由左至右戴國輝，譚嘉（東道主），陳映真，一九八三年，艾荷華

入七〇年代，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改變，台獨運動失去了最好的時機。美國在政策上，至少是公開裡，放棄了對台獨的支持。時不我與，而台灣內部的獨立蜂起似乎遙不可期，於是以「台灣民族論」爲北美的自己和台灣打氣。據說，民族論在北美的高潮這一兩年來已是退潮，但因台灣內部「兩個結」的「討論」，又使他們大喜過望，於是又匆忙地祭起旗來。

事實上，台灣民族論，除了訴諸台灣人，也訴諸美國人。他們在參院公聽會上，向美國人苦苦說明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因此上海公報中說台灣問題由兩岸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是不對的……。我來美後讀到這些文件，心中有說不出來的感慨。

### 「台灣民族論」的演進與困惑

戴：關於「台灣民族論」，我們應該具體一點的分析。由廖文毅的混血「台灣民族論」開始，台獨就提倡「台灣民族論」的。但是自從尼克森到過北京後，張燦塗的台獨聯盟系統起了很大的變化，一度曾經準備要放棄「台灣民族論」。爲什麼呢？主要乃是廖文毅、邱永漢、辜寬敏等人，放棄台獨運動返台。意思就是說，他們認爲過去藉主張「台灣民族論」來製造要求民族自決的國際輿論，以期在美國的支持下達到台灣獨立的目的的道路是走不通了。現在主張「台灣民族論」的則是史明和許信良等標榜「左派」的人，他們並且強烈批判「右派」資產階級的台獨聯盟放棄了「台灣民族論」。

舊的「台灣民族論」——也就是台獨聯盟的代表思潮——是非常閉鎖、排外的，不僅不接納在台

灣的外省人，甚至主張台灣人 and 中國人是不同的民族。但是因為過份閉鎖牽強根本行不通，而漸漸有了修正。到了現在的「台灣民族論」是完全由現實出發的了，表面上不再歧視外省人，號召認同台灣、以共同的「台灣意識」或「台灣人意識」對抗中共。這種變化乃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台獨右派在極微妙的國際政治變化中，體認到他們自身與國民黨政府還有利害一致的地方，可能有携手合作以維持台灣現狀之時；另一方面「左派」的台獨，是藉以馬列的語言來重新組織「台灣民族論」，對右派的不堅定的「民族」立場有很尖銳的批評。這點在島內的黨外民主運動中要如何看待，是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 「台獨保守派」和「台獨左派」

陳：隨著不同的歷史時期，相應於台獨運動在國際政治架構下的變化，所謂「台灣民族論」也有不同的內涵。以我的了解史明這套理論很早就有，但是在當時的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中並沒有市場，直到最近兩三年才在北美洲達到高峯。以我在台灣生活的經驗，黨外運動真正的高舉了「台灣人」「台灣民族」的旗幟還是最近的事情。有如陳鼓應以前說過的，台灣的民族運動可分成兩個部份，主要的本質還是地方資產階級要求在那個政治體系下的資產階級辦公室中找個位置，而且愈是到地方上愈清楚感覺到這種情況才是主要的。過去雖然或者有個別帶有「台獨」意識的黨外人士，但是無論他們的語言或實際民主運動的手段，「台獨」的色彩都很淡，從未像今日黨外少數一些年輕人那麼囂喧的主張。然而，就像所有外來的思潮流到台灣時經過扭曲與折扣的過程一樣，目前台灣黨

外雜誌所談論的「台灣民族論」比起北美的同類文章，無論在濃度或深度上都顯得粗淺多了，這並不單是不敢說的問題。這種情況與您剛才所說的正好吻合，就是目前的「台獨」仍有兩個流派，比較喧鬧、聲音聒噪的是台獨「左派」，但是實際的「力量」恐怕並不在他們一派手上。理由很簡單，在北美的台灣人多半是屬於郊區中產以上階級的律師、醫生、教授……等，他們怎能認同史明的「二段革命論」呢？島內的情況就更不如了，以「生根」為例，雖然大談「台灣民族論」，却不一定懂得或同意史明的全套「理論」，恐怕還是討厭那樣的說法吧，這些可由「生根」雜誌對待勞工問題的態度反應出來。而康寧祥的支持力量來自穩健的台灣資產階級，還是相近於北美的 FADA（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系統。他們不要求激烈的改變，甚且他們更了解到自己與國民黨之間既互相需要，又爭吵不休的「不愉快的愛侶」的關係。他們了解到與國民黨的互相需要，例如戒嚴法對工會、產業聯盟的禁制是對台灣資產階級資本積累與榨取起很大的作用。他們希望台灣政治慢慢的改，他們所爭的，是自己階級參政的席次，並不是體制的改變。至於年輕一代的批康，據我研究，似乎並沒有意識型態的意義，年輕人比較激進，但那只是急於改變黨外現有的秩序，爭自己在黨外陣營中的一席之地。因為黨外也有其牢固的階層性，依照個人參與黨外的年資、是否現任民意代表、或者中央級、省級、縣市級的代表……等不同條件，有不同的「地位」。現在黨外新生代沒有這個耐心。戰後成長的世代，可不講究對前輩的客氣了。

戴：這裏我要做個補充，去年康寧祥等四人來美訪問時，曾公開支持美國賣武器給台灣，「台灣同鄉會」和「台獨聯盟」也都支持。這就明示了「台灣當前秩序的維持」乃是黨外穩健派、海外台美族和國民黨政府三者利益一致之處，也是最重要的前提。

陳：因而，海外台獨運動若是分成上述兩個流派，其實島內黨外運動的影響恐怕也是以穩健的、經過修改的 FAPA 爲大。理由是 FAPA 的財源充裕，……

戴：對！對！台美族的社會基礎根本就在這裏。許信良、史明要跟這些人談革命，「要革我們資產階級的命！」是很叫人家討厭的！所以，史明和許信良的「二段革命論」是少有市場的。但也可能有一些年輕學生因爲本身階級基礎尚未確定、或富有血氣、衝勁未被磨損的正義感，受到「理論」吸引而參與。就整個台美族而言，史明和許信良的影響力我看是不大。

### 學生與社會民衆的意識差距

陳：他們在北美洲台美族間不大的影響力，就按照相同的比例反應到島內的黨外運動。雖然我剛才說，那種語言在部份黨外年輕人當中頗爲流行，但那純然是一種流行。受史明的「理論」影響的可能，是貧困、好學又沒有思想出路的極少數學生。可惜的是，他們還沒有分辨真實和虛構的歷史唯物論的訓練。

然而，在台灣，學生一般地在認識上比社會民衆落後。一般民衆都要比學生較具有改革的精神，這是台灣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很不相同的地方。造成這種奇怪的現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爲台灣近卅年來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哲學知識這些方面的禁斷，使得學生在他們一生最熱情、最敏感的年代一點都不發生作用。絕大部份的學生生活是郊遊、舞會、麻將、喝酒、烤肉。若是有什麼意識的話，也是以贊成現體制的佔絕大多數。

戴：是因為他們可以享受到經濟成長的部份「美果」和加入國民黨，謀求一份不錯的工作或位置，才那樣嗎？

陳：也不一定如此，一般學生不見得太在乎國民黨或政治，主要是近年來物質生活的改善，加上多年來所受的教育，他們自然要維護現行的體制。

呂：關於學生的問題我以為並不是那麼深奧。主要是升學的壓力，從初中、高中一直到進了大學才能喘息，也接觸不到教科書以外的書籍，要求他們思想具有批判力是不可能的。民衆與學生不同，民衆有實際生活的體驗……

### 黨外心中只有國民黨

陳：但是，日本的學生升學競爭也很厲害的，問題是客觀上沒有那樣的東西讓他們去接觸。民衆的進步性是由生活的歷練中學習得到教育的，並非受到書本、意識型態的影響。台灣學生的落後性除了消費社會的因素或功課太忙之外，客觀條件的欠缺是有很大的關係。台灣實在沒有東西讓他們接觸，他們頂多變成一個黨外，用內容貧乏的辭語罵國民黨。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所有的反對者心目中都只有一個國民黨，使他們無法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刻。

呂：你是說黨外不是來自民衆嗎？

陳：噢！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黨外運動是代表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那塊泥土自然生長出來的。問題是這個反對運動的品質，與其他第三世界的反對勢力的思想、文化、知識形態的深度是不能



相比較的。

我這次在寫作班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交流的感受很深。他們的創作做爲藝術品的水準如何是另一回事，但是做爲一個作家，他們的認真和自覺水準是高出我們太多了。

戴：我讀了這次討論「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意識」的幾篇文章，感到奇怪的是，作者對以上幾個問題的邏輯層次都沒有搞清楚。正有如你剛才說的「心目中只有國民黨」，連自己都沒有了，一味只罵國民黨，把一切台灣不好的責任都推給國民黨，要國民黨承擔。這種不求進步，少有自我批判，自我提昇層次，自我拓寬格局的態度，無論在學術上或思想邏輯上都是墮落的。「維持現狀」本身就是退步的。

葉：戴教授，能不能請你對「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意識」簡短整理，定義。

### 「台灣意識」與「台灣人意識」要分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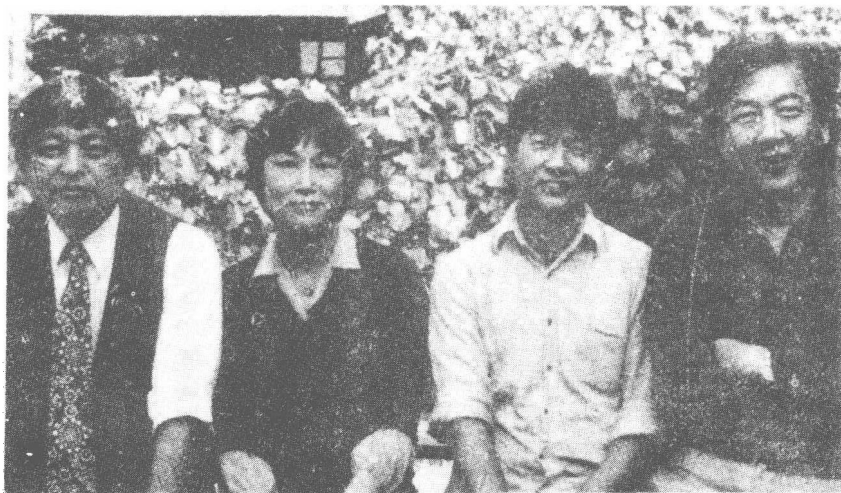
戴：原本不是學問的東西，硬要加以界定，很難的，我只能以假設要我寫一篇提倡「台灣意識」的文章這樣的觀點來談。首先，「台灣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有其相重疊點，也有必要區分清楚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無論理由是反共或恐共，爲了抵抗中共的力量渡過台灣海峽，是可以主張「台灣意識」的。但若藉著提倡「台灣意識」和「台灣人意識」來轉化做「反華」的思想武裝，則未免過於情緒化，且是低層次的行徑。也就是說爲了對抗中共、維持台灣現狀，大家盡力溝通、尋求共同的觀點與利害關係，在這個基礎上或許可能構成「台灣意識」。目前的提法好像都是認爲沒什麼

好商量的，人人都得認同「台灣意識」，否則就是併吞派，就該滾蛋，這就未免太霸氣了，有強姦民意的味道，……

葉：陳鴻基在「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一文中曾指出「台灣意識」的形成，乃是因爲今日台灣的經濟社會生活已形成了共同體。你的看法如何？

戴：這個理論基礎是很脆弱的。你可以找「高山青」的山地青年，中壢一帶鄉下客家村莊，或外省退伍軍人下層窮困人家來問問看，他們會同意台灣的經濟社會生活和他的共同體嗎？他們會認同當前以福佬中產階級作基礎倡導的「台灣人意識」嗎？「台灣意識」是否已形成，還牽涉到如何評估台灣的資本主義成長過程，以及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成熟與否的問題。那麼「台灣意識」與「台灣人意識」也還有必要區分清楚的地方，比如我在日本生活，我認同日本社會的現狀，希望她維持和平憲法，不再有侵略戰爭，經濟能繼續發展，社會秩序安寧，因而我是有「日本意識」，更通俗一點說是具有「日本居民意識」的，但是我不可能認同「日本人意識」。再以林正杰來說吧！我相信他是有「台灣意識」或是「台灣居民意識」的，但是強要他認同「台灣人意識」恐怕就有困難。所以說「台灣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是不一樣的，應該分開看待，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好像混淆不清……。

陳：我想這個問題的混淆是有原因的。史明的「台灣民族論」的主要論點一個是社會發展論，一個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殖民統治，也就是民族的壓迫。所以雖然借用歷史唯物論的語言，却發展成極爲唯心論的東西。強調台灣的政治矛盾的核心是民族壓迫，也就是他表明的兩條公式：①中國民族——統治民族——壓迫階級。②台灣民族——被統治者民族——被壓迫階級。這種提法是存在於他的「理論」



由左至右戴國輝、葉芸芸（錄音整理者）、呂嘉行（東道主）、陳映真。

架構中最大的矛盾，原來機會點是在「台灣意識」的，但是因為這個「理論」上的錯誤，導致另外一個錯誤——即是強調台灣的政治是殖民統治，就像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這個「理論」架構上的弱點是因為與實際生活的不一致，這一點我們待會兒再討論。

但是，「穩健」派的台獨似乎並不強烈主張民族矛盾，他們要求台灣的人權、民主和自由，却不一定要全面地掌握政權，若有必要甚至說願意搞遊說團體替台灣辦對美外交，這樣的主張可能稱之為台灣本位主義較恰當。

戴：這也就是「革新保台」的論點，革新保台論者認為大家在同一條船上蹣跚航行，將共同面臨風暴。

陳：對。所以要求的是修正，因為在共同的階級基礎上，如何保持這個階級的存在與發展才是問題。所以我看「台灣」與「台灣人」意識的混淆不清，是因為基本上台獨運動存在著兩個不一致的主張。

## 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民族意識

載：至於從「民族國家論」的學術立場來談，「台灣民族論」對不對的問題，我看很難。我們都知道，現代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概念是來自於西歐近代民族國家的成立。也就是說近代社會科學上所言及的民族論、民族概念，並不是超時間、超歷史的存在。日本民族也罷，中華民族也罷，都不是幾百年以前就有的概念。此如說近代日本民族的形成，日本人的概念以及他們的日本人意識要俟到一八八〇年代才逐漸醞釀成的。那以前他們各自分別稱爲「長州人」、「信州人」或「遠州人」等等。本來「州」就是通到「國」的一種語匯。日本人打完了明治維新過程的最後一次內戰（也就是西南戰爭），日本資本主義慢慢成長，國民經濟圈逐漸成形，日本人意識才萌芽出來的。至於日本人意識以及日本民族的整合性概念則得藉兩次對外侵略戰爭一爲中日甲午戰爭，二爲日俄戰爭來培育與穩固。

我們繼續談一下中國人意識和中華或中國民族概念的萌芽，培育，發展成形的過程。據我未成熟的想法，萌芽略見於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階段，但這個只是斑點的存在而已。較大規模的萌芽和催生是藉助於辛亥革命。至於發展成形，還得藉日本軍國主義的殘酷行徑轉化爲「反面教師」來培育的呢！

### 「台灣民族」論須向前看

因而「台灣民族論」，只往後看——也就是在歷史痕跡中去尋找見證，是沒有希望的。尤其從漢族系移台居民群體身上來找「台灣民族」的根基是牽強附會。若真要找出一縷希望，要往高山諸族去尋找才合情合理的。但是當前大多數「台灣民族」論者却不屑言及有關高山諸族的歷史問題，沒

有面對歷史的事實。我真不知道，爲何還有人要用幾把剪刀和漿糊來編織，真是勞民傷財啊！

但話得說回來，若論者願向前探討，而台灣的局面能夠維持現況不變，所有圍繞台灣的客觀條件也不改變，我們還可勉強就下列主觀條件來討論「台灣民族」能否成熟的問題。我認爲當爲主體的「台灣人」（她的整合概念已成熟爲前提）能夠真正樹立「群體自我」（GROUP IDENTITY）的尊嚴和獨立自主性，不再挾美、日以自重，且能揚棄仰賴美、日外來勢力參與的慣性，真正依據群眾的草根性，挺直脊骨，力求自我提升層次，擴大格局的話，再過五十年，一百年或許有可能把「台灣民族」培育起來也說不定。

以現階段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總合現實來判定，我認爲台灣人意識以及以她作爲前提的「台灣民族」是萬萬不能斷定爲成熟的。

主張「台灣民族論」者，往往把支持中國大陸與台灣將來成爲一個國家的人們罵爲併吞派，指摘他們陷進「大漢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大中國沙文主義」等等的泥潭中。「台灣民族論」者，主張「台灣人」有別於「中國人」，「台灣民族」有異於「中華民族」。這一種主張，若以善意來解釋，是用 INSIDER'S PERSPECTIVE 來看待台灣內部的問題。他們爲了抗拒官方體制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他們斷定爲以 OUTSIDER'S PERSPECTIVE 來套的「中國民族主義」，或者是以 ORDER'S PERSPECTIVE 來框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而有所主張。

這種邏輯是否正確，能否行得通，我們可以暫時不加以評論。但我們只要冷靜來考察，高山諸族人士和客家系人士亦可斷定當前「台灣民族論」者所主張的「台灣民族論」爲「福佬沙文主義」的一種體現。因爲倡導「台灣民族論」者多數爲福佬人士，他們無形中忽視或輕視高山諸族人士及客

家系人士的 INSIDER'S PERSPECTIVE 的權利、立場和機會。他們若視當前「台灣民族論」有實現的一天，他們將被「台灣民族論」者剝奪主張各自「群體自我」尊嚴的權利。

我個人並不反對台灣人意識的培育與成熟。但是有三個條件：我們得肯定台灣內部居民的多元存在為先，如何善待高山諸族，客家系人士以及大陸系人士有關問題為次，三者我們得勇敢地面對多層且複雜的社會現實。逃避現實的人是懦弱的，是不可能與「勝利的女神」有緣份的。這已是人類共同的歷史教訓。

我們絕不可學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依靠中產階級的反共、恐共心理，藉反共來推展反人性的種族主義，排外，歧視「他族」，殘殺猶太人等等的行徑。

「台灣民族論」暗藏著把省籍矛盾，地方性（地方主義）層次的摩擦無限上綱為民族、種族矛盾，搞出一種假象，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視野蒙住，甚至於有意蒙住老百姓的眼睛，我憂慮這一種論調的持續將給台灣帶來不測的災禍。有位曾經參加過世台會，一度為史明「理論」信徒的年輕朋友告訴我，史明在世台會要求鄉親們「若有說不慣「台灣民族」的人，可以在吃早飯前先喊十遍「台灣民族」就可以了……。」那位朋友說真有一點像希特勒的宣傳作法，也聞到「台灣民族論」裡面已有法西斯主義的萌芽和火藥味，因而苦惱另尋出路了。「台灣民族論」會不會變成法西斯主義的「鬼胎」，給美麗島帶來災難，我不敢預卜。不過站在研究社會科學的立場，先提出問題來吧！

另外，我身為客家系台灣人，我總認為客裔人士和福佬人士合起來的漢族系台灣人，雙手都不是頂乾淨的。我們該擔當起來，積極地肯定，並容納高山各族的各自意識的主張與樹立。同時我得強調客家人意識和健康的台灣人意識是絕對不對立的。也不該讓她們對立的。

在台灣，客家人意識和台灣人意識不但對立，我認為大可把她定位於台灣人意識的下位概念來善待。但中華民族意識却是台灣人意識的上位概念。

我期待台灣人意識的健康成長，不等於我放棄客家系台灣人意識。更不等於我放棄認同中華民族意識。

我也得強調認同中華民族意識，並不同於認同中共或國府的政治體制。在正常的社會，某一位公民或市民對政黨、對政權都應該具有選擇認同的權利，「主權在民」的眞正意義應該在此的呀！呂：那麼，綜合以上所討論的，我們是否可以簡單地說「台灣人意識」是「台灣民族」的前提？

戴：是的，是的。

呂：我在『台灣與世界』第四期所整理的有關論爭的文摘中，記不清楚是那一篇文章了，好像讀到關於「台灣意識」的一個簡單的定義——「台灣意識」就是「愛」台灣，就是認同於台灣，與「關心」台灣是絕然不同的。只有「愛」台灣的人，才有資格決定台灣的前途命運，我覺得這種說法頗有說服力的。

葉：這個觀點陳永興醫師在七月的美東夏令營演講中，解釋的很清楚，他說：愛台灣就是你要與她共生死，台灣再怎麼不可愛，你都要愛她。

### 琉球獨立運動的啓示

戴：這個論點表面上好像很有說服力，因爲完全是以感性做基礎，好像談戀愛一樣，不必談理智的問

題，做爲一種文學題材或創作的動力是很感人。但是在國際關係、現實政治、歷史發展的浪潮中的「台灣問題」恐怕需要冷靜下來，甚至冷酷地來對待。我們可以來參考琉球的獨立運動，琉球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琉球王朝，在近代以前也曾曾在明清兩朝和日本的幕府、明治維新早期政府之間保持微妙的半獨立狀況。這個在「近代國家」萌芽的前階段曾存在過國家體制的琉球，其獨立運動却始終很難且根本沒有過發展。琉球目前仍有獨立運動，但它的主流已退讓到要求自治的聯邦制，我認得一位在美國任教的琉球人教授，他主張琉球民族是構成日本民族的一部份，是沒有民族矛盾的。（過去的日民族只指大和民族，甚至「愛奴族」也被排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共產黨也到最近才承認「愛奴族」是少數民族，日本人的看法是非常落後的。）相對於大和民族，琉球民族應要保持其文化、歷史的特殊性，而與日本的四個島的主要居民勢力——大和民族，構成日本民族聯邦政府，保持日本的多元性……

陳：琉球人在種族上是不是和大和民族不一樣呢？

戴：種族上應該是不很一樣的，外型上就可以看出差異。但是，過去因爲「反基地鬭爭」，日共當局一直否定這種差異。這是因爲美國爲了維持在琉球的軍事基地，以對抗蘇聯和過去的中共，曾有意促使琉球特殊化而獨立於日本之外，而日後隨著美日關係的更進一步的結盟，美國終究是讓琉球主權回歸到日本，重新稱呼明治維新後改稱的「沖繩」。同時還繼續保持美軍在琉球的軍事基地。據我的了解，琉球獨立運動雖也有依靠美國力量的，但是有獨立思考的人是主張有民族矛盾、要求民族獨立的。但如今他們已修正到要求參與到日本民族的聯邦制。所以，在複雜的國際政治關係中，琉球獨立論雖有較台灣獨立論優越的歷史背景與國際條件，仍無法主張「民族意識」，「民族自決



」。而今日以「台灣民族意識」為基礎的台灣獨立運動（民族獨立的真正基礎應在有種族差異的高山族，却被我們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一筆勾消了）不僅其民族意識的形成需要很長的發展時間，另一個問題是台灣海峽太近了，大陸十億人口所造成的有形無形的壓力能否阻擋得住？所以我認為日本聯邦制的提法是比较進步的。就像明治維新以大和民族為核心形成日本民族，近代民族國家都是以優勢民族為中心形成的，但在它的具體過程裡往往犧牲了少數民族的權益，這點却是很需要修正的。我認為所謂「日本民族」應該包括大和民族，以及愛奴民族、琉球民族等等少數民族，由這幾個民族來構成高一個層次的日本民族，然後成為統一的聯邦體制國家，賦予少數民族相對的自治權，這一種提法才是進步而合情理的。

### 新加坡都感受到十億人的壓力

呂：關於如何承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的問題，即使以新加坡的地位都還感到吃不消，新加坡政府採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壓制華文，現在連政府、商號的公文都改用英文了。上回在美國的聶華苓、鄭愁予等幾位中國作家和大陸的艾青、蕭軍等到新加坡參加一個文學會議，新加坡政府就花了很大力氣把他們從新加坡民衆隔離……

陳：是防範得很厲害。中國作家受到監視，據說他們在旅館中，若是華人打進來的電話，特務替他們接聽都說「不在」！怕他們與當地作家接觸，激起文化上的共同感情。

呂：甚至謠傳主持會議邀請中國作家的文化部官員，都可能要被逼下台。

戴：對，對。南洋大學被新加坡大學吞併，也是同樣的因素。李光耀在都市計劃也針對了這個問題大下其功力的。過去都是福建或廣東那一個縣來的就各自構成一條街，這是自然形成的。都市重新規劃以後，改建大廈公寓，不但把華人過去的幫派打破，還把馬來人和華人通通混在一起了。李光耀爲了促成培養「新加坡國民意識」是從都市計劃、國民住宅、物質生活上各方面着手的。但是，還是很困難，每次大陸有乒乓球隊去，當局怕老百姓向中國隊認同鼓掌，要先廣播提醒「我們已是新加坡人了，雖然我們華族的歷史文化是來自大陸」。

回到台灣的問題，儘管有些人爲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需要，而高喊「台灣民族意識」，實際生活中却有一種復古的趨向，譬如婚禮、拜拜的儀式，吃、住尤其是家具一類的樣式很多是採用古中國傳統。所以，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所辦的黨外雜誌，雖然要這麼提倡，一般老百姓能認同多少，我倒是很懷疑的。反國民黨的情緒，對現狀的不滿不該與「反華」畫成等號才對。但一些人却故意或無意地把它混淆不清。

陳：在台灣的實際上的文化生活，有兩個方面：台灣中產階級的生活文化，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發展而日漸國際化，物質生活「現代化」的同時，台灣傳統的、特殊性的生活文化也在消失中。但台灣都市中產階級以外的一般老百姓，例如城市貧民、工業城鎮的工人、偏遠農村農民的文化生活中，却還緊緊地保留著台灣傳統的民俗，宗教祭拜、戲曲、民間藝術等等，而這些文化却保留著十分濃厚的中國性格。然而，主張「台灣民族論」的人，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却不深究他們所強調爲「特殊」的「台灣文化」，例如布袋戲、歌仔戲的內容，例如台詞上的「上京赴考」的「京」不可能是台南府城，也不正視台灣在被強迫的國際分工中，城市消費文化日趨國際化而喪失民

族認同的消費文化生活。

自己先有個信念，再為它找「知識」或「理論」的根據，不只是一般理論家的毛病，尤其是一些庸俗化的「左」的理論家容易犯的毛病，台灣民族論就是一個例子。

在台灣的生動的生活中，卅年來的社會發展，清楚地呈現了這事實，所謂外省人和本省人，只依著一般社會學的規律，組織到社會的階級中。賀兆雄的階級中，有本省人和外省人，他們之間是團結的，屬於 JOHN CHEN 的扶輪社那個階級中，有外省人和本省人，而且是友好、平等、團結的。即使只是形式邏輯，都可以知道凡台灣當權者皆外省人這個事實，是不能引導出「凡外省人皆為台灣當權者」這個結論的。

民族壓迫，是切膚的壓迫，原不必什麼「理論素養」就可以認識的。日本時代的台灣，台灣小孩和日本小孩，從小學就開始打架，直打到中學去。教育的差別、經濟活動的差別、人格的差別，每天每刻，存在於具體生活中。你可以用別的提法來指控台灣社會與政治的不公平，但不能以「殖民論」來代替。若是統治民族，就不容許他在貧民窟住，不容許他睡車站公園，不許他開計程車侍候二等國民。若是被統治民族，就不許他學習法政，不許他開像台塑那麼大的企業，不許他與一等國民同上一個學校……。

和台灣現實生活這麼脫節的東西，如果直拿它來當作「革命理論」，非遭到悲慘結果不可。我來美國後，有這樣的感受。台灣民族論，在台灣，是搞不起來的，因為「中國人民族對台灣人民族施行殖民統治」在台灣生活中並不是事實。但這台灣民族論，依然有它的物質土壤。那就是北美的郊區中產以上台美族的生活。台灣民族論，現實上是北美中產階級台裔美國公民的意識型態。以他們



戴國輝、聶華苓，一九八三，愛荷華。

傲慢地「指揮」島內黨外的神態看，益徵其信而不虛。楊逵老先生說得好，他是來北美之後才看見「台灣民族」的。

其次，應該談一談「一千八百萬人」論。這和「台灣民族」論有深切關係。最近我讀了某一個王茂盛寫的文章，很受其中一部份提法的啓發。

一千八百萬人，其實是個空虛的數字，沒有實質的社會學意義。扣除十四歲以下以及衰老的非生產性的人口等，台灣實際的經濟活動人口只有八百多萬。八百多萬中依農、工、商、服務四個行業中各自「僱主、自僱者、無償工、有償工」這四個類別去分析，有償工佔四百一十九點七萬人，僱主佔二十五萬人，自僱者佔一百一十七萬，無償工佔七十二點一萬人。做為台灣資產階級意識型態，即概括地屬於僱主、自僱者階級的意識型態的「左」的和右的台灣民族論，又怎能代表佔著絕大多數的有償工人口的利益呢？

形形色色的台灣民族論，這些年來不斷向我們和他們的外國朋友呼喚「一千八百萬人」如何如何，夜深

人靜，也應該自覺到它空虛而虛構的一面吧？

### 獨立自主的台灣資產階級難於產生

戴：我所讀到的主張「台灣結」的論述，好像都對台灣的經濟很有成就感。你可不可以談談對台灣經濟前景的看法？

陳：經濟這是很深刻的問題，我恐怕沒有力量可以發言，我只能從一個生活在台灣的人的感想和體會，提供給大家參考。我個人認為台灣獨立運動的最大弱點，在於台灣一直無法產生真正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怎麼講呢？歷史上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形成，有一個特徵，就是都有獨立性強的、有創意有尊嚴的不依賴任何其他力量的資產階級。在微妙的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下，在六〇年代發生的台灣的資產階級的成長，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與政權結合，而帶著附屬的官僚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性格，比如像大家都知道的大同公司的林挺生，也就是說必須依賴政治上的權力，維持其資本積聚和成長。這原因是，台灣的資產階級在現有政治權力結構中，沒有自己的代表，所以使自己的資本「官僚化」，以保護和發展他的產業。走上這條路的台灣資產階級就帶著很濃厚的官僚壟斷資本的性格，自然因著資本的屬性要致力於維持秩序。第二條是與外國（美國或日本）資本結合以尋求壯大，而帶著深厚的買辦性格，又因資本屬性而帶著強烈的依賴性，帝國主義性格。這是台灣經濟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此外還有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結合的，這是另一個特點。因而，台灣的中小企業就如同陰溝

裏的泡沫，看起來是存在的，但個別地是不斷地生生滅滅的過程，只有少數與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資本結合的，才發展成上述那兩種情況。再加上台灣這十幾年來爲了加工出口貿易，承接了其他先進國家因折舊而丟棄的生產技術，即台灣在大國所規定的國際分工、國際生產綫上的定位，規定了台灣整體經濟的依賴性格更不在話下。台灣資產階級非獨立的、依賴的性格，規定了台灣分離運動的依賴和不徹底的性格。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許多人致富了，一種是正在賺的，他們關心的多半是如何改善營業，如何促使企業成長的問題，很少會關心現實政治的。還有一種是已經賺了錢的，則他們關心的就是如何保值、如何保護其財富的問題，於是馬上就碰上台灣的未來地位的問題，因而引發了非常深沉的不安全感，大家爭先恐後的往外跑。

戴：都忙著爲了成台美族的一員而奔命。

陳：我片面的考查，以資產階級爲中堅的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獨運動其階級本身就帶著這麼致命的弱點，完全沒有爲了保護其階級前途而奮鬥的信念與堅性格。

戴：所以，問題倒不在中共會不會過海來。像這幾年來那麼多的經濟犯罪就是一種現況的反映。……企業家們大失其信心。但另一些人却自誇台灣經濟的成就，他們真有信心，認爲台灣的經濟發展能夠持續嗎？我真有一點懷疑？

陳：這些因素影響了台灣經濟的缺乏長期發展計劃，而這長期性計劃，正是大資本企業最重要的一環。因爲生產與擴大再生產是要一定時間的。這種從來沒有長期投資發展和管理計劃的企業型態，嚴重影響著台灣的經濟發展的本質，永遠是一種投機的、暫時的措施。

戴：除了中產階級外，那些沒有代表代爲表明立場的沉默的大多數人，他們的情況又是如何呢？能夠



陳映真，一九八三，愛荷華

代為推測、分析一下嗎？

### 殖民統治的表象、假象與真相

陳：我說的也可能只是片面的觀察。我們就以台獨「左翼」「民族壓迫」的理論來談吧。方才說，一種「民族壓迫」並不需要很高深理論去認識的，比如您們小時候，台灣人和日本人從小就開始打架，從小學打到中學、甚至到大學，然後有很多人就去搞抵抗運動，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人既是異民族又是政治、經濟生活上的統治階級，這兩個條件相疊合時才構成「民族壓迫」，這也是他們的「理論」。台灣的情形，隨著這卅年的社會發展，其社會矛盾本質只是更加真實化、具體化。怎麼講呢？過去因為前近代的中國與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台灣長久隔離而產生的那種震驚與痛苦，很簡單化、很尖銳地歸結到表面的省籍問題。然而卅年的共同生活中，不斷地因著社會發展的規律，使得台灣的大陸人和本省人非常社會學地編制

到台灣社會的各種階級裡，這才是台灣社會的事實。而這種階級編成，就表現在階級的生活、文化的生活和通婚的關係上。爲什麼在吳濁流、鍾肇政的小說中一個日本女性要嫁給本省人總是不可能的呢？因爲劣勢民族、被統治民族的男性是不容許擁有一個優勢民族、統治民族的女性的。而我們都很清楚，今日台灣的真像漸漸不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海員工會以及扶輪社成員就是一個例子。

戴：「台灣民族論」者努力把省籍矛盾擴大成爲民族矛盾，是相當牽強附會的。殖民地與非殖民地的分別，第一可在教育上看出問題來。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斯時叫做本島人）要受中、高等教育談何容易，國民政府在台灣並不會採取隔離的教育措施，本省人與外省人都通過聯考入學，在教育層面上，只有階級的差異而無省籍的歧視。此外，「台灣民族論」者還嘗試把日本人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形態，繼續延伸下來解釋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以此，「台灣民族」再度以被殖民者、被壓迫者自居，唱著「苦難的台灣人」的哭調仔自怨自艾，不僅自我憐憫又要別人的同情，實在是非常不求上進而墮落的一種姿勢。依我觀察，台獨運動之始終不能展開，乃是這種卑屈感，喪失自我尊嚴，（喊空頭口號，自鳴得意，相互標榜不算爲真正的自我尊嚴感的表現）心理情結之累。

### 「幸福意識」瀰漫於台灣

陳：然而台灣型大眾消費社會的自然發展和形成，使得今天的一般台灣人毫無「苦難意識」，有的只是「幸福意識」，是一種對「幸福」（所謂「幸福」乃是物質消費生活的改進帶來的部份滿足感）的不斷追求的意識，姑不論這種「幸福」是真實的或是假象，今日的台灣人是斷然沒有「苦難意識



」的，更沒有日據時代那種悲壯的、莊嚴的民族意識。所以，當我讀到戴先生提出「自主的」台灣人意識（參考戴氏日文著作『台灣與台灣人』，很受感動）。

呂：剛才的討論釐清了台灣並不存在著兩個互相矛盾的民族，但若是相對於大陸，台灣島上的人是否有民族的差異或特殊性的真象？

戴：那主要是省籍矛盾，是地域性本位主義相互摩擦的問題，而非民族矛盾。因為中國地方大，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本來就具有地方特性會造成矛盾或衝突，這個問題是可以由時間來沖淡的。日本過去也是如此，在明治維新時代還是有內戰的，後來因為國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才慢慢地把這個問題克服下來，就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陸軍與海軍還保有以某縣人為優越的傳統。其他日本人要進入宦仕之途，就通過考取東大法學院一條路，東大法學院畢業並經高考合格後就可以進入政府財經部門任職，至於以後能不能升高官，是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裙帶關係，比如與某某國會議員或局長，高官之女結婚，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發達成熟後的議會民主政治的一種規律。由這個觀點來看，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尚未成熟的，台灣的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少有代表人且沒有權力、沒有相對的發言權，甚至國府也沒有容許他們進入政治權力核心結構的正常管道的存在，因而才會有黨外民主運動和台獨運動的產生。

## 苦悶的「第二代大陸人」

陳：我還想做幾點補充。第一、在台灣的現實生活中，只有階級的差異而無民族的差異，所謂「中國

人」與「台灣人」的矛盾，在現實上是不存在的。台灣的「第二代大陸人」的問題，恰好是這個提法的註腳。這些「第二代大陸人」很苦悶，他們是中下層外省籍公務員和軍人的子弟，在台灣的社會既無權力裙帶關係，復加具有認同上的徬徨。這就反面說明了台灣社會的矛盾性格不在民族問題而是在不同階級、階層的差異。第二、一般老百姓在目前這個向美、日先進國家依賴的經濟體制仍可運行的情況下，多半是不會關心政治的，趕快賺錢才是更重要的。「美麗島事件」這麼大的事件發生時，圓環附近的夜市仍有人在喝酒猜拳，絕不像波蘭的工運那麼悲憤，是屬於一種全波蘭人民的運動。或是孫中山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和已覺醒的知識階層的關係或是延安時期的共產黨與人民的關係。人民把希望寄託在國民黨或中共、相信只有同盟會、國民黨或中共成功了他們才得以翻身。所以當國民黨或是中共受到破壞的危急時，人民會保護組織、為黨犧牲。目前的台灣黨外與群眾還沒有樹立成功這一種關係。而選舉時群眾給予黨外的掌聲，可能緣起同情或自身政治、經濟生活上的不滿與苦悶，不見得有甚麼堅固的認同感。但是黨外却往往將「聽眾」誤解為黨員或堅決的支持者。

第三、是黨外天生弱質，沒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和理論的深度。更缺乏有深度、思想層次的政治家，確實難以成爲一種運動。這當然是跟台灣三十多年來哲學思想社會科學教育的貧困有關係。多年來大家爭相以罵國民黨來贏取選票，同時幾乎所有的反對力量也都以國民黨爲世界的中心，除了空泛地罵國民黨仰望美國和日本而外，也少有黨外自己的、自主的世界觀。而今，黨外人士對海外更有一份令人難解的自卑感，總是在向海外的台美族博士們鞠躬誇獎，並且期望透過他們影響美國的對台政策，從而改變一黨獨大的台灣政治現狀。由革命的歷史看，這種現象也是異常的。我們都知

道無論孫中山的革命也好、蘇聯的革命也好，主要的力量莫不是在國內的，好像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革命」是這麼依賴或形勢上接受國外力量的指揮的。

### 「台灣人意識」與鄉土文學

葉：當前主張「台灣結」的論述，都以黨外民主運動為「台灣人意識」在政治層面的象徵，而以鄉土文學運動為「台灣人意識」表現在文化層面的象徵。你是文學創作者又是當年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當事人之一，我特別想了解你對這種論點的看法？

陳：鄉土文學的出現是在六〇年代中期以後。若以文學思想史上的意義來說，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六年）其實是現代詩論戰（一九七一年）的延長。鄉土文學論戰時所提出的理論問題，譬如文學的民族風格，文學應該為大多數人，文學應該描寫現實社會的生活，文學應該為社會的改革與進步而服務……等等，這些理念，都在保釣運動初期發生的現代詩論戰時就提出來了。而且鄉土文學的實踐——重要作品的創作，也早在論戰發生以前就開始了，並不是論戰以後有了理論指導才創作的文學。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因為政治造成的歷史斷層，連帶的在文學、思想上也無法跟中國的三、四十年代接上頭，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大陸發生過的重要知識生活，譬如著名的社會史論戰、社會性質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等等，對在台灣成長的新起一輩文學工作者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隨著台灣與美國的緊密的盟友關係，不僅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甚至文化上台灣也受到美國的支配性

的影響，這一點與戰後的日本很相似，最爲顯著的就是教育、醫療制度的結構與思想由日本式的改爲美國式的制度。因此五〇年代以至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可以說是帶著「西化」的面貌出現的，受到歐美式現代主義的全面支配，一直到六〇年代末期，社會的低層才有了黃春明等人的小說來反映他們的生活。這個現象在政治、經濟上，或可勉強解釋爲與跟隨著美援經濟體系一起成長的台灣土著資本家的成長有關係。跟隨著台灣本土經濟的成長，有些作家開始回頭來寫身邊熟悉的人與事物。

那麼，你所提出的鄉土文學是不是「台灣人意識」的表現的問題，是非常值得討論的。當年鄉土文學論戰中，我們是面對著，把我們當爲「台獨」和「左翼文學」的左右雙重政治指控，首先因爲鄉土文學作品所寫的都是台灣本土的人物、社會、生活與語言，有很濃厚的地方色彩，所以被指爲有「台獨」的嫌疑。第二因爲鄉土文學所寫的人物多半是社會下層的，所以又有左翼文學的嫌疑。面對著這兩樣的政治指控，我們的辯駁有兩方面，一是強調台灣鄉土文學絕不是階級文學。理由是在向來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並沒有很強烈的階級觀念或階級意識，即使楊青矗所寫的工人小說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因爲他並沒有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要改造社會，創造新社會的歷史自覺。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並沒有人寫過一篇這樣的作品——描寫備受地主或資本家壓迫剝削的農人或工人，有一天突然覺醒，相信他們必須團結起來，打破現有的體制而建立一個農人或工人爲主體而掌權的社會——除非有這樣的文學作品出現，我們才可以說那是工、農文學，或是階級文學。另一方面是說台灣文學雖然有其地方性、特殊性，但終究也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與前面所說的道理一樣，台灣的鄉土文學也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作品——描寫一個「台灣人」，向來自以爲是「中國人」，而在嘗盡了各種挫折傷痛後，終於幡然覺悟到，自己必須只是「台灣人」

，絕不能再是「中國人」了，並且自覺地爲台灣民族的解放而鬪爭。縱觀近、現代台灣文學中，還沒有這種文學作品產生，我們就絕不能說台灣鄉土文學是「台灣人意識」的一種表現，而不屬於中國文學的一支。在日據時代却是有這樣的文學作品，但那時候的「台灣人意識」是相對於「日本人意識」的。文學到底是文學，任何文學理論、詮釋，都要有現存文學作品爲依據。如果台灣社會的確已形成「台灣人意識」，自然地應該會反應在文學作品的。因而我個人認爲強說：台灣鄉土文學是「台灣人意識」的文學是毫無根據而一廂情願的，而且對現階段台灣文學的發展也是有害的。我期待文學理論家們對台灣鄉土文學做更冷靜深刻的分析，也要對世界文學有更爲廣泛深入的理解，在這樣的視野下或許對台灣鄉土文學會有較客觀的評估，而不致於爲了個別政治主張的方便，隨意的解釋和奸污台灣鄉土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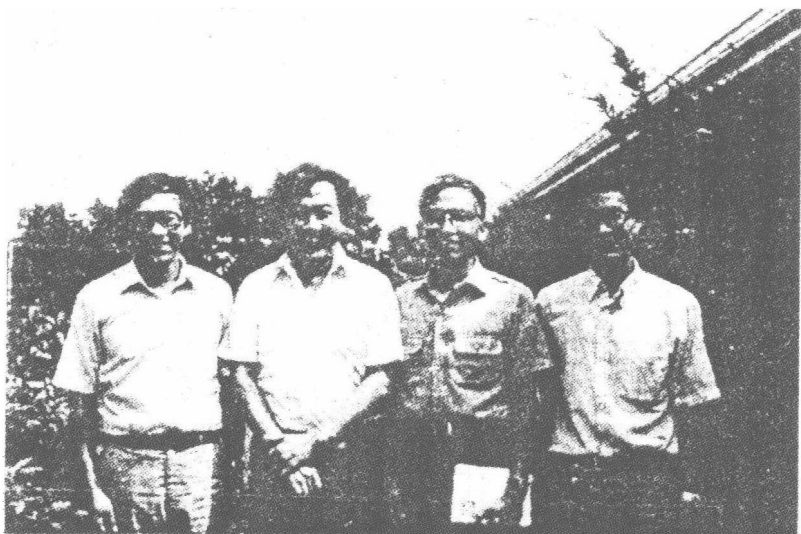
### 文化創新的展望

葉：戴教授，歸納您前面所談到的關於近代民族國家和民族意識的形成，我們是否可以總結地說「台灣民族意識」的培養，可能是要放棄在歷史痕跡中尋找根據，而積極地展望未來，也就是說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那麼接著，您能不能更深入的談談「向前看」的內涵意義是什麼呢？「台灣民族意識」如何才能健康地發展？

戴：所謂「向前看」有個大前提，就是要從世界史的現階段或者放在未來大格局的展望裡來說。那麼，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承認且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肯定多元文

化存在的現實，以此作為前提來探討我們的課題。同時在文化上要重新評估地方特性，即是保持與發展地方文化的本土性與多元性，來鋪好文化創新的良好土壤。從而與資本主義化所帶來的文化上的「劃一主義」——也就是映真兄所說以歐美為糖衣的「消費型文化」相抗衡。從文化創新的角度來談，有地方特性的方言、地方戲曲、民間藝術……等等是非常重要的而富於生機的，但是搞政治的人似乎都不怎麼考慮文化的問題，有些甚至於藉地方特性來主張分離，有時却認為對多元存在的肯定會導致分離和破壞團結，而盡量避免談及。因而文化問題總是受到政治掛帥的處理。比如說語言的問題吧！中國那麼大的地方、那麼多的少數民族與方言，為什麼硬要把「北京話」當做「國語」來講呢？單就這一點來看，中共用「普通話」的稱呼，倒是比較合情恰當的。而且「北京話」和「閩南話」、「廣東話」、「客家話」……等各種方言又為什麼要對立起來呢？各種方言和一種做為溝通用的、大家都懂的「普通話」之間有甚麼理由讓它們不能和平共存的呢？這完全就是政治造成的。政治上的當權者恐懼方言成為分離運動的推動力之一部份，所以老是要壓制方言，推動所謂的國語。其實方言，少數民族的母語與「普通話」之間的關係，我們大可讓它們有和平共存，切磋琢磨，互相補短護長，豐富各自語匯。為何一定要搞成敵對緊張呢？我們應該發揮我們的智慧，好好對待這個問題。文化創新與政治之間一直存在著這麼敏感微妙的緊張關係，我們要「向前看」就必要對這個問題有合理的、建設性的處理，映真兄由文學創作的角度怎麼來看待這些問題的呢？

陳：這個問題我們在台灣也有很多思考。首先，今天如果一個人要繼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似乎就無可避免地背負著海峽兩岸兩個政權的包袱了。這個問題我也曾經苦悶過，而今終於理解我所認同的，仍是中國的土地、歷史、人民與文化，並不是那一個特定的政權與政黨。因而我也認為文化與政



左至右：許文雄、陳映真、杜國清、非馬。

治的問題，必須要有「人民」的觀點做為大前提。以語言政策為例，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推行國語或是普通話是有必要的，但同時也必須充分尊重各地方方言。國民政府在台灣推行國語，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推行的手段却是相當不合理也是極為不健康的，譬如限制大眾傳播的閩南語時間，限制歌仔戲、布袋戲的演出，甚至在學校說方言的學生要受到處罰，使用方言——我們的母語，竟然成爲一種羞恥！當然，國民政府爲什麼這樣子也可以分析，一九四九年移到台灣之初，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國民黨政府與本地的土著力量沒有任何固有的關係，這使得他對台灣本地的方言也有一種恐懼或心理壓力，國語政策的背後是有這樣的純然政治領域的推動因素。現在台獨分離運動却也沒有超越國民黨，在反抗國語政策的同時，自己也帶著「福佬話沙文主義」，充分地漠視其他如客家話、高山各族語言的存在。同樣的有些贊成統一的人，也因為政治主張而沒有深究地就反對方言的使用。這些都是非常值得反省深思的，而大家檢討

的基礎，也就在必須有「人民」的觀點為共同的基礎，然後才能平等地對待各地方文化，尊重地方文化的特殊性，進一步才能談所謂文化創新問題的展望。

戴：我得補一句。我看美國文明儘管有它腐敗的一面，它的多元性也附帶有不可原諒的種族歧視等等的負面。但它在文化創新的層面上具有的「生機」和「潛能」相當地「活」和「富」。這些條件及相貌當然有一大部份是來自它的種族，文化等等的多元性。這一點我們應該向美國社會逐漸擴大少數民族的權利，並積極肯定多元性的正面價值的作法多學習。我們大陸和台灣，本來就是幅員大，人口多，民族複雜，方言多，就多元性來言並不比美國差。我們得好好研究並對待我們固有的多元性，讓我們的多元性發揮，把多元性的正面價值組織起來，變成我們創新文化的契機和推動力。我們不該一再地踏襲老套，墨守成規。以維持封建的中原正統，藉題發揮大漢沙文主義為使命，自我膨脹，自得安慰，老往後看，這一種態度是落伍而沒有建設性的。

葉：陳先生來美國後，獨立派的刊物逐漸有文章批評你，你看過這些文章？你的感想怎樣？

陳：在愛荷華，簡直是鄉下，別說台獨刊物，其他中文報刊都難以一見。這些文章，是熱心的朋友寄來的。我想是主要的我全讀了。

台灣知識份子到了美國，有機會看到台灣禁止的學說，例如史的唯物論吧。他們讀了，搖身一變，成為「革命理論家」，可也立刻有了「我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奇怪的驕傲，使我想起日本三〇年代文學中對半調子激進青年的戲稱——MARK BOY。

很多文章要跟我比歷史唯物論的知識。我當然比不過他們。其實，我那懂得什麼歷史唯物論，我所知道的一點點，無非皮相之談。但我知道，細讀他們的文章，覺得他們還沒有中國社會史論戰時



期的文章深度。不管語言文字、思想發展，皆不及遠甚。不，甚至比起北美另外時期一些在學院或私下搞馬克思主義、搞年輕馬克思思想的一些鄉親，朋友都差。可以這樣總結：北美的台獨「左」翼，在理論和學問上，還在很幼稚的階段。當然，比起島內同性質的文章，北美是好多了。問題在北美有北美的標準。看看美國的「左派」。他們即使被養在校園中，對社會起不了作用，但在理論發展與研究上，有發展、有深度，叫人瞠目相看。台獨「左」派，起碼要有人家一半的水平，說話才有人側耳吧。

其次，比起島內的「民族論」者，我較敬重島內的。因為他們在台灣，有勇氣，也算是好學深思吧。在一個沒有「警總」的地方，住在美國郊區中產階級社區，大談馬克思和歷史唯物論，指揮島內「起義」，這樣墮落和謔畫式的革命家，我是寧可敬遠的。

我不打算敬覆北美鄉親們的文章，是因為有一點不齒（請原諒），也不打算回答島內的文章，是因為我愛其「才」（比較而論），愛其勇。何況，在台灣環境下「打台獨」，在道德上說不過去。

不過，在攻擊我的文章中，有一個共同策略：明顯或陰含地指控我是親中共的，是要中共來「併吞」台灣的。這如果是說給國民黨聽，其心不可問，叫人齒冷，可以不必談它。但也許有一部份是基於我過去的政治主張推論下來的。對這種人，我應該有所說明。

對「四人幫」後揭露出來的中共，我是深刻失望的。對目前政策，我還保有因過於失望引起的懷疑——和反對，例如最近的對文學界的整肅，例如最近愚不可及地大談反對社會主義有人道主義之論……對於它的「對台政策」我是批評和不安的。但這些，却怎麼也無法使我成爲反華的、宣稱自己不再是中國人的獨立派台灣人。

我的立場很明白。我認同的，是歷史的、文化的、人民的中國。我很佩服戴教授，是因為他的台灣人的做爲中國人的自主意識論，給我很多啓發。

我不再是一個政治人物。在某一種意義上，對於「政治」，我是厭惡的。文學和文化，是我這以後的生活中關切的主題。我自知我只不過中下之才，不能成器，理由是我在書本上親炙過許多文學和文化上仍不可視的巨人。

如果「四人幫」給我們什麼教育，那就是一種謙卑的情懷。讓我們不要自以爲義，自以爲真理的化身；讓我們不要大辣辣地喊革命辭語、讓我們不要相信自己調門拉得病態地高的辭語、讓我們不再偏執於一個框框、一套教條和勅語，讓我們在不斷進步的人文、知識的浩瀚中，低頭虛心……。

現在我開始想回台灣了。眞想。那兒的土地、人、鄰居、朋友，甚至是污染過的空氣，全是我們生活的主要泉源啊。

葉：時間很晚了，我們就到此結束吧。我特別要感謝主人夫婦提供了這個機會，也感謝映眞先生和戴教授願意就當前海外島內爭論最多，最爲敏感的「台灣人意識」的問題做爲對談的題目。今晚我們所談的牽涉相當廣泛，但也都緊緊圍繞著歷史發展與全球的觀點，兩個時、空的座標。雖然如此，今天的討論也還只是個引子，我期待著，也相信會有更多的討論繼而生起，因而今天的討論也沒有必要有所結論，結論還是留給我們的讀者吧。

# 台灣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與李哲夫對談於華府

『台灣與世界』是一份以討論「台灣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雜誌，我們一直以「積極的探討代替主張」自律，選稿一直採取兼容並包、只問文章水準不問立場的原則，同時、我們也努力朝著由總結歷史經驗，以及由全球國際社會，當然也包括所有「中國人」社會的觀點，兩個時空的方向來探討大家所關心的台灣的各種問題。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的開展，省籍問題也一直在發展在變化，而今日的台灣社會已經邁向現代化、多元化了，黨外民主運動更是新人輩出，省籍問題恐怕很難一直留在桌子底下或感性層次階段，因而我們也感覺到海外確有加以探討的迫切感。很幸運地，我們今天邀請到美國天主教大學社會學系李哲夫教授（台灣嘉義人）來和戴國輝教授對談討論這個問題。

戴：我目前只搞歷史研究，但過去在東京大學唸書時，碩士論文寫的是社會學方面的。今天有機會和社會學的專家李哲夫教授一起，針對台灣的省籍問題，經由社會學與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交叉討論，希望對這個問題能有一番整理。也算是對『台灣與世界』的讀者有一點點貢獻。

剛才葉芸芸提到海外對這個問題的主張強烈，却少有冷靜的探討。我也覺得多年來，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海外的，對台灣政治現狀的不滿，所採取的反應多半是訴諸情緒化的言語或政治主張口號



『台灣與世界』發行人葉芸芸（左）與戴國輝教授、李哲夫教授。

。這樣子，雖然可以把問題攤出來，却無法進一步針對問題加以深入的探討與整理，確實有違知識份子對社會應具有的啓蒙的責任。

最令人憂慮的是，海外的政治言論及其作爲，把省籍矛盾無限上綱成爲民族、種族矛盾問題，恐怕會把台灣帶往好似納粹、希特勒給德國老百姓以及猶太人所加添的那類災禍。我們都知道，當年德國反共資產階級與共產黨爭奪政權，希特勒得資產階級之擁而上台，後來却無限制縱容反共而演變成極端排外性的種族主義，大殺猶太人以及異己，造成恐怖的法西斯時代。這個問題也並不孤立，在世界史上也有共同經驗的，不僅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日本對朝鮮人、東南亞國家對華僑、華人也一直有類似的做爲。雖然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確實有歷史上非常特殊的地方，但基本上是一個地方主義的問題，地方主義的問題在一個邁向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是相當普遍的、是世界性的。因此，今天我特別高興，能就這個問題在社會學研究方面，多向哲夫兄請教。

## 爭論的焦點——中國觀念的「民族」

李：國輝兄，你太客氣了。你首先提到的史學與社會學的方法，在傳統上這兩者間是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史學的傳統方法是拿史實，經過相當的整理後就好像可以把「事實」陳列出來了，社會學則往往是說史實需要分析。但是，社會學在經過長久以來運用分析的辦法之後，近年來也開始有所反省，覺得社會學所依據的歷史基礎似乎太淺薄了，因為太重視現今的問題了。我個人也有這種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傾向，總是以現今的問題當作開端，然後才往歷史追溯。關於我們今天所要談的省籍或「台灣民族論」的問題，剛才葉芸芸提到分開有「主張」和「探討」兩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待。若以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來談，「主張」和「探討」並不見得要完全分開，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正是今天所存在的主張，然後再問爲什麼會有這些主張？這麼一來，當然就很不像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了。但是，等一下討論下去，我會非常需要歷史的細節來支持和驗證分析的方向。

現今已有的有關省籍問題或民族問題的主張，基本上都包涵了一個相當混亂的概念。到底所談的是指中國各地方、來源的不同呢？或是指種族的不同呢？種族的不同又可分兩種：一是指原種、血統來源的不同，也就是像白人與黑人。另一種主要指文化背景的不同，血統上可能相當接近，但是因爲長期隔離與不同的文化發展，而造成不同的風俗習慣等等，叫做 ETHNICITY。而今天我們所關心的這個問題是具有現實政治的涵義，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我們或是其他海外台灣政治運動團體在爭論台灣省籍這個問題時，其焦點的觀念到底是被如何解釋，以至於引起今天這樣的



戴國輝（左）與李哲夫教授。

爭論？我們應先在可能理解的範圍內，就各種主張中的不同點，畫分定義、界綫。以我個人的觀察，今天人們所激烈進行的政治性或感性討論的問題，實在並不是「種族」的問題，既不是英文所謂的 RACE 也不是 ETHNICITY。雖然有許多討論的文章，沒有畫分清楚，都一概以種族視之。在中國的觀念，其實應該以「民族」稱之較為恰當，其內涵是 NATIVE NATIONALISM —— 就是有一群人在經過以文化、風俗習慣、歷史背景甚至種族膚色等等界定之後，覺得自己與其他群體有很大的不同，而以此為基礎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所以我認為 NATIVE NATIONALISM 應該是中國觀念裡的「民族」。

中國大陸所說的「少數民族」則是相當於 MINORITY ETHNIC GROUPS。而我們今天爭論的焦點則是台灣的省籍問題到底構不構成「民族」問題？因而我們才有很多的的感情與憂慮其對政治的現況與將來會有什麼樣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今天所要問的問題實在是一 NATIVE NATIONALISM 的問題在今天的台灣。

灣，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與省籍的界綫，是不是構成某一個基礎（無論由人種、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等），分出有明顯區別的一群人並且基於這種區別，使得這一群人主張建立另外一個國家？

光復當時的台灣人，雖然意識到，相對於外省人，自己世代生存的地方是一個大陸各省以外的地方。但當時並無一種想法，認為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也沒有那種要求，所以，他們總是認為他們所屬於的國家政府是在台灣海峽對岸的那一邊，光復接收的當時才會那麼熱情地歡迎祖國。關於這一點我們大概都不會有什麼異議的。需要探討的問題在下面，光復後的歷史經驗是否造成一種條件與情況，而觸發了所謂的民族感情，包括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要求呢？是有那麼一段歷史曾經造成這種要求呢？

### 古典殖民統治與民族意識的萌芽

談到這兒，可能先得從橫面的、普遍性的整理來釐清——種族或是民族間的衝突是在何種情況下產生的呢？一般粗枝大葉的畫分，由歷史背景造成的種族之間的關係大概有兩種，一種是一群少數的人移民到一個地方去，而成爲少數的統治階層，最古典的例子就是「殖民」。西方的殖民者以他們優越的政治、經濟與武力到落後的地區，不僅破壞當地區原有的社會秩序，並且依其意願，指揮當地社會秩序的創造，也就是說以其本身的優越性移民到另一個地方去當主人翁。另外一種是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而成爲少數民族，就像中國人移民來美國一樣。還有其他的類型，我們等一會兒討論時可能會觸及到。

那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帶領著到台灣的那一群外省人，就是第一種類型，他們雖然是少數，但基於政治與軍隊的背景，他們自認是來管轄台灣的，是以統治者的身份移民來的。然而，當時的台灣，並沒有條件，要求被統治者一定要反抗統治者，而造成兩個民族間或者省籍間的界綫。當時的確沒有這種因素存在，怎麼樣發生的呢？什麼樣的情況下，使得被統治的當地大多數人，產生要求自己統治自己的權力呢？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的產生。光復不久，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接收官員與軍隊的逐漸積累起來的失望，已經是老生常談，衆所週知的。較為嚴重的現象是，這些國民政府的行政官員普遍帶著過客的心態，就像是被派到殖民地的優越民族的殖民官員，有一定的任期，只是暫時性的。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年前後，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方面與心態大致是這樣的……

戴：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去……

李：對，對。當時匆匆忙忙逃到台灣，總以為喘一口氣，馬上就要反攻大陸回家鄉了。這種短期居留的統治者心態，主要在求短期的利用當地的人力與資源，並無長久的打算。因而，只要其統治力量、武力能夠維持局面、壓得住，他們並不想跟當地的人民有所交流或同化，台灣只是回到故鄉的一塊墊腳石。這種強壓手段，就激發當地人民的反抗。就像其他的殖民地一樣，殖民統治者的利益與當地人民的利益絕不可同日而語。殖民者的利益在於掠奪殖民地的資源運回母國，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則在於本地的長遠展望。這是台灣與其他殖民地相同的地方，也就是橫面的普遍性。但是台灣也有很多特殊性……

戴：當然，歷史背景大不相同。



李：原因有很多，以古典的殖民模式來比較，就有很大的差異。譬如歐洲在南洋或南美洲的殖民地，當殖民母國要在殖民地發展經濟時，立即就面臨一個問題——殖民地欠缺能夠承擔母國所要發展的經濟型態的人力資源，也就是說殖民地原有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或教育水準，並不能馬上與較先進的經濟發展的要求配合。因而，就產生了輸入「第三種種族」的現象，印度人到殖民地的非洲，中國人到殖民地的南美洲或南洋都是變成這種 MIDDLE MAN，是去為殖民者服務，充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這種古典的殖民模式，在台灣就不曾出現過；首先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完全被切斷，不可能再運人到台灣，其次，台灣當時勞動力的水平，遠超過那些到台灣來的國民黨所能經營的，也就是說當地提供足夠發展的條件，包括人力和日本人所不得不留下來的一些基礎。所以古典的西方殖民統治型態，並不適用於解釋台灣的問題，雖然，早先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有著疑似殖民的關係，但是往後的發展却不一樣。那麼，今天所有各種不同的「台灣民族」或省籍的觀念，其主張的方向以及激烈程度的不同，可能就是反應台灣從那個時代以後，因為政策的變更、台灣人與大陸人間關係的變化，而導流出幾個對台灣省籍觀念的不同層次的理解與主張。

簡單地說，一直到一九五四年，美國明確地告訴蔣介石不支持「反攻大陸」以前，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完全是一種徹底的強壓手段。也就是說，在一九五〇年代前期之前，是赤裸裸地、用武力斬除一切可能產生的反抗力量，以求短時期間，在台灣建立起絕對的控制力。二、二八事件只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例，整個時代是一個恐怖黑暗的時代，被逮捕、被殺害的絕不只是台灣本地人，還有很多是與國民黨一起到台灣的大陸籍人士，後來被判為政治犯。事實上，一九五〇年代前期，國民黨因為在大陸的失敗經驗，心懷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在台灣進行一場殘酷無比的「清共」。單就台



李哲夫教授

灣人民而言，國民黨遂變為一個與台灣本地利益完全不一致的少數統治者，其恐怖鎮壓的統治手段，確實在省籍問題上造成了歷史性的傷痕，為當時某一部份的台灣人民催生了「民族意識」。

### 社會各階層對省籍問題的不同反應

戴：從史實上，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點是，來台大陸人士因時期有異，其構成份子不同，當然其心態亦有其相異的地方。第二點是，「二二八」的彈壓與在台的「清共」，其主要目的、對象、具體過程有所不同，我們需要留意詳細分析才夠社會科學。

有關第二點，『台灣與世界』正在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我希望有它突破性的成果累積下來。

至於第一點，光復當時和一九四九年以前從大陸來台人士，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六種成份。一為陳儀一統的班底。二為國民黨各派所派來台的「先遣隊」份子。三為避免大陸的亂局，真正來台作事的，特別是有

關資源委員會方面的「非政治」人士。四為老留日份子來台求發展。五為舊「滿州國」、「汪政權」有關係子，埋姓隱名爲了逃避「漢奸罪」來台混水摸魚。六為對岸閩南方面人士藉通達閩南話來台淘金者。我們以後若能多注意上述幾點分類來作具體分析，或許較易了解當年的情況。一九四九年底以降，「避共」大撤退來台的有關軍政、黨務、財經、學界人士和他們的子弟事，我們今天就不多言了。

言歸本題，哲夫兄，你由一般性的角度，引用世界其他殖民地國家的普遍情況來探討台灣的省籍矛盾的問題，是相當貼切的。換一個角度，由大陸籍人士在台灣的稱呼，由「唐山人」到「阿山」、「豬仔」這樣的改變，我們也可以看到省籍矛盾問題在台灣的歷史演變。光復初期的台灣，的確是沒有省籍矛盾或對立的問題存在，當時一般台灣人民所認同的祖國是由重慶復員回來的南京國民政府。台灣人一直尊稱大陸來的人爲「唐山人」，是所嚮往的唐土那兒來的人。而我們客家人對大陸稱「原鄉」。對大陸來的人稱「老屋伯」、「唐山客」。但是經過二、二八事變後，對祖國的期望落空了、失望了，「唐山人」遂變成「阿山」、「豬仔」這種好吃懶做、侮辱性的稱呼了。

關於二、二八事件，一般都只談到受殺害的台灣人，方才哲夫兄提到五十年代前期，在台灣被迫害的政治犯，也有很多大陸籍的共產黨人以及進步人士，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段內情幾十年來很少爲人所知，年前黨外雜誌在國民黨釋放了一批在火燒島關了卅年的政治犯之後，才有文章談到大陸籍政治犯。台籍資產階級——藉張俊宏的「中智階級」亦可，他們的「孤兒」屬性，自限爲「只有我是被迫害的無辜養女」的觀點相當地重。

有一點我們需要較爲嚴密地分界的是——社會各階層對省籍矛盾的不同反應。我認爲把省籍矛盾等

同於民族矛盾對待，或是說這種感覺最深刻，反應最爲強烈的，多半是中產以上的階級與知識份子。的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害的本省人也是這些精英份子佔大多數，農民、勞工階級參與的可以說少之亦少。除了二、二八事件之外，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大陸的建立，對台灣的知識份子、中產以上的階級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怎麼說呢？就邏輯層次上來說，在國共政權之爭奪過程中，台灣的資產階級原來應該可以加入國民黨的陣營與共產黨對抗的，但是光復回歸到祖國懷抱才第二年就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可以說是狠狠地被陳儀和國府在台當局踢了一腳。三年之後，共產黨的政權在北京宣佈成立，國民黨被趕出大陸撤退到了台灣，不僅如此，堅決反共的美國繼續支持國民黨，台灣竟然成爲反攻大陸的基地。尤有甚者，台灣子弟還有可能被那個不肯接納他們的國民黨政權送到「反攻大陸」的戰場上充當炮灰，成爲國共內戰的犧牲品，而且，大陸與台灣、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對比之懸殊，再怎麼看國民黨的勝算都幾乎等於零。那麼，只要國民黨繼續留在台灣，台灣就免不了要被捲入國共內戰的命運。就是這種恐懼與矛盾，使得台灣的資產階級有了與國民黨、中國畫分界綫的心態，而產生了早期的「聯合國托管論」、「混血民族論」、「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請求美國支持台灣獨立。因爲要向國際訴求，輿論上最好能造成台灣人與中國人已經不是同一個民族，台灣與大陸已經毫無關係的印象，使共產黨沒有理由、藉口過海到台灣來，這些實在都是具體的歷史經緯所造成的。

省籍或地方主義的問題日本也有，世界各國也都有的。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之所以會扭曲成民族主義的假象，是有其歷史的特殊性，整理起來有兩點最重要：第一，台灣與大陸不會被一起殖民過，台灣有過五十年與中國近代史與大陸割裂的體驗。第二，回歸祖國之後不久，就遇到了二、二

八事變與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樹立政權的兩個衝擊。

## 歷史不曾停留在五十年代

李：經過你由歷史縱面的整理，我們就更加清楚，今天人們所談的「中國觀念的「民族問題」，並非人種或種族的問題，而是一個共同生活的群體，成立自己的國家的政治要求的問題。

總結我們上面所討論的，如果歷史停留在五十年代，國民黨繼續其高壓的「殖民」統治，與反攻大陸的國策，國民黨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台灣人民之間，就可能延續著以二、二八事件為代表的關係。那麼，幾乎可以斷言，台灣的「民族意識」就有可能成長，並將成為台灣人民反抗運動的基礎，武力革命或有可能發生。但是，台灣的歷史由五十年代後期却有了大轉捩點，那是因為美國明言不再支持反攻大陸，而促使國民黨在台灣的政策有所調整，當時，國民黨本身對「如何調整？」或許並不明確，更不會讓老百姓知道。但是，不可能光復大陸，而必須在台灣久留，必須在這塊土地上經營以求落地生根，則是不爭之事實了。五十年代以後台灣的發展談起來是相當有趣的，美國扮演個重要的大角色，他雖然不支持蔣介石政權反攻大陸，但是，韓戰以後，台灣做為對中共的圍堵政策的一個重要戰略點，美國是絕對支持蔣介石政權有效而穩定地控制台灣的。從那時候開始，國民黨政府，不僅接受美國的軍援，也接受大量的經援，並就日本所不得不下來的一些工業基礎，開始在台經營發展。

前面已經談到，國民黨統治台灣與古典的西方殖民國家有所不同，歐洲工業先進國家，當年到他

們的亞、非洲殖民地，多少都帶著一點資本，並有一定的對市場與產品要求。而國民黨政府到台灣時，却是一個經濟破產的政權，所帶到台灣的是少數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工作及技術人員、少數的商人和大量的軍隊，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力量，而非開發經濟的殖民力量。但却無妨叫人們點出，提供軍援、掌握資源與經援的美國不正是殖民者嗎？後來的日本也是。國民黨政府恰似一個代理殖民的中間人，以中華民族的觀點而言，國民黨政府是繼續在當「買辦階級」的角色，這個角色國民黨並非第一次擔當，在大陸時期已有相當的經驗……

戴：而且，在大陸時地方大，人才分散了，較難起作用，到台灣以後，人才集中起來了，就能夠成爲主要的動力。

### 經濟開發與省籍矛盾的淡化

李：對、對。還有一點，就是前面已提到的第三種民族的矛盾問題，西方典型的殖民者，需要輸入第三種民族來協助經濟開發。台灣却不需要，當時台灣一般知識水平很高，也就是說台灣本地住民就能夠產生協助管理經濟開發的中產階級。這就引起台灣人經驗上的矛盾，二、二八事變後早期那種全面反國府的心態，到了此時，已有部份中產階級參與了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活動而分享了一些好處。台灣人，雖然在政治上仍無插足中樞之餘地，但確有許多中產階級參與經濟活動其中。所以說，歷史畢竟沒有停留在五十年代，台灣的「民族意識」也就沒有繼續成長的客觀環境，反而是「淡化」了。但是，歷史也不會停留在「經濟起飛」前夕的六十年代，中產階級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了成就

之後，很快就覺察到政治權力上的不平等與隔絕，於是就有了黨外民主運動，要求民主、參政。自六十年代後期，七十年代前期以來，黨外提倡的均是「民主」而非「民族」，這「民主」的要求，絕不基於五〇年代的「民族意識」。

戴：所以，大陸籍的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高玉樹等能夠站在一起，組成聯合陣綫，是有其社會經濟基礎的。這個社會經濟基礎就是哲夫兄剛才談到的，六十年代以後台灣經濟的開發，除了美援以外，可能還要考慮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等因素。在這個社會經濟基礎上，有了較強烈的意願，想要培養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的陣容，以爲阻止中共滲透台灣的對抗力量，但是，這和國民黨內要求絕對控制的頑固保守勢力間是具有很多矛盾的。

李：關於台灣的經濟開發以及土地改革的問題，論者多半給予相當的評價，尤其是美援的機構——農復會所發表的論文，對台灣之經濟開發推崇備至，或說是三民主義之實施，或曰拜美式民主政治之賜，這類論文自然很受美國讀者之歡迎。時至八十年代的今天，美國仍然帶著濃厚的「民主導師」的心態，以在世界各國支援推行民主政治爲己任。這種「民主」的理想原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政權，却是一點點「民主」的概念也沒有的，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過是認真的在當「買辦」的角色而已。

然而，經濟開發的直接影響，却是導致以省籍的界綫來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綫、意志衰弱了、潰散了。爲什麼呢？經濟開發以後，就有少數台灣資產階級，有機會看到所謂國民黨的「高等上層社會」，也有某種程度的經濟的客觀競爭，也有某些原屬軍、政統治體系的特殊階級的外省人，轉入了當地社會的生產隊伍。省籍的界綫就不再那麼明顯而尖銳，而是穿孔交流了。

## 台灣資產階級的出路

載：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知識份子與中產以上的階級，確是相當致命的打擊，犧牲的人才不少。對生存者而言，三七五減租以及土地改革的衝擊也很大，我們可以由具體的實例來整理。如果以傳統的觀念來看，辜顯榮、辜振甫父子都該算是漢奸，據傳辜振甫在光復當時，曾捲入日本軍人搞台灣獨立的旋渦裏，二、二八時他逃到香港去一段時間。但是，後來土地改革，以四大公司的股票向地主換取土地，大家都知道，當時四大公司的股票只有水泥公司的才賺錢，而水泥公司的股票，最後正好是讓辜家、林本源等，最有力量的台灣資產階級來集中和控制，他們因掌握了實權重新發跡。當年的吳三連並沒有什麼資產，他在日據時代抗日政治運動中的貢獻，使得他成爲極有聲望的知識份子，當時他也得到美援棉花而開始發展台南紡織財團了。我們不易找到確實根據來斷定國民黨或美國當局當年的動機，但由結果來探討，發現是有相當代表性的資產階級或知識份子都被編列到經濟開發的體系中去。而且，做爲圍堵中共的戰略要點柱石之一小部份。軍糧供應的穩定，金、馬等軍事基地建设所需之水泥，這都與土地改革之實施，水泥公司之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他美援所扶持的民生工業，還有麪粉、紡織、塑膠等等，台灣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就這麼起來的。相對的，大陸籍的資產階級，却少有恒心積極地加入台灣的長期經濟開發，他們可能對國民黨缺乏信心，對台灣的興趣也不大，多半在台灣停留一下，以後就將資金外移轉到美國、香港、南美洲或南洋等其他國家。所以說，不管是不是巧合，美援在台灣所栽培的，確是一批台灣本地的上層資產階級。而這



些台灣資產階級在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後，可能對政治也相當恐懼，他們把所有的精力向經濟方面發展，也終於找出一條出路。當然，其中也有要求政治上有更多發言權的，高玉樹、李萬居等人跟雷震搭配組織在野黨運動，就是反映了這一股力量。透過胡適之得到美國的支持，曾經有一些發展，但是後來還是不能為國民黨的保守勢力所容，雷震終於下獄。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在台灣地方政治上不可忽視的醫生階層。台灣的醫生界在日據時代曾以蔣渭水、賴和為代表，在抗日政治運動中相當活躍，扮演了不少正面的角色。光復後，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醫生也不少。到了五十年代，政治權力、參與的轉型，最主要的就是國民黨對地方政治放手，開網於一口，好使有關人士有一出氣之孔。讓當地人去搞派系。而抵消了一部份反抗體制的「抗力」。

因而，地方上可能有政治權力要求的，像醫生這一類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多少有了出路，ENERGY 自然而然地有了消散之處。剛才您提到，如果歷史凍結在二、二八事件後的 TIME TUNNEL，可能會發生更大的政治、社會上的摩擦，但是這一轉換，把社會政治矛盾都緩和改觀了不少。

### 中央政府與法統的強調

李：你談到了非常關鍵性的問題，我認為台灣在六十年代以後，政治上最大的轉變，就是產生了中央政治與中央政府，地方政治與地方政府的區分。決定政治的不一定是「政策」，有時候客觀條件的影響更大，人口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光復當時台灣的人口是六百萬，到了八十年代是一千八

百萬，三十年來人口成長爲三倍之多。通常三十年成長爲兩倍已經很高了，由此可見，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的大陸籍人士對台灣人口成長的貢獻！我們再以西方古典殖民爲例來探討，就會發現，當殖民者決定在殖民地安頓下來時，殖民者人口較多的要比人口較少的壓力更大，就像南非、阿爾及利亞都是歐洲殖民者人口較多的殖民地，正因爲他們人口多，要求安定與控制力的壓力也就更大。因而我們可以推論，當五十年代後期以後，國民黨自知不可能反攻大陸時，又面對著十年來大陸籍人口的膨脹，其要求安定，要求絕對地控制的壓力必然地也隨著變大。尤其，當經濟與社會開始有所變化，大陸人與本省人開始有了交流以後，要保持社會安定，統治力量必須很強，「中央政府」與「法統」的強調也就益形重要，因而，「反攻大陸」的政策雖在五十年代後期已不得不實質地放棄，但是一直到六十、七十年代，「反攻大陸」這個口號却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階級問題，雖然一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因爲分工與分配，階級一定會產生的，台灣的確是明顯而快速地在產生階級的兩極分解化，但是國民黨却完全避開階級觀念，而以「法統」與「省籍」做爲統治的兩個基本原則。所以，我認爲在五十年代，台灣確是有強烈的省籍問題，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界綫清清楚楚，是絕不會與社會階級混雜的。到六十、七十年代，省籍問題的存在却是政策上的需要，原來是社會自然形成的，後來則是人爲的，因爲要強調「法統」，就一定會加強省籍面的政治提法，然而惹起省籍矛盾的問題……。

戴：因爲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大部份是大陸時代選出來的外省人士，「法統」的強調必然得根據省籍背景，如此一來，當然無意中亦給省籍矛盾加油添醋……。

李：對。那麼，我們相對地看七十年代興起的黨外民主運動，雖然表面上談的是民主、是參政或選舉，其實就是圍繞著「法統」的問題。黨外運動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有了一個主題，而且這個主題甚至還包括了「省籍」的矛盾問題。國民黨對高雄事件的反應，爲什麼那麼緊張呢？過去她自己藉省籍的分界來避開階級問題，但是，黨外運動興起後，非常明顯地，「省籍」問題轉而成爲黨外手上一張運用自如的王牌了……。

### 黨外支持者的階級背景

戴：而且，黨外能隨心所欲控制省籍問題，國民黨却只能藉省籍問題來保衛「法統」，無法控制省籍問題的焦點突破圍困。下面我想補充一點，分析黨外支持者的階級背景。由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這段經濟上高度成長的時期中，教育普遍地提高，經由土地改革和美國經援所栽培的一批本地資產階級出現了。台灣社會也在激烈地變動中，其中最爲顯著的是最上層和最下層兩個階級省籍問題的淡化。上層的，因爲經濟發展的需要，本省人與外省人有了交流，像水泥公司或幾個大銀行都請許多外省已退休的高級官僚當顧問，也有通婚的。而下層的外省人，像退除役軍人們爲了生活只能溶入台灣本地的下層社會，結婚對象也是高山族或貧苦的工、農人家的婦女們。

李：外省人本身的階級極端分解化了。

戴：對。所以說最上層和最下層階級的外、本省人已經站在一條綫上。剩下的是中間的，始終浮游不定的中產階級，他們在經濟、教育方面有了提升後，對政治上的缺乏發言權，自然有相當的不滿。

所以我認為，這一部份中產階級是支持黨外強有力的階級基礎，同時也是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力量的重要來源，還有反共的長老教會，以及其他基督教會人士，也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那麼，海外的部份，在一九七二年承受了中共與美、日關係激變的大衝擊，造成主張台灣民族論並着重尋求美、日支持的第一代台獨運動領導人廖文毅、邱永漢、辜寬敏等人相繼返台，向國民黨投降。這就充分說明了，民族矛盾的理論實在只是一種假象，並無實際的社會經濟基礎。但是，這之後，美國的台獨運動反而興起了，這是代表新興中產階級的年輕一代，這部份哲夫兄也曾經有過參與，可否請你分析一下？

## 台灣結、中國結與美國結

李：哈哈！這個分析起來很有意思的。上面我們討論的，已經很清楚地分辯了五十年代所產生的「民族意識」或說對時局的反應，而產生的「民族」的要求，與六十年代所產生的是大不相同的。六十年代以來，確如你剛才提到的，上層的與下層的幾乎沒有了或淡化了省籍的問題，只有中間的，要往上層沒有可能，往下呢！當然自己不願意。正好，那個時候國民黨開放了留學生政策，於是，大量的中產階級子弟到了海外。你剛才要我分析這些人，我想這些人是在幾個失望下所產生的，他們可能帶著比五十年代的「台灣結」更嚴重的情結在參與政治運動。怎麼說呢？第一、他們對國民黨當然失望了。第二、老一代的台獨運動者也令他們大失所望。第三、對中共，他們從未有過寄望，這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教育中，中共從來都是不許碰觸的、不能想像的。因此，他們實在是

毫無去路的，只有選擇「美國結」，寄希望於美國人。今天，在海外可以看到的很多台獨運動的言論中，這種美國情結是表露無遺的。

更進一步深思，我們會發現，這個「美國結」，其實是整個六十年代的產物，實在是不分省籍的。「中國時報」就是一個外省籍的「美國結」代表，他們的經驗與台獨運動人士的經驗，其實是很相近的，只是他們雙方都繼承了傳統的「省籍矛盾」，因而尚無法合作。但是，某一天，如果利害一致超越了傳統的省籍矛盾，合作是很有基礎的。而且，這樣的合作也是台灣當局以及一部份美國政客所期待的。台灣的省籍或民族問題演變至今，實在很難界限於台灣人與國民黨之格局內來討論，探討到某一層次就必然要碰觸到帝國主義的問題。前面已經談到，六十年代國民黨之所以能夠在台灣維持政局，是因為背後有一個真正的殖民者——美國。這個矛盾要探討下去，也就不能局限在台灣島上來談，也不能在省籍上繞圈子，事實上，六十年代後期以來，利益的分界綫就不是省籍了……。

戴：但是表象還是省籍的。不滿現狀的「台獨」朋友，一直都把這個表象亦是假象當做「真象」，來做他們的「情緒戰」……。

李：表象是歷史原因，因為這些人無法克服歷史遺留下來的心態。但是，很多利害關係的估計、盤算，雙方却是一致的，譬如，年前大力支持美國賣武器給國民黨的不正是台灣同鄉會嗎？

將來是屬於新生代的

戴：最後，我們是否探討一下省籍問題如何能夠克服？而不致於演變成法西斯的鬼胎。就社會學的範疇與理論上，哲夫兄，你認為有沒有「出口」呢？

李：國輝兄，你給社會學出起問題來了，我倒覺得今天的談話受你這歷史學家指引的較多呢！哈！話說回來，社會是發展的，歷史不會停留在五十年代，當然也不會停留在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雖然，目前人們都把焦點放在 ESTABLISHED 的一代，但是將來是屬於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新生代。對年輕人我比較樂觀，至少近來在新生代所辦的黨外雜誌，已漸漸可以看到超越「島國意識」的世界觀，可以看到很多不同觀點的文章，雖然有的相當激烈，但這是一種求變的表現，還是可喜的。看這種發展，應可期待他們突破省籍觀念的局限，揚棄歷史的包袱，而以開闊的視野與胸懷去研究台灣本土的根本問題。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三十多年來知識壟斷的局面正逐漸在被打破。國民黨在台灣統治，除了政治上集權外，知識的壟斷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礎，五十、六十年代的年輕人，都是在知識壟斷下受教育、成長的，因此我們看到他們在感情上反抗，却無法在文化上、在知識上反抗。七十、八十年代的年輕人不同了，他們開始要求知識的自主權，國民黨說不准讀馬列，不准讀三十年代的文學，年輕人就偏偏要讀……因此，我想『台灣與世界』這個雜誌的出現，應該也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正好這個時候，新生代普遍要求突破知識壟斷，對台灣問題也有不同的評價，也理解到台灣的問題不能只局限在台灣一島來談，必須要放到國際社會、世界的以及全中國的觀點來看待。

戴：關於知識壟斷的問題我有兩點補充一下。首先說以前國民黨為什麼能夠壟斷？五十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的經濟基礎還不穩，而且又害怕共產主義滲透到台灣來，所以，當然要控制思想、知識。過

去老一輩台籍人士是透過日文接觸世界思潮。光復後年輕的不再具備日文的能力，也還很難透過英文接觸思想性的書籍，而中文書籍國民黨就很容易控制。但是，隨著經濟的成長，台灣與世界的來往漸漸頻繁而打開了孔道，還有香港、東南亞的僑生對突破知識壟斷也有相當的貢獻。六十年代以後留學生多了，也有回去的，又開放觀光了，所以國民黨要再持續知識的壟斷實在是很困難。人的來往，語文上能看英文的年輕人都逐漸增加，慢慢地形成衝破壟斷局面的動力。最近我看到『暖流』（台灣黨外康系雜誌）上有一則消息，說是各大學附近的書攤有很多三十年代的文學書籍出售，且非常暢銷。因而康寧祥提出質詢，要求國民黨開放有關書籍。

最後，我談一談對年輕一代的期待。前面我也提到我對省籍問題的憂慮，擔心省籍問題被「台灣民族」論者無限上綱，擴大成民族問題，變成排外「種族」意識，而把台灣帶到法西斯的窄路上。然而，我這次來美訪問遇到一些香港、東南亞的華人留學生，有的以前在台灣唸過幾年書，有的也沒有，但他們對台灣的政情與前途很關懷，對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大力支持。也有一些外省籍留學生，認為國民黨太不起台灣人，而帶著一種原罪感在支援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只要台籍的年輕人，能放眼世界克服自己的「小格局」，與上述一批年輕人合作，是可以給台灣吹進新的風氣的。我又碰到一些富有朝氣的台灣青年，我感到台灣的年輕一代是有希望的，他們難免還要帶著一點歷史的傷痕與歷史包袱，但是大方向上需要他們去努力自我超越，而我也相信年輕的一代是能夠自我超越的。我們正在期待著。

李：僑生對台灣的關心，我也有一些個人的體會，的確非常感動人。他們有的甚至從未去過台灣，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不僅僅關懷、支援，同時還有無限的嚮往，這可能與他們本身的殖民地經驗有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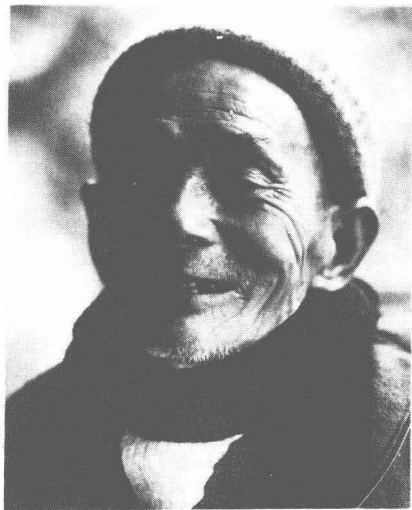
！然而，他們的關懷、支援並不會得到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家們的接納，但這也無妨，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原是凍結在六十年代以前的心態，從來不曾與台灣的歷史與社會的發展一起成長的，這是華僑界的普遍現象，沒有辦法。

最後我再補充一點，如今，台灣要求知識不再被壟斷的現象相當地普遍，也不僅限於本省人或外省人或民主運動的範疇了。譬如前不久，台灣在討論「社會學中國化」的問題，可見認識的要求，已不再限於對科技的生產及控制的認識，還擴大到自我解釋、自我認知的要求。今天，台灣的年輕一代還面臨著如何解釋自我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不僅僅台灣島內的年輕人，海外的、港澳的、甚至大陸的年輕一代，都普遍關心這個問題。他們不僅要求掌握科技控制的知識，對自己的存在、對世界的情況都有認識的要求。因而，我更相信台灣的新生代是有希望的，雖然他們仍然多少會帶著歷史的傷痕，但這個歷史的傷痕在他們身上將成爲一種警惕。而且，如果省籍是問題，他們就會首先面對這個問題，會先搞清楚彼此到底是誰？他們不會再任人指使，告訴他們「你是台灣人」「你是中國人」……只要新生代能夠突破、能夠超越，民主運動必能提高層次。



# 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

——陪內村剛介訪談楊逵於東京



楊逵先生，攝於八二年馬利蘭州。

這個訪問紀錄，是由日本河出書房新社出版的『文藝』雜誌社所主持，禮聘上智大學的內村剛介教授，和立教大學教授戴國煇博士，採座談會方式，編輯而成。全文刊登在一九八三年一月號日本『文藝』雜誌。

內村剛介教授，本名內藤操，一九二〇年出生於日本栃木縣，畢業於偽滿哈爾濱學院，日本戰敗後被蘇聯軍逮捕，坐了十一年的史大林監獄。一九五六年釋放歸國。現任教於上智大學。著作甚豐，

為研究蘇聯現代文學及思潮的日本人權威。

楊逵先生以一位歷史的見證人，傑出的台灣作家，五十年來，首次重踏他青年時代的舊遊之地。在此，他追憶少年時代的往事，青年時代的歷程，與日本左翼文壇的關係，以及他的文學活動、農民運動，和生命中的逸事。他以精確的記憶，平靜地娓娓而談，雖歷經千古的不平，却沒有半點怨尤。

我們看到了這位不食周粟的堅貞之士，為民族氣節所受的挫折，他的人類愛，帶給他的苦難，以及他對理想、原則的追求。在在為台灣的歷史，做出了見證，充滿耀眼的淚和光，照亮了我們的旅程。

陳中原 一九八三·六·十一：東京旅次

## 日本統治下的少年時代

內村剛介：楊逵先生這次是別後五十年，首次重來日本訪問的吧？你是應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邀請，訪問美國，歸途順道來日本的，聽說，台灣的國民政府這次終於批准你的出國申請，並發給你護照，是真的嗎？

楊逵：是的，這次愛荷華大學的企劃是邀請了以第三世界為主的二十八個國家的作家，來參加集會，日本也去了許多人。我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從台灣出發，到美國約逗留了兩個月，去各地打個轉，到達日本是十一月一號，我準備在十五日，也就是星期天，回到台灣去。

內村剛介：楊逵先生的名字在日本，就是所謂「知道的人才知道」，也就是，除了少數人，其他的不知道楊先生的存在，並且，看來好像只限於「戰中派」（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成年的。）以

前的那些上了一點年紀的人才知道你的大名。這是因爲日本戰敗後，已歷經了三十七個年頭了，那麼現在三十七歲的人，可以說是屬於對戰爭茫然無知的人，因此之故，現在日本看文學雜誌，二十多歲、三十多歲的人，他們對楊先生的名字是了無所知，實在是莫可奈何之事。現在，假如是有關中國大陸的事情，我們多多少少還有些知識、有些接觸消息的機會。但是，對有關台灣的事情，則在學校也沒法學到，報導機構除了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之外，向來不留意。爲此，對於有關台灣的事物，就愈來愈不清楚了，日本目前的情形，我想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就拿我個人來說吧！對楊先生的事，也僅僅知道一點點皮毛而已。比方說，我知道楊先生的小說「送報伙」在戰前左翼文藝雜誌『文學評論』一九三四年十月號，是以入選第二名刊載出來的。依此，楊先生也是最早登上日文壇的台灣作家。此外，日本戰敗之後，在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在一九四九年，楊先生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在監獄中渡過了漫長的十二年之久。我只知道這樣程度，只知道這些事情。

總之，我認爲今天真是一個難逢難遇的機會，想借此一機會，來充分向楊先生請教。希望借助你的發言、你的指教，給予日文壇有關人士，尤其是那些「戰後派」的人士，充分了解你的文學、你的時代、你這七十七年的歲月。台灣出身的戴國輝先生將以不同的角度來提問題，他同時也會對有關台灣的風俗、習慣、歷史、人物，我們日本人不了解的，而在楊先生的談話中出現的，由戴博士來加以分析，加以說明和補充。

戴國輝：好的，我明白了。我個人對於楊先生的大名，以前就知道了，而見面却是他這次來日本以後的事。

內村剛介：根據我現在手頭上的年譜，（河原功著「楊逵——他的文學活動」，『台灣近代代史研究』創刊號，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一九七八年四月，東京發行。）楊逵先生是一九〇五年十月出生在台灣南部台南州的新化，也就是出生在所謂締造了台灣殖民統治的基礎的兒玉源太郎總督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時代。在那整整十年以前的一八九五年，當為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頭一年。馬關條約以後，日本調動了五個師團的兵力，把台灣全島的抗日武裝力量瓦解解掉，軍事佔領了全島，這就是日本在台灣五十年殖民史的開始。有關當時的情形，你是不是曾經從你父母那裡聽到過些什麼？

楊逵：是的，從我父親那裡，我聽到過。那時的日本軍是從基隆那邊登陸的，先佔領台北，然後才逐漸南下，到我的故鄉來的是北白川宮（註：皇族出身之軍人）率領的近衛師團，當年日本軍來的時候，我的父母都跑到山中隱藏起來，我家前面有一個望族，是個地主，他的莊園，聽說北白川宮住過，然後他南下到了台南，在那裏，他終於死掉。

內村剛介：楊逵先生你家過去也是地主嗎？

### 體弱多病的阿片仙

楊逵：不、不是地主，我父親是一個錫匠。用錫做成燭台、食器，還有別的用具。我排行第三，長兄在糖廠的試驗場做事，老二給別人做養子，當了醫生，後來因事自殺了……。我是最小的，成爲這樣（註：參與各種運動）的一個人。總之，我父親的手藝就沒有人承接下來。現在，在我的家鄉新化，我們連一個親族都沒有，我們楊家在那裏本來就不是一個大家族。



刊載「送報佚」的『文學評論』  
(一九三四年十月號)。

戴國輝：楊先生，聽說你小時候體弱多病，是嗎？

楊達：是的，我老是生病，就是體弱多病，公學校我上得比別人都遲，普通七歲上學，我却拖到九歲。那時候，朋友給我取了一個外號，叫「阿片仙」，日本話就是「懦弱鬼」的意思。在新化街的郊外，有一個虎頭山，山下有一個清澈的湖，小時候，我經常在那裏釣魚啊！游泳。

內村剛介：公學校是什麼？

楊達：台灣人的小孩子上的叫公學校，日本人上的才叫做小學校。

戴國輝：這個須要稍微說明一下，在當時的台灣，是被強迫使用日本話的，爲了學習日語的必要，日本當局給台灣人的孩子們另外設立了公學校。

楊達：在我小時候，有一種說書的賣藝人，常常跑來講三國志啊！水滸傳啊！他們常在街上的廟裏賣藝，我很喜歡，常常去聽。還有鄉村戲、木偶戲，或布袋戲。

戴國輝：我在這裏又得說明一下，台灣總督府以後連那種中國傳統民間藝術都禁掉，這是怕與回歸祖國運動發生關係的緣故，因此我說，在楊先生的少年時代，日本人對台灣的控制還沒有那麼緊，相對的還算是比較自由的。

## 讀了『台灣匪誌』大起反應

楊達：我進公學校的那一年，發生了西來庵事件，那年我只有九歲，所以，詳細的情形，我不清楚。只記得有許多許多日本軍隊，用車子拉著大炮，由我們家門口的大路上通過，那時誰都怕惹上麻煩，家家戶戶都把自己的大門緊緊地關上，躲藏在自己的家裏，我却用手抓住門門的橫木，從門縫中，屏息閉氣，偷看日本兵的行軍。

戴國輝：所謂西來庵事件，發生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可以說是台灣的漢民族最後一次的武裝抗日起義，領導人余清芳、江定等人，聚集在虎頭山，據險而守，繼續抵抗。總督府因為僅靠警察的力量，無法鎮壓下去，竟出動了擁有炮兵的軍隊，進行殘酷屠殺，才總算把起義鎮壓下去。楊先生小時候所親眼看到的那一幕，我想就是派去攻擊虎頭山的日本炮兵隊。西來庵是在台南市內的一間廟，相傳余清芳是在這一家廟裏策劃起義的，等到這個武裝抗日起義被鎮壓之後，日本採取了殘酷嚴峻的制裁和報復。當時，被逮捕的，有兩千人之多，其中八百人，在特別設立的臨時法庭，被判處死刑。楊達：那時我的哥哥被徵調去當軍伕，幫日本兵搬運彈藥糧食，他回家以後，把事件的種種情形告訴我。日本軍把抓到的台灣人拿來審問，如果承認自己與事件有關的，就交給警察，送到臨時法庭，如果是否認與事件有關的，則就地把眼睛蒙起來，排成隊，日本人事先挖了一個大坑，一個一個用日本武士刀砍頭，以後用腳踢到那大坑裏頭去。這事件，我家附近有人參加，許多可怕的話，我都聽過，印象特別深刻，至今也還留在腦海中。以後我上了中學，成爲中學生，看了許許多多小說

和讀了各色各樣的書，其中有一本，是日本人秋澤烏川寫的，書名叫『台灣匪誌』，他把西來庵事件寫成討伐「匪賊」，那明明是對迫害的一種反抗，為何竟是討伐「匪賊」？誰才是真正的「匪賊」？我產生了強烈的疑問。

戴國輝：秋澤烏川在台灣是吃警察飯的，搞這一行的。「台灣匪誌」這本書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由台北的杉田書店出版的。

楊達：一八九六年，也就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的第二年，他們制訂了所謂「六三法」。依據這一個法，台灣總督可以不受明治憲法的約束，可以在台灣公佈與法律有相同效力的命令，也是依據這個六三法，再頒佈嚴厲的「匪徒刑罰令」。凡是集會結社，甚或對於日本的統治表示有所異議的，通通可以任意以「反逆罪」論處，判以死刑。

總之，我看過這本『台灣匪誌』之後，產生極大的疑問，我認為那種歪曲的歷史應該予以矯正，真實的事情，想通過小說，把它寫出來，我產生這種想法。

內村剛介：根據年譜，你十四歲時，親眼看見一個曾經受到你父親的照顧的小販，在新化街上，因為芝麻小事，給日本警察當場打死。年譜說，你當時受到了極大的刺激，是這樣嗎？

楊達：是的，這個人叫楊傳，是個單身漢。警察正在取締站在路上做買賣的小販，而楊傳是個流動小販，正好有客人喊他，他便站著賣東西，惹火了這個警察，動手就把他打死。現在想來，那個警察當時未必真要致他於死地，可是那時我是個小孩子，我是非常悲痛難過的。

戴國輝：在公學校時，有一個日本人老師，對楊先生特別愛護過的吧！

## 晚上猛讀書，上課打瞌睡

楊達：是的，他是我五年級以後的老師，叫做沼川定雄，他剛剛從學校畢業不久，大約才只有二十一、二歲，當時還沒有結婚。他對我很好，常對我說：到我家來吧！我就常常到他家去玩去。到了沼川先生的家，又可以在那裏吃飯，他書很多，又可以讓我隨便看。我也常常在先生那裏過夜，不僅這樣，他還教我代數、幾何、英語，還有別的，凡是基本學業，他什麼都教我。沼川先生後來當了台北一中的老師，這是我後來聽說的。

內村剛介：你就像得到了一位特別的家庭教師，對不對？

楊達：真是這樣啊！託他的福，我進了中學以後，幾乎沒有什麼可學的，我每天通宵看書，上課時，我就打瞌睡。碰到沼川先生，使我對日本人的看法，大有改變。日本的某一些特定的人，比方說警察，那些人有欺負台灣人的，但是，也有在我少年時代，這樣愛護過我的人。沼川先生是對台灣人沒有絲毫優越感的人。

內村剛介：你進了中學以後，應該是和日本同學一起唸書吧？

楊達：是的，但事情並不完全如此。台灣以前有台北一中、台南一中等中學，而這些學校是以收日本學生爲主的，台灣人是很難進去的。在我公學校畢業時，在各地新設了二中，我當時考進的學校，就是這時新設的台南二中，由於這種原因，台南二中的學生多是台灣人，在一個學年一百個學生之中，日本學生只有六、七名。相反的，在台南一中，幾乎全是日本人，當時，台灣人的「共學生」



，（註：在日本人爲主體的小、中學，與日本人同窗的台灣人學生叫做「共學生」）我想大約只有二、三名吧！

戴國輝：楊先生就這樣開始過著，白天打瞌睡而晚上拼命亂看書的生活啦？

楊達：是的，是的。我白天都在打瞌睡，學校當局大概是諒解我的性格，對我不曾干涉過。有一次，代數老師笑著這樣說：「這個班上有個英雄好漢。你們上代數課有人打瞌睡，我不足爲奇，但是，有人在輪到校長上修身（註：公民）課時，也一點都不在乎，照樣悠然見周公去，他不是英雄好漢是什麼？」這就是指著我說的。

內村剛介：你讀些什麼書呢？

楊達：日本的舊小說我沒讀過，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白樺派的作品，我全讀過。還有，當時日本



『弱小民族小說選』（1936年刊）

對外國文學的翻譯，盛極一時，對於外國文學，我最初是靠查字典，看英文本，但是，看日文譯本來得快，又方便，所以……。俄國文學我是喜歡的，主要我看的是十九世紀的東西，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柯里里、托斯多爾夫斯基。法國文學，我看的是大革命前後的東西。英國是狄更斯，而最受感動的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總而言之，那些揭發舊社會的黑暗，描寫人們對老套習俗的抗議與反抗；同情在那種社會矛盾以及下層社會裏，過著悲慘生活的小人物們，

那樣的作品，我特別以感動的心情來讀它。

### 逃避童養媳赴日留學

內村剛介：這就是所謂文學青年楊達誕生的過程吧！我想你讀過俄國文學作品，這點和日本的文學青年相彷彿。但你連狄更斯也讀過，這確是我沒料到的事，這點是與日本人大異其趣的。比方說，托斯多爾夫斯基最愛讀狄更斯的小說，但是，日本文學青年即使讀托斯多爾夫斯基，也很少讀到狄更斯的書。

楊達：那時候我是碰到什麼，就讀什麼，並不是有一個系統的讀法，覺得有趣，我就讀，沒意思的，就丟在一邊，並不是所謂的研究，而是爲樂趣而讀下去的。

內村剛介：就那樣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九歲那一年，楊先生從台南二中中途退學，來到日本的。那時候，你是因爲在思想上有著某種矛盾，同時，也對日本，那樣一個陌生的廣大世界，存在著內心的嚮往吧？

楊達：不錯，是那樣子。在那前一年，也就是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發生過關東大地震。另外有一件事，那時正是大杉榮（註：日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家人，被一個名叫甘粕的憲兵上尉殺死，屍體全被投到井裏去。我那時讀到新聞的報導，給我內心的衝擊，至今還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從那時候開始，我在思想上不得不思考到一些似乎是「多餘」的事物上去。大杉榮的書，那時我大概已經看過一本或是兩本，我到東京以後，最先讀的書也是大杉榮的著作，那以後

是巴克寧，以後才是克魯泡特金。當時，馬克思主義逐漸盛行起來，那種所謂盛行，又像是一種時髦，我很自然的像被捲進旋渦那樣，閱讀起那一方面的書了。

然而，我之想要到日本去，也有另外一個理由，我家本來就有一位童養媳的姑娘，這使我精神非常痛苦。

戴國輝：這裏我要稍微說明一下，所謂童養媳，簡單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父母給兒子在未成年以前就決定下來的婚事也就是新娘候補小姐。昔日在中國，要娶成年的新娘子，要花很多錢，爲了省錢，又多一個勞動力，一個有兒子的父母，在自己的兒子很小的時候，就從別人家裏要一個小女孩子來當養女，到他（她）們長大以後，就結爲夫婦。這個小女孩子就叫做童養媳。在朝鮮也有這種風俗，魯迅、郭沫若也爲童養媳的事非常痛恨過，楊先生就是爲了逃開那童養媳，逃到日本來的。楊先生，你當初來日本，是瞞著父母，逃走的嗎？

楊達：不，不是。我決定要來日本的事，曾經使我母親非常悲傷過，但她因爲我父親已經答應了，就什麼也沒有說過。我的鄰居有一個男的是台北工業學校畢業之後，升入東京高等工業的，剛巧他暑假回家渡假，我從他那裏聽到種種的話，突然心血來潮，決定要到日本去。到了東京以後，沒費什麼心，因爲那位東京高等工業的老兄已經給我安排好好的。那時從基隆搭船經過九州的門司，到神戶登陸，由神戶到東京，改乘火車。時間好像是九月間，到了東京，首先見到的是那些大地震以後的痕跡斑斑，嚇了一大跳，建築物大部份都倒塌了，從火車站放眼看去，大樓只留下一丸之內大樓」（譯註：當年東京火車站前的第一大樓）和帝國飯店是好的，其他的大型建築，全都不見了。

內村剛介：原來如此，楊先生你到東京來之時，正是普羅文學勃興之際。現在，讓我們把歷史、時間

稍微整理一下來看。楊先生來日本前一年，大杉榮被殺，再前一年，日本共產黨創立，更前一年的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所以，楊先生可以說是趕上風雨欲來，百事具備的情形之下，來到  
日本的。

楊達：大概就是這樣的情形吧！我對當時的雜誌，像『文藝戰線』、『戰旗』，就像這個戰字一樣，  
狠狠、拼命讀下去。

戴國輝：你家裏完全沒有給你寄生活費嗎？

楊達：有，有一點接濟，我自己抱著自力更生的意志，沒有向家裡要求什麼，雖然如此，在父母看來  
，還是放不下心的。最先我租民房住的地方，在荏原（譯註：現東京都品川區）的碑文谷，那個時  
候，那邊全是鄉下。反正不做工就沒飯吃，我來以後，馬上就開始做土木零工，或是送報。第二年  
，因為我的學歷是中學肄業，就參加檢定考試，考取了，然後再考進入日本大學文學藝術科，當時  
的日大是只有夜間部的專門學校。那以後我白天做工，晚上上學，過的是苦學的生活，當時我已搬  
到目黑區去住。

### 「專檢」考試合格・加入前衛演劇研究會

內村剛介：原來你是檢定考試及格的，你是專檢吧？

楊達：不錯，是專檢，考場在小石川（註：現時的文京區）的學校裏。

內村剛介：真是了不起啊！所謂專檢（專門學校入學資格檢定考試）是非常難考的一種檢定考試，連

專檢你都可以通過，那你必也可以考取全日本最難的學校，一高、東大。

戴國輝：特別是台灣人在日語方面，具有語言方面的困難，這就更難上加難。

楊達：我不過是運氣好，然而語學方面，我那時是有自信的。

戴國輝：日大上課的情形，你還有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

楊達：昇曙夢教俄國文學史，他的課，我從不缺席。日大的老師在我腦筋裏頭留有印象的，僅此一人。內村剛介：那你和日本作家之間的往來，是怎樣開始的呢？

楊達：剛到東京時，我沒有和他們往來過。和同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也僅止於進行組織讀書會，讀些左派的書，然後大家一起討論而已。大約是在日大入學以後一兩年的時候，佐佐木孝丸（譯註：日本著名戲劇運動的領導人）在他自己家裏開「前衛演劇研究會」，我也參加了。千田是也（譯註：日本著名的劇作家）剛剛從德國回來，教給我一些演劇的基本訓練。

戴國輝：楊先生你也當了演員？

楊達：不，我演的只不過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角色，像演路上的行人啊！一些最起碼的角色，而多半我是擔任舞台佈景，後台方面的工作。在那裏，我才和日本作家相識起來。秋田雨雀、島木健作、窪川（佐多）稻子、葉山嘉樹、前田河廣一郎、德永直、貴司山治，這些所謂普羅文學的作家們。那時，我也向雜誌投稿，東京記者聯盟辦的雜誌「號外」，一九二七年九月號登了我的「自由勞動者的生活斷面」，當時不是用筆名楊達，而是用原名楊貴，是用稿子十五張的短文，領到稿費七圓五角，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弄到手的稿費，真是高興極了。

戴國輝：那是小說嗎？

楊達：詳細內容我已經忘記了，是對自己生活經驗的平鋪直述，可以說是「一種報告文學的吧！」

內村剛介：中野重治你會過沒有？

楊達：會過，我在一九三七年又再來一次日本，所以，在時間上，是我第一次來留學時會過呢？還是以後那一次，詳細時間我忘了。中野重治主要是問我台灣的種種情形，是他對我提出質問的，我們有過很長的一段談話。他是一位誠懇、沉默寡言，又給人有信賴感的人，但德永直就不然，他和我見面時，緊張兮兮的，他的膽子太小了。

內村剛介：中條（宮本）百合子你會過嗎？

楊達：會過，中條百合子也是一位堅定可靠的人，和我碰面時，大概是因病從牢裏保釋出來的，當我去拜訪她時，我記得談到的也是台灣的情形，當我告別時，她送我拾塊錢。『星座』的編輯長也送過我拾塊錢，我很感激。此外，我至今還留有印象的是武田麟太郎，他那時非常走紅，因為紅，連載的文章很多。我到他那裏去的時候，許多報社的人，守著他等稿子，在那種情形之下，武田麟太郎却開口對我說：「我們，上銀座去！」就把等稿子的編輯們丟在一邊，我們上銀座散步去了。喝了啤酒，坐了地下電車，又到別的地方去喝酒。「武麟」真是一個豪爽的男兒。

內村剛介：你參加勞動運動的情形呢？

楊達：那是什麼契機我已經忘了，可能是參加了五一勞動節以後，就有了多方面的接觸了，我因為自己做工，參加了工會，評議會也參加過。

## ▲ 在東京的一段羅曼史

戴國輝：你在分租民房時，和那家姑娘發生的羅曼故事，以及在國會大廈建築工地差點送掉老命的事，也是發生在這一段時間的嗎？

楊逵：不，那姑娘的事，是在以前住在碑文谷發生的，那家姑娘在森永糖果工場（譯註：日本最大的糖果食品公司的工場）工作，大概是她的同事，一個朝鮮人對他有意思，常常送些巧克力糖給那姑娘，而她却把這些東西全都轉送給我。每天，她從工場回到家裏，就跑到我的房間來，纏著我，寸步不離。然而，也僅僅是這個程度的，淡淡的交往。不久，我就搬到目黑去了。她的芳名，至今我還記得，她叫做井上馨。也就是在差不多同時，我到調布的深大寺去的時候，却出了一次大洋相。有一天，我到附近的多摩川去游泳，游罷上岸一看，不得了。放在岸上的上衣、褲子和錢，全都給小偷偷走，我毫無辦法，穿著那條僅有的短褲襪子（譯註：腰纏布），一步一步，走回我住的地方去。

到國會議事堂的建築工地去做工的事，我想是在日大唸書的時候。那一次，我在很高的建築架上搬運東西時，風很大，把水泥刺到我眼睛裏去，沒想到我腳踩錯了地方，搖搖欲墜，正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同事用他的身子支持著我，不讓我掉下去，這才把我救了。當時，如果我掉下去的話，肯定這條老命立刻報銷。當年，在日本留學時，因為太窮，痛苦的事不勝枚舉，太多了。可是，那時我只有十九到二十二歲，是個年輕的小夥子，現在，即使那時所有辛酸的回憶，都變成那麼甜美，帶給我無限的懷念。

內村剛介：一九二七年，楊先生是接受台灣農民組合的邀請回去的，在那以前，你在日本受到首次逮捕，那是不是你參加了朝鮮人集會的關係？那次逮捕，會不會也是你回台灣去的一個理由。

## 參加農民大會被抓

楊達：不，這和朝鮮人集會事件毫無關係，那一段時間的事情說起來是這樣的，我當時住在勞動農民黨的牛込支部裡，在那裏一邊找掙錢的工作機會，一邊替他們貼傳單啊，幫點忙。在牛込支部時，鹿地亘（譯註：日本普羅作家之一，中日戰爭時期他投進重慶日本人反戰組織）常常來。朝鮮人集會事件是因爲有一件大事發生在朝鮮，逮捕了許多人，爲了抗議抓人，朝鮮人就在東京集會，地點是在本鄉東大附近的佛教會館。在那裏集會抗議時，牛込支部的勞動農民黨黨員日本人說要去支援他們，我也一起去參加了。當時，在開會之前已經「預備檢束」抓人，全體參加的人被本鄉（註：東京大學的所在地）的本富士警察署的警察抓去，我受到三天的拘留，却沒有刑訊，朝鮮人却都給警察抓到武道場去，用竹劍狠狠打了一頓。

次日，我被照了相，在肩頭掛著姓名牌，正面側面各照一張。我騙他們我叫楊健，他們就把那相片轉到各警察署去，目黑署的「特高」（譯註：日本特務警察「特別高等刑事課」的簡稱）不久就發現我說的謊。第三天，本富士的警察署長對我說，你的事情我很清楚，你參加文化活動的人，爲什麼要參加這種集會？我說：沒有工作，去找打工機會時，常有些集會，我覺得很有意思，就跑去看罷了。署長又對我所說的，大概頗能理解，調查完了以後，署長這樣對我說：你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我會照顧你，你再和我聯絡吧！然後叨擾他一頓炸蝦飯，平安無事釋放了。

內村剛介：台灣的農民運動有何特色呢？





昔年腳鐐手銬度蜜月，老來相互扶持的  
楊逵與葉陶。

台灣史研究／二一八

就是趕走居民，就是接收土地，因而產生種種糾紛。在我回台灣前兩年，「農民組合」運動才急速地發展起來，形成領導人才不夠的現象，他們再三邀我回去的原因就是這個吧！

戴國輝：台灣農民運動中，以同志的身份和你一起活動，以後成爲你的夫人——葉陶女士，那時是和你在一起嗎？

楊逵：嗯，是這樣的。葉陶比我早參加了農民運動，我擔任「台灣農民組合」的教育部長、組織部長時，葉陶擔任婦女部長。我是一個內向型的人，葉陶比較外向，很愛說話，演講也比我強得多，兩人的性格不一樣，反而有緣份。那時參加農民運動的女性，除了葉陶之外，只有四、五個人，所以說葉陶是台灣近代女性中的先知先覺者之一是不過份的。我只做了兩年農民運動，一共被捕八次，葉陶也同樣被抓。後來，農民運動的領導人簡吉與我的意見不合，我就離開農民運動，從此，我就到台灣文化協會參加活動。

### 坐牢渡蜜月

戴國輝：一九二九年你和葉陶結婚，在舉行婚禮之前，兩人雙雙被捕，是嗎？

楊逵：是的。那事情發生在一月，就在前幾天晚上，台南市總工會——日本叫做勞働組合，開大會，我和內人去參加，並且兩人都登台演講。不，那時還沒有結婚，不該叫內人才對。……（笑）當天晚上住在文化協會的支部，準備第二天一早就回新化的家去舉行結婚典禮。家裏也很慎重其事，都給準備好了，等著我們回去。不料天一亮，我們兩人都被捕，加上手銬腳鐐，從台南街上被帶走，我和葉陶，一男一女被拉在一起，街上的人看到這光景，都說這兩個男女是私奔給逮到的吧！我們後來才聽到這種笑話一樣的傳說。

這時是由當地警察署送到台南監獄，然後又送到台中監獄，共被拘留十七天。因為當時背後有台共的問題（譯註：日本當局正在大搜查、大逮捕有關台共人員），所以搜查網遍及全島，凡是黑名

單上有名字的人物，通通一齊逮捕。我是給扯上了這個問題，才被抓去。釋放之後，我才與葉陶舉行結婚典禮，這造成婚禮延期的十七天拘留；我那時對葉陶開玩笑說，那是政府給的「官辦蜜月」啊！那葉陶現在也已經死了，一九六九年六十六歲死掉的。

### 「送報伙」後半部被禁

內村剛介：那以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台灣的左翼運動也處於崩潰的狀態，在那一段時間，楊先生才再度從事文學活動的。是嗎？

楊達：是的，第二年一九三二年，我寫了「送報伙」登在『台灣新民報』上，後半部却被禁了。

內村剛介：那篇「送報伙」後來送到『文學評論』來，楊先生才正式登上日本的文壇。一九三四年這個時期，日本左翼文藝也在逆境中，可以說『文學評論』却是扮演一個強者殿軍的角色。

戴國輝：楊先生在前面稍微提了一下「六三法」帶給台灣政治的特殊狀況，爲了使讀者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我在這裏稍加說明。在台灣禁止刊登的文章，在日本却可以登，這個例子，說明了台灣與日本所適用的法律不同。在日本本國，不管好壞，當年至少還有明治憲法被適用。在一定限度以內的出版自由也有，因此之故，「送報伙」全文——包括在台灣被禁掉的那一部份，可以在日本的『文學評論』刊登出來。然而台灣總督府有絕對的權力，當時楊先生的作品被視爲眼中釘，無論如何，無法在台灣出版。

## 創刊『台灣新文學』

內村剛介：「送報伙」都是楊先生的親身經驗，原原本本寫出來的嗎？

楊達：是的。報紙分銷所的描寫，是我實際的經驗。主人翁的母親自殺的事，那是我參加農民運動目睹的事實，我把它寫出來了。

內村剛介：一九三六年，這篇「送報伙」經由胡風之手，譯成中文讓中國大陸的人也讀到，是嗎？  
楊達：嗯，譯成中文這件事，以後不料對我發生很大的作用。日本戰敗後，有許多從大陸來台灣的中國人，都來看我，他們都是透過胡風譯的「送報伙」知道我的名字，才對我的事情有所了解。

內村剛介：一九三七年六月、蘆溝橋事變爆發前一個月，楊先生第二次到日本來，這個時候，楊先生在台灣的文學活動，已經不可能，所以，你想要到日本來，尋找一個可能的突破口，我這樣推測，你想對不對？

楊達：正是如此。我離開最先擔任編輯的『台灣文藝』之後，在一九三五年底創刊了『台灣新文學』，費盡了氣力，一九三七年還是停刊了。我是六月到東京的，見了『文藝首都』，『日本學藝新聞』，『星座』等誌的編輯負責人，我對他們說明我們台灣作家希望得到一個發言的園地，我的話終於能被他們接受時，七七事變爆發了，什麼都搞不成了。

內村剛介：那時你見過『文藝首都』的主要負責人保高德藏沒有？

楊達：我在『文藝首都』的編輯室內見到保高先生，我還記得就在那裏碰到石川達三。七七事變之後，

，我當時被捕，所幸很快就獲釋。之後，我把在『新台灣文學』上登了一半被禁的「田園小景」一文改編，以「模範村」之名的小說，送給保高先生看，他替我介紹給改造社的『文藝』（譯註：為登載本稿的『文藝』的前身）。九月我便回台灣去。可是，十月二十號，這個稿子却退還給我。

內村剛介：楊先生爲了台灣文學活動的生存之路策劃奔走，到日本來，受到非言語可以表達的苦楚時，中日間的戰火由華北燃到上海，終於擴大成爲全面戰爭。日本也進入了戰時體制，思想控制的繩子勒得愈來愈緊，一步步走向蠻幹的路綫。那年十一月，中井正一，久野收他們辦『世界文化』那一批人，給逮捕去了。十一月，人民戰線事件發生了，在日本要發表楊先生的文章，變成完全不可能了。雖然如此，『文藝』的編輯却不能把你的文章「石沉大海」，良心上他應該把稿子送還，可是，進一步看，這退回原稿，也正表示楊先生的稿子放在東京是會有危險的，「退稿」這個行爲不外是表示了這個紅燈信號。

楊達：對的，沒有錯。所以，我一直把這個十月二十號的日期記得清清楚楚。

內村剛介：這樣的話，楊先生和那『文藝』編輯之間彼此的意思，在重點上是有過默契了。我這樣了解，不會錯的吧？

楊達：是這樣，沒錯。

戴國輝：楊先生因爲在日本太辛苦，回到台灣以後，肺病加重，不斷咯血，是嗎？

## 關於魯迅的追悼文



【小伙子，大家來賽跑，不爲冠軍，不爲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到自由、平等、和平快樂的新樂園。】——楊逵

楊逵：嗯，那時真是在困境中，『台灣新文學』發行時，工作過度，我和葉陶從編輯一切雜務，裡裡外外，全部兩人幹，咬著牙勉強幹下來，弄出肺病來，葉陶也病了。

內村剛介：楊先生親手創刊的『台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號有一篇沒有署名的「悼魯迅」，是排在「卷頭語」，我們先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不久之前，吾人因失去高爾基，悲痛猶新，今聞魯迅，痛於十月十九日，因心臟性哮喘病，辭別人間，文學工作者，在此

三個月之間，何其不幸，喪失兩位吾人尊敬之人……（中略）遙遠的黃浦江上，定是悲雲深鎖，表示深沉之哀悼。」

這篇沒有署名的悼魯迅文，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是楊先生的手筆（編按：本文刊出後，日、台兩地有數位文友示教，該文爲王詩琅先生執筆者，謹追記於此。），我想請教，你與魯迅之間，不管直接或間接，有沒有什麼關係，或是來往？

楊達：直接關係完全沒有，我和魯迅也沒有見過面。

內村剛介：一九二七年，魯迅在廣東，目睹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後的白色恐怖，後來逃到上海。那次以後，他到死都沒有離開過他住的上海日本租界。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就是，在上海那樣的环境下，魯迅當時的立場，和他與日本的關係，想肯定並且站在台灣老百姓的立場來發言，將會引起相當微妙的問題的。因此，對有關當時仍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其發言必會有所節制的，如果直接用口述，我相信他很慎重才對。況且，魯迅對台灣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有關台灣文學的問題，我不認爲他會不關心。爲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爲魯迅在還不到二十年代，來到日本留學時，就和他弟弟周作人，共同自費出版兩卷翻譯的書，書名叫『域外小說集』，而這一小說集的特色是，用周作人的話來說，收集選擇的作品概是偏重「被壓迫民族」的作家。魯迅本人，以後也對所謂「被壓迫民族」的文字，繼續寄予強烈的關心，這是普通爲人所知的事實。

楊達：確實如此。

## 「送報伙」首度譯成中文

內村剛介：把你的「送報伙」譯成中文的胡風，你見過嗎？

楊逵：我沒有見過胡風，以後才聽說，胡風當時是在慶應大學留學，他好像看過登我小說的『文學評論』。

戴國輝：胡風所譯的「送報伙」，頭一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登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世界知識叢書之二『弱小民族小說選』裡面。

內村剛介：胡風是魯迅的得意門生，特別是晚年的魯迅，胡風是他身邊很親近的一位年青作家。我們剛才說到的『弱小民族小說選』中，收集了楊逵的文章，其背後一定是受到了魯迅的影響的吧？我又有一個想像，就是魯迅的『域外小說集』與胡風的『弱小民族小說選』之間，似乎感覺到有某種「紐帶」存在似的。

戴國輝：讀魯迅的日記，可以發現一些台灣人的名字，但這些魯迅見過的台灣人，與楊先生毫無關係，因為那些人，都是所謂的書齋派人物，如果他們不喜歡住在台灣，他們就可以到大陸去，在那邊，偶爾去見一下魯迅自慰自慰的。而楊先生却是一位澈頭澈尾的實踐派人物，決不離開台灣亦抵抗到底的。

楊逵：但是，戰時想要離開台灣，我也沒有機會啊！我是一個被官方盯得緊緊的人嘛。

還有，我不知道這件事與魯迅有沒有間接的關係，對他，我有難忘的一段話，要插在這裏講：當我第二次由日本回台時，雜誌沒有再出版了，我又有肺病。平常我是，在文化活動的工作沒有的時候，我可以改行搞體力勞動的工作。現在却因肺病，激烈的體力勞動我沒法幹，這時，朋友就說，不如種花出售，又可以靜養身體，比較上，又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時間。但是，借土地的錢又無着落





(上) 鋤開硬土，讓幼苗生長，是楊逵一生致力的事業。  
(下) 楊逵攝於「國民地理雜誌」大樓內，1982年。

，那時，陷入毫無辦法的困境中，連米店都欠了二十圓的帳，因為無錢可還，被告到法院去，傳訊了好幾次。

## 入田春彥伸出援手

在這樣的困境中，竟有一個人向我伸出溫暖的手，這個人就是名叫入田春彥的日本警察。

有一天，「台灣新聞社」學藝部員（譯註：副刊編輯）田中保男陪著一個陌生的日本青年，到我家來。我和田中保男以前就很熟，原來那個陌生的青年是個警察，他讀過我的「送報伏」，很受感動，一定要見一見作者，就把這個心願託「台灣新聞社」學藝部員來實現。他們兩人特地帶來了酒菜。那天晚上，我們喝了酒，談得很愉快。夜深時，他們兩人就回去了。在臨別時，那個陌生的青年對我說：「這個，你拿著用吧！」居然交給我一百圓大款子。我用那一百圓，還了二十圓米店的舊欠，剩下的錢，就去租了二百坪土地，我的農園就這樣開始了。這位對於我，就像救主一樣，初次見面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做入田春彥。菜園子開始了，我把此園取名「首陽農園」。

內村剛介：原來如此，「至死不食周粟」，是嗎？你以首陽山上，至死不食周朝的糧食，吃蕨菜的野草而餓死的伯夷、叔齊，來勉勵自己，以他們的抵抗精神為精神，自己在中日戰爭中，堅守著民族的氣節。

楊逵：是的，假托這個典故，沒錯。然而，畢竟不是聖人，我並沒有餓死。

不久，這位入田春彥警察不幹了，常常來我家玩。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入田春彥突然被警察抓去，給拘留了四、五天，以後，命令他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不允許他住在台灣，驅逐他。出來不到幾天，我收到入田的便條子，一看，草草寫著「今晚七時，請來我處」。我準時到了他所住的地方

，從外面聽到他房裡發出苦楚的呼吸聲，我馬上發覺不對，飛奔衝到他房間去，房門上了鎖，從女管理人那裡找來鑰匙，奔進房內，只見他已氣息奄奄，人事不省。他好像正在做夢，一再喊我的大兒子「資崩」的名字。他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藥，有計劃的自殺。抬到醫院時，已經太遲了，第三天或第四天，入田先生與世長辭。

他留下遺書兩封，分別給我和我內人，給我的只寫道：我的心情，你能了解我吧！給內人的，是託他料理身後的事，他寫著：要自己的遺體火化的骨灰，「請當作養花的肥料用吧！」不料，在入田先生的遺物之中，有改造社版『魯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發行，全七卷）我靠他遺留下來的書，才開始認真閱讀了魯迅的著作。

內村剛介：話題雖然曲折，你與魯迅之間の間接關係，我非常了解，在你楊先生這方面，是靠著日本那位警察，魯迅才進入了你的精神世界。我現在突然回想起，當我在哈爾濱學院上學時，教法學的老師是東大法科畢業的，這位先生在當上大學老師之前，曾在台灣當過警察中最低階級的巡查，這是因為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在經濟恐慌的大不景氣中，就業非常困難，即使第一流大學畢業，找事也非常困難。甚至當時有一部電影叫「大學畢業了，但是……？」因為這樣，當時就是在台灣當巡查，也可算是一份好差事。

戴國輝：在殖民地，官吏的薪水是加百分之六十支薪的，待遇比日本國內好的很多。

內村剛介：那位日本警察，入田春彥氏，大約有多少歲？

楊達：大學剛畢業的樣子，二十四、五歲吧，很沉靜的好漢，不過，我對他的經歷，什麼都不知道。

他對自己的事，什麼都沒有說過。問他的警察同事，也什麼都不告訴我。



楊逵所譯的「阿Q正傳」中日文對譯版封面。

內村剛介：也許，他是一位有好教養的青年，這點不會錯。他對日本的現狀，完全絕望了。抱著一種理想，却在日本國內吃不飽飯，跑到台灣去當巡查，然而到了殖民地的台灣，他所目睹的，使他更加絕望。碰巧看到楊逵先生的「送報伙」，想要看那個作者，這以後，他的心情就壓制不住了，所謂的，利車失靈了。我想如此來了解……，不知如何……。

楊逵：入田先生每月訂了美國的『新民衆』雜誌，英語版的『莫斯科新聞』也每期必讀。

內村剛介：這也可以作為推理的線索，那時，在日本從事左翼運動的人們，互相之間，問對方的經歷出身是絕對的禁忌。不但問是禁忌，聽也是禁忌，這是爲了被抓之後，假定會刑訊，爲了保護自己的組織，不允許互相之間問出身經歷。由於他澈底遵守了這一條鐵律，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輪廓。他連自己的後事都託給楊先生，却對自己的來歷，隻字不提，由這件事推測，大概是個有特殊來歷的人，我好像尋出有關他的一點蛛絲馬迹……。

楊逵：我也是這樣想的。

戴國輝：楊先生，關於你所讀的改造社『魯迅全集』，大約在蘆溝橋事件發生稍後，先兄因爲收藏有

這部書，竟給憲兵隊抓去。對於台灣的留學生來說，『魯迅全集』在東京仍是禁書。因此，要帶到台灣去，那就更難了。入田春彥能在台灣擁有『魯迅全集』，這難道不也是日本人的一種特權嗎？

內村剛介：這樣的話，入田春彥這個人更加是一個特異的存在了。

楊逵：在我的「首陽農園」前面就有一個火葬場，入田先生的遺體，就在那裏火化掉，我去撿了骨灰，這個骨灰罐子，一直由我親自保存著。一九四九年，我被自己祖國的政府逮捕，送到孤島——火燒島，一關十二年。我在牢房裡，我的家人爲了慎重，就送到台中寶覺寺，妥爲保管。因此，他的骨灰，到現在也還在那間寺裡。只因一點線索都沒有，否則，如果能找到他在日本的遺族，我很想把骨灰交還他們。入田先生是九州人，我好像聽說他出身於熊本縣。

### 日本話與台灣話等等……

內村剛介：關於楊先生的「送報伙」，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就是，那文章當初在日本『文學評論』發表時，是用日文寫的，不過，最初在台灣報紙發表時，是用中文？還是日文寫的呢？

楊逵：是用日文寫的。

內村剛介：那麼，這裡就有一個疑問，如果是寫評論文章，用對楊先生是外國語文的日文來寫，我想當然你可以寫，但要寫文學作品，而且是用日本文字來表達的話，那時的心情到底是怎樣的呢？我想你是很難受吧？真能用日文來寫文學作品嗎？

楊逵：是啊！我過去完全沒有漢文的素養，還有，由小學一年級開始，一直就被用日語來教育大的嘛

！因此之故，日本語文的表達能力，我想已經相當可以了。

內村剛介：那是用日文寫就好了呢？還是曾經想過到底用自己的母語來寫文學作品，比較好呢？……但是，那在殖民地的台灣，是不允許用中文字的。

戴國輝：這裏我想稍就日語與台語的問題，台灣話與中國話的問題，更正確說，是台灣話與北京官話的問題，說明一下。

居住在台灣的民族有兩大類，一是先住民，土著的高山族，其二是由大陸遷居來的漢民族。而後者的漢民族又分別使用兩種語言，在台灣稱為「福佬話」，另一種是我們客家人使用的客家話。

說「福佬話」的人，佔台灣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強，如今一般以「福佬話」簡稱爲台灣話。但台灣話與中國話（北京官話）之不同，並非如同東京腔與關西腔之所異，用東京腔與關西腔，兩人可以完全通話，完全了解。但用台灣話與北京官話，則幾乎全不通。因此之故，台灣話與北京官話有很多的迥異。

再者，在台灣使用的語言，無論福佬話或客家話，好多有音而無字的話，至少可以說，有音而很少有字。用台灣語言從事文學的表現，在文字學上看，尚不很成熟，因爲此一語言當作書寫的文字是尚未完成的。

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中國大陸發生了文學革命運動，提倡了白話文運動，文字改革，提倡口語，所謂活的文字，活的文學運動。經過了文學革命運動以後，中國「標準」話也就是北京官話慢慢地演變成了可以表現現代文學的口語。但是，大陸上的文學革命發生之時，日本已統治了台灣二十年以上，固然中國大陸的口語運動，在台灣亦產生影響，但總督府爲了切斷其與祖國回歸運動的

關係，禁止了這一運動在台蔓延。此外，台灣話尤其是福佬話本身也有過口語運動，因為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故未結出預期的果實。

總之，在強制使用日語的台灣，除具有特殊條件的少數台灣人能學會北京官話之外，要想從事文學創作，除了選擇日語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實則，楊達先生寫「送報伙」之時，並未學會北京官話，並且，用閩南語也就是福佬話來表現文學作品，幾乎不可能，用日文來創作之外，別無他法。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間之文化上的影響亦是「傷痕」，我以為從此一語言問題來思索，最能明瞭。

內村剛介：原來如此，現在我明白了。

戴國輝：平常在二十歲以後學到的語文，要用來直接從事文學創作，似無可能。我已是五十歲出頭的人，用中文來寫社會科學論文，已感吃力。漢族系台灣人裡頭，真正已能掌握住近代中國語的辭彙來寫出文學作品的可以說是以陳若曦她們這一代人為開始。也就是說從小學就學北京官話而長大的，大概在四十二、三歲以下的人們才能以中文寫出文學作品。我個人的推測，我想留日中國人作家陳舜臣大概無法以中文來寫小說。又留日朝鮮人作家李恢成也無法用朝鮮文寫出小說的。

### 在火燒島學中文

內村剛介：我想他們寫不來。

我讀「年譜」知道，一九四五年從殖民地解放以後，台灣的使用語言，從日語換到中國話，那時楊先生深為所苦。我看了大惑不解，現在才明白過來。楊先生是從台灣回歸中國以後，才開始正式

學習北京官話的嗎？

楊達：是的。我是被關在火燒島十二年，在牢房中學的中文，後來又向我的孫子學。還有，光復後（回歸祖國後），我出版了用中文、日文印的『阿Q正傳』，就是爲了學習中國國語的。

內村剛介：這種書對日本人學習中文也適用的，那時台灣人却只用來學中文，而且是用日文做媒介，楊先生你當時出版的『阿Q正傳』，一定要在日本重印。

楊達：用閩南話我也試寫過文章，在戰前，『台灣新民報』把文章登出來了。可是，造語太多，以後我自己看了，也搞不清楚我自己究竟寫了些什麼。

戴國輝：所謂造語就是，楊先生所要說的話，閩南話中沒有字的，用同音的漢字來填上，但造語用多了，別人讀起來，完全不知內容說些什麼，楊先生用民族精神來挑戰，但當時終告失敗。

內村剛介：對於我來說，日本戰敗，並不是戰爭結束，因爲我是在戰敗之同時，被蘇聯人抓到西伯利亞去的。所以說戰爭對我還沒有結束。楊先生你是怎麼的？日本戰敗投降，是不是戰爭就結束了呢？我對台灣的事情不明白，却對這些有關深層心理的問題感興趣。

楊達：我先想到沼川定雄和入田春彥，如果沒有這兩個，也就沒有現在的我。

戴國輝：你聽到日本戰敗的消息，是不是和別人一樣，聽到天皇「玉音」廣播的。

楊達：我在家裡聽到的，我有收音機。前一天，報上登了：「明天天皇有重要廣播」，讀到這個，我馬上明白過來。如果不是日本戰敗，天皇是不可能廣播的。那時我已四十歲了，種種情報我也聽到一些，自從日本偷襲珍珠港，引起所謂太平洋戰爭，我就認爲日本註定要敗了。

戴國輝：對楊先生來說，日本戰敗就是回歸祖國，你那時必是興高彩烈的吧？



楊達：是的，所以我就把「首陽農園」的招牌拿下來，換成「一陽農園」。

戴國輝：首陽山變成一陽來復的一陽，是吧？

楊達：於是，台灣總督府向國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這一天以前，我組織了解放委員會，意思是要總督府的統治權停止，我們的要求，特高課長（譯註：指的是台中州廳警察內的特別高等刑事課課長）是以默認的方式接受了，當他向上面呈報時，上面却回說不行，因此才想從文化方面做點事，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出版了「阿Q正傳」。

內村剛介：對楊先生來說，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可以說是命運的決定性事件，是嗎？那個事件的起因是一件很小的事，鬧大起來的，在台北街頭，有一個賣私煙的老婦人被專賣局取締私煙的職員打傷了。群眾紛紛起來抗議，事件以此為導因擴大，後來波及全島，結果，動員了軍隊，造成了血腥的鎮壓，死者達近萬人。

我對二二八事件的情形不太清楚，只知道，主要是日本戰敗後，從大陸到台灣來的國民黨一夥人，氣勢凌人，用高壓手段，來對付台灣的住民，引起了很大的失望，為此，大陸來的外省人和本省人（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時，已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發生尖銳的感情裂痕，日久累積的本省民衆的不滿，是那件事的原因，是這樣的吧？

你是臺灣人，「捏死臺灣人」

楊達：最先，台灣住民是非常歡迎大陸來台的人們的，能夠回到祖國懷抱，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可

是那些官員，官僚得厲害，接收的事，舞弊亂搞，還有，那些軍隊也亂來，有些駐在學校裏的，把教室玻璃打破，把課桌椅搗毀當柴燒。孫文的「三民主義」那本書印了很多，大家都搶先去買，但是，到台灣的國民黨那批人，都是些胡作非爲的，對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那批人完全背道而馳。最後，大家都失望了。

其中最明顯的是，當時老百姓都這麼說：那不是什麼三民主義，而是他媽的三眠主義。還有老百姓又這麼說：那是教科書上寫的「你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他是台灣人。」這樣的句子，發音稍微改成閩南話來讀，就變成意思完全不一樣的話，「捏死台灣人，餓死台灣人，踏死台灣人」這樣的話。

這樣的表達法，老百姓之間，掛在嘴上，貼在牆壁上，到處都是，而且逐漸擴大，抗議私煙事件出了人命，後來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內村剛介：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楊先生被逮捕過沒有？

楊達：我和葉陶都被捕。是四月被抓去，八月才釋放。那時對我是懸賞通緝的。

內村剛介：多少錢呢？

楊達：伍萬圓，葉陶也是伍萬圓。

戴國輝：真是「時代不同了，男女在這一點上倒是平等的」。

「和平宣言」換來十二年牢獄

楊達：是啊！那是因為我和葉陶無論何時，都是並肩作戰的。我被釋放以後，想到，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鴻溝非早一天填平不可，於是在一九四九年，我寫了和平宣言，內容是：建議把二二八事件被捕的人，全體釋放，以及國共內戰之和平解決。我主張這樣。這種主張，說是不行的，我又被捕，這次，被判了十二年徒刑。

戴國輝：那時你有何感想呢？

楊達：那時我認為，我自己的看法誤了自己，是這種心情。唉！我有何辦法！自己的判斷，誤了自己，那就只有自己認了。然而，我決不絕望，在任何困境中，我確信有超拔之道，我確信如此。

戴國輝：是的，楊先生在監獄中寫下了「壓不扁的玫瑰花」，現在被收入台灣的國語教科書內。

內村剛介：我很驚奇，在監獄中，你却可以寫東西，在史達林時代的監獄中，這種事簡直想像不到。在日本特高狂暴橫行的時候，也不可能，在台灣怎麼有可能如此呢？

楊達：那我也不太清楚，大概當時監獄的所長，對我頗為愛護的緣故吧。

內村剛介：楊先生你真是幸運，你碰上了第二個入田春彥。

戴國輝：楊達先生的情況可能是很特殊的，楊先生對台灣民衆當時已經很有影響力。

內村剛介：剛才所學的國語教科書是什麼內容的？

戴國輝：是台灣的國民中學教科書。它却很有意思，第一課是蔣介石的文章，「孔孟學說與中國文化復興之發揚」，第二課是孟子的文章，第三課是楊達先生的作品，但把筆者的名字換成楊貴。我感覺好像其中有些什麼文章似的。然後跳到第八課，是現任總統蔣經國的文章，楊先生到底還是很偉大的。



# 亦談海峽兩岸問題

——和李嘉、陳鼓應鼎談於扶桑

本文原刊在『中央公論』雜誌一九八二年三月號。座談會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參加座談的三人，分別反映了台北官方、台灣本省人及台灣民主人士的觀點，值得注意。原文較長，中譯略有刪改。

## 三民主義是否已實現？

李嘉：中國原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幸被外來的所謂共產制度分裂成爲兩個。

三十年以來，雙方在敵對的狀態下，共存下來。一方面在大陸徹底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設立人民公社，不承認私有財產，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另一面則在台灣忠實遵守著中華民國憲法，以三民主義爲國策，復國建國。

但是，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政權代表中國加入聯合國以來，戰後與中華民國關係特別密切的日本與美國等等諸國，相繼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轉而與北京中共政權建立邦交。其結果，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呈現出被國際孤立的形勢，國際形勢對中共有利，北京在國際間各機

構的發言權在逐漸增加中。

然而，在這十年之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國際形勢的逆轉的另一面，是中華民國與中共的國內形勢以及經濟發展却走向相反的兩極。

一言以蔽之，被國際社會所排除的中華民國，在這十年之間，因為國內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的成長，使國民生活益形豐富，最近國民所得達到每人每年二二八〇美元；而在國際舞台上形勢昂揚的中共，令人啼笑皆非地呈現出國內奪權鬥爭與文革的後遺症，向來依靠「竹幕」隱藏起來的窮困國民生活，終於暴露無遺，國民所得只有二百五十美元，不成比例地低於台灣。

如上所述，分離了三十年的中國，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終於由內戰到對立，又由對立而到今天可以說是「共存」的狀態。以及不能不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這分裂了三十年的中國，再度成爲一個國家，也可以稱爲中國的統一問題。

但是，統一有種種方式，大體不外用武力把對方的土地佔領、合併的方式；或是以和談來達成雙方都同意的方案，使國家統一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再以軍事對決，恐非今日國內外情勢及國際輿論所允許。如此，則只有第二種方式，這也許就是中共常常在口頭上叫喊的「和平談判」了。

這只是我個人原則性的看法，現實上可以採行與否，還有許許多多的論爭與意見。

第一，雙方分裂達三十年之久，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之下渡過，終於出現「共存」的小康狀態，現在突然往「統一」或「合併」的方向突入，是否會有不智的亂事發生？若仍保持目前平靜的狀態，假以三、五年，觀察國內、國際形勢之進展，再開始走下一步，亦不爲遲。持這種看法的人，在中

外之間，都佔多數。這是我個人的感覺，也就是「爲時尚早論」。

第二，在現階段，過早促成中國統一，對今日國際形勢真正有良好影響嗎？還有，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國民生活，也就是中國本身的問題，這些國內問題能否一併解決呢？這種「統一懷疑論」者也相當多。

第三，統一之後，有國體問題，是採無產階級專政與否定私有財產制的共產主義國家呢？還是採民主政治與自由企業爲主的三民主義呢？這點不明白地規定，則統一的道路尙屬遙遠。

第四，中共的葉劍英對台北的呼籲，我個人決不認爲這是「平等的談判」。加了九項條件的談判，怎麼可以稱爲「平等」呢？

第五，以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是台北方面呼籲的和平談判，這是大原則，而且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決非國民黨單獨決定的宣傳。這是全台灣島的人民所支持的國策。因爲有了三民主義才能使台灣擁有「貿易大國」的美名，成爲富裕的國家。看看台灣海峽的彼岸，實行共產主義、人民公社，致使國民所得只有台灣的十分之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業已三十年了，依然未能脫離貧困的狀態，台灣的人民，是從這些實際的現況來拒絕共產主義，選擇了三民主義的。

第六，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在我看來不過是眼光狹窄的地域觀念所產生的奪權鬥爭而已。假如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人果真以暴力取得政權，則比今日台灣更民主、自由、開放的保證在那裏？

陳鼓應：兩個月之前，同事某教授說：「現在台灣與大陸開始合在一起了，不是嗎？台灣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拿出登載了台北政要發表的：「以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云云……的報紙讓我看。我說：「這位大官大概沒有讀過三民主義，或許是沒

有讀通。他在經濟方面擔任行政工作，是個把經濟制度導向資本主義的重要角色。這根本就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

我在一九七八年參加選舉運動時，批評這三十年來，國民黨當局背離了三民主義的路綫。六十年代以後，台灣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路綫，基本上，是美日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一環。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主義，其基本精神是反帝反侵略的民族主義。他擔心外國資本的侵入，但從這一點來看，台灣當局在這方面是背離了中山先生的。

其次，說到民權主義，台灣海峽兩岸有許多人被捕，民主（權）主義有必要加強。

再來看民生主義，中山先生說的是「平均地權」與「抑制資本」這兩支柱子。關於「平均地權」，我們且看一下幾年前的統計數字。台北市七千萬坪的土地之中，有四千萬坪是屬於僅佔台北市的百分之〇點二八的大地主。關於「抑制資本」，七七年『夏潮』雜誌已經舉出十六個大財閥來批判；如今是更集中了，僅僅有十個大財閥壟斷了台灣的生產，從而貧富懸殊巨鉅，民生主義這方面也背離了中山先生的理想。

中山先生揭示天下爲公的精神，我希望海峽兩岸不要搞「天下爲私」，而且，孫先生最後的希望是：和平、奮鬥、救中國。希望台灣當局要切切記住這些話。還有，中山先生一直到去世前夕也盼望「南北和平會議」的成功，對中國和平統一這一條道路，我們也千萬不要忘記才好。

戴國輝：首先我要把自己的立場明確表示出來。

第一，我是在台灣出生，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戰後在國民黨政府之下受完大學教育，一九五五年，來到日本留學，到現在爲止，我在日本已有二十六年（追記；本座談會係在一九八一年末舉行的



了。從這樣一種經驗，對今日的問題究竟如何看法，有幾點可以奉告。

其次，我們家已有四代人沒有回到中國大陸去掃墓了。

最初是日本政府妨害了我們的往來。抱著「大中華思想的」台灣人當中，包括我的祖父、父親以及我剛去世的長兄，（曾祖父的事情我就不很清楚了……）根本上是懷念故土的。台灣人因為有這種立場，所以，我們老百姓本來對共產主義、三民主義這種黨派之爭的真面目如何，一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有意去計較。

後來主要是自由往來被阻止了。我們想要回去掃墓是最大的意願，但是，政治並非如此單純，政治常常並不考慮老百姓的意願與感情為何，此乃司空見慣之事。尤其是在兩個政權激烈抗爭時爲然。

台灣當局一直高唱「反攻大陸」，但照李先生剛才所說，現在已沒有這個可能了。另一方面，北京也高唱「解放台灣」，這也有了種種變化，現在不是解放了，「和平統一」倒變成了新的口號。台灣當局也由「反攻大陸」改唱「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雙方如此變化，我們應予留意，不應輕易放過。在台灣有中華民族意識或中華思想的人們，對於這種變化感到重燃希望，鬆了一口氣。有心人厭倦政治口號，有心人厭倦流血。到現在爲止，台灣人與中央的政治一直沒有過真正重要的關係吧，不管是在台灣或在大陸。——只與地方政治有些關係而已。有朝一日，我們台灣人也想到中央的舞台上扮演一些角色，或者是回到大陸的老家——我思念的老家在廣東梅縣——去尋找源遠流長的根，去掃一掃祖墳，只有這麼淡淡的希望。這一個感觸，這一種希望，是在國共雙方的上述變化中，重新燃起的。

其次，談到對三民主義的看法。一般台灣的地主階級有著這麼一種意思：農地改革是一些口實，

實際情形是，國民黨一聲令下，就把農地所有權轉移了。土地拿去以後，一部份上層的地主變成了資本家，對台灣的工業化擔當了一個角色，但其餘沒有上船的中小地主是一直懷有不滿的。若從長遠的歷史及邏輯來看土地改革的意義，不但可以理解，而亦可接受的。但從感情上，當今對國民黨那種做法始終抱有不平。

再其次，我們談到三民主義的問題，台灣當局目前說他們已經在實施三民主義，這究竟是不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呢？我很坦率的講，從文獻上、理論上所知道的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與目前台灣當局所執行的，是有一段距離的，這一點應該是事實的吧！這之間的差距，倘若站在台灣當局的立場，是可以了解的。何以可以了解呢？因為國民黨面臨著大陸的壓力，他自有一套來自圓其說。爲了適應台灣海峽的情勢，國民黨有限地試行了他們的三民主義。問題並不在於這種自圓其說，而在台灣的老百姓大多數並不認爲目前的台灣已經實行了三民主義。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從這個層次來分析，我認爲台灣並沒有實現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我倒是希望台灣當局修正方向，把孫先生的理想付諸實現，像台灣的經濟、民衆的政治參與等等，能夠回到孫先生的理想的真面目上去。這是我所期待的。

### 九項提議的真意

陳鼓應：我在葉劍英發表九點提案時，正在香港，我曾與友人包奕明共同提出六點意見。

首先，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是全中國人的問題，不僅僅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問題，如果黨意能夠包

含民意，甚好，否則應以民意為依歸，不容違背民意，而以黨意為主。

第二點，統一之後，台灣的經濟、社會、生活方式等，在九項提案之中，是主張不變的。這種看法與社會發展的法則不合，無論什麼生活方式或社會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變的，必要在漸進的過程中，向著民有、民治、民享，或者是民族、民權、民生的方向改進。台灣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不良之點也有不少，同樣大陸的生活方式須要改善的也有，比如說鬥爭頻繁，官僚主義跋扈，單調枯燥的生活等等，就應予改善。因此之故，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第三點，是關於軍隊的，在台灣的軍隊應對付外來的敵人，特別是蘇聯人的擴張主義，不可以因此而增加人民生活上的負擔。

第四點，台灣與大陸當局，對待本省同胞的態度與設施方面，都要充分了解同情他們遭受的種種歷史創傷。

第五點，是有關過度中央集權的問題，就是在統一之後，為避免中央集權的弊害，應檢討國體，改為聯邦制的問題。

最後一點是，大陸對台灣呼籲和平談判時，必須儘量減除「統戰」式的宣傳壓力，並在各種設施上減少台灣同胞對統一的疑懼。台灣方面也不應該在兩岸交流互通方面，拒人於千里之外，要能跨出「海角樂園」，對軍國主義侵華歷史造成的分裂局面，展示協同合作，共建國家的歷史責任感。海峽兩岸或官或民，都要心懷全國格局，致力減少分裂所帶來的不幸，以及敵對帶來的惡果。

復次，中共對九項提案之主要動機是，要使台灣內部有財產的人放心，並要使台灣的國際投資環境安定下來。

但是，台灣方面一概拒絕的態度是奇怪的，比如三通，我認爲至少也應該讓一通開始，這是很重要的。從大陸來的三百萬人，他們與父母兄弟姊妹都不能通信，不管從那一立場來說，通信應該是自由才對。台獨人士對這些事不能理解，說這是你們外省人的事情，其實不然，台灣省籍的人在大陸上也有二萬多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李嘉：中共過去也作過同樣的呼籲，這一次，我認爲可稱之爲集大成的、綜合的呼籲。

中共要以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這一點向海外華僑表示，這一個目標，是這次和平攻勢的一個理由，而中共真正的目標也許是對準美國，也可稱爲對美國的和平大合唱，其大合唱的戲目叫做：「不許把新武器賣給台灣」。不過，美國對中共的目的，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之故，我認爲這次不會有多大的收穫。

台灣方面，如果不僅僅說「不」，而是誠懇懇、詳詳細細，把拒絕的理由說明清楚，也許會得到更多內外的同情與理解。國民黨因爲過去在兩次國共和談之中，損失很大，因此對於中共有很強烈的不信任感。在進入談判之前，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感不得不由中共方面予以擦拭乾淨。呼籲談判之前，爲了消除國民黨與台灣民衆的不信任感，應由鄧小平向全世界宣稱，即使談判失敗，也決不使用武力作爲解決統一的手段，台灣方面才會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

現在，台灣與中共政權沒有接觸，但在人道上的往來應予鼓勵。如所周知，台灣是一個狹小的島嶼，如果大陸上有許多人要來，台灣是無力收容的。現在是一概拒絕從大陸來的訪客，這是實情。但是在海外，台灣的人與大陸的人之間，親戚的招待，同學的往來，體育競賽的交流是已經公開舉行的。

戴國輝：陳先生對九項提案以大局的立場所作的批判，我相當留意。特別是提到不僅僅黨意，而且要盡量包含民意的主張，我很贊同。

我因出生在台灣，自認要克服「島氣」而以更遠大的歷史眼光來展望自己故鄉與國家的問題。台灣的問題，不要只以台北、台灣的管見來看世界，而是要以全中國、全亞洲，乃至全世界的視野來看世界的動向與台灣問題。也就是說，把我們台灣本身問題的定位搞清楚，來尋求出路。這是我常常說的。

並不僅僅是我個人，而是同我差不多年紀，或是與我有來往的台灣人，對於這次的呼籲，他們從報上看到以後，總是覺得自己還是局外人似的，與現實問題有著一種疏離感，這種人爲數頗爲不少。這是台灣人對於當政者對台灣的民意、台灣人究竟在想些什麼從來不甚關心的一種不滿的表示。有關三通這一點，是否應該把島內、島外，尤其是國外的情形分別對待，分開來分析、討論呢？誠如李先生剛才所說的，住在外國的人，三通已經相當程度在進行著了。在美國曾經號稱親國民黨的學者，其中多數也去過大陸了。現在在日本居住的台灣出生的日籍華人，也一邊到大陸去旅行，一邊又回台灣探親，國民黨當局現在聽說已經不太找麻煩了。這表示三通並非全然不行，透氣筒子是愈開愈多了，只不過台灣內部沒有公然開放而已。在台灣島內是沒有搞直接的溝通，但透過島外的溝通是頻繁的，這是實際的情形吧！國民黨的情治機構也應該有所聞，却不吭氣。

所以，就如李先生說的，在體育活動上，學術會議上交流了，但若台灣內部迅速自由化的話，對國民黨有不方便與困難吧！

李嘉：自由化這個詞會引起誤會，是開放的意思吧？

戴國輝：對！對！但是，台灣當局，比如行政院長與新聞局長是發表了拒絕的聲明。不過，對國際形勢比較有留意與認識的台灣企業界的人士，對那種拒絕的聲明，不會像日本傳播界那樣輕易單純地去接受。舉一例來說明：陳納德夫人陳香梅到北京與鄧小平握手吃飯，之後，路過東京到台北，在台灣又與蔣經國吃飯的這種作法，若在以前，蔣經國在公開場合就不會接受。企業界人士是如此說的，同時他們又加了一句，以過去那種「漢賊不兩立」的作風，該會把陳罵作反叛者，一脚踢開，給她吃閉門羹……由此可見，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化。

有一部份人主張國民黨當局不應該老是採取守勢，慢慢也該轉取攻勢，來掌握主動，尤其以三民主義自誇的國民黨。

下面我談談有關十四名受邀請者的名單（按：指八一年十月九日，胡耀邦公開提出邀請蔣經國等十四名政要訪問大陸。）的問題，十四名受邀請者的名單之中，第一次出現了台灣省籍的兩位人士，其一是副總統謝東閔，另一是省主席林洋港。我並不認為這兩個人上了名單有什麼特別重要性，但有台灣省籍企業家却為此表示欣慰，他們說台灣人只有一千六百萬，大陸有十億，我們人數並不多，不管怎樣，第一次向我們打了個招呼，這就是值得高興的事。由此，可以清楚地反映一部份台灣同胞的心情。

關於三通之中的貿易一項，台灣大同公司生產的電飯鍋經由香港賣到大陸去的事情，這是台灣家傳戶曉的事，台灣的國民黨自然知道，只是不便公開發表而已。

陳鼓應：李先生、戴先生所說的交流已在進行中是事實，……如果家人病危，或者是死亡的事情發生，海峽兩岸應該讓他們無條件立刻返家料理一切才對，那怕回去只准停留四十八小時，或三天也可

以，這一點希望雙方都能促之實現。

### 台灣島內運動的焦點

戴國輝：如前所述，我是台灣出生的台灣省人，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我現在五十歲，當然並不等於我接受到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但我的父兄輩是受到了這麼久的統治。因為有過這種處境，戰後，我們歡欣鼓舞地慶祝過光復。講得更清楚一點，那時我的父母他們親匿地高呼「阿石伯萬歲」（蔣介石伯伯萬歲），大表歡迎。偶爾，國民黨的軍隊或官員之中，有從廣東來，會說客家話的，我們就把他們請到家裏來吃飯，而且非常關切地問到我們大陸老家的近況。

我家也和別人一樣，台灣的地主過去多半是那些爲了三餐而渡過台灣海峽前來的人的後裔。他們拼命與山胞打仗，把土地變成良田，一部份人就成爲地主。其間由於甲午戰爭失敗，日本人來了，有些人飽受欺凌，可是基本上，日本人爲了便於統治，對於地主是採取懷柔安撫的態度的。所以說，我的家是一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反抗，另一方面又是這一統治的部份受益者，這是客觀的事實。從這個關係來說，對於國民黨的農地改革是存有不滿情緒的。

抗戰的勝利，台灣光復，使我們欣喜若狂地把蔣介石尊稱爲「阿石伯」，但生活却並未改善。二二八事變發生以後，台灣人的領袖們被慘殺的不少，於是對國民黨失望了。台籍中上層人士正在茫然若失，不知所從的時候，國民黨爲了防共保台，遂實施了農地改革，從他們口袋裡把錢拿去；國民黨政權是安定下來了，但依然像日本人那樣，對他們參與政治加以限制。從殖民地以來，台灣本地

地主除了小部份上層階級之外，中下層地主一直被限制參加與他們具有的經濟力相符的政治。國民黨當局也爲了保持其所謂的法統，在地方政治上還讓部份台灣人參與，至於中央政治方面，却差不多全不讓參加，這種心裏的希求被抑制了，對政治參與的飢餓感便是台獨今天的部份心理基礎。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是否如此是另當別論，但這個問題的癥結與根源應該知道才對。

居留在海外的台灣省人，連我個人在內，出身於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弟佔絕大多數，這些人在海外定居，有了恆產，入了籍後，他們自上一輩一直抱持有的「被遺棄（清朝的割台）感，被迫害意識以及被歧視的差別意識」猛然抬頭。他們對農地改革的嘀咕（他們認爲被利用但沒有得到補償）以及對政治社會現況的不滿情緒，開始公然表露。對於這些人來說，中共要從台灣海峽渡海而來，這對於自己的前途、生活，具有巨大的影響。所以顧慮甚多，因而正在力謀「本錢」以備討價還價。但對國民黨爲了保持自己的政權，而宣傳人民公社如何可怕，等等的反共宣傳，台灣的企業家及海外知識份子是用著與國民黨有關的人士所不同的耳朵來聽這些反共八股的。國府的宣傳方法搞不好，將會誤導一般台籍人士爲反共、反中國大陸與反國民黨、及反外省人排在一條線上，毫無分別，鬧成悲劇。

此外，台灣內部的老人，還有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總之，接受中國教育較多，而受日本教育影響較少的人之中，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嚮往，視野較廣大，自前面所說的「被出賣與被歧視的『台灣孤兒』意識」中解脫出來的人也有，他們之中，能把台灣問題從全中國，全世界的情勢與動向掌握的人士也逐漸出現了。

所以說，把台灣目前的反政府運動，只當作台獨在那裏興風作浪，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其實，



其主流是民主化運動，而追求社會正義的實現，人權的保障以及政治上充分的參與却是一股強烈的暗流。

其次，從二十到三十幾歲的激進份子之中，他們有強烈的政治參與要求，而又高唱民主，如果這不能被接受或受到阻礙，那就成爲憤怒的一代。如果這種人有反共意識的話，就容易走向台獨運動。對於台獨運動，精密而又冷靜的分析是必要的。只動用背祖論、中華思想、黃帝子孫爲依據來謾罵，那是談不上說服力，沒有太大的效果。

陳鼓應：台灣島內的經濟發展，主持其事的人，特別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們對現況是滿意的。還有一部份人，這也是包含中產階級的人，他們希望改良，他們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發現了行政效率低和政治上的弊害。經濟成長受損失最大的是下層階級。因爲這個道理，黨外人士爲主的民主運動是有基礎的，黨外的運動並不等於台獨運動。

今天，島內在高雄事件之後，政府的處置有不當之處，而高雄事件之後，又有林義雄滅門慘案，接著又有陳文成橫死事件……。

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給予台灣社會很大的不良影響，是可以斷言的。對高雄事件，國民黨的處置是不適當的，這明明是要求社會開放、要求政治參與的一種運動，却硬把它當作十足的台獨運動來處理。高雄事件發生時，有一些參與運動者是有較濃的地方色彩，却不應該把他們當作台獨。

黨外運動，一般是主張言論自由，改善法律制度，人權的保障。這些方面的努力，相當得到民衆的共鳴，這是實際情形，總之，黨外運動的主流是民主化運動。

島內由於高雄事件以後，政府的壓力大，黨外採取了低姿勢，但是對於前述他們努力的方向，依

然在進行中。現在黨外覺得高雄事件有些盲動的傾向，比較穩健的方向是他們現在所採取的。

另一方面，在海外——主要是在美國——統一派由於「四人幫事件」，遭受重大的打擊，真正的活動幾乎完全停止了。海外的台獨運動認為高雄事件以後，中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是失敗了，所以變成了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的主張。

海外與島內，運動趨向兩極分化的樣子，這因為海外台獨的主張與台灣內部人民追求他們當然的權利，是兩碼事。台灣人只為了一點點權利要求，就馬上給戴上了台獨的帽子，這是錯誤的。

總之，重要的是，現在台獨運動的主張，對島內的民主化運動，變成不是支持，反而是妨害。所以我对台獨運動採取批評的態度。

李嘉：現在，台灣內部有一部份人對現政權不滿，並且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有不和睦的現象。這在外國也是有的吧！假如，東京突然來了三百萬大阪人，兩者之間的日常生活也會起種種摩擦的。

我感覺非常悲傷的是，讓時間慢慢自然可以解決的問題，却有許多人用近視乃至誇大的眼光來看之。沒有把握到問題本質的外國人，利用一部份對政治有野心的人起鬨，不知不覺之間助長了台獨運動，到了發展成爲奪權鬥爭時，那外國人本身也會受到連累的。

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認爲國民黨是從外面移來的，因此，國民黨等於大陸人，大陸人等於國民黨，有這種錯覺的人很多。現在的國民黨員百分之七十五是台灣省人，而且台灣的大企業多是由台灣省人所有或經營，這是三十年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爲本的自由競爭的自然結果，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在政治上，企圖以暴力破壞來顛覆政府，這和奪權鬥爭是相同的，這種傾向是很危險的。

隔著台灣海峽有兩個政權還好，今後還有統一的可能……。現在最可怕的是，在台灣島內，有人要製造兩個中國。果真如此，台灣就完了。

市、鄉、村選舉的當選者，百分之九十五是台灣省人，反而從大陸來的人，變成了少數派，在地方政治上沒有發言權。因感孤獨，遂漂流海外的人也有。

有熾熱的愛國心，死也要保衛台灣的人看來很少。果真愛台灣，則先非團結起來使台灣成爲一個堅強的台灣不可。當然，與大陸以平等的立場來談判統一問題的日子是會來臨的。但在現在這個時空，若自亂陣腳，那就難了。因爲怕共產黨要來，台灣省籍的上、中層人士在（國府）與美日斷交後，大舉遷往美國。同時，大陸出身的人士之中，也有人認爲一旦台獨取得了政權之後，生活就沒有保障，因感不安，遂把子弟多送到海外。

只要是自己的國家，不管是那裏人，只要是中國人，而又住在台灣島內的，對於台灣存在的各種缺點，應同心協力來改善、改革，使之成爲更完美、更強大的台灣，這才是應負的使命。

坦白說，現在台灣只不過是各先進工業國家的衛星國而已，還不是可以自稱爲貿易國而沾沾自喜的階段。而建立一個完全自主獨立的工業國家的基礎，這是比什麼都要緊的課題。

戴先生所說的「農地改革」以及陳先生「台灣不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論調，我不能完全同意。台灣的「土地改革」我想也是依據三民主義來做的，也許，地主是蒙受了某種損失，然其目的並非是要地主變窮，而是使數十萬佃農能有自己的土地。台灣的土地改革是相當成功的，這有聯合國調查的資料爲證。

陳先生的「不是三民主義」的批評……。國民黨也許有些地方應該反省，但如果沒有故總統蔣介

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就沒有今日的台灣，今天台灣仍會處於窮困中吧！一九四九年美國不可能佔領台灣，而會被中共派遣的台灣省籍的共產黨員統治下來。

美國的報紙喜歡用「政治流亡者」來揶揄由大陸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員或與中共不同立場的人們。它從政治史上看，台灣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政治流亡者所建立的，這點美國人却不知道。台灣同胞的祖先大多是從滿州人統治下逃出來的政治流亡者。首先，鄭成功就是一個明朝的政治流亡者，他從大陸率領艦隊趕走了荷蘭人取得了台灣。鄭成功與當時的台灣主人荷蘭人打了一仗，荷蘭總督正式簽投降書，台灣才納入了中國的版圖。如果不是鄭成功，則今日台灣不是中國的，它會像戰前的菲律賓那樣。二、三十年前鄭成功把台灣從白人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國人的領土，今日，故總統蔣介石從共產黨的侵入與佔領之威脅下，保衛了它。說這兩個人是台灣的恩人，不會過甚其辭吧！

此外，陳先生關於台灣的財閥的批判，亦不同意。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是中產階級為中心的社會，而貧富懸殊應予避免。今日台灣的貧富之差，在二十九個開發中國家中最低，其最富與最貧的平均差為四點二五比一。

我對最近的台獨運動完全無法理解，是奪權鬥爭還是想擴大對政治的參與，我完全不明白。今日台灣的成功並非奇跡，是戰後困難期間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和本地的人，共同携手流淚流汗所建立而成的。有了錢，雙方為了權利，為了功利而打起架來，這真是可悲的事情。

現在台灣的緊急課題是行政效率不高與警政辦不好的問題。社會治安太差尤為各方所不滿。提高行政效率是台灣當局應及早進行的。把民衆的不滿之情，不分青紅皂白，通通當作台灣獨立的理由和基礎，那是把問題過份簡單化了。

我認爲今天世界最大的威脅總是蘇聯，一國乃至一地區的局部安全是不可能或不易維持的。我們考慮到自己的安全時，若不從全世界的規模來看形勢，那安全保障政策是無法建立的。西太平洋安全問題也以對蘇聯的行動加以警戒爲要務。現在想和台灣接觸的當然是中共，另一方面，更想和台灣握手的却是蘇聯。我的看法，中共沒有對台灣採取全面攻擊的可能，同時也不具備這種軍事行動的能力，問題是蘇聯會使出哪一招？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華民國的國防政策，對付蘇聯的軍事進入遠東，重於反攻大陸。雷根總統提出的全球戰略，我們應積極參與。這樣也符合日本的防衛政策。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央，如果被共產化，則整個亞洲便變色矣！爲了防止這一點，台灣需要新式武器，其目的並非反攻大陸，我想這應該講明。如果台灣的國防政策像我所講的這樣發展下去，積極成爲全球戰略的一部份的話，中共對台灣購買新式武器一事，應該不至於插嘴吧！

陳鼓應：大陸與台灣是利害與共的一個整體，首先應該確認這一點。從中華民族全體的共同利益而言，中國自然是一個國家。由於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與生活水準等等大陸與台灣不同，借此反對統一的人，是在強詞奪理。例如，有一個國家佔領了北海道，行使其影響力十數年之久，然後對日本人說：「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與日本不一樣，所以是外國。」試想想看這情形吧！社會制度是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人才是主體，制度不好應予改善，且海峽兩岸有待改善的地方很多，這是事實。制度與生活水準都是會變的，變了以後就可以統合。還有，就是非從全球戰略來看問題不可，此點我與李先生有同感。大前題是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不能不予保障。

美國與大陸的貿易、文化交流與友好關係愈深，這從全球戰略來看，對對抗蘇聯擴張主義這點是

有利的。但是，美國實際上是由「軍工綜合體」來支配這個國家的，他們同時將兵器賣給阿拉伯與以色列，讓他們打仗，這種事是有目共睹的。對這一點，我們作爲中國人，應該要深刻了解。如果大陸與台灣都要購買武器的話，則只能用來對付蘇聯的霸權主義的侵略，像剛才李先生所說的，購入武器並不是用來對付自己的同胞的，同時，現在保持的兵力也決不可對自己同胞使用。雙方應該明確宣佈這一點，使相互之間有所信賴，有所了解。

戴國輝：我是台灣出生的客家人，同時以身爲中國人引以爲榮，在東京我對任何政治活動都沒有參加過，我一直以研究工作來約束自己，並對於這種研究頗爲自負。作爲一個研究者，需要以冷靜的分析對待台灣問題，若是這種態度要受到批判的話，我願接受。以一個研究歷史的人，對李、陳二先生有關國際形勢的意見，基本上我表示贊同。

總之，大陸若要用武力解放台灣，我是反對的，同一民族之間流血，會留下很深的傷痕。「革命」本不是要製造傷痕。我身上流著台灣開拓者的「血」與精神，我愛我的鄉土台灣。並盼望我們的同胞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海峽兩岸的對立。

# 附錄：

## 站穩在我們生活的大地上

——訪戴國煇教授談當前一些問題

陳國祥

旅日歷史學家戴國煇教授，精研台灣史，著有「台灣霧社蜂起事件」、「台灣與台灣人」、「中國蔗糖史」及「華僑」等書，備受日本學界推崇。

他是台灣桃園人，一九五四年畢業於中興大學農經系，一九六六年獲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日本立教大學。

內政部長吳伯雄是他的妹婿。他日前率領立教大學棒球隊來台比賽，並洽談一本「戰後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鉅著的編撰事宜。

記者日前訪問他，討論台灣經濟體質、官僚體制、民主政治、社會發展及學術研究等問題。以下是訪談摘要：

記者：你這次回來，剛好碰上十信和國信風波，你認為造成這次金融風暴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 台灣經濟體質太虛胖·官僚體制缺陷須創新

戴國輝：十信與國信風波反映台灣的經濟體質過於虛胖，經濟上許多不上軌道和亟待充實之處，長久拖延未解，現在爆發出來了。

台灣的經濟，外觀上是資本主義，理念上是三民主義；政策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未形成健全的資本主義金融體系，也未建立完整的資本主義法治，一切顯得序中有亂。

後進國家邁向現代化過程中，政府應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但我們的官僚體制存有一些缺陷，官僚的培養制度也未形成。日本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才培養出健全的官僚體制，他們的官僚積極有為，很少走後門，利用職權牟利，雖然也講裙帶關係，但不嚴重；我們的官僚體制中盛行裙帶關係，走後門的歪風把應有的現代化素質啃食掉，進步而有專業素養的人被老式、保守而腐朽的群體吞噬掉。

經濟部長徐立德辭職，固然表現了道德責任，但如果不能全面調整官僚體制，提高其效能，釐清責任義務分際，則根本無法解決問題，艱辛締造的經濟果實將來也可能毀掉。

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動態社會中，問題一定層出不窮，我們不怕有問題，祇怕官僚體制法令制度和社會內部沒有解決問題的力量。

記者：從金融風波及其引發的企業倒閉風潮，是否反映台灣的經濟體質和官僚體制太不健康？



戴：台灣隨著工業猛晉，引發很多矛盾，尤其是都市和農村的矛盾，工業和農業的矛盾。爲求正常而平衡的發展，必須有高效能的官僚，制定優良的政策和制度，加以引導，建立秩序，步上正軌。令人擔憂的是，台灣社會中間衝力強勁，但始終看不到指導其方向及整理其秩序的充沛力量。

台灣戰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由於政治上強調反共復國，雖以保住基地爲第一優先，但打基礎的意志薄弱，而且由於政治掛帥，不但流於口號政治，經濟也是口號經濟，表面看似堂煌瑰麗，實際上却始終沒有求實、求深，未能按部就班發展，因此經濟體質十分脆弱。

其次，中國官僚喜歡管，較不尊重民間衝力，而且思想觀念囿於傳統格局，缺乏新知睿見。而且做爲管理主體的官僚體制，老人當道，新人不能形成班底，因而效能低落。

### 痛定思痛因應新挑戰·重言論調整經濟構造

爲求痛定思痛，我們必須在十信風波之後，針對新的挑戰力求因應，重編經濟構造，並把官僚體制弊病的膿頭找出來，澈底根除。

記者：我們的官僚體制愛管而又管不好，而且抑制民間力量的伸展，是否反映政治民主化程度太低？

戴：在正常的民主社會中，尊重言論，批判和學術自由。一個沒有批判的社會，絕對不會健康。批判和挑剔不同，更不是潑婦罵街，而是站在學術理論的立場上討論問題。

我們的社會盛行耳語、小道消息和談論隱私，拍賣小道消息的書刊大行其市，這反映社會不成熟，缺乏批判的風氣。這和印度類似。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小道消息很少人理會，頂多祇供消遣；批評若缺乏事實和理論依據，也不會被接受。

我們迫切需要推動政治的民主法治化，並且宏揚批判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帶動大眾媒介和學術研究的批判風氣，以便提昇民衆的素質，引導民間力量的蓬勃發展。

此外，我們的民主法治，總是因爲反攻大陸政治框架凌駕頭上，許多矛盾無法擺平，因而未能順利發展，結果民間力量雖很強大，但到處亂跳，非常可惜。

記者：台灣社會除了民主法治不上軌道，缺乏批判風氣而瀰漫小道消息外，人心意識似乎也是鄙俗而缺乏理想性格，你是否也有這種感覺？

戴：這次我回來，發現台灣社會瀰漫「向錢看」的風氣，許多親戚朋友老是在談論賺錢，有沒在國外置產，子女有沒有送到外國去，到處是購物場，污染嚴重，人雖活潑，但少有理想。學術也不被看重，大家拚命想學自然科學、電腦，人文和社會科學偏廢。這種發展將使社會變得跛腳，健康不起來。

台灣整個社會太「向錢看」了，偏重工商業發展，根本不重視平衡發展。尤其可憂的是，現在大家拚命想用工業賺錢，把農業當做一種包袱、一種負擔。這是純從經濟觀點來看。然而，農業不能祇從經濟觀點來看，不能缺乏農業哲學。社會安定和農村、農業有密切關係，一個穩定的社會，少不了健康的農村。因此，農業除了經濟上的定位外，還要有哲學上的定位，否則就會變成新加坡和香港，成爲都市商業小國。

我們必須構思在一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得應佔國民所得多大比例，農村人口佔全部人口多大比例；同時必須考慮一個富有人的尊嚴的生活方式中，從整體觀點上給農村定位，以建立一個健康而穩定的社會。

記者：台灣除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矛盾外，文化上也有中國意識和本土意識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應如何化解？

戴：如何對待歷史的教訓。以及如何追求未來的發展，應該聯結起來看。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方面在高倡具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大中國主義，另一方面則在極力抗拒，中國的歷史文化，提倡本土主義，而形成對立。這兩種立場都是不對的。

我們固然要提倡本土化，站在我們現在生活的大地上發言，但也不能抗拒過去的歷史。現在一些主張本土性的人，好像一定要抗拒中國意識，這雖是歷史的傷痕和挫折在作祟。健康的文化發展應是把歷史的本土結合起來。未來是歷史的一部分，現在更是歷史的一部分，一定要把歷史、現在和未來拉在一起。

有些高倡大中國主義的人，則常誇耀中華民族的優越性，帶著濃厚的沙文主義色彩。不錯，中華民族曾建立光輝的歷史，但我們不能一脈相傳，就顯示我們有一些劣根性，而不能繼續發揚光大，就是我們自己有問題。

因此，無論提倡大中國主義，或是本土主義，都不能走極端，更不要把兩者對立，而必須相互配合。我們必須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生存社會歷史和現實的總合。

記者：文化上的本土化問題，似乎也應包括學術研究上的本土化問題，我們如何建立本土化的

研究取向？

戴：這是缺乏社會價值體系優位性所造成的，而以美國或日本的尺碼來評價，用美國或日本的眼睛來看待，造成嚴重的侷限性。

我們一定要站穩在我們生活的大地上，把美國或日本的尺碼調整為自己的尺碼，把美國或日本的眼睛變成自己的眼睛，以自己的立場構成自己的價值體系，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 美日理論僅可供參考·培養主體自覺創新機

有些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的人，就自以為很有學問，而不知道博士祇是走進學問的門口，學歷不等於學力。我們不能老是往美國日本看，美日的理論學說祇能參考，不能一味跟著他們走，而必須走自己的路：站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看我們的過去和未來，並且培養主體的自覺，用自己的觀點來看待事實。

（原載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自立晚報）

## 跋

這一本集子，是由在台的熱心朋友們倡議出版的。收有學術論文一篇，小雜文三篇，演講稿二篇，座談會記錄四篇，總共十二篇文章。

除「訪我稿」二篇外的所有「底稿」都是由朋友們先自日文翻成或自錄音帶整理成稿，再經我親自審核定稿的。因此我得先多謝幫我整理「底稿」的熱心友好們。同時我亦得向供我機會將我既今未成熟，又尚臥在深層心理的意見或意識顯現出來的、有關雜誌的編輯先生和女士們，以及陪我座談的幾位學長致謝。沒有他們的賢讓，我的發言是不會有其突出和光彩的。當然沒有學長、好友們的協助，這一本書也是不會出生的。

有關本書——係我生平第一本中文書的催生，我還得提一下，我訪問北美一年的「幸會」和「遭遇」。一九八三年三月底，有幸受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園。在這足足一年的期間內，我常受邀前往北美（包括加國）各地作些訪問和演講。等我回到東京寓所寄賀卡時，發現受過指教的新舊知音將上百人，真叫我驚喜不已。

在「幸會」的許多熱絡感人場合裏，一而再地有鄉親以及知音，殷殷地向我遊說（他們的話裏常常還含有些責備的「苦言」在）「老戴！你怎麼老向日本人服務。我們都

知道你已有多篇和多部的日文專著，爲何不把它譯出一些來以饗中文讀者呢？日本人口雖有一億多，但千萬不能忘記，講中國話的卻比它多十倍的呀！你得好好地考慮，年紀已經不小了！」。

聽了這些勸言和苦言，心裡甚感不安。一憶出國飄泊已近三十年，拿不出一點「東西」回饋社稷，真有不少酸苦之感慨。

凡是大海是不拒絕細流和涓滴的，我終於決定獻醜一番。我不知道，收在本集的一些拙見，將給讀者諸賢帶來些什麼？是「憤怒」呢？是「懊惱」呢？或是一些微小的「衝擊」。我本人，雖不敢抱有任何奢望，但冀望的倒是具有正面且理性的「知性的刺激」。

本書，若是少有白、錯字，應該歸功於王曉波兄和王永先生，因他們幫我校正過。若有錯處當然歸罪於著者本人。

至於順利問世的功勞則該歸於陳宏正兄和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社長，他們的熱情教我難於忘卻，是值得我大書特書的。

本書各篇，都曾分別發表在台灣、香港、美國及日本的各種刊物上。現在我將各刊物的名稱記在本書的末尾，聊以表示謝意。

一九八五年三月吉日

戴國輝

## 本書各篇原發表的刊物

(一) 布扣唐裝的耕耘者

(1) 『遠東時報』，美國加州，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

(2) 『中華雜誌』，台灣，一九八二年六月號。

(二) 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

『民主台灣』第三十一期，美國芝加哥，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

(三) 晚清期台灣的社會經濟——并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人治台史

(1) 日文本，初收刊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法與亞州』，日本勤草書房，一九七〇年五月三〇日。

(2) 『台灣風物』，台灣，第三十卷第四期，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民主台灣』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共四期，美國芝加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

(四) 給東鄰日本的諍言

(1) 日文本，初收刊於『世界』，日本，一九八二年十月號。

(2) "Advice For Japan As An Asian Neighb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c. 1982。

(3) 『台灣與世界』第九期，美國紐約，一九八四年三月號。

(五) 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的往事

- (1) 日文本，初收刊於小著『台灣與台灣人』，日本，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
- (2) 『中華雜誌』，台灣，一九八二年六月號。
- (3) 『中報月刊』，香港，一九八二年七月號。

內 隱痛的傷痕

- (1) 日文本，初收刊於小著『台灣與台灣人』，日本，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
- (2) 『中報月刊』，香港，一九八二年七月號。

(七) 日據價值體系之批判

『前進出版社、每週一書』（前進系列總號第六十七號），台灣，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

(八) 「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從自我體驗來自剖或解釋——。

(1) 日文本，初收刊於『漢民族與中國社會』，日本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2) 『民主台灣』，第三十六期，美國芝加哥，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九) 「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與陳映真對談於愛荷華——

(1) 『台灣與世界』，第八與九期，美國紐約，一九八四年二月號與三月號。

(2) 『夏潮論壇』，台灣，一九八四年三月號與四月號。

(十) 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與李哲夫對談於華府——

(1) 『台灣與世界』，第十與十一期，美國紐約，一九八四年四月號與五月號。

(2) 『夏潮論壇』，台灣，一九八四年八月號。

(十一) 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陪內村剛介訪談於東京——



- (1) 日文本，初收刊於『文藝』，日本，一九八三年一月號。
  - (2) 『台灣與世界』，第四與五期，美國紐約，一九八三年九月號與十月號。
  - (3) 『文季』，第四期，台灣，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號。
- (ㄅ) 亦談海峽兩岸問題——和李嘉、陳鼓應鼎談於扶桑——
- (1) 日文本，初收刊於『中央公論』，日本，一九八二年三月號。
  - (2) 『七〇年代』，香港，一九八二年五月號。
  - (3) 『生活與環境』，台灣，一九八二年七月號。